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创建和谐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创建和谐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创建和谐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十卷 创建和谐

主 编：黄友兰 蒋建农

副主编：刘志南 徐小宁

编辑部：任仲涛 万松涛 王英才 王树芳 文道秀
邓廷民 卢 俊 石奇丰 田 婷 江 涛
江雪松 刘 铭 刘亚友 刘延金 李 明
李小红 李其金 李 亮 杨 帆 刘志男
李瑞华 李丹慧 杜 蒲 金映喜 李 宁
袁 嘉 苗 棣 胡茂桐 黄 明 王建写
王铁梅 邵迪新 耿昭明 解玉国 佟立伟
徐敬华 何茂才 杨立新 陈立明 王国写
张凤车 陈明磊 于立斌 丁 伟 张传俊
苏晓明 隋 新 张 明 何俊岩 张建喜
李铁男 于 鑫 丁 伟 佟立伟 李艳男
杨凤义 马守田 郭 义 任仲博 李莎莎
李 冬 王佳菁 蔡 泽 隋 勇 陈建志
蒋春野 谭春秋 范成强 于家南 刘荣华
李 昊 刘占江 张齐鹏 丁 辉 王向东
李洪伟 张国秀 刘 扬 于海洋 温硕石
邵俊生 姚殿珣 石建军 柳 伟 潘国富
尹聪良 吕文研 苑克彬 朱有臣 林洪章
张玄知

审稿人：周知民 郑 毅

目 录

第一章 确立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001)
“邓论”的提出	(006)
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012)
养老保险的改革	(016)
香港回归祖国	(021)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建成	(025)
治黄史上最大工程黄河小浪底	(030)
发展与亚洲近邻的友好关系	(034)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040)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045)
国有企业改革	(053)
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	(059)
国家行政机构改革	(065)
医疗体制改革	(069)
住房改革	(074)
“再就业工程”	(079)
1998 年大洪水和“抗洪”精神	(085)
海峡两岸关系的波折	(090)
改革开放 20 周年总结与回顾	(094)
实施人才战略和“高校扩招”(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	(099)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103)
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108)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113)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117)

澳门回归祖国纪实	(122)
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	(127)
发展同欧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131)
回顾共和国 50 年成就	(136)
党中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142)
“九五”计划的完成和“十五”计划的制定	(146)

第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	(151)
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155)
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发展	(159)
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164)
国家行政区划的变化	(169)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173)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179)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	(183)
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87)
我国政府上网工程主网站正式开通	(191)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195)
中国反倾销案	(199)
主办亚洲博鳌论坛	(203)
我国体育事业的骄人成绩	(207)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召开	(211)
中共中央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	(215)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219)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	(224)
主办 APEC 峰会	(228)
中国“反恐”力度不断加强	(232)
全国精神文明工作会议举行	(237)

第三章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国确立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241)
不断调至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	(246)
证券市场的建设	(253)
西电东送工程	(260)
南水北调工程	(266)
西气东输工程	(272)
审计风暴	(279)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286)
“三个代表”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294)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00)
胡锦涛考察西柏坡与坚持“两个务必”	(306)
万众一心、抗击严重瘟疫灾害	(313)
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320)
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	(333)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340)
我国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349)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54)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361)
促进中部崛起	(366)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37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380)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385)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388)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396)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402)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	(407)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410)
颁布《反分裂国家法》、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419)
环球大洋科学考察	(427)
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启动节能环保工程	(432)

联合国改革、胡锦涛提出四点意见	(439)
稳健发展的中俄关系	(44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	(447)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455)
青藏铁路通车	(464)
加强对药品食品的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470)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480)
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86)
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	(491)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500)

第四章 创建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铁路进入高速时代	(508)
为适应新形势中央进行新一轮宏观调控	(513)
教育部颁布《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518)
中央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524)
海峡两岸在“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旗帜下加强往来	(529)
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措施遏制房价上涨过快问题	(533)
胡锦涛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议	(538)
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	(544)
我国航天事业的新发展	(549)
8 亿农民免征农业税“皇粮国税”被取消	(554)
整顿社会风气、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	(559)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推动科技不断创新	(563)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568)
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提出“八个为荣、八个 为耻”的重要论述）	(574)
中国科学家完成庞加莱猜想	(580)
《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	(585)
十一五时期文化规划纲要	(590)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95)



中共中央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603)
建设和谐文化	(608)
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	(614)
国务院发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620)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	(6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	(630)
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635)
中韩交流年	(641)
中共十七大的召开	(646)
中国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651)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656)
嫦娥一号	(662)
《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667)
改革开放 30 周年	(672)
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的彰显	(678)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	(683)
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	(689)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694)
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而不断努力	(699)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2008 北京奥运	(704)
新时期的教育建设	(709)
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715)
中国政府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720)
海峡两岸实现大“三通”	(725)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730)
新外交方针指导下的外交活动	(735)
中共领导全民抗击 H1N1 流感	(741)
党中央带领人民沉着冷静、积极高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746)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751)
中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行动	(756)

六十年沧桑、六十年辉煌、六十年感动	(761)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10 年来取代显著成效	(766)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	(771)
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776)
逐步推进户籍改革	(781)
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	(786)



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来的五年，是很不寻常的五年。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五年；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五年；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五年；也是在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中，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五年。

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贯彻十四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5年来全党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认真实施十四大的重要决策，提出并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年来，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1992年~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农业得到加强，粮食等农产品稳定增长。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钢铁、能源等基础工业迅速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八五”计划胜利完成，“九五”计划的实施有了良好开端。

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

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在试点基础上积极推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展开。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国家外汇储备显著增加。

精神文明建设迈出新的步伐。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可喜成绩，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各民族的大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完成抢险救灾等任务中，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7%，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的衣食住行条件明显改善，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3200万。

五年来，我们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可以告慰无数的革命先烈和前辈。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欢欣鼓舞的盛事，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改善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我们大力加强了党的建设，全党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深入。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加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广大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党内生活向制度化、规范化迈出新的步伐。

虽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矛盾和困难，工作中也有缺点和不足。主要是：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活力不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



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发展差距还明显存在，城乡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等等。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为了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面对的新的形势，全党亟需在思想上统一认识，明确任务。中共十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12日~18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应到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2074人），代表了全党5800多万名党员。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大会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三、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四、选举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五、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鹏同志主持了大会开幕式。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该报告共分10部分：一、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二、过去五年的工作；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江泽民在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他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论述。他指出，这些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江泽民指出，实现这次大会确定的任务，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他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

江泽民同志主持了大会闭幕式并讲了话。大会批准了江泽民同志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

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 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51 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15 名。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了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这次大会强调了旗帜问题的重要性。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这次大会在科学地分析了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的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同时必须充分地看到：第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二，建国后特别是近 20 年来我国已经形成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确立起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条件。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



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建党 100 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大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为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确定了行动指南。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

注释：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

“邓论”的提出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并且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前夕，是这一理论的准备和初步提出的阶段。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把我们党和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方面的后遗症还很严重，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还未走上正确的轨道，百废待兴。为了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党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进行纠正。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决议在系统总结32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点经验。这十点经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雏形。

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是这一理论初步形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从中国



国情出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建设一起抓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改革开放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强调实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更加全面。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明确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至此，我们党已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的阶段。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首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了十二条原则，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这十二条原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在十二条原则的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经验，鲜明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从而使邓小平理论的主线和轮廓更加清晰。这个谈话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报告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高的理论层次，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作出科学的概括。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提出了清晰的基本框架和实现的总体规划，不仅使

我们有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而且对进一步丰富邓小平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命名的阶段。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和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进一步阐明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且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了党章，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正式确立和命名。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早就发现前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他们在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曾经做出过许多努力，提出过许多好的思想。邓小平理论继承了这些思想和观点，并加以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理论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21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



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20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它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哲学方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些基本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证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第四，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五，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第六，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第七，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第八，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



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第九，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上述九条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要掌握其完整体系和内在逻辑。第一条是思想基础，是这一理论的精髓，贯穿于全部。第二条是这一理论的前提和立论基点。第三、四、五、六、七条着重论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这一理论在党的路线上的集中表现。其中又突出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还突出讲了生产力标准，这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第八条专门论述了运用这一理论，实现党的路线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第九条讲“一国两制”，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党能够形成邓小平理论，是来之不易的，它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行动指南。

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贯穿我国改革发展全过程的一类艰巨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要求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尤其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主要改革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这一阶段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围绕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简称“四句话”）的要求，创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尤其是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竞争上岗的工作逐步推开。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愈见成效。

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党和国家初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干部人事制度，从组织工作方面有力地支持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干部队伍实现了“四化”，带动各级领导班子的结构和素质形成质的飞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认真贯彻干部“四化”方针，针对不同历史时期领导班子建设存在的问题，有步骤有重点地加以解决。

“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精神构筑了的党政领导干部新型选拔任用制度。根据“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的要求，按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部署，各地各部门的党委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全力改革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在扩大民主方面，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成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必经程序，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成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全委会票决制、任



前公示制普遍推行。

多年的改革，引领干部人事工作朝着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方向进行根本性建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要的是把成熟的改革经验和成功的改革结果，抓紧形成制度，使我们的工作不因领导人和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实际上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向退休制、任期制和辞职制转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全党树立主动遵守制度、高风亮节的榜样。

干部分类管理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正在转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和党管人才的原则，各级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宏观指导，吸引、培养、选拔各类人才的工作出现新气象。对于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建立领导人员分层管理体制，健全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激励和监督机制；建立国有大型公司董事会，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积极探索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新机制；企业经营管理考核力度不断加大，考核评价机制逐步健全。对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全面推进和分行业实施相结合，分类制定科研、卫生、高校、中小学、广播电视、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的改革意见；推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搞活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健全岗位管理制度，实行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推进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逐步转变为岗位管理。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逐步形成，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伴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探索中稳步推进，不断深化，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持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方针，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相适应。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自觉地把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放到国际大背景和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做到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相一致，从

而为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扩大民主和依法办事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领导在干部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是干部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扩大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这一治国理政基本要求的体现。要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改进党管干部方法一致起来，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管干部的有效途径。既要坚持扩大民主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又要稳妥、有序地推进；既要拓宽民主渠道，又要引导广大党员和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既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管干部原则。要坚持依法办事，使干部人事工作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内其他法规相衔接，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第三，必须坚持以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为目标，遵循干部人事工作的内在规律，逐步形成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干部人事制度体系。所谓科学化，就是使干部管理的方法、标准、程序、机制和制度，符合领导人才成长规律和人事管理的一般规律。所谓民主化，就是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并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贯穿和体现于干部工作的各个环节。所谓制度化，就是把干部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以法律、法规、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相互配套、紧密衔接的制度体系。“三化”目标是一个有机整体，揭示了干部人事工作的内在规律。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把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着力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依靠科学的制度和方法，确保按照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把人选准用好，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还要致力于通过改革更加有效地保障这些原则得到贯彻落实。通过改革，准确把握和认真落实新时期党对干部德才标准赋予的新内涵、新要求，做到全面准确地考察、客观公正地评价、有的放矢地培养、人尽其才地使用、持续有效地激励和严格



及时地监督干部，必须着力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第五，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不断推进，思想就必须不断解放。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在求实中开拓，在继承中发展，善于扬弃旧制度，敢于创造新机制；必须坚持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推动相结合，既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要加强检查指导；必须充分认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注意把改革的力度、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从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入手，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搞形式主义。同时，还必须十分注意各项改革措施的衔接和配套，努力把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邓小平同志讲：“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这段论述，深刻阐发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和创新人才，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的关键所在；是形成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是扩大和落实党员和群众对于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客观需要；是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治本之策。总之，从整体上不断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促进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和相形见绌的干部及时调整出去，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编写：《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9页。

养老保险的改革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指公民或劳动者在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帮助，以保障基本生活权利的国家政策、制度和法规的总称。这一套政策、制度和法规不是一日建成的，它必然经历由初创到完善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诞生前夕，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人民政府应“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目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3条更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国家根本大法的明确规定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开始形成。最先建立的是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接着建立起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离体退休制度，从90年代初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逐步形成，覆盖全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险事业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构架。

1991年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退休费社会统筹正式在全国推广。文件要求，在企业缴费之外，职工个人也要缴纳养老保险费，由地方政府根据支付费用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职工的承受能力，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统一筹集。文件明确提出，劳动部和地方劳动部门负责管理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工作。在筹资模式方面，文件首次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思路——在以支定收的同时，多收一些钱并积累起来，用于弥补老龄化高峰期收支缺口。这一“未雨绸缪”的朴素设想，其实只是在现收现付制的框架下作出的一种修正；199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企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



“部分积累制”的重大决定。这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199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这是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要求各地建立个人账户，逐步提高个人缴费比例。文件同时提出两套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政府选择试点；1997年，由于各地多种养老保险办法并存，养老保险水平差异大，管理相当困难。同时，基金统筹层次低，调剂能力弱，挤占挪用现象盛行。同年，国务院再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6号文），统一了各地“统账结合”的实施方案，决定中还重点强调，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逐步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劳动者也要逐步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老保险，严禁挤占挪用和挥霍浪费。提高社会保险管理服务的社会化水平，尽快将目前由企业发放养老金改为社会化发放，积极创造条件将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逐步由企业转向社会，减轻企业的社会事务负担，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这就规定了统一的缴费比例和管理办法，这是国务院为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至此，“26号文”成为正式确立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框架的纲领性文件。

国家下大力度进行养老保险改革是有深刻背景的：从经济方面看，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高度集中的、由政府统包统配的经济运行的模式反映到社会保障领域，形成了具有国家保险性质特征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措施。从社会方面看，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在二元化社会结构之上，城乡分割、工农有别的社会结构使针对不同对象的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呈现巨大的差别，这一差别又反过来强化了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从世界各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以企业职工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农民为对象的保险制度的建立，大多有时间上的差异。从文化方面看，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使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崇信和遵循不同的社会观念和范。就普通平民百姓而言，家庭保障的观念浓厚，社会保障的观念淡薄。臣民意识浓厚、公民意识淡薄。依赖政府的观念浓厚、依靠自己的观念淡薄。自给自足的观念浓厚，互济互助的观念淡薄。就当官为政者而言，为民做主意识浓厚、为民服务意识淡薄。集中统一的观念浓厚、民主自由的观念淡薄。政治意识浓厚、社会意识淡薄。治乱求安的意识浓厚、进取发展的意识淡薄，所有这些思想观念都是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完善不利的。从历史上看，新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源于根据地和解放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和实践活动，而根据地和解放区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和实践主要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按照国家社会保险的制度构架开展的，诸如保险基金预先提留、费用由政府和企业负担、退休金的高工资替代率、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等等做法和理念，都是那个年代就接受并承袭下来的，所以其根子很深，惰性很强。虽经几十年的发展和变革，至今还能从现行制度中看到它们的痕迹和影响。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无到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近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在许多方面得到改善。但是由于上述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加之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需要的必然过程，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众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制度不统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一个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是同一制度下的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标准待遇上的差别。二、保险层次单一。主要表现在：目前我国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仍侧重于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发展十分有限；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残缺情况严重。三、覆盖面残缺。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参保情况差别较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在不同地区间呈现较大差异，“截止到1997年6月底，全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80%以上；北京市、上海市和江苏省的集体企业养老者保险覆盖面达到90%；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海南省和陕西省的外商投资企业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75%”^①，而其他一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形势却不容乐观，有的



总体参保率还不及50%。从全国范围看，城镇各类企业职工的总体参保水平不高。1997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各类职工共计8671万人，只占当期全国城镇职工总数14760万人的58.75%。^②其中农村更为严重；四、企业负担重。五、社会化程度低。企业的社会负担重；六、基金增值保值难度大；七、管理体制不顺；八、新老制度衔接难度大。企业和在职职工承担的缴费比例将加倍提高。

因此，为了突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困境，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使之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养老保险的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西方福利国家推行的高标准福利已带来许多消极作用，我们要引以为戒。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较高替代率副作用也比较多，需要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养老保险结构的改善，逐步调低替代率。

二、自助与互助结合、自我保障和社会互济相结合。当今世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趋势，是加强自我保障意识相自我参与的责任，“自我保障要融入社会保障机制中去”。养老保险的改革要从观念、体制、法规方面体现出在自我保障的基础上发挥社会互济的作用。

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和保险的原理，享受保险待遇者必须先投保、缴保费，光尽义务，后享权利。

四、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养老保险是初始分配的延续，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国际上养老保险存在社会统筹则和个人账户储存型两种筹资模式。社会统筹体现了社会成员横向之间（包括以新养老、代际转移负担）收入调剂，个人账户储存型体现了劳动者一生的纵向调剂。对于低收入者，社会统筹通过社会收入再分配保障其社会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的待遇，体现了公平原则。个人账户储存型体现了收入高的人，保费缴的多，储存多，退休时多得偿还，透明度高，具有激励人们劳动热情的效率机制。当前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实现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核心是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因而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中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五、统一决策，分级管理，政事分开的原则。养老保险的模式、发展方向、基本政策和制度要由国家集中决策，统一立法，各地区因地制宜组织实施。政事分开，行政管理与基金营运管理要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补充养老保险的资金营运管理要走向市场化、社会化；在金融

部门监管厂，由企业和职工双方组建基金会，通过招标投标，选择社会市场金融机构委托营运管理。各部门、各地区都不得以任何行政手段指定基金营运管理机构。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一项大系统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社会保障改革的经验表明，要改革一项就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经历二三十年，付出一两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1997年上半年劳动工作形势分析》，《中国劳动报》，1997年8月9日。

②《国家统计局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历年政府颁布的官方文件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



香港回归祖国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600多万香港同胞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神州大地，一片欢腾，五洲四海，万众瞩目。我国人民的这个百年期盼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香港位于东经 $114^{\circ}15'$ ，北纬 $22^{\circ}15'$ ，地处华南沿岸，在中国广东省珠江口以东，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内陆地区，以及262个大小岛屿（离岛）组成。香港北接广东省深圳市，南面是广东省珠海市万山群岛。香港与西边的澳门隔江相对61公里，北距广州130公里、距上海1200公里。此外，香港的地每年都会下降3厘米。香港三大部分的面积分别是，香港岛约81平方公里；九龙半岛约47平方公里；新界及262个离岛约共976平方公里，总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略大于上海市的 $1/6$ ，及仅大于全中国面积的万分之一，土地和水域的管辖总面积2755.03平方公里，水域率59.9%。香港已发展土地少于25%，郊野公园及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多达40%。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除了烟、烈酒和动力用的燃油（汽油、柴油等）之外，香港不对其他进口物品征收关税。香港是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的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地区贸易中心，拥有邻近很多国家和地区是不可替代的优越地位。以吞吐量计算，香港的货柜（集装箱）港口更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口之一。以乘客量和国际货物处理量计算，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以对外银行交易量计算，香港是世界第15大银行中心。以成交额计算，香港是世界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以市值计算，香港股票市场是亚洲第二大市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交通、旅游中心之一。香港是全球第11大贸易经济体系、第六大外汇市场及第15大银行中心。香港股票市场规模之大，在亚洲排名第二。香港也是成衣、钟表、玩具、游戏、电子和某些轻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出口总值位列全球前列。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它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三部分，总面积1 081平方公里，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宝安县）管辖。它位于珠江口外东侧，扼我华南门户，地居世界航道要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840~1842年间和1856~1860年间，英国借口保护英商进行鸦片贸易的所谓“利益”，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条》，强行租借“新界”地区99年，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

以上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都是武装侵略的产物，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上述不平等条约，没有承认过英国对香港的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香港曾经被日本占领。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国民党政府曾就香港问题与英国进行过交涉，但没有结果。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抢先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重新占领了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多次阐明我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割让香港的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政府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日程。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指出：“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根据这一伟大构想，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为中国政府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并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祖国统一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和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

随着香港“新界”期届满之日临近，香港问题成为中英两国政府均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一定要在



1997 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历时两年，分两个阶段。谈判艰难曲折，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指导下，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英方放弃了“三个条约继续有效”、“以主权换治权”等无理要求，接受我以“一国两制”为指导思想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谈判圆满结束。1984 年 12 月 19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中英两国领导人庄重地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中英联合声明宣告中国政府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载入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并做出了使香港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其他安排。在中英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中，中国政府进一步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5 年 5 月 27 日，中英两国政府互换了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同年秋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起将中英联合声明递交给主管法律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从而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香港由此进入了过渡时期。

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收回香港，一雪国耻，一直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今天历经坎坷、饱经风雨，终于迎来了祖国明珠的回归。百年期盼，一朝梦圆，神州大地无不欢欣鼓舞，吐气扬眉。通过香港回归的过程，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保证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通过香港的回归，人们将会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香港的回归，将会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利于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献身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干劲，在党的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香港的回归，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正如江泽民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近代以来，香港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抵抗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

慧，开发了香港，建设了香港。香港回归祖国，使香港同胞的政治地位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他们爱国爱港的热情空前高涨。可以坚信，有伟大祖国作坚强后盾，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充分运用香港自身的优势，香港这座国际经济大都市一定能够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香港的回归，标志着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香港问题和平解决已经成为现实，开创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先河，树立了一个榜样。“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方针的科学性、正确性，对澳门回归、海峡两岸统一带来了无限光明前景。香港与台湾历来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将会有力地增进台湾人民对“一国两制”的了解，香港回归之后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海峡两岸之间桥梁作用的优势，进一步扩大祖国大陆与台湾交往交流的渠道，增加沟通，以赢得更多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与支持，增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互信，促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的和平统一。

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并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突破了当今世界上主权国家的固有模式和形态，是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出现的崭新形态。“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运用，不仅为解决澳门问题、台湾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为国际解决复杂争端、为人类社会和平进步树立了榜样，做出了独特贡献。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指出的：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

香港的回归，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台湾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因此与香港问题的性质不同，但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是同样适用的。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肯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利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

香港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香港回归祖国，必将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内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可以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香港进一步发挥连接内地与国际经济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利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①

注释：

①李鹏在庆祝香港回归招待会上的讲话，1997年7月1日。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建成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主要指在长江上游西陵峡段修筑一座大坝，利用从重庆到宜昌 600 公里长江段（包括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形成一座大型水库，达到防洪、发电和航运的目的。三峡水利枢纽位于长江西陵峡中段，坝址在湖北宜昌三斗坪。枢纽主要由大坝、水电站、通航建筑物三部分组成。大坝位于河床中部，即原主河槽部分，两侧为电站坝段和非溢流坝段。水电厂房位于两侧电站坝段之后。三峡工程所需投资，静态（按 1993 年 5 月末不变物价）为 900 多亿元；其中枢纽工程 500 多亿元，水库移民工程 400 亿元；但考虑物价、利息等因素，动态所需投资为 2 039 亿元。分为三期施工，总工期为 17 年。一期工程 5 年（1993 ~ 1997 年），主要进行一期围堰填筑，导流明渠开挖等。二期工程 6 年（1997 ~ 2003 年），工程主要任务是修筑二期围堰，左岸大坝的电站设施建设及机组安装等。三期工程 6 年（2003 ~ 2009 年），主要进行右岸大坝和电站的施工。三峡大坝高 185 米。正常蓄水位 175 米，总库容量 393 亿立方米。电站装机 26 台，总容量 1 820 万千瓦，年发电 847 亿千瓦时。工程竣工后将发挥防洪、发电、航运、养殖、保护生态、净化环境、开发性移民、南水北调、供水灌溉等十大效益。三峡工程的兴建，为长江经济带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使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优势和特点更为突出，为建设沿江商业走廊、发展流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向外开拓、形成综合的总体优势奠定基础。

长江，虽然哺育了沿江两岸的代代子孙，但也给中下游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自汉代到清末的 2 100 年间，长江洪水 200 多次，平均不到十年泛滥一次。1860 年和 1870 年，长江洪水接连两次给富庶的江南带来了灭顶之灾。20 世纪 30 年代的两次大洪水，就吞噬了近 30 万人的生命，仅 1931 年的大水灾就遍及 7 省 205 个县，淹没良田 5 000 多万亩，灾民超过 2 800 万人，被淹死的就有 14.5 万。1954 年，尽管党领导人民与长江洪水进行了艰苦的搏斗，但这年还是有 3 万人被无情的洪水夺去了

生命，京广铁路也因此瘫痪百日。特别是1991年，华东和华中地区发生了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了长江水患的肆虐。一个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非修不可，迫在眉睫。同时，我国是个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度，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极低，而21世纪又是水资源将比所有资源更为重要的世纪，我们的水资源太少却又屡屡闹洪灾，长江中下游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举足轻重，既要保住宝贵的水资源又要化解长江水患，兴建三峡工程正是解决这两难的万全之策。

三峡工程，是一个民族的世纪梦想。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改善川江航道，发展三峡水力发电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军阀混战，国力衰弱，电力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要开发利用长江谈何容易，因此这又是一个当时根本没有条件付诸实施的设想。1932年~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数次组织中外专家在长江三峡地区勘察和测量，编制开发计划，并着手进行初步设计。然而，兴建三峡工程需要有强大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可是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1947年5月下令停止三峡工程的勘测、研究和设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十分重视长江的防洪和开发利用问题。反复地调查研究，开会讨论，并于1960年编制出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草稿。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并没有立即做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决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建设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纪工程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建三峡工程的极好机遇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同志鼓励人们“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接过三峡工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意愿，一步步把三峡工程由论证推向建设实施。

这样一个世纪大工程经过数十年无数科技专家的艰苦努力，特别是1986年以来，又经过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织全国40多个学科的412位专家，对三峡工程技术、地展、航运、战争、水位、发电等14个方面全面的审查，进行了两年又8个月的重新论证。论证结论认为，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水库移民可以妥善安置，没有制约性的不利环境影响；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等论证。1989年7月，刚上任仅一个月的江泽民总书记，冒着炎夏酷暑，实地考察三峡工程坝址三



斗坪。1990年国务院听取了论证情况的汇报，并正式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长江三峡工程项目获得了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1993年，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成立，李鹏总理兼任主任。同年7月26日，国务院审查批准“长江三峡工程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枢纽部分）”，三峡工程进入施工阶段。199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并明确该公司为三峡工程的业主。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三峡工程工地现场举行的开工典礼上宣布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95年，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全面启动。1996年11月下旬，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系统工程启动。1997年10月6日，人工开挖的3.5公里长、可供大型船队航行的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正式通航。同年10月14日，国务院第63次常委会议下达截流命令，长江三峡将于1997年11月8日实施截流。1998年10月8日，三峡永久船闸上游引航道靠船墩浇下第一方土。2000年7月17日，150户639名重庆市云阳县农村移民外迁到上海市崇明县落户。2002年3月17日，三峡工程首台发电机组转轮吊装成功。2002年9月1日，135米水位以下的清库工作接近尾声。2002年11月6日，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成功。2002年12月16日，三峡工程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开始浇筑。2003年5月21日，三峡工程通过国务院长江三峡二期工程验收委员会枢纽工程验收组的验收。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正式下闸蓄水。2003年6月16日，三峡船闸开始试通航。2003年11月22日，长江三峡工程第1号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并投入商业运行。至此，三峡工程首批发电的6台机组全部投产。三峡工程已经创造出一年内装机420万千瓦、连续投产6台70万千瓦的水电安装和投产世界纪录。2004年4月，三峡工程三期移民搬建工作已全面展开。2004年7月6日，投入40亿元的三峡库区二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基本完成。2004年8月24日，三峡工程左岸电站8号机组于正式并网发电。2005年10月12日，三峡大坝启动导流底孔封堵工程。该工程计划于2006年5月15日前完工。2006年2月10日，三峡工程三期库底清理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全面竣工。2007年6月11日，右岸22号机组投产发电，是三峡水电站右岸电厂第一台发电的机组。标志着三峡水电站三期工程开始发挥效益。2008年10月29日，右岸15号机组投产发电，是三峡水电

站右岸电厂最后一台发电的机组。至此，三峡水电站 26 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2009 年 6 月 30 日，三峡水电站迎来设计的 26 台机组全部投产后的首次满负荷发电。2010 年 10 月 26 日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次成功蓄水至 175 米水位，这意味着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通航、补水等综合效益开始全面发挥。

三峡工程是全球超级工程之一，这体现在：一、世界防洪效益最为显著的水利工程。三峡水库总库容 393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221.5 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消减洪峰流量达 2.7 万立方米每秒至 3.3 万立方米每秒，能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增强长江中下游抗洪能力。二、世界最大的电站。三峡水电站总装机 1 820 万千瓦，年发电量 846.8 亿千瓦时。三、世界建筑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大坝坝轴线全长 2 309.47 米，泄流坝段长 483 米，水电站机组 70 万千瓦×26 台，双线 5 级船闸和升船机，无论单项、总体都是世界建筑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四、世界工程量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主体建筑土石方挖填量约 1.34 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 2794 万立方米，钢筋 46.30 万吨。五、世界施工难度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 2000 年混凝土浇筑量为 548.17 万立方米，月浇筑量最高达 55 万立方米，创造了混凝土浇筑的世界记录。六、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截流流量为 9 010 立方米每秒，施工导流最大洪峰流量 79 000 立方米每秒。七、世界泄洪能力最大的泄洪闸。三峡工程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为 10.25 万立方米每秒。八、世界级数最多、总水头最高的内河船闸。三峡工程的双线五级船闸，总水头 113 米。九、世界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升船机。三峡工程升船机有效尺寸为 120×18×3.5 米，最大升程 113 米，船箱带水重量达 11 800 吨，过船吨位 3 000 吨。十、世界水库移民最多、工作最为艰巨的移民建设工程。三峡工程水库动态移民最终可达 113 万人。

“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今天正在变为现实。三峡工程是一项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千秋功业，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改天换地、创造未来的宏伟气魄。”^①

长江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继修建万里长城之后又一项伟大工程。绵延起伏的万里长城代表了秦汉以来两千年的古老文明，雄伟的三峡工程是现代中国人民造福子孙的旷世之举，三峡大坝必将成为中华大地上的水上长城，三峡水库必将成为万里长江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注释：

①摘自：1997年11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大江截流仪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②奚洁人主编：《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10月。

治黄史上最大工程黄河小浪底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水患，有史以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根治水患，新中国将目光锁定在黄土高坡下的小浪底。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小浪底，在洛阳市以北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南距洛阳市 40 公里。上距三门峡水利枢纽 130 公里，下距河南省郑州花园口 128 公里。是黄河干流三门峡以下唯一能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集减淤、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是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属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小浪底工程浩大，总工期 11 年。

小浪底工程凝聚了几代黄河水利人的心血。从 1953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小浪底水利枢纽坝址勘探和测量工作起算，到 1994 年 9 月 12 日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中华民族为建设这座治黄工程积蓄力量，用了 40 年时间。

1953 年，为配合黄河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黄河水利委员会钻探队的队员们踏过原始的荒山，进驻小浪底坝段，支起帐篷，在黄河的最后一段峡谷间，第一次举起了地质勘探的铁锤，从此拉开了小浪底工程勘测设计的序幕。

1955 年 7 月，在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审查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拟定小浪底水利枢纽为黄河干流 46 个梯级开发中的第 40 个梯级。

20 世纪 60 年代，三门峡水库建成并投入运用以后，由于对上游水土保持估计不足，水库淤积严重，未能实现预期的开发目标。1969 年 6 月，在三门峡市召开的晋、陕、豫、鲁四省会议上，研究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和改建的同时，专家们讨论了兴建小浪底水库的问题，并责成黄委进行规划设计。

1975 年 8 月上旬，淮河流域发生罕见的特大暴雨，造成一些库坝失事，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许多人由此而产生忧虑，如果这



场暴雨北移，发生在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将会产生5万多立方米的特大洪水，如无控制性工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河南、山东两省和原水利电力部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防御黄河下游特大洪水意见的报告》，提出在三门峡以下黄河干流修建小浪底水库或桃花峪水库。该报告认为：从全局看，为了确保黄河下游安全，必须考虑修建其中一处。经过审查，国务院原则同意上述报告，并要求对各项重大防洪工程进行规划设计。黄委于1976年6月提出《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规划报告》，把防洪和减淤放在开发任务的首位。

1984年8月，黄委设计院完成了《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水利电力部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查，并在审查意见中提出，尽快兴建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非常必要的，同意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开发任务为：以防洪（包括防凌）、减淤为主，兼顾灌溉、供水和发电。据黄委设计院老专家介绍，《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小浪底工程施工期为11年，总投资34亿元。审查中提出了不少意见和问题，要求在初步设计中进一步研究采用新技术，改进施工方法，提出经济合理并切实可行的工期和造价。对水库移民应会同河南、山西两省提出切实可行的迁建措施、实施方案和相应的投资概算。由此，黄河小浪底工程开始由设想走向实施阶段。

1984年12月，原水电部在《关于下达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设计任务书》的通知中指出：鉴于小浪底枢纽的水文、泥沙及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工程量较大，国内尚缺乏实际经验，因此经国家计委批准，初步设计中有关工程地质评价和处理方法，枢纽总体布置和水工建筑物设计以及施工方法、总工期和工程概算等部分，由黄委与美国柏克德公司联合进行轮廓设计，其余部分由黄委负责完成，并汇总成统一的初步设计。

按原水电部的指示，1984年9月~1985年10月，黄委与美国柏克德公司联合进行了小浪底轮廓设计。参与设计的黄委设计院原副院长林秀山告诉记者，轮廓设计确定了以洞群进口集中布置为特点的枢纽建筑物总布置格局，左岸单薄山体作为大坝的延伸，采用混凝土面板包山方案，提出了新型的由导流洞改建的孔板消能泄洪洞，按国际施工水平确定工程总工期为8.5年。原水电部组织国内专家50余人对轮廓设计报告进行了审查。审查认为，该轮廓设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有关小浪底工程地质评价、枢纽布置、建筑物设计、施工进度等方面的成果达到了初步设计的目标。

1987年2月至1988年7月，黄委设计院按照国家计委的批示，全面开

展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工作。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设计院的技术人员为了黄河人梦中的小浪底水利枢纽而忘我地工作，汗水凝聚在图纸间，奉献成为了一种幸福。

1988年3月，水利部规划总院邀请国家计委、河南、山西两省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专家在京预审了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初步设计，并于1988年4月，分别对小浪底工程概算及机电组织了专业预审。同年10月，水利部组织有关专家就小浪底水利枢纽泄洪方案进行了复议，要求黄委在技术设计阶段进一步优化设计，研究进口的淤积、下游消能、排沙洞改进和低位导流洞适当提高等问题。黄委设计院根据水利部的指示，提出了枢纽泄洪方案优化设计报告，水利部于1989年元月在京组织了审查讨论会，对优化后的泄洪方案予以肯定。

为了促进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尽快上马，水利部拟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责成黄委设计院编制了《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可行性报告》，连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泄洪建筑物总布置优化设计报告》和《小浪底水库淹没及处理规划报告》以《关于报请审批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初步设计的补充报告》呈报国家计委。

与此同时，黄委设计院在认真听取了咨询专家的意见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论证后，完成了《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地下厂房专题报告》，对引水发电系统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将原初设半地下厂房改为地下厂房，同时取消了上游调压和尾水调压室，结合电站扩机增容，最终完成了引水发电系统的设计优化工作。

在一系列紧张的设计与准备工作中，小浪底工地渐渐变得喧嚣，人们已感到这里即将迎来历史性的一刻，即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1991年9月1日，在国家计委对小浪底工程初步设计未正式审批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在小浪底工地举行了前期准备工程开工典礼，小浪底工程建设脚步加快。

在此后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初设的评估中指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黄河的一项关键工程，并已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设计部门已完成了初步设计的优化工作。“三通一平”等前期施工准备工程已于1991年9月开工，施工征地和水库移民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各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建议批准初步设计优化方案，以利于工程早日开工建设，尽早发挥工程效益。



1993年3月23日，国家计委以计农经〔93〕459号文《关于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的复函》发至水利部，文称“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原则同意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优化方案。”至此，属于工程初步设计阶段的工作正式告竣。

随之，黄委设计院于1990年全面开展了工程的招标设计工作。通过公开招标，并经水利部和世界银行批准，确定加拿大国际工程管理集团黄河联合咨询公司（CYJV）作为工程招标设计的咨询公司。此外，按世行要求聘请了世界知名的14名专家组成特别咨询专家组，同时水利部提名组建了以赵传绍为首的中国咨询专家组，对工程招标设计中有关技术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和咨询。同时，黄委设计院投入了大量人力，与CYJV专家一起分13卷准备供世行贷款项目评估用的简要报告。1993年7月由黄委设计院完成了相应3个主体土建标的标底编制。1993年8月31日，小浪底三个主体土建工程标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公开开标。1994年6月正式发出中标通知。

自1989年以来，历经前后13次考察，世界银行于1992年10月进行了项目预评估，于1993年5月结束了项目正式评估工作。1994年6月与世界银行签署了正式贷款协议。

1994年9月12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亲临小浪底工地宣布了小浪底主体土建工程开工，小浪底的主体建筑物的设计工作也全面进入了施工详图阶段。1997年10月28日，中华民族治黄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黄河小浪底工程，上午10时28分实现截流成功。

小浪底工程是一项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除害兴利、综合利用的工程，在治理开发黄河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工程建成后，与三门峡、陆浑、故县水库联合运用，可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基本上解除了下游凌汛威胁，使下游河道20年左右不淤积抬高，每年增加供水量40亿立方米，每年平均发电量51亿千瓦时。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兴建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揭开了黄河开发治理的新篇章，成为治黄的里程碑工程。

发展与亚洲近邻的友好关系

1998年，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正在调整。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但是危机频繁发生，动荡此伏彼起，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有时表现还很突出。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了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同朝鲜、韩国和东盟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

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949年10月6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浴血奋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61年7月11日，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两国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交往，中朝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1990年3月14~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1991年5月3~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992年4月13~17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应金日成主席的邀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993年7月26~29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1999年6月3~7日，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邀请，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双边政治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互访活动和个人良好关系的建立，为两国关系打下了积极的政治基础。中韩建交5年多来，双边关系得到了顺利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国



从长远眼光出发,着眼于21世纪、着眼于大局来处理中韩两国关系,携手韩国将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向前推进。1998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对建交6年多来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表示满意,认为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而且对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双方商定,以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的精神及建交后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基础,着眼未来,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韩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韩关于简化签证手续和颁发多次签证的协定》、《中韩两国政府青年交流谅解备忘录》和《中国铁道部和韩国建设交通部铁路交流与合作协定》,草签了两国渔业协定。两国外交、经贸、铁道和建设部门负责人也分别在北京举行了对口会谈。除北京外,金大中还访问了上海,并在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回国途中,于11月19~20日正式访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东南亚国家联盟共有10个成员: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近年来发展很快。在政治上,短短几年间,中国从东盟的协商对话国发展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双方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双方各个层次的交往频繁,政治对话升级,相互了解和信任加深。

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实现首次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建立中国——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为双方关系全面和深入发展构筑了框架,指明了方向。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全面对话合作框架运作良好,共有五个并行的总体对话框架:中国——东盟高官政治磋商、中国——东盟经贸联委会、中国——东盟科技联委会、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和东盟北京委员会。

在政治关系深入发展的同时,中国与东盟在其他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也不断扩大,其中经贸、科技合作已成为双方关系中非常重要和活跃的部分。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从1994年的13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35亿美元。双方相互投资也在逐年增长。在劳务合作和承包工程方面,东盟已成为中国的重要市场。中国与新、马、泰、菲、印尼五国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中国与东盟国家民间商会间的合作也正在逐步发展。1997年4月,中国贸促会与东盟商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成立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此外，中国与东盟在环保、邮电、交通、海运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同程度地向前发展。

中国与东盟关系会不断发展，是因为双方存在着深厚的共同利益。在经济上，双方都是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地理上接近，这些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共同繁荣。在安全上，双方都希望本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也都愿意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作用。在政治上，东盟与中国在人权、反对强权政治、地区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区等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和政策立场，不满西方国家借口“人权高于主权”干涉各国内政，反对西方国家的干涉性、高压性的贸易政策和动辄和非经济方式制裁的强权做法，因而谋求借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抗衡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

同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南亚人口过亿的大国，作为中国的近邻，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

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进展顺利。70年代的中巴关系稳定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加深。80年代，中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但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却未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继续向前发展。1990年5月，万里委员长访巴。同年9月，巴总统伊沙克·汗访华，并作为主宾参加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1991年2月，巴总理谢里夫访华。同年10月，杨尚昆主席访巴。1992年10月，谢里夫总理再度访华。1993年12月，李瑞环主席访巴。同月，贝·布托总理再次访华。1994年12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5年9月，贝·布托总理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嘉宾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同年11月，乔石委员长访巴。1996年12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巴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中巴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还在巴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中国的南亚政策。1997年4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8年2月，谢里夫总理访华。1999年4月，李鹏委员长访巴。同年6月，谢里夫总理再次访华。2000年1月，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5月，巴基斯坦外秘哈克来华参加两国外交部年度磋商。7月，唐家璇外长应邀对巴进行正式访问。



9月，江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会见了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

20世纪50年代初，中印间曾有过密切的交往。1950年4月1日两国建交。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周总理再次访印。1959年，印支持和收容西藏叛乱分子并在中印边境制造流血事件。1960年，周总理亲赴新德里就边界问题同尼赫鲁会谈。1962年，印在中印边境向中国发动全面武装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两国关系冷淡。1976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印外长瓦杰帕伊访华。1981年，黄华副总理兼外长访印。1984年双方签署了贸易协定。1988年12月，印总理拉·甘地访华，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共同维护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同时努力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决定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和经贸、科技联合小组。两国还签署了科技和民航合作协定。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了领事条约、恢复设领协议、恢复边贸备忘录和和平利用外空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次访问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此后，印总统、议长和国防部长等要人相继访华。廖汉生副委员长等访问了印度。中国驻孟买总领馆和印度驻上海总领馆恢复开馆。印方还取消了针对在印中国人的歧视性限制法规。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两国签署了保持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环境合作协定、广播电视合作协定以及增开边贸点议定书，为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增添了新内容。同年，李瑞环政协主席访印。1994年，印度副总统纳拉亚南访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和迟浩田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分别访印。双方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卫生和医学科学合作协定、简化签证手续谅解备忘录、两国银行合作谅解备忘录。1995年，乔石委员长访印，同印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钱正英政协副主席也访问了印度。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对印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共同确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双方保持高层往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加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支持等达成广泛的共识。

199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访印，分别会见

印党政领导人，保持了两国高层对话的势头。1998年5月，印进行核试，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使中印关系严重受挫。中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后，印政府反华言行有所收敛，并通过各种渠道与中方接触，寻求修复两国关系。7月，在第5届ARF会议期间，印计委副主席贾斯万特·辛格主动拜会唐家璇外长。1999年2月，中印两国外交部官员在北京举行会晤，确认中印互不构成威胁。6月中旬，印外长贾斯万特·辛格应邀访华，双方确认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基础是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愿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继续恢复和改善。

中国同蒙古及中亚国家的合作不断扩大。中蒙两国边界线长4710公里。两国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关系。中蒙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主流。尤其是近1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显著。1994年，双方重新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1998年12月，应江泽民主席邀请，蒙古总统那巴嘎班迪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蒙联合声明》，确定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9年7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蒙古进行国事访问，充实和丰富了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双方不断加强联系。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日，双方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主要内容有：一、双方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二、双方重申，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是两国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双方不在本地区谋求霸权，不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纠纷。三、双方重申恪守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所阐述的各项原则，确认上述文件今后仍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在高新科技、信息、环保、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



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将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日联合宣言》的发表，为两国在 21 世纪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朝关系大事记》，新华网，2001 年 10 月 29 日。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人民经历了中苏中俄关系 40 多年的风风雨雨，在深刻总结从结盟到对抗到和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共同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这种关系最初的倡导者和奠基者。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遵循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与俄罗斯领导人一起不断地发展、完善这种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进行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后，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地指导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外交战略，从根本上改善同前苏联的关系。1988 年底和 1989 年上半年，实现了两国外长自 1975 年以来的首次互访和轰动世界的首次最高级会晤。当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中俄关系之建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而邓小平同志关于中苏关系的战略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中国立即派出以时任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访俄，宣布承认俄联邦政府及其取代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双方签署了确立两国关系的《中俄会谈纪要》。中俄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保持了正常化状态。1992 年 1 月底，时任总理的我国领导人李鹏与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首次会见，确定两国将在 1989 年《中苏联合公报》和 1991 年《中俄会谈纪要》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从此两国关系开始了新篇章。以后由于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两国最高领导人密切、频繁的往来和接触，给中俄关系以直接的巨大的推动力。

1992 年 12 月 17~19 日，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首次最高级会晤，签署了《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双方在会谈和联



合声明中，重新强调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表示要“相互视为友好国家”，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置于本国对外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或“重要地位”。双方宣布两国关系从此走上了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正常轨道。

1994年9月2~6日，江泽民主席访俄，两国元首进行第二次最高级会晤，签署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等文件。两国元首宣布，中俄之间确立了长期稳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始终履行不将战略武器瞄准对方、互不使用武力，特别是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义务。

1996年4月24~26日，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与江泽民主席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晤，双方发表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又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已是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成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接着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个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政治军事文件，为五国发展双边和多边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1997年4月24~26日，江泽民主席再次访俄，与叶利钦总统举行第四次最高级会晤，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中俄第四个联合声明。与前三个联合声明不同的是，这次联合声明从双边范畴转向世界，主要阐述两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致立场。这表明中俄将加强国际领域的合作，本着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之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又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1997年11月9~11日，叶利钦总统第三次访华，与江泽民主席举行第五次最高级会晤，发表了第五个《中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两国领导人对近六年来中俄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总结，并就进一步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交换意见，确定了继续努力的具体方向。作为中俄关系的重大成果，两国元首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工作全部完成，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正式开始运作。

中俄之间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着丰富的内容，扎实的基础。

在政治合作方面，首先体现在双方对各自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努力之理解及支持上。俄方一再重申：只承认一个中国，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不同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往来，而且也坚决反对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西藏和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干涉中国内政。叶利钦总统于1992年9月签署了《关于俄罗斯与台湾关系的法令》，以保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中国表示，十分理解俄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积极评价俄罗斯促进独联体一体化的努力，明确表示支持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在车臣等涉及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坚持车臣问题是俄的内政、应由俄妥善解决的立场。

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都把发展经贸关系视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保障。中俄建交以来，经过双方努力，两国的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正朝着规范化和国际标准的方向发展。“1992年两国贸易额达52亿美元，超过中苏贸易额的最高纪录。1993年再上新台阶，达76.8亿美元。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两国的贸易在1994年滑坡至50.7亿美元。但1995年开始回升，为54.63亿美元；1996年为68.5亿美元。”^①1996年底，两国总理进行定期会晤时，为双方贸易额的增长提出了若干具体措施。双方决定充分发挥各自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开拓合作新领域、新途径，争取在石油、天然气、电力、航空航天、机械制造及高科技等领域大中型长期合作项目上取得突破。1996年底，中俄合建连云港核电站的合同签署，为中俄经贸合作起了示范作用。两国领导人已提出，力争到200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200亿美元。

在安全合作方面，中俄两国最为关注和优先解决的是共同边界的安全问题。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原苏联三个中亚国家共有8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维护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可为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友好合作，以及本国经济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提供保障。1994年，中俄政府签署了两国西段边界协定并于次年生效，加上1991年的东段边界协定，使中俄两国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96年底，中俄两国元首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工作全部完成，公正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中俄哈吉塔先后在上海、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两个协定，使中国与上述四国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纽带。另外，中俄军事合作也积极展开，已签署了中俄国防部合作协议，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以及在保卫边界方面合作的双边协



定等。

在国际领域，双方对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有着一致或相近的看法。例如，两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不赞成由一国主宰的“单极世界”，一个国家的事情应由该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参与决定；互不干涉内政，应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原则；中俄在“多极世界”中都是独立的重要的一个极，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不断加强磋商，协调立场，进行合作，是为了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双方在前南问题、海湾危机、伊拉克武器核查等具体问题上，都持相同或类似的立场。

为了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促使中俄关系多层次各领域向前发展，双方已建立了各种有效的保障机制：两国的元首、总理、外长和国防部长都实行定期会晤制度，并将原来副总理级的中俄混合委员会升格到总理级，下设经贸科技合作、能源合作和运输合作三个分委会，每年在双方首都轮流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和解决友好合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而两国跨世纪的友好组织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之成立和运作，使两国各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不断加强，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厚。

中俄发展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顺应世界局势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和需要作出的正确抉择。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及缓和的总趋势不断加强，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国家都致力于在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发展中发展本国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把经济工作列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后，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改善和发展对俄关系对我国的安全与现代化建设有“特殊意义”。从俄罗斯方面来说，苏联解体后，它的政治经济力量大为削弱，大国地位受到挑战，其地缘政治利益也发生了不利变化。在西部，北约东扩咄咄逼人；在西南部，西方和其他势力加紧向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扩张和渗透。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俄改善周边环境，重振大国地位。当然中俄经济上的互补性，以及在国际关系中许多相同的利益和主张，也是促使两国加强友好合作的重要因素。

中俄从建立关系到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终强调两国的关系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也不影响对方与第三国发展友好关系。这本身就是对目前世界上尚存的“冷战思维”、“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予有力的否定和抨击，有利于世界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促进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中俄两国通过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各自办好自己的事，保持本国的稳定和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中俄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两国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发挥着重要影响，它们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两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并本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精神，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之建立，而且它们还通过建立和发展彼此间的新型关系，以及与三个中亚邻国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相互裁军等重要协定，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进行了重大实践，为冷战后谋求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良好的模式。

注释：

①《人民论坛》，1998年第05期。



“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8年3月5日~19日在北京举行。共有代表2980名参会，共有34个代表团参会，其中包括重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第九届全国人大共收到议案830件，议案总数居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首。其中代表团提出的议案26件，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804件。

会议听取了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李鹏总理首先报告了过去五年政府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八方面的成就：

第一，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顺利完成了“八五”计划，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开局良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某些领域过热、物价涨幅过高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既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1997年经济增长8.8%，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为0.8%，这种“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是多年来没有过的。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4.5%。各级政府重视农业，加强农业的政策逐步得到落实，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强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较大提高。1997年粮食产量达到49250万吨，比五年前增加5000万吨，粮食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已初步形成比较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肉、禽、蛋、奶、水产品、水果和蔬菜等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加。城乡市场副食品供应充足，花色品种齐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乡镇企业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不断为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力量。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5.3%，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出现了积极的变化。1997年钢产量达到1亿

吨以上，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5亿千瓦。运输邮电业迅速发展，五年铁路正线铺轨总里程11344公里，高速公路增加4083公里。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出现了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格局，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商品紧缺现象已经根本改观了。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近10万亿元。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投资得到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就。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京九、南昆铁路全线投入运营，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顺利截流。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建设。新发现和探明了一批矿产资源。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邮电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得到明显缓解，增添了持续发展的后劲。

第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五年来，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价格和投融资等体制改革。新的财税体制已经建立并且运行正常，中央和地方财力都有较大增加。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初步分开，中央银行的调控和监管职能开始增强。人民币汇率顺利并轨，汇价保持稳定，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计划调控方式不断完善，价格进一步放开，绝大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市场机制对增加供给、调节需求、丰富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投融资领域进行了改革，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度和招标制度，投资风险约束逐步加强，企业筹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在积极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改革的方向、目标、方针和重点已经明确，对解决难点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有的亏损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有的已经扭亏为盈。农村经济、社会保障、商品流通、对外贸易、城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有新的进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展开，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深化改革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对外开放继续扩大，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五年来，我国年进出口总额由1655亿美元增加到3251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明显改善，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所占比重稳步上升。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五年累计1858亿美元。外商投资项



目质量有所提高，技术含量比较高、投资金额比较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逐年增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出口逐年增加，旅游业持续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国家外汇储备由 194 亿美元增加到 1 399 亿美元，对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抵御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继续发展，全国对外开放的地区和行业进一步扩大，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五年来，我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 187 个。对外开放的扩大，为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在改革中前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绩。五年来取得一大批重要科技成果，其中一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整体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授予专利权 22.4 万件，知识产权进一步得到保护。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集中力量解决了一批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不少科技成果得到推广和应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推进了高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研制开发出一批我国权利人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基础研究在一些前沿领域取得可喜的进展。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决策逐步落实，教育投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而不断增加，社会力量办学也为发展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占全国人口 65% 的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6%。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迅速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总人数的 56% 以上。数以亿计的城乡劳动者接受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岗位培训、技术和专业培训。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管理体制有了良好开端，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有所提高。五年共培养本科和专科毕业生 687 万人，研究生 17.5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逐年增多，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繁荣发展，创作出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受到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都达到了 85% 以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开展。加强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秀成绩。思想道德建设得到加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普遍进行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以及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开展讲文明、树新风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宣传各个领域的先进模范人物，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各级政府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在工作中注意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五年来，国务院提出法律草案 66 个，制定行政法规 197 个，依法行政状况有所改善。行政监察、审计和经济监督工作得到加强。普法教育广泛开展，人民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逐步增强。人事制度改革有新的进展，推行了公务员制度。民族地区在国家的扶持和其他地区的支援下，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经济增长加快，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得到保障，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侨务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严打”斗争和专项治理，防范和打击了犯罪活动。勤政廉政建设得到加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取得一定成效，依法查办大案要案，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在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国始终保持社会稳定，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六，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我国第一部《国防法》开始实施。各级政府支持人民军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重视科技强军，国防科研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后勤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国防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一些企业积极发展民品生产，在调整 and 改革中增添了新的活力。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军民共建活动，军政、军民团结得到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参加重点工程建设和抢险救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199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 160 元，五年来年均实际增长 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 090 元，年均实际增长 5.4%。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居民的衣、食、住、用、行条件明显改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 10.3%，城乡居民人均粮食、肉类、蛋类等消费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拥有的家用电器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家庭电视机普及率达到 85% 以上。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 8.7 平方米，农村增加到 22 平方米。城乡居



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存款余额达到 46 280 亿元。五年来城镇新增就业 3 555 万人。城镇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 10.06%。妇女儿童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城乡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一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控制，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平均期望寿命达到 70.8 岁。加强了城市和重点区域环境污染的治理，淮河流域污染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果，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全国初步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逐步扩大，300 多个城市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五年中有 3 000 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第八，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继续保持繁荣稳定。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振奋了民族精神。香港实现平稳过渡，标志着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对澳门回归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香港回归八个多月以来，保持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和法律基本不变，“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社会稳定，人心稳定，经济保持稳健运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支持香港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的措施。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李鹏总理在报告中同时指出，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加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经济建设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现象比较普遍，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金融监管不够健全，金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地区发展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城乡都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人民群众对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还不满意，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浮夸作风比较严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这些问题，有的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的是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政府工作也有缺点和失误。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努力解决，但还不尽如人意，有些问题甚至在加重。继续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仍是今后政府工作的艰巨任务。

李鹏总理在报告中总结了五年政府工作的体会：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第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1998年是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第一年，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一年。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报告中提出了1999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齐心奋斗。根据这个总体要求，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1999年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再有一个好收成，力争农民收入增加，保持农村社会安定。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进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要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落实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改善农村干群关系。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中央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推进重点行业 and 重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国有企业的改组和调整。积极稳妥地进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积极推进其他各项改革。

第三，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1999年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8%，商品零售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改善金融调控方式，注意适时适度微调。

第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因势利导，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通过了关于199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改革后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0个减少为29个。会议通过选举决定，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鹏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为国家副主席，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同年3月19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本届政府的任务，并将其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三个到位”，一、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确定在三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朱镕基还强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大会提出，未来的五年，认为中国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21世纪头十年的发展规划，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任重而道远。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有利条件也很多，前景是光明的。全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艰苦奋斗，开拓前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完成政府计划而建立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它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兴衰强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体制是“计划经济”。随着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反对国家计划干预和主张市场调节的经济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国有企业成本高、效率低、竞争能力差以及亏损面逐年增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充分肯定国有企业成就和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主要是：第一，政企不分，职能错位，责权混淆。长期以来，政府集社会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于一身，各级政府都在办企业，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第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营运、监督的责任不清，国家对企业债务承担着无限责任。第三，传统“国有企业”的资产不具有流动性，难以动态优化配。

为了搞活国有企业，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有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党和国家为国企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推动了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推行各种承包制的文件。1987年，有78%的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缴，”的原则来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承包期一般为3~5年，到90年代初期，第一轮承包已经到期。许多企业在第一轮承包期满后，签订了新一轮承包合同，到1991年初，有95%的企业签订了新一轮承包合同。承包制也进一步完善，

形成了包括经济效益指标、发展潜力指标和企业管理指标在内的综合配套的承包指标体系。承包基数也趋于进一步合理化，全国承包基数总水平提高了55%。第二轮承包较大幅度地调整了承包主体，风险抵押机制增强，全员承包范围扩大。企业承包的形式主要有“双保一挂”、减亏承包、行业投入产出承包、定额承包、全员风险抵押承包等。1990年国家又对234家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双向”承包，国家对企业承包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供应，企业对国家承包上交税利、企业发展、企业管理三项指标的合同兑现指标。

我国股份制的实践最早产生于农村社队企业向农民的筹资活动。随着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的扩展，以股份制形式改革国有企业的试点工作也开始展开。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股份制应成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的一个办法。同年7月，我国第一个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991年，全国共有各种类型的股份制试点企业3220家（不包括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工业企业1781家，占试点总数的55%；商业企业942家，占30%；金融企业171家，占5%；建筑企业58家，交通运输企业28家，其他行业企业240家。原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占22%。到2000年，大陆内资股份制工业企业发展到18301家；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大陆内资股份制法人企业发展到4532家，其中批发业有2407家，零售业有1710家，餐饮业有415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各项重大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成长壮大。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配套改革的新阶段。1994年国务院决定，选择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试点。随后，各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确定了一些试点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九五”之初的1996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已遍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企业个数达2343家，在这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改制为股



份有限公司的有 540 家，占 23%；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也有 540 家，占 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有 909 家，占 38.8%；尚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有 307 家，占 13.2%；其他类型的企业有 47 家，占 2%。实行改制的公司中，71% 已成立了董事会，63% 已成立了监事会，33% 已成立了股东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初步形成。到 2000 年，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务院确定的及各地选择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共 2 700 户，绝大部分实行了公司制改革。国家统计局调查的 2 473 家试点企业中，已有 2 016 家企业进行了改制，比重为 81.5%，在改制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为 603 家，占改制企业的 29.9%；股份有限公司为 713 家，占 35.4%；国有独资公司为 700 家，占 34.7%。在已实行改制的企业中，82.2% 的企业成立了股东会，95.1% 的企业成立了董事会，84.5% 的企业成立了监事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列入 520 户国家重点企业的 514 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有 430 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占 83.7%。其中 282 户企业整体或部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已基本形成。

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九五”期间，我国开始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通过改组、改制、改造、兼并联合，培育出了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企业和大集团。1991 年，国务院选择了一批大型企业进行企业集团试点，到 1995 年试点企业集团发展到 56 个。1997 年，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抓紧培育大企业和大集团，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企业扩大到 120 户。1998 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基础上，重组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这两家企业集团的资产总计都在 4 000 亿元以上，实现了上下游、内外贸和产供销一体化，大大提高了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的集约化程度和国际竞争能力。1999 年又组建了军工十大集团，有色金属三大集团。2000 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中国联合通信、中国卫星通信、中国铁道通信 5 家（集团）公司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方案组建或重组。2002 年 5 月 16 日，随着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新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的正式挂牌，中国电信业“5+1”的格局最终形成，即由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讯六大集团公司共同

撑起中国电信运营市场。我国通讯与信息服务领域的市场竞争新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90年代后期，我国结合政府机构改革，政企分开取得了重大进展，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一、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一批重点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所办经营性企业已全部移交地方，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企业脱钩。二、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2001年4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文：《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企业不再套用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管理人员不再享有国家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待遇。打破传统的“干部”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三、加强了政府的综合管理和为企业服务的功能，减少了行政审批项目。改革了行政审批制度。对国家经贸委的行政审批职能进行了全面清理，在清理出的121项行政性审批项目中，已经取消或改变管理方式的有44项，占现有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36%。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1997年底，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数为6599家，三年脱困就是要使这6599家亏损企业中的大多数扭亏为盈，走出困境。“三年脱困”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特定阶段的攻坚战。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国家加大了企业兼并、破产、关闭“五小”（小高炉、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造纸）等政策的实施力度；出台了债转股、技术改造贴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债转股措施对促使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促进企业管理重组、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到2000年12月，已确认对580家企业实施债转股，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从2000年4月1日开始停息，当年可减轻的利息负担为200亿元左右，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可由债转股之前的70%以上降到50%以下。至2000年底，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已经实现。1997年，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为6599户。到2000年11月，已减少了4391户，占66.5%。这些企业有的实现了扭亏为盈，有些通过关闭破产退出了市场，有的被兼并或进行了改制。

激励和约束是发挥经营者潜能的重要手段。年薪制作为激励方式之一，在我国试行于90年代初。“九五”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1992年，上海市



轻工局选定所属的上海英雄金笔厂等三家企业在全国率先试行年薪制。1994年9月，深圳市出台了《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年薪制试点办法》，随后，四川、江苏、北京、河南、辽宁等省市也开始了年薪制试点。经过几年试点后，1997年3月，原劳动部在印发的《关于“九五”时期企业工资工作的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要在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中积极稳妥地推行年薪制。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少数企业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可以继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但不要刮风。”据调查，到1999年，全国除云南、贵州、海南、江西、宁夏、西藏外，其余25个省区市都不同程度地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施了年薪制试点，试点企业总数有9000余家。各地区实施年薪制情况虽有较大差别，但大多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查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1998年出台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条例》，先后任命两批38位稽查特派员进驻到62户国有重点企业开展实地稽查。2000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据调查，2000年，全国31个地区中，除内蒙、江西、福建、湖南、海南、重庆、云南、西藏、陕西、宁夏、青海外，其他20个地区已对一些国有（含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了会计委派制试点。试点企业总数618家，占全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的4.3%。

20年来，我国的改革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循序渐进的道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难点问题，比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政企分开，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过度负债以及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必须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从各方面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解决好这些问题。为此我们班必须根据这个标准，判断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应当具体体现在：一、是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真正把企业建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二、是否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否调动了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四、是否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要体现这些原则。

回顾 20 多年国企改革政策演变的过程，使我们清晰地看出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执著地探索、不断地实践、顽强地奋进的足迹，激发我们做持续的努力完成这一改革大业。

注释：

①张寿正等著：《攻坚之战：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年版。



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

1978 年与整体经济改革同时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通过 20 年的改革与探索，我国的财税体制不仅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领域入手的。最初确定的主调便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几乎窒息的国民经济的活力。在改革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这一改革思路与财税体制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

1994 年的财税改革使中国的财税体制走上了制度创新之路，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因为 1994 年财税改革所覆盖的还只是体制内的政府收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则没有进入视野。1994 年财税改革所着眼的主要是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至于另一翼——财政支出的调整，虽有所涉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既得利益的掣肘加之财政增收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随着 1994 年财税改革成果的逐步释放，上述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并演化为困扰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收支运行过程的“瓶颈”。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先后进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并由此将改革带上了财税体制整体框架的重新构造之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从 1994 年起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

1994年元旦刚过，政府便在财税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主要有：建立新型税收制度体系，建立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基本框架，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从制度上斩断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所推出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多是围绕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展开的。而且也是在整体改革目标定位尚待明晰的背景下而谋划的。这次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突破了以往“放权让利”思路的束缚，走上了转换机制、制度创新之路。从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入手，在改革内容与范围的取舍上，既包含有利益格局的适当调整，更注重新型财税体制的建立，着重财税运行机制的转换。

1998年3月19日，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当选之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下了一段颇具震撼力的话：“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以此为契机，中国拉开了“税费改革”的序幕。

实际上，在全国性“税费改革”正式启动之前，各地已有过治理政府部门乱收费的尝试。最初的提法是“费改税”，其初衷是通过将五花八门的收费改为统一征税的办法来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现存政府收费的种种弊端并非出在政府收费本身。现存的、被称为政府收费的大量项目，既未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又基本不纳入预算，而是由各部门、各地区自立规章，作为自收自支的财源，或归入预算外收入，或进入制度外收入，直接装入各部门、各地区的小金库。因而，它实质是一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来源。“费改税”的目的不是要将本来意义的政府收费统统改为征税，而是将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纳入规范化轨道。“费改税”开始跳出“对应调整”的套路而同包括税收在内的整个政府收入盘子的安排挂起钩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费改税”一词为“税费改革”所取代，进而被赋予了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特殊意义。

在“税费改革”日渐深入并逐步取得成效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翼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后进入改革视野的有：财政支出结构由专注于生产建设领域逐步扩展至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优化调整；推行以规范预算编制和分类方法、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状况为主要着眼点的“部门预算制度”；实行由财政（国库）部门集中收纳包括预算内外收入在内的所有政府性收入，由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政府部门所有财政性支出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进将政府部门的各项直接支出逐步纳入向社会公开竞价购买轨道的



“政府采购制度”。

然而，无论是财政支出一翼的调整，还是以“税费改革”为代表的收入一翼的变动，所涉及的终归只是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局部而非全局。当分别发生在财政收支两翼的改革的局限性逐渐凸现出来之后，人们终于达成如下共识：零敲碎打型的局部调整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一个整体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新构造，并将局部调整纳入整体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之中，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于是，将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及体制在内的所有财税改革事项融入一个整体框架之中，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人们发现，能够统领所有财税改革线索、覆盖所有财税改革事项的概念，只有公共财政。于是，以1998年12月15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为契机，决策层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定：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从那时起，作为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与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位，带有整体改革布局性质的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正式进入财税体制改革的轨道，主要内容有：

第一，2000年开始的部门预算改革。根据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一个部门没有一个完整的预算，而是各部门的经费按功能分成若干类，同时编制多个预算分别向财政业务部门申报。由于经费管理渠道的分散，各类经费预算编报程序和编报途径各有不同，不可避免出现预算编报的时间不统一和编制内容、形式不规范的问题；在资金使用上也无法统筹安排。实行部门预算改革后，将一个部门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按照统一的编报内容和形式在一本预算中完整地反映出来，增强了预算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自2000年财政年度开始，财政部开始推行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即一个部门一本预算，是政府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经政府同意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执行的涵盖部门各项收支的综合财政预算。部门预算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 改革的预算的编制形式，初步实现了“一个部门一本预算”。2. 改革预算编制方法，按照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编制部门预算。3. 深化“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初步实现综合预算。4. 规范了预算编制程序，初步建立起财政部和中央内部的预算编制规程。

第二，2001年“收支两条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是指政府在对财政性资金的管理中，取得收入与发生支出相脱钩，即收入上交

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由财政根据各单位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审核批准，对收入、支出分别进行核定的资金管理方式。2001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意见的通知》，以综合预算编制为出发点，以预算外资金管理为重点和难点，以强调收支脱钩为中心，以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为保障，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的步骤与相关措施，成为新时期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方面的纲领性文件。以这个文件为指导，2002 年财政部进一步加大和深化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对中央部门区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或实行收支脱钩管理等办法，编制综合预算。

1. 将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环保总局 5 个行政执法部门按规定收取的所有预算外收入（不含所属院校的收费）全部纳入预算，全额上缴中央国库；其支出由财政部按该部门履行职能的需要核定，确保经费供给。
2. 对国家质检总局、外经贸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 28 个中央部门的预算外资金（不含所属院校的收费），实行收支脱钩管理。其预算外收入缴入财政专户，财政部按核定的综合定额标准，统筹安排年度财政支出，编制综合财政预算。
3. 改变国税系统、海关系统按收入比例提取经费的办法，实行“预算制”。从 2002 年起，按照部门预算的统一要求核定经费支出。同时，取消缉私、缉毒办案经费同缉私罚没收入挂钩的做法，缉私经费统一纳入海关总署部门预算，缉毒经费分别纳入公安部部门预算和中央补助地方支出预算，根据支出的实际需要予以核定，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

第三，2003 年政府采购制度的全面实施。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在财政等部门的监督下，以法定方式、方法和程序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贯穿预算编制到资金支付的全过程，与其他财政预算改革密切相关。其中，预算编制细化是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前提，采购资金实行财政直接拨付是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保障，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对预算编制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2003 年 1 月 1 日，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进入了全面推行阶段。政府采购制度实施以来，对于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2001 年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配套改革。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是一项涉



及整个财政管理的基础性改革，贯穿于财政预算执行的全过程，是预算执行制度的创新。同时它也是在分税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部门预算编制改革取得进展的基础上，针对多年来我国财政资金管理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滞后的状况，对预算执行制度推行的一次重大改革。预算执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亦称为“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我国传统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预算单位多重设置账户，财政资金分散收付，这种国库运作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发展要求。财政部从1998年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适合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库单一账户和财政资金集中收付制度。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2001年2月28日，国务院第95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同意改革方案，并决定从2001年起在中央实施改革试点，“十五”期间在中央和地方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税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加强宏观调控、实施监督管理、规范财经秩序等重要作用，并具有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性，平等非歧视的公平性，注重社会效益的公益性，以法制为基础的规范性等属性特征。因此，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认识和把握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与作用。

财税体制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保障。财政税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坚持“多予少取”，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深化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完善关税和出口退税等制度，促进外贸健康发展，有利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财税体制改革直接涉及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等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对其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

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财政还要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以创造有利的改革环境。

财税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政以财立，国以财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财政汲取能力，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财政收支活动具体直观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是连接人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国家行政机构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在 20 世纪末以前的 20 年内要抓紧四件工作，头一件就是进行机构改革，并作出了“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著名论断。自此后一直到 1998 年，我们党在连续五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提出了机构改革的任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于第五届和第七、八、九、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范围内，曾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1982 年开始了我国政府机构首轮改革，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1982 年 3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此前不久，国务院已经开启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机构改革。在报告中解释了设立国家经委的目的，“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国家日常经济活动的指挥必须集中统一，目前领导多头、管理分散的状况必须改变，为此决定重新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并扩大其职权和业务范围。”此轮机构改革，设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兼任。还设立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由当时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而来。这个部委在中国 15 年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立下汗马功劳。1982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其历史性进步可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第二，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第三，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第一次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 64 岁减到 60 岁，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 58 岁降到 50 岁。这次机构改革在现代政府管理上迈出关键一步。

1988 年，我国行政机构改革进入第二轮，此轮改革矛头直指政企不分。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平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表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现有机构的弊端愈益突出，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结构不合理，在职能上微观管得过多，宏观调控不力；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结构不适应

经济的、法律的间接管理方式等。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如，撤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销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撤销劳动人事部，建立国家人事部，组建劳动部。撤销国家物资局，组建物资部。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建建设部。撤销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水利电力部，组建水利部。撤销隶属于原国家经委的国家计量局和国家标准局以及原国家经委质量局，设立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

1993年我国进行了第三轮政府机构改革。此轮改革目标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3年3月召开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政企不分再次出现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中。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表示，“这次机构改革和以往机构改革的不同，就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针对政企不分的问题，罗干提出，要坚决把属于企业的权力放给企业，把应该由企业解决的问题，交由企业自己去解决。部委改公司在这次改革中再次出现，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分别组建了航空工业总公司和航天工业总公司。正如中国的市场化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体现在机构改革中，罗干当时坦言，“从经济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长过程来说，目前这个方案还带有一定的过渡性，有的还带有试点性质。今后，还要继续深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此轮改革的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1993年改革时将机械电子部拆成两个部——机械部和电子部；1993年改革撤销能源部，设立了电力部和煤炭部。此外，1993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1993年实行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以调整所有关系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任务。至此，市场与市场主体均已成型，其合法的结合明显推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而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则要求全面建立以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规则，进而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加快转变管理方式，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



理，变单一管理为多元管理，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变自为行政为依法行政。否则，由于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连带的社会进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后续力将因此受到禁制。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加快自身的改革，全面提高政府及其官员的素质，全面增强政府的能力及其有效性，进而引导和推动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迎接21世纪的挑战。

1998年，我国开启了第四轮政府机构改革，此轮改革的目标是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总理。并下大决心进行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面对数千全国人大代表，罗干在会上强调，“政府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经多次改革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此次机构改革直指前两轮改革都未能根治的顽症——政企不分，这次改革，是此前历次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此轮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1998年改革历史性的进步是，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其突出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10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是因为众多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的载体，是落实经济计划的依托。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类部门的存在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的组织堡垒。

1998年的机构改革仍然坚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但这次的侧重点是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具体目标：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

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概括起来，我国四次机构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五条宝贵的经验：一、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关键；二、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三、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既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坚定不移地迈出改革步伐，又充分考虑各方面可承受的程度，审慎地推进改革；四、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五、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经过20年的探索和努力，一个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型公共行政体制正在形成。



医疗制度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坚持了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结合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路线，建立了完善的农村和城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据统计，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35 岁提高到 1981 年的 67.8 岁，新生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20‰降低到 1981 年 37.6‰，孕妇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卫生事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国家在经济上濒于崩溃，财政基础薄弱，卫生费用紧缺；医疗卫生队伍青黄不接，领导水平、技术水平、工作效率都十分低下。粉碎“四人帮”后，虽然 1976 年~1978 年期间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很多医疗机构硬件设施落后，医生护士比例失调，护理人员不足，专家、学者、专业人员知识老化；许多地方疾病多发，卫生状况差。与此同时，卫生系统长期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控制，导致我们不得不思考新的路径进行恢复性的改革的孕育。1978 年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拉开了中国 30 年改革的序幕，一方面为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给卫生事业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简称医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从农村到城镇，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开始进行逐步的渐进改革。工商业企业经历了承包制、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造后逐渐改变了原来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同时，医疗机构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一大潮的影响：随着 80 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在城镇范围，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逐渐衰落。而医疗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相关问题又十分复杂，这一领域的新制度的建立一直较其他行业迟缓。

1985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局长会议，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部署全面开展城市卫生改革工作；同年

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62号文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由此拉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1989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1989〕10号文），这个文件进一步提出通过市场化来调动企业和相关人员积极性，从而拓宽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1991年，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

1994年，国务院决定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进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一、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减轻了各单位医疗费用畸轻畸重的问题，保障了职工的基本医疗；二、建立了医疗费用的制约机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三、促进了医疗机构的改革。当然，试点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在改革中不断进行完善。总之，1994年的“试点”为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探索经验，由此揭开了医改的序幕。

199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为下一步卫生改革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初，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卫生服务、医疗保险、卫生执法监督的卫生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国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在全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健康需求的、比较完善的卫生体系，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欠发达地区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决定》还提出了，推进卫生改革的总要求，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为城镇全体劳动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保障费用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要切实加强对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对医患双方的制约机制，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支付方式，有效地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改革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社区卫



生服务，逐步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改革卫生机构运行机制，这些指导思想成为这一轮改革的基调和依据。

1998年3月，朱镕基宣布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后答记者问时提出了本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五项改革”，是指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至此，医改进入了组织实施阶段。同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了医疗保险改革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指出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原则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此外，这个《决定》还在六个方面对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具体部署。一、对覆盖范围和缴费办法进行了具体说明。1998年《决定》指出，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乡镇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用人单位缴费率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职工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随着经济发展，用人单位和职工缴费率可作相应调整；二、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一般为用人单位缴费的30%左右，具体比例由统筹地区根据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和职工年龄等因素确定。以“统帐结合”的方式进行医改，既注意个人责任，又注意社会共济；既考虑效率，又考虑公平；既立足当前，又顾及长远，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三、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支付，并要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各级劳动保障和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审计部门要定

期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基金收支情况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监督；四、加强医疗服务管理。要确定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范围和标准。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包括中医医院）和定点药店管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根据中西医并举，基层、专科和综合医疗机构兼顾，方便职工就医的原则，负责确定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并同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较少的经费投入，使人民群众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五、妥善解决有关人员的医疗待遇。离休人员、老红军的医疗待遇不变，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医疗待遇不变，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国家公务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享受医疗补助政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包括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均由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缴纳；六、加强组织领导。这是因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政策性强，涉及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出，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从1999年初开始启动，1999年底基本完成。

1998年，中央针对医疗保险进行重点改革，是有深刻原因的。医疗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与国力来实现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创新。迄今以来的医改试验，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成功，甚至还存在着些失误，但包括“两江”、海南、深圳、上海等在内的改革试验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收获。这些收获至少包括：一、新型的职工医疗保障观念逐渐得到确立，新制度的确立已经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或社会基础，从而使改革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职工而是来自于制度设计本身的挑战；二、费用分担和统帐结合的原则基本上制度化了；三、社会化目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体现；四、经过以往的改革已经发现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从而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可以说，以往的改革已经完成了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创新的部分任务，并为最终完成制度创新的任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以往改革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未能确立，从而使医疗保险作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单一层次孤军突进难度加大，并直接制约着医疗保险改革的深化；二、迄今仍未找到公认的、合理的、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三、医疗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疾病医疗风险不能在较大的地区范围和群体范围分散；四、配套的医疗改革等严重滞后。



以往的改革已经部分地完成了医疗保险制度创新的任务，现阶段需要的是通过更加深入的改革来最终确立新型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深化改革的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化的、适合国情的、并为城镇职工提供疾病医疗的基本保障的新型医疗保险制度。为此，需要我们向这样一些方向努力：一、多层次的体系目标不仅要在新制度框架中得到体现，而且应当努力得到实施；二、社会化目标应当尽快实现，包括确立以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不分所有制和城乡户口）为保险对象的原则，实现全面覆盖、属地管理和社会化运行；三、进一步完善筹资机制，包括资金筹集原则、费用分担比例、统帐结合方式等；四、建立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包括供给价格的计划调整对供给方的控制，对需求方的控制，以及对社会保险机制自身的控制（防止流失等）；五、必须将配套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甚至是优先考虑的地位，如医疗改革、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等。总之，医疗保障体系的重建与深化医改是个系统工程。制度创新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还需要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才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注释：

①邹东涛等著：《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住房改革

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应该说，这种制度模式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人口流动不平衡，原有的住房制度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房的迫切需要，因此住房的问题不断尖锐。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保持社会稳定，党中央历届领导高度重视住房制度改革，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住房制度改革起始于1980年邓小平关于住房问题的讲话，当时谈到住宅问题，邓小平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邓小平的讲话为尚没有方向中国住房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划定的“提高租金，出售公房”的指引下，中国住房改革1979年~1985年的主要内容是试点售房。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提出：“准许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房”，正式实行允许住房商品化政策，自此揭开了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在此前后，部分城市开始进行以出售房为主要内容的单项改革探索。

1979~1985年房政策的重点是试售住房，可以分为全价套房与补贴售房两种。1982年，国务院批准以郑州、沙市、常州、四平四城市为试点，试行新建住房补贴出售。“个人购房只需支付1/3的房价款，其余2/3由地方政府及职工所在单位分担补贴，简称为‘三三制’。”^①补贴售房虽然售价略高于全价售房的价格水平，但由于地方政府和单位补贴了2/3，大大减轻



了职工家庭的购房负担，一般家庭大约用两年的收入即可购买一套普通新建住房，因此推行起也相对顺利。但是，补贴售房受到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2/3购房款需由企业和地方政府补贴（地方政府提供的补贴多数转由企业承担），从而造成购房职工越多，企业需承担补贴量越大的情况，不能实现住房资金的自我循环。同时，由于补贴售房未触及低租金制，多数居民仍不愿自己花钱购房。1985年，补贴售房被视为低价售房而取消。

1986年~1990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提租补贴。由于全价售房与补贴售房在实践中受挫，有关部门遂转向研究改革公房租金的可能性。实际上调整公房租金思路的提出与试点售房的进行几乎是在同时，但由于其牵涉面更广，对社会的震动更大，需要克服的阻力更多，所以直到补贴售房被否定后，才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出台。

1988年初国务院开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并于当年2月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宣布将住房制度改革正式纳入中央和地方改革计划，分期分批推行。第一步改革旨在通过全面提高租金，做到以租养房，促进购房，从而实现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并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第二步改革则是理顺分配关系（补贴列入工资、计入企业成本），提高职工的经济负担能力，进一步实行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和专业化。这是中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个房改总体方案，一般称之为提租补贴方案。

提租补贴方案的主要政策构架是：根据住房的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和房产税五项因素，合理调整公房租金；同时根据调租幅度，发放一定数量的住房卷，用于抵交新增租金；住房卷按个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坚持多住房多交租和少住房可得益的分配原则，改变以往等级制分配方式；建立城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三级住房基金，以形成稳定的住房资金来源；积极组织出售公有住房，同时进行财政、金融和信贷方面的配套改革。

这一改革，在烟台、蚌埠、唐山、深圳、成都等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遗憾的是，中国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考虑到如果继续实施提租补贴方案，在成本推进效应的作用下，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形势更趋于恶化。同时，由于提租方案触及了部分当权者的利益，因而遭到一些执行者的抵制和反对，于是原计划用3~5年完成的提租补贴方案，未全面推开就夭折了。

1991年~1993年住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以售带租。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在继续提出合理地调整现有公房租金、出售公有住房的同时，强调实行新房新政策，使新建住房不再进入旧的住房体制，有利于今后住房制度及住房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时期的政策取向开始转变，希望通过新房新政策的方式，避开存量住房提租的阻力，通过在外围实行增量房改，使住房新制度在量逐渐累计，最终实现质变。

1991年10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10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起草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总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在总目标首先肯定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重申1991年6月国务院《通知》的主要精神外，还提出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从改革公房低租金着手，将现行公房的实物福利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货币工资分配制度。在分阶段目标中，“八五”计划期间以改变低租金、无偿分配为基本点，公房租金计划租标准力度达到实现简单再生产的三项因素（维修费、管理费、折旧费）水平；到2000年，公房租金标准要努力达到包含五项因素（维修费、管理费、折旧费、投资利息和房地产税）的成本租金水平。长期目标是住房租金达到包含八项因素（在五个因素基础上加土地使用费、保险费和利润）的商品租金水平，完善住房机制的转换，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

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的房改房也陆续全面实施。在实施中，一些大城市的运作比较规范，部分中小城市则相对较差，致使优惠比例越来越大，低价住房之风再次蔓延，房改第三次进入低价售房的怪圈。1992年6月，国务院房改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制止低价售房。

1994年到1997年住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住房市场改革。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正式改革之路。该文件提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把各单位建设、分配、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改变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



品房供应体系；同时，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

经过三年多来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形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发展速度，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快住房改革步伐，加大住房建设的规模，适应人民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和住房需求的增长，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城镇居民住房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可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1997年1月24日，国务院朱镕基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针对住房改革发表重要讲话。

朱镕基在讲话中指出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政策，推行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同时，通过多种资金渠道，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并指出，要把普遍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1997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他在讲话中还重点指出，住房公积金的基本原则：一、由房委会决策，即由住房委员会或房改领导小组决策，应该怎么使用，盖多少房子；二、“中心”运作，即有一个管理中心来运作，具体执行；三、银行专户，即住房公积金存到银行设立一个专户，利率是低进低出的，存进去的利率是低的，贷出去的利率相对也是低的，这样就保证房子是低造价，卖给居民是低价格。公积金如果一时用不出去，沉淀在银行的钱，银行还要照付利息，甚至是更优惠的利息，这也是一种优惠政策，鼓励住房公积金的建立；四、是财政监督，即加强住房公积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住房公积金专款专用，安全有效运行，不允许挪用公积金去搞别的。

朱镕基还在讲话中着重强调，要把国家安居工程与利用公积金建房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建设。地方政府给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也要给用公积金建的住房。为了保证住房建设资金的回收、运转，以形成良性循环，必须保证经济适用住房的低造价、低售价，促进住房商品化。同时，银行对经济适用住房用户，要采取抵押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方式，引导居民住房消费，推动住房商品化。讲话中也提及了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重要性的问题，主要是，要大力推行住房商品化，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是振兴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总之，这一时期各地区、各部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居民住房状况总体来讲有了较大改善。

而对于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提出了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一）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国情的城镇住房新制度；加快住房建设，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二）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三）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在国家统一政策目标指导下，地方分别决策，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坚持国家、单位和个人合理负担；坚持‘新房新制度、老房老办法’，平稳过渡，综合配套”。该文件还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通知》强调，要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采取扶持政策，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发展住房金融，加强住房物业管理。

住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住房制度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城镇住房实物分配的福利体制已经基本终止，货币化住房分配、市场化和社会化供给体系也已大体建立。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继续锐意进取，解决改革中的问题，不断推进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改善人民的住房水平。

注释：

①《关于出售城市住宅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国务院颁布，1982年4月。



“再就业工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伴随着国企改革的同时，我国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统计摘要中的数据显示：1996年全国的国企下岗职工人数已达891万，而且预计在未来的五年内，国有企业还将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裁出富余人员，届时将产生3000万名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的不断增多，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阻碍了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失业和下岗人员增多已经成为当前以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了切实解决失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原国家劳动部于1993年开始实施再就业工程。1996年国家劳动工作要点强调指出：要紧密配合企业改革，着力抓好再就业工程的实施。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不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再就业工程在我国实施和大力推行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再就业工程实施是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最重要一环。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就业体制的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劳动力市场主体不到位，就业信息的发布、传导及其对劳动力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很有限，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再就业工程适应转轨时期的需要，通过采取一种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手段统包统配，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自主调节的应急性和过渡性措施和手段配置劳动力资源，为失业、下岗人员提供就业指导、就业咨询、职业培训，培育劳动力市场主体，沟通供求双方信息，降低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促进

劳动力流动，最终为实现企业成员增效，下岗分流和再就业走向市场，建立国家政策指导下的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新机制奠定基础。

其次，再就业工程的实施是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客观要求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劳动要素的专用性不断加强，新兴产业和扩张部门对劳动力人力资本要求、专有技能要求不断提高，职业培训对劳动力就业、岗位转换的意义越来越大。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培训收益期较长，目前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尚未到位，再就业工程通过政府投入一定资金，针对结构性失业和下岗人员举办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创业培训，进行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职业技能教育，有利于提高劳动者转岗适应能力，消除劳动力跨部门、跨行业流动障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产物。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统包统配所形成的企业内部庞大数量的冗员包袱严重地制约了企业活力发挥和经济效益提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客观要求解放人的生产要素，落实企业用工自主权，把企业内部大量富余人员排除、释放，实现隐性失业社会化和显性化，真正做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缺乏安全网络的特定历史时期，实施再就业工程，组建各级各类再就业服务中心或类似机构，对企业庞大数量富余人员实行“管”，既解决了企业富余人员社会化、显性问题，又避免了大量失业、下岗人员直接冲击社会的巨大压力，这不仅是一个权宜之计，也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

我国再就业工程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而适时提出的。它的实施大致经历了试点、推广和制度化三个阶段。

1993年4月，针对我国当时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富余职工需要安置的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定》，对国有企业职工因企业破产、倒闭而失去工作的重新安置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企业自行安置为主、社会帮助安置为辅、保障富余职工基本生活”的指导原则，并开始组织在部分城市实施再就业工程试点。1994年，原国家劳动部在上海、沈阳、青岛、成都、杭州等30个大中城市具体组织实施再就业工程试点，并对再就业工程的实施提出了初步意见和办法，具体内容包括：



一、全面推进就业制度和就业服务事业发展，由劳动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组成专门机构对失业人员进行登记，提供必要的失业救济金，开展就业培训等；二、利用劳动服务企业建立生产自救基地，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出路问题，同时适当安置主办单位富余职工和职工子女，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三、对缺乏一技之长或不能利用原有技能或技能急需提高更新的失业人员进行就业转岗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要求；四、实行政策倾斜优惠政策，鼓励用工单位优先招收失业人员，如将一定数额的失业保险金（不超过24个月）一次性拨付给用工单位，用于安置、培训失业人员，同时提供适度财政贴息贷款，鼓励优势企业兼并破产企业等；五、大力组织向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同家进行劳务输出，缓解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随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纷纷投入再就业工程。仅1994年一年，“全国利用各种途径共安置城镇失业人员725万人，占需要安置人员总数的58.9%；建立职业介绍机构2.5万个，就业培训中心2600个，劳动服务企业18.8万个。有关部门为180万人发放了失业救济金，并帮助其中108万人实现了再就业。”^①

1995年4月，我国再就业工程经过近两年的试点，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劳动部关于在全国实行再就业工程的报告，标志着我国再就业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开始启动。这一时期，在总结前期试点城市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时就业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了我国再就业工程是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和企业职工分流安置的社会工程，指出我国再就业工程的中心任务是要综合运用扶持政策和各种就业服务手段，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面的积极性，为失业六个月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和生活困难的企业下岗富余职工提供重点的服务和帮助，促使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再就业工程实行由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的新“三结合”就业工作方针。

在再就业工程组织和实施中，各地区、各部门结合自身特点，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系列文件要求和布置，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有关税收优惠、工商登记、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中规定，新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当年安置城镇待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60%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可免征所得税三年。免税期满后以后，当年新安置待业人员占企业原从业人员总数30%以上的，可减半征收所得税两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的人员包括待业青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农转非人员、劳教释放人员。武汉市对企业自办或联办、以安置下岗职工为主的生产项目，劳动部门批准的安置下岗职工的生产自救基地，除享受劳动服务企业规定的待遇以外，缺乏启动资金的，可给予贷款支持；对于下岗职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利用其原企业闲置设备、边角余料、库存产品从事生产自救活动或新开项目的，在单独核算的基础上，除享受劳动服务企业优惠政策外，还可给予更大幅度的照顾。市政府还通过财政拨款、企业和社会各界资助、失业保险金合理调配等途径，建立再就业基金。为此，市政府连续三年内通过财政拨款 500 万元作为建立再就业基金的基础。上海市还在推行“政府推动、市场吸纳、企业自行消化、职工自助和社会援助相结合”的再就业工程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再就业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于 1996 年 7 月 26 日成立了由政府帮助、社会支持、企业出面组建的纺织、仪电系统“再就业服务中心”，为支持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下岗职工进行委托管理。到 1996 年年底，“全国有 22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台了《再就业工程实施办法》推动了近 200 个城市的再就业工程。全国共有就业服务中心 2 716 所，组织 500 万失业职工和下岗人员参加了再就业工程。其中 300 万人参加了职业指导，110 万人参加了转业、转岗培训，451 万人享受了失业救济，近 200 万人开展了生产自救。通过政策引导和就业服务使 243 万人实现了再就业。”^②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加快，特别是 199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走出困境”的中期改革目标，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重组的大型企业集团战略措施以后，就业问题及其引发的其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再度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下岗和再就业成为全国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

在进一步总结前期各地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国务院于 1997 年 4 月 20 日发布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问题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把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和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把再就业工程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并正式启动了再就业工程。《补充通知》要求，再就业工程由国家经贸委具体负责全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的组织协调工作。为加强对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



院成立由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同等部门组成的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参加，加强对全国再就业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由国家经贸委任组长，专门负责全国试点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制订《企业兼并破产和再就业工作计划》的编制办法，下达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核销呆、坏账准备金的预分配规模等。《补充通知》还明确提出，各试点城市人民政府要积极推广上海市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经验，结合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当地的具体情况、从上到下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积极拓宽就业门路，关心破产企业职工生活，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保持社会稳定。破产企业向再就业服务中心从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职工安置费标准原则上按照破产企业所在试点城市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支付。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从政治高度确立了再就业工程的地位，使再就业从过去简单意义上的促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演变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

199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专门会议，并于1998年6月9日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在总结我国再就业工程实施状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我国当前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就业工程实施的指导思想、目标和任务以及具体内容等都作了明确和详尽的阐述。提出，当前我国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尤其要把切实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作为再就业工程的核心任务。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成为我国再就业工程实施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标志着我国再就业工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再就业工程是根据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点和切实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通过一定的资金投入，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转岗培训和生产自救、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是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就业工程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利益得到充分重视和保护的制度特征，不仅是一项重要经济工作，也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政治工作。

注释：

①摘自：《劳动部、国家统计局 1994 年度劳动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中国市场发展报告》（1996～1997 年），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23 页。



1998 年大洪水和“抗洪”精神

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全长 6397 千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主峰各拉丹冬雪山。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水量也是世界第三。总面积 1 808 500 平方公里（不包括淮河流域），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5，和黄河一起并称为“母亲河”。长江可供开发的水能总量达 2 亿千瓦，是中国水能最富有的河流。历史记载表明，在公元前 206 年至 1960 年期间，中国经历了 1 030 余次严重洪水。特别广泛的洪水，长江发生了 50 余次，其支流汉江发生了 30 余次；长江流域平均每 60 ~ 65 年会发生一次灾难性洪水。广泛的洪水也可在较短时期内发生。1870 年以来即是如此，在这一期间内，长江流域在 1870、1896、1931、1949 和 1954 年发生洪水。其中 1931 和 1954 年的洪水是普遍的、全国性的灾难。1931 年洪水起源于覆盖流域中、下游多数地区的、猛烈的、连续的季风雨。在 5 ~ 6 月间，6 次巨大洪峰顺江而下，摧毁 23 地的防护堤坝，淹没 90 650 平方公里土地；4 000 万人失去家园或遭受其他苦难。包括南京、武汉及其他城市在内的许多人口中心遭洪水淹没。

自 1998 年 6 月份起，由于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长江流域出现三次持续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发生了继 1954 年以来第二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入夏以来，东北地区也连降大雨暴雨。松花江、嫩江发生三次大洪水，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洪峰之高，流量之大，都超过历史最高记录。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等江河，在 6 月下旬也相继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由于洪水量极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非常严重。

能否战胜这场洪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是对党的严峻考验。6 月 30 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关于长江、淮河防汛抗洪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立即上岗到位，切实负起防汛指挥的重任，迎战洪峰，战胜洪水。8 月 9 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赴湖北长江抗洪第一线，察看长江大堤防守情况。朱镕基传达了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最新指示，强调在长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沿江各地一定要把长江抗洪抢险作为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要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不能有丝毫松懈和动摇。随后，朱镕基又到九江市抢险现场察看。8月13日，江泽民赴湖北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看望、慰问、鼓励广大军民，指导抗洪抢险斗争。8月14日，江泽民在武汉发表重要讲话，就决战阶段的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作总动员。江泽民说，现在长江抗洪抢险到了紧要关头，处于决战的关键时刻。只要坚定信心，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能够取得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但是，这一段时间也最容易发生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损失。因此必须加倍努力，把动员、组织、落实工作做得更好。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在长江抗洪抢险中英勇牺牲的空军某高炮团政治指导员高建成“抗洪英雄”荣誉称号。8月16日下午，江泽民向参加抗洪的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沿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同时要求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率领群众，与部队官兵共同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干堤安全。

1998年9月4日，江泽民在九江市就抗洪救灾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他号召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发扬在抗洪抢险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艰苦奋斗，互助互济，做好救灾工作，早日把生产恢复和发展上去，早日重建美好的家园。9月5日，江泽民赴黑龙江省考察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抗洪救灾工作，强调要把受灾群众的生活安置好。9月7日至12日，朱镕基先后到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和四川考察，听取五省市负责人对灾后重建、治理水患、发展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共同研究做好这些工作的主要措施。朱镕基强调，在灾后重建工作中，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又要着眼未来、从长计议，把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治理江河水患、实现长远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百万军民与罕见的大洪水进行殊死搏斗的一场硬仗。为了打赢这场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特别是受灾省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同前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终于确保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确



保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据统计，全国参加抗洪的干部群众800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调动66个师、旅和武警总队共27.4万兵力。截至8月23日，解放军、武警部队已投入兵力433.22万人次，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500多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75万艘次，飞机和直升机1289架次。

在这次伟大的抗洪斗争中，我们也积累了两条宝贵的经验：第一，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这是因为只有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不断提高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近20年来，我们始终不渝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全面跃上新的台阶，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们的国家已经拥有比较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我们的人民焕发出更加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在这次抗洪抢险中，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硬仗。这样的硬仗，离开必胜的勇气和顽强的斗争，离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离开综合国力的提高，是打不了的。没有经过长期努力建设和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没有水利、气象、水文等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要夺取这样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这次抗洪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认真学习和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学习和吸取国外一切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益经验，是我们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二，通过综合治理，提高我国防洪抗灾的能力。因为从总体上看，我国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还不高，在水利建设和综合治理方面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洪涝灾害频频威胁着沿江沿湖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深思考。今年发生这么大的洪水，主要原因是气候异常、降雨集中，也就是说，主要是天灾造成的。我们要充分正视生态破坏严重、江湖淤积、水利设施薄弱等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加以改进，使我们的防范抗御能力得到新的提高，以利更有效地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加强水利建设，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中央对进一步做好生态保护和水利建设提出了总的要求，国务院已进行了具体部署，各地各部门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抓紧安排，确保落实。重点是要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治理江河湖泊，加强防洪设施和水利设施建设。

199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由朱镕基主持，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在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展示出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凝聚力。从千里长堤到首都北京，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沿海省市到边疆民族地区，前方后方步调一致，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中华儿女的力量集结在一起。越是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大关头，全国人民就越是充分显示出非凡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我们就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浊浪排空，惊涛击岸，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面临着严峻考验。这是生死系于一念的时刻，更是英雄辈出的时刻。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高建成、吴良珠、胡继成、王占成、李长志、杨晓飞、陈申桃、包石头、宋波、董光琳、罗典苏、马殿圣等同志，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这种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天地为之动容，世人为之赞叹。有了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鼓舞，中国人民就能始终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广大军民誓与洪水决一死战，迎着困难和危险勇敢前进，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始终牢牢挺立在滔滔洪水的前面。洪水涨一尺，斗志高一丈。越是情况危急，广大军民越是不屈不挠，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有了这种勇气和毅力形成的雷霆万钧之势，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克服！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



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发扬，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的发展。抗洪精神，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和新时期的创业精神一样，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代都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激励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9月28日。

海峡两岸关系的波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历史与大陆的历史是休戚与共，一脉相承的。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就曾派将领到台湾，从此开始了我国对台湾、澎湖的经营。宋元时期开始在台湾设立官制。明朝曾派兵戍守台湾和澎湖，使台湾、澎湖成为我国重要的海防地区。1604年台湾被荷兰和西班牙侵略，成为殖民地。1662年郑成功率领大军，横渡海峡，赶走了殖民者，使台湾重归祖国。郑成功死后，其子掌握政权，在台湾实行割据，阻挠统一。1683年清康熙帝派兵收复台湾，使台湾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并于第二年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1885年清政府撤府设省，从此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省份。这种统一持续到《马关条约》签订之前。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中国才重新收复台湾。1946年国民党置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的愿望于不顾，公然发动内战，并最终于1949年战败，退踞台湾。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所谓“代表全中国”的政治框架，妄图伺机反攻大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共产党集中主力于朝鲜战场，暂时搁置对台湾的收复。自此，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大陆长期分离的状态之中。

尽管如此，但是“台湾问题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两岸迄今尚未统一，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的事实并未改变”。^①

国民党从1991年开始，在李登辉的主导下，以“修宪”为主要内容，进行了“宪政体制改革”，逐渐地使国民党政权台湾化。1991年12月完成第一阶段的“程序修宪”。1992年5月完成第二阶段的“实质修宪”。至1994年7月完成第三次“修宪”，基本上落实了政权的台湾化。这样，就在“宪法”上炮制出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架构”，从而使台湾当局



在两岸关系上所鼓吹的“对等政治实体”有了“宪法注脚”，也为台湾前途的“多种选择”确立了“法律依据”。政权台湾化，也带来了国民党的台湾化，“中央民意机构”的台湾化，“行政体制”的台湾化，“中华民国”的台湾化。在两岸还没有实现统一的条件下，台湾进行这样的“宪政体制改革”，必然会促成以台湾为主体的地方意识的极度膨胀，于是诸如“台湾利益优先论”、“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命运共同体”等谬论纷纷出笼，并蔓延发展。其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把台湾建成与祖国大陆相分离，从而具有“独立主权地位”的另外一个国家，其实质是搞“台独”。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对台政策的“八项主张”，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逐步实现和平统一的谈判；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身份访问大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争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重要宣示。讲话不仅进一步阐释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精髓，而且提出了为打破现阶段两岸政治僵局，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一系列建设性主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平统一所秉持的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坚持原则、求同存异的立场，是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早日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增强两岸互信合作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因而受到了两岸人民的普遍关注和热烈欢迎。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宣称要“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致使两岸两会正在筹划中的第二次“汪辜会谈”遭到破坏。1995年7月2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任何外国势力的介入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台湾当局图谋“重返”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一国两席”，不仅阻碍中国实现和平统一，而且必将在台湾海峡引起紧张局势、威胁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8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利在回答中国记者关于台湾当局企图推翻联大决议，“重返”联合国的提问时说，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

“现在仍然有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联合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1996年3月1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公然叫嚷美国应帮助保卫台湾。美方此举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加剧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恶劣行径。

1998年10月14日，应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邀请，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和夫人严倬云率海基会参访团一行12人抵达上海，开始了在祖国大陆为期6天的参访活动。1998年10月在各方的努力下，辜振甫访问大陆，他在北京分别与江泽民、钱其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并在上海两度与汪道涵会晤，两会达成了包括汪老1999年回访台湾在内的四项共识，开启了两岸高层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政治对话的先河，为恢复两会的良性互动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期间，汪会长指出，“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我们一贯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江泽民提出，第一步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敌对状态，是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必经步骤，符合海峡两岸同胞的心愿，符合台湾同胞求安定、求和平的愿望，体现了我们实事求是、分阶段逐步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当前，首先要就上述政治谈判作出程序性安排，通过程序性商谈，就政治谈判的议题、代表名义、方式等问题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有了这样一个渠道和机制，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进行沟通 and 讨论。希望海基会作出认真的、积极的、明确的回应。”^②

汪会长在回顾了两会事务性商谈的历程后指出，以往两会商谈难以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已涉及政治问题而又没有条件进行讨论。汪会长提出，两会应尽快开展对话，包括政治对话，为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预作准备。汪会长建议继续保持两会的交流和接触，可以共同举办两岸关系研讨会或座谈会，也可由两会副秘书长率交流团组，两会负责人率顾问、理事团或董监事团互访，为两岸政治对话创造条件。在两会商谈未开始前，涉及两岸同胞权益的事件，两会可在各自许可的范围内加强个案合作。

在谈到当前涉及两岸同胞权益的突出问题时，汪会长指出，随着两岸人员往来的频繁，难免发生一些有关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受损害的突发事件。大



陆有关方面将一如既往地本着维护两岸同胞权益的宗旨予以高度重视，妥善处理。海协也将继续通过与海基会相互联系与委托的方式，尽可能提供各种协助，努力维护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汪会长认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中真正攸关台湾 2 100 多万同胞和 12 亿大陆同胞权益的问题，一、尽快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二、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敌对状态没有结束，使两岸长期处于不正常、不稳定状态。两岸同胞之间不能正常往来，直接损害着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海峡两岸人民的整体权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衍生各类纠纷与事件的重要原因。辜振甫先生等也就两岸之间的一些政治分歧问题，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辜振甫大陆参访及两岸的高层接触、对话，是国民党去台以来，两岸高层在中国人自己领土上进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极具象征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两岸关系气氛在历经 3 年多的紧张、僵持后有了明显改善，两岸实际上的政治性对话已经开启，还有助于两岸增进了解，培养互信，缩小差距，进而共议解决分歧之道，从而为两岸关系进一步的良性互动创造契机，带来曙光。但是，由于两岸两会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对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作出明确承诺，辜振甫大陆行仅被定位为“参观访问”，其实质意义有限，两岸政治僵局仍然未能打破。1999 年 7 月李登辉为阻止汪道涵访台，突然抛出“两国论”，两会协商对话再次中断。

注释：

①摘自王兆国：《关于〈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的说明》，新华网，2005 年 3 月 8 日。

②《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 年 10 月 15 日，第 5 版。

改革开放 20 周年总结与回顾

“1978 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坚定不移、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令人心向往之的光明前景。”^①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②

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有其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的。在国内方面，“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挫折并带来了重大损失。政治上体现为政治局面混乱，经济上体现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在国际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范围内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快速向前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日趋甚远，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也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邓小平正是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式，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的基础上，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其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又进一步指出：“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据此，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10月），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城市进行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并创建了经济特区。1978年，为了克服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中共安徽、四川省委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两省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9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也取得进展在这期间，对外开放逐步展开。1979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采取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吸收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第二阶段（1984年10～1991年12月），改革的展开阶段，重点在城市。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成为了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其中价格改革是关键。改革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公布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加快人才培养，多出成果，尽快把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指明了方向。此外，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

第三阶段（1992～1998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制度创新，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市场、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构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1992年1月~2月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时，阐述了他对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③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反映了来自我国改革实践的呼声，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布采取新的“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争取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方面取得改革的突破，使市场经济体制在20世纪得以初步建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20年。也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20年。

199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将改革开放20年所取得的成就概括为：一、我们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二、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四、我们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我们发展经济和抵御各种风险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



强。12 亿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五、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重要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备。六、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和其他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七、我们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历史性的胜利。严格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澳门将于 1999 年回到祖国怀抱。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发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八、我们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注重质量建设，依靠科技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国防总体实力和防卫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九、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我们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十、我们党提高了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积累了驾驭各种复杂局势的重要经验。党的自身建设得到改善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进展顺利。我们党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20 年的伟大成就，为今后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去夺取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

改革开放 20 年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党在妥善处理国内和对外关系中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20 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并结合实践的发展充分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 11 个方面对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全面而精辟的阐述，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这些经验主要包括：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维护 and 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必须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

展望未来，我们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国内情况上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需深入，并将进入“攻坚”阶段；仍有相当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缺乏活力，经营困难，而且将在相当长时间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金融体制改革仍需有效推进；国民经济竞争力总体较弱。从国际情况上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如果这些不能有效解决，就会影响我们改革开放的大业。因此，我们要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沉着冷静的应对各种挑战，不断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①②摘自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Z]，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实施人才战略和“高校扩招” (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有较大发展，到2010年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该计划吹响了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军的号角。在1999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上大学的需求。在2001年全国人代会上，朱镕基总理提出将毛入学率15%的目标提前到2005年实现，这是顺应历史潮流，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只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大批各类人才，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才能落实“三个代表”。

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推行大众化，也有质量问题。因为教学质量是教育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不断解决的问题。当然，大众化以后，数量发展了，质量问题也就多了。数量与质量是对立的统一，是一对矛盾，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没有质量的数量，等于没有数量，甚至比有数量还要糟糕。但是，从当前我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的状况来看，数量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当务之急，然而有不少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首先要解决为什么要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尚处在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仅为11%，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不适应新世纪人才竞争的需要。21世纪的最大特点就是“竞争”，各国将在经济、国防、科技、综合国力等各方面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但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为20世纪世界的财

富源于物质资源，而21世纪世界的财富源于人力资源，哪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人才才是富有的、强大的。知识与人才已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党中央提出，在21世纪里，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才。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提出，我国的“教育事业要有大的发展、大的提高”，他还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缺乏人才，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必须走大众化之路，实施“高校扩招”。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的发展人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我国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很落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82%，加拿大高达102%，日本、英、法等发达国家均在50%以上，菲律宾、印度等国也在30%以上，全世界平均毛入学率为14.5%。”^①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多培养人才、扩大招生，我们应当用积极的态度热情支持，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扩招的目标，为国家多培养人才做出贡献。

自《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高校扩招”逐步展开。具体表现在：一、办学主体多样化。改变了过去完全由国家办学、政府办学的单一模式，发展“一主多元”的办学模式，即以国家办学为主，积极发展民办教育、私人办教育、企业办教育、公民合作办学、公立高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二、办学形式多样化。有全日制、非全日制，有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大专自学考试。三、教育目标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根据社会的不同需要，分别培养理论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等。四、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不同学科、不同专业有不同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即使是同一专业，不同的学校教学内容也不一样。为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各高校普遍开设大量选修课，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五、培养方式多样化。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教授式、讨论式、研究式、专题式、个案式等教学方式。

实施人才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才问题战略思想在实践层面的拓展，是我们党科学分析世纪之交国际国内的形势，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继承我国古代优秀人才思想的精华，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国情做出的重大决策，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而做出的努力。这一战略的提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才理论，同时也是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人才领域的必然要求，是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

在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把科技和人才摆到突出的战略位置，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建议》第九部分专门论述了人才资源开发（含发展教育事业）问题，《建议》鲜明地指出：“要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才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要把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切实抓好。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尤其是培养一大批急需的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专业人才。”随后，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批准“十五”计划纲要把人才资源提升到战略资源的高度的同时开辟专章，提出“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至此，表明实施人才战略已经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并成为国家和全民的意志。在接下来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认真实施人才政策。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快培养和选拔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需要的各类人才”。这样，就为实施人才战略提供了政策支持。

2002年中共中央公布实施了《（2002—2005）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综合性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也是落实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的具体行动。这个规划纲要在先前“人才战略”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并鲜明地指出了人才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再一次把人才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工作规划。同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确立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2002年底，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了党管人才原则，要求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2003年5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近年来我国人才工作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才工

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重大任务和工作目标。会议提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并进一步强调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根据党管人才的要求，决定成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将其作为全面加强人才工作的一项组织措施，履行人才工作的战略规划、政策研究、宏观指导和工作协调职责。这标志着人才工作摆上了党和国家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是对人才战略的深化，把人才工作与国家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表达为国家战略，是我们党对人才工作总体设计和战略谋划的结晶，集中体现了 21 世纪新阶段党的人才战略思想和总体要求，对于全党全国进一步把人才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具有重要的动员作用，从国家层面提升了我国人才工作的层次和水平。2003 年 11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重点研究人才工作。2003 年 12 月 19 ~ 20 日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要求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作为 21 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向全国发出了 21 世纪新阶段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标志着人才工作进入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的新的发展阶段。

人才战略是筹划和指导人才工作全局的方略，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人才队伍建设的总方针。人才战略体现的是国家根本利益，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总目标和总方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中央科学分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面临的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情况做出的重大部署，是顺利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正确抉择。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走人才强国之路，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决策，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预示着我国人才工作进入新的历史纪元。

注释：

①《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论集：135 位专家学者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校扩招（中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52 页。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三代领导人都很重视正确处理地区发展的问题。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突出地提出了处理地区之间关系的战略问题，强调我国面临的区域结构性矛盾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进行过深刻的考虑。他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赴陕甘宁贫困地区考察工作时说：“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总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中国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国家有能力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还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6月17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概念和总的原则，精辟地阐述了西部大开发的深远意义。他说，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总的原则

是：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把西部发展同实现全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保持西部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各民族共同富裕了，就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就会大大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巩固祖国边防，也就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政治基础”。^①

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进一步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以下方面。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二、切实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和资源等条件，着力发展有自己特色的优势产业，有条件的地方在发展高新技术；四、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至此，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成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西部地区特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内蒙古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



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成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目标是努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达到新水平，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新成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出扎实步伐。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

在从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到实施过程中，西部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快。西部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加，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益和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第二，西部地区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党中央、国务院选择西部地区最薄弱的方面、也是长期以来制约西部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突破口，提出力争在西部开发头十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经过几年的努力，许多项目已经开始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第三，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一手抓关系西部全局的重大工程，一手抓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中小项目，使各族人民不断得到实惠。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基本实现，县际公路、农村饮水、农村能源、生态移民等工程积极推进，“两基”攻坚计划稳步实施，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四，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提高。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强大动力和重大任务，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西部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完善市场体系，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拓宽东西合作和对外开放领域。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部署；是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的根本保证；是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的必然要求。实施这个战略决策，不仅对于振兴中西部地区经济，而且对于促进全国经济更大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长远发展的宏伟目标，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实现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东部地区由于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有利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现代化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们普遍过上了小康生活。然而西部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甚至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加速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共同繁荣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保持全国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广大西部省区地处祖国边疆，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方。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分化”和“西化”，利用西部民族和宗教问题搞颠覆和分裂活动。维护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我国的阴谋，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根本上巩固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宁的大好局面。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需求不足，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需要寻求新的生产领域、新的市场、新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发展水平较低，还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通过发展特色经济，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有效地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实施，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任务更为艰巨。加上千百年来频繁的战乱、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的原因，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荒漠化年复一年地加剧，并有逐步向东推移的趋势。这不仅对西部地区，而且也给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不遏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就没有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地区的现



代化，也就谈不上全国的现代化。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适应世界范围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而深刻地进行，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在 21 世纪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使我们发展得更快、更好，必须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为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民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边境线最长的地区，也是地域广大、资源丰富、潜在市场广阔的地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可以缩小地区差距，有利于民族团结、边防巩固，而且可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之成为 21 世纪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支撑点。

今后一段时期，是西部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发展科技教育，培育和用好各类人才；国家要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

注释：

① 《人民日报》，1999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

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 通过宪法修正案

1998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我们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战胜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在巨大困难条件下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这些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强大的凝聚力，极大地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也使我们积累了在复杂条件下驾驭全局取得成绩的宝贵经验，为做好新一年的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5日~1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期最短的一次）。“会议共有代表2869名。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共收到议案759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议案19件，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740件。”^①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审查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批准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1999年中央预算；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草案）》；听取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朱镕基的报告共分十个部分：1998年工作回顾和1999年工作的总体要求；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认真做好金融工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有效利用外



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努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

会议审议并批准通过了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基本实现了预定的改革和发展的各项目标，这是来之不易的。会议指出，1999年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完成本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推进和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维护农村稳定。要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行业调整和改组的步伐，调整产品结构，坚决制止重复建设。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科学管理，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鼓励和支持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稳步推进金融改革，继续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加强税收征管，全面清理和规范收费，逐步推进“费改税”。要继续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要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继续改善人民生活。

会议要求，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各项社会

主义文化事业。

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依法行政，从严治政，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积极稳妥地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会议指出，要继续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按照基本法施政，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要确保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八项主张，认真做好各项对台工作，努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会议指出，要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我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这个《修正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第十二条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十三条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十四条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十五条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第十六条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第十七条宪法第二十八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修改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

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根据这一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等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决议、关于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大会。人民代表讨论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全国各族人民了解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人民意志，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团结和集中各种力量成就大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也是我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和历史的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一制度本身也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人大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在立法、监督等方面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做了很多新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总之，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我国在新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摘自《人民日报》，1999年3月5日，第1版。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并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毛泽东曾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过安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①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客观审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法制建设遭受严重破坏以及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后，十分强调和重视法制建设。他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条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会上，江泽民同志在题为《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政府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由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针，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要求。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1998年3

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就依法治国的问题再次做了精辟的阐述。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深刻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的同时要注意把握：依法治国的主题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也就是党领导人民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依法治国就是要保证对所有这些事业、事务的管理工作都要依法进行。依法治国所依的法，最重要的是宪法和法律。我国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利益、人民意志的统一。

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方略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法制的健全。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中，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核心，执法必严是关键，违法必究是保障。具体说来：“有法可依”就是要建立统一、完善、科学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即立法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能够及时对各种互惠关系进行隔离规范；“有法必依”就是要保证法律效力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即尽量排除杜绝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的随意性、偶然性和腐败现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执法必严”就是要严格确保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按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既需要社会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人在思想意识主观方面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的法律体系仍有待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包括干部队伍在内的全民的法律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加强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



“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架起整个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制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④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在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有利于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⑤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民主与法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身、人格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制定和实施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得到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这体现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济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对反。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办事。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⑥因此，实行依法治国，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需要。

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安定团结是我们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稳定压倒一切。要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依靠法制来协调各互惠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同时，还有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来能更好的社会治安环境。”^⑦

总之，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新的里程

碑，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对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然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深刻领会、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针和治国方略，从而全面正确地贯彻和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断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④⑥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第203页，第201页，第202页。

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使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即将进入小康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大步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和工人阶级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面对世纪之交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要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必须不失时机地整体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 年中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 1999 年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一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方针政策已经明确。一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一些企业已经或正在走出困境，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了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将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共中央于 1999 年 9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 189 人，中央候补委员 147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完成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这次全会集中研究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适时和必要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确定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适应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决定》在强调国有企业改革重要性的同时,确定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and 改组国有企业。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三、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五、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重视科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技术创新机制,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六、全面加强企业管理。推行科学管理,强化基础工作,改善经营,提高效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七、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依靠各方面力量,扩大就业门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八、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经营管理队伍素质,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



主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十、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决定》要求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有经济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企业由国家控股。继续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着力培育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要重视发挥各种所有制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扶持科技型企业，培育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对老工业基地、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企业改组，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面向市场着力转换经营机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必须切实加强企业管理，重视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严管理企业，狠抓薄弱环节，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提高经济效益。

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和减轻企业社会负担，要同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新机制、加强科学管理结合起来。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财力，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步骤地分类加以解决，帮助企业增资减债，促进债务和资产重组。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各级政府要积极支持，稳步推进。继续做好减员增效、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广开就业门路，引导职工转变择业观念，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要以市场为导向，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围绕增加品种、改进质量、提高效益和扩大出口，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国有企业要占据重要地位，掌握核心技

术，发挥先导作用。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的技术改造投入。要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继续搞好宏观调控和相关的配套改革，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扩大对外开放，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发展各类市场，维护经济秩序，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努力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规范和完善对经营管理者培养、选拔、管理、考核、监督的办法，营造经营管理者和企业队伍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地站在改革的前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前进。

这次会议决定增补胡锦涛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许运鸿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撤销许运鸿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鉴于许运鸿的有些问题涉嫌触犯刑律，由司法机关对其依法处理。

十五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政治稳定，各项工作成绩显著。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党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善于把做好当前工作同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越是形势复杂、任务繁重，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这次会议的精神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的各项决策和部署，同心同德，奋力拼搏，扎实工作，努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是世纪之交的一次盛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99年09月23日，第1版。

②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澳门回归祖国纪实

1999年12月20日零点，中华民族又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来到了！江泽民同志参加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江泽民同志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大会，澳门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西侧，由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和路氹城四部分组成，总面积约32.8平方公里，“据澳门官方统计，截止1996年底，澳门总人口为42万。其中，97%为华人，3%为土生葡人和外国人。”^①这也使澳门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澳门北与广东省的珠海市拱北连接；西与同属珠海市的湾仔和横琴对望。东面则与另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相距60公里，中间以珠江口相隔。澳门是“世界四大赌城”之一，其著名的纺织品、玩具、旅游业、酒店和娱乐场使得澳门长盛不衰。因此，澳门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原始居民已经涉足澳门，丰富的地下文物证明其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同出一源。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澳门遂归入南海郡番禺县。其后历经汉、晋、隋、唐各朝，或归东官郡、或属南海县、或隶东莞县。南宋绍兴22年（1152年），南宋王朝分东莞县一部分并割南海、番禺、新会海滨之地建香山县，澳门地区遂划入香山县境。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在战败被俘经过澳门以东的零丁洋时，曾写下不朽诗篇《过零丁洋》，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成为千古绝唱。史家推断，在元军进逼、南宋王朝倾覆之际，南退的南宋军民极有可能踏上澳门半岛，作为藏身之地。从现有资料看，至迟在元末明初，澳门一带已有长期定居的汉族居民。明清时期，澳门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管辖，是镶嵌在我国南海的一颗明珠。16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所谓“航海大发现”的扩展，葡萄牙人到达我国东南沿海一带。1553年，葡萄牙人以



“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通过向明朝官员行贿的方式，获准在澳门半岛暂时居住，并迅速聚集成村，扩大在澳地盘，设立有关机构。但直至鸦片战争前，澳门半岛整体上仍一直由明清政府负责行政管理，行使主权。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葡北京条约》，清政府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与葡治理他处无异”，但条约未划定澳门的界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澳门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被葡萄牙占领，但中国历届政府都从未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上作过让步，也从未在法律上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让予他国。因此，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只是时机问题而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葡两国的友好建交以及中国统一大业的推进，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时机已逐步成熟。进入20世纪80年代，解决澳门问题成为中葡两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根据这一伟大构想，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为中国政府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并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祖国统一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为解决澳门问题找到了方式。

1984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葡萄牙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同葡国领导人就澳门问题交换了意见。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来华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埃亚内斯总统就解决澳门问题进行了友好的磋商。5月23日，中葡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指出：双方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1986年6月30日~7月1日，双方第一轮谈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举行。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商定了会谈的全部议程，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9日~10日，中葡双方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会谈一开始，中方首先向葡方正式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我国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一、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并恢复行使主权；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三、恢复行使主权

后，按照“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我国对澳门的基本政策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澳门特别行政区由澳门当地人自己管理；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并可自行制定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政策。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可自行处理某些涉外事务，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居民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享有澳门现在的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自由。除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法律必须删除或修改，以及一些法律由于情况变化不再适用外，澳门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葡萄牙共和国和葡萄牙人及其后裔在澳门的利益将受到照顾。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葡籍和其他外籍的一般公务、警务人员和中国籍的人员一样，予以留用，其薪金、津贴不低于原来的标准等等。10月21日~22日，中葡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中，在葡萄牙归还澳门的时间等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中方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但仍未达成一致。3月18日~2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会谈在北京举行。本轮会谈是中葡会谈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先后进行了6次会议和5次私下磋商。3月23日双方发表会谈公报宣布：双方审议了协议文本草案，就协议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决定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由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签。历时8个月又14天的中葡澳门问题会谈，至此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1987年3月26日，按照会谈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零时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这天，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高兴地说：“中葡在不长的时间里解决了澳门问题，为国际上处理



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看来是成功的，用这种方式解决澳门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为解决国际争端和消除国际热点提供了一点经验。”“澳门从此结束过去，走向未来”^②。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交换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批准书，并在互换批准书上签字。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即日起正式生效。1993年3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1993年第3号令将澳门“基本法”予以公布，并于1999年12月20日实施。

《基本法》不仅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交接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澳门的发展描绘了美好的未来。《基本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国家决定，在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澳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宣布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是不同于内地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在第一章总则中，从理论、经济、法律等方面规定了“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如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组成，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澳门原有的法律基本不变等。针对澳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基本法》还规定了具有澳门特点的政策体制。比如在居民的基本权利方面，考虑到澳门居民中有一部分是葡萄牙后裔居民，故《基本法》规定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尊重他们的习俗和传统文化；与此相适应，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官方语言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这些法律规定，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澳门的繁荣稳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澳门的回归，结束了外国人在中国领土统治的历史，也证明了祖国的强大。澳门的回归，将使澳门同胞一洗寄人篱下的耻辱，彻底摆脱在外国人统治下做“二等公民”的命运，成为自己土地上真正的主人。澳门同胞将以主人的姿态，在这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澳门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江泽民主席在1988年会见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时指出：“澳门回归祖国将为‘一国两制’原则创造一个光辉的范例，有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澳门的回归，再次成功地践行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也将对台湾与大陆两岸的最后统一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澳门事务司编写组：《澳门问题读本》，1999年06月第1版，第4页。

②《人民日报》，1987年4月13日。



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克林顿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12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是中美关系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访问。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同克林顿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认为，中美两国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存在分歧；双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决心共同本着合作和坦诚的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取得具体进展。中美除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外，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贩毒、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上；在加强双边经济发展、贸易、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国军队往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

江泽民在访美期间多次强调，两国建立健康稳定的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实现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双方应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美方在《中美联合声明》中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总统克林顿及其他领导人还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对美方所作上述表态，中方表示赞赏，要求美政府真正做到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严格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中方认为，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两国元首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

双方同意，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支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全球事务中，包括在维持和平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两国都赞成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同时保持和增强安理会的工作效率。两国强调需要将联合国置于更加稳固的财政基础上，两国将积极参加联合国内有关会费比额问题的讨论。

中美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愿加强合作，共同对付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促进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双方认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双方通过四方会谈推动建立半岛的持久和平，并继续就此进行磋商。双方还强调，维护中东、海湾和南亚等重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元首就采取一系列步骤达成了协议，这些步骤将为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和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提供框架。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次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是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标志。

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1998年3月19日，美国宣布搁置多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从当天开始正式生效。5月6日，中美双方签署了《关于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第八条实施方案（谅解备忘录）》。1998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双方签署中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协定。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南亚问题、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和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克林顿总统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朱镕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人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但是，正当两国关系呈现好转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科索沃问题对南斯拉夫实施轰炸。中国主张科索沃问题政治解决，反对向主权国家动武。1999年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使馆建筑被严重毁坏。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不幸遇难。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纷纷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这一野蛮行径予以强烈谴责。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下午紧急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奉命就我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一事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5月8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表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他向中国政府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

5月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致信江泽民主席。克林顿在信中说：“我就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所带来的痛苦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①同天，胡锦涛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事发表重要电视讲话。5月10日，江泽民与叶利钦通电话，严厉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的野蛮行为。外交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向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提出严正交涉。“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以下严正要求：一、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受害者家属道歉。二、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四、严惩肇事者。”^②

5月12日上午，中国政府处理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北约袭击事件专门小组和遇难英烈骨灰、伤员及使馆部分工作人员乘专机抵达首都机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下午3时，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新华社亲切慰问邵云环同志的亲属。下午3时15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光明日报社亲切慰问许杏虎、朱颖同志的亲属。5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驻南新闻工作者给予表彰的决定。

5月14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要求，5月14日晚，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再次道歉，江泽民主席重申我国政府严正立场。当晚，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就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通过了主席声明。6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克林在北京向中国政府报告了美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事件的调查结果。美方的调查表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是一起由美政府一些部门的一系列失误所导致的“悲剧性误炸”事件。中国政府指出美方迄今所作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并且强调美方必须作出令中国人民满意的交代。

1999年7月28日~30日，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在北京就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举行了第二轮谈判，双方就中方伤亡人员的赔偿问题达成共识。美方将尽快向中国政府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金。12月16日，中美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支付2800万美元，作为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所造成的中方财产损失的赔偿。

注释：

① 《人民日报》，1999年5月10日。

② 《新华月报》，1999年第6期。



发展同欧洲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借口“人权”等问题，以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很不安宁。

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1989 年以后，西欧发达国家一度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致使双边关系严重倒退，政治往来和经贸合作受挫。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西欧国家觉察到，制裁对双方都无好处，所以从 1990 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关系得到逐步恢复。1991 年英国首相、意大利总理先后访华。1992 年，李鹏总理访问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我国同西欧的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1994 年，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中国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即面向 21 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这次访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1994 年底，欧盟正式取消对华制裁。1995 年，欧盟发表对华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主张全面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于 1996 年提出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6 年 11 月，德国总理访华，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道

路。1997年5月，法国总统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7月1日，中英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中英关系出现新的开端。进入1998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积极举措。

1998年是中欧关系大发展的一年。2月，李鹏总理访问西欧，重申了中国的对欧政策方针：“全面发展同欧盟及其成员间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他指出，“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与欧洲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双方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都致力维护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在经贸、技术等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都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双方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在国际事务中进行着有效的磋商与合作；双方都赞同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各有所长，有着扩大交流与合作的良好愿望；双方都十分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共同致力于对付恐怖主义、环境恶化和国际犯罪的全球性挑战。”^②同月，欧盟15国外长理事会宣布：鉴于欧盟和中国在人权问题对话中取得的成果，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8年度会议上，欧盟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单个成员国，都不向委员会提交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3月25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又一份对华政策文件《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报告，提交各成员国审议。该报告于6月获批准。报告对中国的内外政策给予了更加积极的评价，体现了更加强烈的要求加强与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1998年是中国政府换届年，中国领导层决定，新总理一上任，就赴英国伦敦参加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与欧盟举行首次首脑会晤，并访问部分欧盟大国，该计划如期实现。1998年4月2日，中国总理朱镕基同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中国——欧盟领导人之间的首次正式会晤。这次会晤在中欧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次会晤，中国与欧盟建立起了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1998年10月，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访华，江泽民同志在会见桑特时表示，中国愿同欧盟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对话，努力把一个充满活力的中欧关系带入新世纪。

1999年9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欧联盟议会议长路易斯·玛丽亚·德普伊赫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他说，“欧盟是当今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在多极格局发展过程中，欧盟



应成为重要一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重视发展与欧盟国家的关系，愿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深化合作’的精神，继续与欧方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共同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③1999年12月21日，朱镕基总理在北京与欧盟轮值主席芬兰总理帕沃·利波宁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举行了第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欧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中国与欧盟关系发展的同时，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关系也有了明显改善，中法、中德、中英等双边都不断有高层互访，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发展良好。

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对外开放，欧盟国家是重要开放对象。欧盟与欧盟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中国要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不可没有欧盟国家的合作。

中国与欧盟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共向利益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上，中、欧都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目标，都主张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的构想，尽管双方对于多极化具体内容和原则框架的理解和设想并不一样；另一方面体现在经济贸易上，欧盟重视中国大市场的发展前景，积极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加大对中国市场的资金、技术和商品的投入，中国也希望通过发展与欧盟的经贸关系，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双方发展彼此关系的主要动因在于经济利益。中国与欧盟在中国“入世”问题也最终圆满达成协议，就反映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利益上虽有分歧，但双赢和互利终将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决定国际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非洲、拉美国家的关系。

1991年7月2~6日李鹏总理访问埃及。1992年6月28日~7月11日杨尚昆主席访问摩洛哥、突尼斯、科特迪瓦。7月9日，杨主席在科特迪瓦阿比让总统府宾馆对科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六项原则，一、中国支持非洲各国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发展经济所作的各种努力。二、中国尊重非洲各国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三、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联合自强，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四、中国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谋求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经济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五、中国支持非洲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六、中国愿意在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

1995年7月19日~8月4日朱镕基副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毛里求斯、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7月25日，朱副总理在哈拉雷市向津巴布韦工商界发表演讲，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的三点主张：一、扩大相互支持，创造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气候。二、加强友好磋商，促进国际经贸环境的改善。三、推动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朱副总理指出，为扩大中国同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规模，提高援助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后中国希望把援助重点放在受援国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生产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上；政府积极鼓励和推动双方企业通过合资、合作经营，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采取由政府贷款，银行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尽可能调动和利用多种渠道的资金发展经贸合作；以承包、劳务等多种办法，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的合作，以期谋求共同发展。10月3~5日李鹏总理访问摩洛哥。

1996年5月8~22日江泽民主席访问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在埃塞俄比亚访问期间，江主席应邀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题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主旨演讲，提出发展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一、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二、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三、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四、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五、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关于中非经贸合作关系，江泽民宣布：“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继续提供力所能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政府援助；双方积极配合，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振兴中国提供的传统援助项目；鼓励双方企业间的合作，特别要推动有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公司到非洲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在合作中坚持守约、保质、重义等原则；拓宽贸易渠道，增加从非洲的进口，以促进中非贸易均衡、迅速发展。”江主席访非期间，中国同非洲6国签订20多个经济、技术、贸易或文化合作协定。

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正式建交。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重返联合国的阴谋。我国同非洲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速，1997年，贸易总额达56.7亿美元。此外，我国还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援助，援建



项目超过600个。1998年8月3日由中国外经贸部和外交部联合举办首期中国非洲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22名学员分别来自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国务委员吴仪在开学典礼上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同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双方经贸合作潜力很大，中国愿与非洲各国携起手来，为把中非经贸合作推向新的高度做出努力。

1999年1月23日~2月4日胡锦涛副主席访问马达加斯加、加纳、科特迪瓦、南非。2月3日，胡副主席在南非工商界和非亚协会举办的晚餐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愿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国家的政治交往和各领域不同层次的人员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政府援助，并本着互利互惠、优势互补的原则同非洲国家积极开展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经贸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同它们的协调和磋商，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争取早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把一个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的中非关系带入21世纪。”10月28~31日江泽民主席访问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中国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就江主席往访分别发表了新闻公报。11月15~25日李鹏委员长访问毛里求斯、南非、肯尼亚。18日，李鹏在南非发表了题为《谱写中非友谊的新篇章》的演讲。

我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拉美同我建交国家增到19个。一些尚未建交的国家也开始考虑同我国发展关系。我国同本地区国家高层往来频繁，主要领导人先后访问拉美，使中国与拉美地区多边组织及机构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对话加强。1990年以来，中国同拉美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政治磋商机构——里约集团保持着外长级对话关系。1994年，我国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国。1997年5月，加勒比开发银行正式接纳我国为该行成员国。同年10月，南美一体化重要组织——南方共同市场代表团访华，同我国进行了首次对话。中国和拉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拉美多数国家支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拉经贸合作蓬勃发展。此外，我国同拉美国家在经济技术领域、投资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取得可喜进展。

注释：

①②《人民日报》，1998年2月17日。

③《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09月11日，第1版。

回顾共和国 50 年成就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封建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国家濒临灭亡边缘。为了救亡图强、改变国家被宰割的命运，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爱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1911 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强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这些斗争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这些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人民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 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武力威胁，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们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排除各种干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12 亿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重要进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果。我国政府顺利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澳门也将于 1999 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共和国的 50 年，从根本上说，是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 50 年。从 1949 年到 1999 年，纵观共和国成立 50 年，我们国家取得了如毛泽东所讲的“当惊世界殊”的伟大成就。

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之时，一穷二白，国力空虚。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通过艰苦奋斗，使我国综合经济势力显著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在 1999 年公布的《新中国 50 年系列分析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52 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679 亿元，到 1998 年到了 79 553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 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平均增长 3% 左右的水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快速、健康发展。到 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提前 5 年实现了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的速增长大大缩小了与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据世界银行估算，1997 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 7 位。

三大产业全面发展，社会商品极大丰富。“农业生产以占世界 10% 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 22% 人口的温饱问题，为人类作出了极大贡献。农业增加值由 1952 年的 343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14 299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 3.5 倍。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①与此同时，工业经济也快速增长，“增加值由 1952 年的 119.8 亿元增加至 1998 年的 3 354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 157.7 倍，平均每年

增长11.6%。解放初期,我国钢产量仅居世界第26位,原油居27位,发电量居25位。”经过5年的发展,“钢、煤、水泥、化肥、电视机产量已位居第一,发电量、棉布、化学纤维位居第二,原油产量跃居第四,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大部分工业品由严重短缺变成了供大于求。”^②而一、二、三项产业比例则“由1952年的50.5%、20.9%和28.6%变为1998年的18.0%、49.2%和32.8%,经济结构趋于优化。”^③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公布的《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显示,1950年以来,我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7 99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完成投资72 125亿元,更新改造完成投资32 516亿元,建成投产基本建设项目130多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约6 200个。在工业方面,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基础薄弱、发展不合理的状况,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独立的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大为增强。原油生产量由1949年的12万吨扩大到1998年的1.61亿吨;钢铁生产雄踞世界首位,年产钢量由1949年的15.8万吨扩大到1998年的11 559万吨,增长了731倍;汽车生产从无到有,迅速扩张,汽车年产量由1955年的100辆左右迅猛扩展到1998年的163万辆,发电量由1949年的43亿千瓦小时增长到1998年的11 670亿千瓦小时,增长270倍,结束了长期困扰我国缺电、少电的历史。此外,煤炭、水泥以及电子、通讯、船舶等生产能力也大大增强。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大为提高。在农田水利方面,我国大力发展农村水利事业,农田灌溉条件大大改善。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1 996万公顷扩大到1997年的5 124万公顷。建成了大量的防洪、排涝、灌溉、发电等工程设施。1997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8万千瓦增加到42 016万千瓦。在交通运输方面,已基本形成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铁路营业里程由1949年的2.18万公里增至1998年的5.76万公里,增长1.6倍。公路里程由1949年的8.07万公里增至1998年的127.9万公里,增长14.8倍,公路等级明显提高,路况大为改善。内河航道经过疏浚,通航条件大大改善,通航里程由1949年的7.36万公里增长到1998年的11.03万公里。民用航空是我国发展最快的运输方式,到1998年为止,民用航空开通了1 122条国际国内航线,构成了四通八达的蓝天运输网。管道运输伴随石油工业的成长迅速发展,输油(气)管道里程由1958年的200公里增加到1998年的2.31万公里。邮电通讯方面,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信等覆盖全



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并建成了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密布的公用邮政网。全国邮路和农村投递线路总长度由 1949 年的 70.6 万公里增加到 1998 年的 621.5 万公里，增加 7.8 倍。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中国 50 年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也连续上了几个大的台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由 1952 年的每人每年 80 元，提高到 1998 年的每人每年 2 973 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 1952 年的 8.6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53 408 亿元。”^④消费结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住、用、行和娱乐等享受和发展方面的消费支出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对外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在 1999 年公布的《新中国 50 年系列分析报告》显示，50 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仅对原苏联和东欧等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到逐步扩展为包括日本、欧盟、美国等在内的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总额由 1950 年的 11.3 亿美元增至 1998 年的 3 239 亿美元，增长 286 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 12.5%。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由 1978 年的第 32 位上升到第 11 位，其中，出口总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排名居第 9 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外汇储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8.4 亿美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1 45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1952 年，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高达 83.4%，1998 年，机电产品、轻纺产品等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比重高达 88.8%，初级产品的比重则下降为 11.2%。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建国之初，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国利用外资渠道单一，规模小，主要依靠前苏联向我国提供低息贷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 1978 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外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不仅规模大、项目多，而且形式多样。1978～1998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达 4 069 亿美元，外商投资的平均规模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22 万美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263 万美元。

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从 1949 年到 199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有 1 300 多万人，研究生 50 多万人。科技队伍稳步壮大。截止 1998 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达 2 091.3 万人，是 1952 年的 49 倍，1978 年的 4.8 倍，平均每年增

加41.8万人。”^⑤科研活动硕果累累，中国在原子能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许多“高、精、尖”领域已经跨进世界先进行列。文化事业成果丰硕，文艺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等从1949年的18所发展为30所，已基本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专业门类齐全的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体系。文化事业机构大幅增加，截止1998年群众文化馆达比1949年增加2005个。体育事业飞速发展，自从1979年11月中国恢复国家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开始全面走向世界体育舞台。到1998年底，我国共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共有1206人，在962各项目上创超了世界纪录。卫生机构和队伍已具规模，截止1998年“全国卫生机构发展到31.4万个，比1949年增加84倍多。卫生机构人员由1949年的50.5万人增加到553.6万人。”^⑥医学教育、科研水平大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走过了整整50年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5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由一个落后弱国变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50年的成就巨大辉煌，但是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有着十分宝贵的经验。

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前提；三、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依靠改革开放，走依法治国，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四、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五、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极少数敌对分子进行专政，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必须以人民军队为坚强后盾。

新中国50年来，虽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前进道路上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部分群众生活仍然比较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加大；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相当突出；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等。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



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本文数据均摘自《新中国五十年系列分析报告》，中国统计局网。

党中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我国相对集中居住在偏远、边境一线、人口较少、社会发育程度低的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较少民族发展比较落后的实际，中央有关领导十分关注，提出要关心、帮助人口较少民族的加快发展，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领土完整，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2个少数民族人口在10万以下，统称为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63万人。”^①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分别是：“毛南族、撒拉族、布朗族、塔吉克族、阿昌族、普米族、鄂温克族、怒族、京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珞巴族。他们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黑龙江、福建、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十个省（区）。除福建省，其余九省（区）的人口较少民族相对聚居在西部和边疆地区的86个县（旗、市）、238个乡（镇）、640个行政村。有16个在边境沿线的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人口较少，大多地处边境地区和偏远地区，多数跨境而居，绝大多数分布在民族自治地方，聚居在以乡、行政村为单位的农村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民族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原因，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没有通电、通公路，没有小学、卫生室和安全饮用水等，有1/4左右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一些民族呈整体贫困状态，人口较少民族的整体发展水平同其他民族相比差距较大。

抓好这22个民族的发展是新世纪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因为：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民族的社会形态有的保留着原始社会形态



的残余，与汉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不一样，他们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状态，跨越式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有关省区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这些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诸多原因，这些民族中的大部分仍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尤其是他们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与现代社会的要求还不是很适应，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这种不适应显得尤其突出。要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必须在实践中逐步解决这些民族在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民族中的大部分相对贫困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第三，解决这些民族的问题，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维护边疆稳定，维护民族团结，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对解决中国其他民族的问题，也会起到借鉴的作用。

第四，当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民委倡导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我们提出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就是要抓住这个机遇，乘势而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由于这些民族人口少，居住相对集中，他们的问题解决起来要相对容易些。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帮助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2000 年中央专门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了调研，旨在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这次调研，是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组织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后，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的第二次规模较大的调研。并向国务院提出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重视，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列入国家议事日程。“十五”计划把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任务。2001 年，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函〔2001〕4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复函》，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作出明确要求，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人口较少民族实行特殊扶持政策，改善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条件等，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

在国务院 44 号文件的指导下，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加大了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使人口较少民族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一、国家民委牵头协调，狠抓落实。成立领导小组，协调、指导扶持人

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摸清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社区基本情况，对各地开展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中安排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补助资金，2002年~2004年共安排1.17亿元，专项用于人口较少民族聚居乡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国家民委和国务院扶贫办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和布朗山开展针对基诺族和布朗族的“两山”综合扶持开发试点，安排7300万元资金帮助基诺族、布朗族以及各族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两山”综合开发试点使基诺山、布朗山基础设施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实现了村村通水、通路、通电，解决了人畜饮水难、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借鉴“两山”综合扶持开发试点经验，2003年国家民委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在“两山”召开现场会，组织有关省区以22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贫困村为单位，研究制定并实施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规划，规划基本覆盖了人口较少民族相对聚居的贫困村和人口较少民族贫困人口。规划的实施将加快人口较少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为实现小康目标打下基础，各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重点倾斜。自2002年起，在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中，考虑对人口较少民族义务教育扶持因素，增加人口较少民族所在省区的标准支出，相应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额；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项目优先安排国债资金和专项资金，在“广播电视村村通”、“中小学危房改造”、“农村卫生三项建设”、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送电到乡”等工程项目安排中，尽力覆盖人口较少民族所在的县、乡、村。在交通、广播电视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关部门也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给予了适当照顾。

三、有关地方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落实规划，项目带动。有关省区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一族一策”、“一族多策”、“一山一策”等特殊措施，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以落实项目为重点，积极为人口较少民族办实事。内蒙古自治区制定出台扶持三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在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聚居县、乡、村已安排通公路、通电、人畜饮水、农田水利、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项目233个，总投资2.85亿元。黑龙江省投入资金4000多万元，帮助赫哲族群众修路建桥、加固河岸、建设居住小区、接通程控电话和有线电视，从根本上改善了赫哲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4年11月，中央领导同志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大支持力度，帮助22个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这使备受关注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又一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家民委对此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组织力量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等有关部门，在有关省区政府的支持下，已着手研究制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规划》提出以63万人口较少民族群众为基本对象，以64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为主战场，以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为重点，通过5年左右时间，在中央和地方的集中投入与特殊政策扶持下，使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村，先于其他同类地区实现减贫目标；使已经解决温饱但尚不稳固的低收入村，在实现减贫目标的基础上尽快实现稳定脱贫，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达到当地中等以上水平；使部分发展较快的民族村，努力建设民族小康示范村，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当地较高水平；切实解决这22个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问题，帮助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注释：

①②摘自：《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

“九五”计划的完成和“十五”计划的制定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九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如期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社会生产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十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2001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对“九五”期间我国取得的成就做了高度的概括：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九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8%，经济总量由世界第九位跃居第七位。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亿吨左右，实现了丰年有余、歉年平衡，粮食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5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国防建设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国防实力进一步增强。

有效治理了通货膨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取得初步成效。“九五”前期，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国民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1997年以来，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有效制止了通货紧缩趋势的发展。1999年上半年，经济发展出现重要转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2%，社会需求全面回升，进出口大幅度



增长。

有效供给水平明显提高，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据 1999 年国家内贸局商业信息中心资料分析，目前供过于求的比重达 80%，供求基本平衡的占 18%，供不应求的商品只占 2%。城乡居民蛋白食物人均占有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99 年肉、蛋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 47.3 公斤、17 公斤和 32.7 公斤。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的产品大幅度增长。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通信业发展迅猛，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将分别达到 1.4 亿户和 7 300 万户，比“八五”末分别增加 1 亿户和 6 900 万户。服务业稳定增长，新兴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万元产值能源消耗和节能率均超额完成计划预期目标。

基础设施不断加强，城乡面貌大为改观。“九五”期间，抓住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机遇，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集中建设了一批重大项目，办了一些多年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农林水利建设明显加快。公路建设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投资规模比“八五”增长 4.5 倍。铁路建设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机场建设发展迅速，新建、扩建和改造机场 40 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建成 250 多亿公斤的粮食储备库，有效地提高了粮食调控能力。电力建设稳步发展，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15 亿千瓦，比“八五”末增加 9 778 万千瓦。电网建设进入历史上最快阶段，电网主网架建设逐步加强，城乡电网改造取得成效。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199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5 854 元和 2 210 元，比 1995 年增加 1 571 元和 632 元，年均实际增长 5.6% 和 5.4%。居民消费结构显著改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1999 年全国居民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49.3%，比 1995 年下降 6.8 个百分点。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 8.1 平方米增加到 9.8 平方米，农村由 21 平方米增加到 24.4 平方米。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 13%，比“八五”末提高了 8.3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力度加大，农村贫困人口由 1995 年的 6 500 万人减少到 1999 年的 3 400 万人，预计今年还将减少 1 000 万人，“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完成。

坚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出发，把科技教育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加速科技进步，优先发展教育。加大对基础研究、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高技术项目的支持力度，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初见成效。启动创新工程，进一步加强科技前沿的研究。“神舟”号飞船试验飞行成功，载人航天事业迈出重要步伐。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比“八五”增加 233 万，招生规模有了突破性扩大。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卫生和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大中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加快，兴建了一批标志性的大型文化设施。“九五”末，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将分别达到 91.5% 和 92.5%，比“八五”末提高 12.8 和 8.1 个百分点。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1995 年的 10.6‰ 下降到 8.8‰，基本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力度明显加大，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始启动，“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全民环保意识显著增强。

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坚持以改革统揽全局，大力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进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将如期实现。初步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初步确立。政府机构改革迈出重要步伐，机构和人员大幅度精简，加快转变职能，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取得积极进展。目前，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地位，提供了 3/4 的国内生产总值，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制经济占 62%，非公有制经济占 38%；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公有制经济占 38%，非公有制经济占 62%。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们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增加就业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



增强。目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产品收购总额、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分别为95%、84%和86%，比“八五”末提高6、5和8个百分点。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外汇、外贸等改革继续推进，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

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竞争能力。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4 000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居第九位。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继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加工产品为主的转变之后，又实现了从一般加工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新进展，在保持对香港、美国、日本、欧盟等传统贸易伙伴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开拓新兴市场取得成效。利用外资的规模继续扩大，外资质量明显提高。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 800亿美元，比“八五”增加1 1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科技含量增加，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增多，单项投资规模扩大。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推进。加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和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教育，加强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巩固和深化。基层民主和基层政权建设得到加强，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加快，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明显提高，依法治国取得进展。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洗雪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所蒙受的耻辱，是祖国统一大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一国两制”顺利实施，鼓舞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信心。两岸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两岸同胞交往不断加强，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

随着“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2000年10月9日~1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全会深入分析了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认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5~10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

全会按照十五大对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展望和部署，提出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十五”计划纲要根据上述总体目标的要求，经过反复认真测算，从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科技教育、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五个方面，分别提出了预期目标。

在宏观调控方面，计划提出经济增长速度预期年均7%左右，五年新增城镇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4000万人；城镇居民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纲要提出结构变动的预期目标为：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3%、51%和36%（1999年为17.7%、49.3%和33.0%），与1999年相比，第一产业下降4.7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1.7和3个百分点。在发展科技、教育方面，《纲要》提出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开发费用GDPP的比重提高到1.5%以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纲要》提出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以内。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城乡环境质量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比2000年减少10%。在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纲要》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2005年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加到22平方米。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设施改善。

“十五”计划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从而充分肯定了村民自治，并为村民自治发展进一步指明的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它的颁布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

从1980年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诞生一直到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逐步深入。

1980年2月，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诞生，开始了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尝试。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从而在国家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了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上到1982年底，村民委员会在全国不少农村地区都有了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村民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为后来村民自治组织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了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央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做了一系列规定。在中央文件精神指导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深入地发展。到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颁布之前,村民委员会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个别省,全国绝大多数省的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

在制定政策引导的同时,村民自治的立法工作也已启动。1987年1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这部法律依据新宪法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此法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以及村民会议的权力和组织形式等都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特别是明确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协调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于确立村民自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使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型的群众自治制度和直接民主制度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起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正式实行和各省地方实施办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广大农民实践中的创造性发挥,使村民自治的各项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

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村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必须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同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修订后的《组织法》,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党对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各项方针政策法律化、具体化,反映了广大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之后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愿望,完全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它的贯彻实施,标志着我国村民自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颁布的《组织法》与1987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相比增加了9条内容,并且新的《组织法》对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能、选举原则、程序、方法、基本工作制度、工作方式,法律实施的保障等方面,做出了增补和完善,具体的修改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性质的内容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试行法”关于“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性自治组织”规定之后,《组织法》增加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定内容,从而对村民委员会性质的规定更加明确、全面和清晰。二、增加了在村民自治中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在“试行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关系,在《组织法》中,根据大多数村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增加了第三条关于“中国共产党在



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据宪法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关系，使党的领导更加明确，可以使村民自治活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三、进一步明确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为了在实际执行中能够妥善地处理乡、镇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组织法》第四条中明确规定：乡镇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事项”。同时，村委会要积极支持和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四、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方面的补充和完善，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选举程序，扩大基层民主，民主选举是基础。《组织法》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程序方面的规定，主要包括：选举前公布选民名单的程序；村民委员会主持选举的程序；村民委员会候选人产生的程序；选举村民委员会投票当选的程序；村民委员会选举方法的具体程序；具体选举办法授权的程序；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处理办法；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程序。五、增加了完善民主决策的规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决定，方可办理。这项规定加强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从法律上明确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地位。六、增加了民主监督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民主监督程序。《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这项规定对于保证村民民主监督权力的行使和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七、增加了自治章程，完善了村规民约的有关规定。《组织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八、增加了保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的规定，从体制上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组织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

总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标志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指导下，村民自治将会以更加波澜壮阔的态势在中国农村大地上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以推动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现。

实行村民自治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1958 年在农村普遍建立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迅速瓦解，国家对农村的行政控制职能开始弱化，于是重构农村的治理模式已成当务之急，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路，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解决了如何保证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实行村民自治是农民传统价值观念转变和政治意识增强必然反映。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不仅极大地改变着农村社会经济，而且极大地影响着农村文化，使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农村文化发生着急剧的裂变。农村农民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居民政治意识有所觉醒，建立了新的政治价值规范，也萌生了现代法律意识。这些都必然要求不断推进村民自治，从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组织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不断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措施，是保障 8 亿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法律，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之一。村民委员会是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把村民委员会建设好，把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对于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于调动 8 亿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组织法》的颁布试行，标志着我国村民委员会的建设和工作朝着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了不断推进村民自治，要求各地村民委员会要按照《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和自觉培养群众的民主意识和观念，坚决贯彻执行由群众自己当家，自己做主，坚持依法治村的原则，做好本村的各项工作。同时，必须明确的是，“村民委员会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自治，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实行自治。因此，村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各项号召，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做村民委员会工作的重大意义，把这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①

注释：

①摘自：《人民日报》，1987 年 11 月 26 日。



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和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由于实行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制度，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中国国民经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恢复和发展。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的私人经济基本消失，仅存的一些个体经济，由于人数与规模甚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此后的20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被彻底排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指出，个体经济是“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种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发挥积极作用。”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国营和集体经济是中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1982年12月中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个体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

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方针。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条文。

1992年12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1999年3月，中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根本大法对非公有制经济20年来生存发展及其贡献的充分肯定。

成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

20年前，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到1%。改革开放以后，在党的正确政策引导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形成了国有、集体、非公有制经济三分天下的局面。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7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不到250美元增加到约7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4亿减少到4200万左右；城乡居民储蓄已达6万亿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市场商品丰富，衣食住行条件明显改善。这些举世瞩目的变化，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难以想象的。

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方面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方面对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1991~1996年，全国从业人员新增人数3296万人，而个体经济新增人数969万人，私营企业新增人数522万人，个体私营经济提供了约1/2的新增



就业机会。到1996年,非公有制经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300万人,安置城乡待业青年、闲散人员、离退休人员1700多万人,安排的就业人数超过同期国有企业的15%。1986~1996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累计上缴国家税收2400多亿元,1996年比1986年增长八倍。仅1997年,个体私营经济就为国家纳税540亿元。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在全国工商税收中的比重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86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仅占工商税收的3.88%,至1996年已上升到7%。在地方各级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经济税收所占的比重则更高,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一般在10%左右,地市一级一般在20%左右,县一级一般为30%。在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0%,甚至50%以上,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十五”末期,民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已达68.3%,私营企业法人单位498万家,民营经济占整个GDP比重超过60%。在许多地方,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税收支撑着地方财政收入,个体、私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新增就业人员的2/3以上。

进入新世纪以后,非公有制经济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一、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紧密相通,非公有制经济以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将可获得稳定的、多边的公平竞争环境。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将会形成更多的市场和新的投资热点,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会。三、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意味着活动空间更加广阔。四、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的战略,将为各类非公有制企业提供更多的商机。

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最具活力部分之一的非公有制经济,它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要为各类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党

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由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能够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不会冲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还会在与公有制经济的联系、竞争和合作中，有益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和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还是建立全方位、多渠道、多领域的就业体系，保持社会稳定，都需要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发展前景看，由于中央政策明确，地方政府支持，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人们思想观念更新，非公有制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快速增长，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也将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对待非公有制经济，要积极鼓励、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旧观念收到猛烈冲击，新观念在中国大地上生长传播。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为社会主义法治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从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和发展。从20多年前的法制不完备，到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不重视法制及法制观念单薄到依法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确定，标志着中国法制发展史开始了又一个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邓小平把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加以倡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把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相结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1985~1988年，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学生闹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执政党和政府一面用加强法制手段制止少数人闹事，稳定社会局面，一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

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做出了法律保护规定。

1989年出现了“六四”事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稳定压倒一切”方针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法制，维护社会治安的措施，并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时间的决定，改进县以下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序。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允许非政府民间组织合法存在，并对其规范管理。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城市全面铺开居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和人民政协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政治报告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78年~1996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文件中虽然没有正式使用“法治”这个概念，但是，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所阐述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主张直接体现了“法治”原则。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的政治领导”和“党政职能分开”等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实际上也体现了“法治”的内涵。

1996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讲座结束时，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①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确认为一项治国的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



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修正案。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民主”道路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较稳妥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

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使人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中国国民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流动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多重选择意识、竞争求富意识、个性解放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民心所向：呼唤法治，认同法治；“法治”，既可以保障秩序，又可以维护稳定；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又可以保障和体现公民基本权利；既可以制约党政领导干部违法行为，又可以抑制社会成员的过激行为；既可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可以使经济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迅速恢复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1996年以后则大力推动“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法治经济既要求经济主体严格遵守法律、规则和程序，也要求政府部门依法行政，



不能随意地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一方面为企业和个体提供了独立活动的空间，使他们得以发挥更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限定了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形成了一整套监督、制约政府权力的法律、制度和机构，使专制或独裁政体难以存在下去。

在上述各原因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法治经济，而法治经济为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建设道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组：《改革开放 20 年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封建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国家濒临灭亡边缘。为了救亡图强、改变国家被宰割的命运，100多年来，中国的爱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1911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强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这些斗争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这些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人民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把持的巴黎和会竟然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权利转让给日本，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黑夜里看到了曙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此找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支点。五四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由此掀起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广泛参加的全国性群众斗争。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以往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新的发展。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五四运动鲜明地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

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



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作了准备。五四运动以来 80 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自己事业的核心力量，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选择并成功地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力量，青年运动的发展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我们的事业取得的全部成就始终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英勇奋斗分不开。

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五四运动也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其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尤其在党活动中被视为重要纪念，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其形式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大型的纪念活动。

1999 年 5 月 4 日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 80 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5 月 4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五四运动 80 周年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还有 6 000 多名各族各界青年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历程。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

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列，经受了罕见的重重磨难，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

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1949年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彻底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光荣地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武力威胁，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排除各种干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12亿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重要进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果。我国政府顺利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澳门也将于今年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缅怀五四先驱们的业绩，回顾中国人民和青年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展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靠党和人民的团结奋斗，要靠全国青年继往开来、奋发进取。五四运动点燃的革命火炬，已经传到当代青年的手中。广大青年要增强历史使命感，高举邓



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发扬伟大的五四精神，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建功立业。

而五四运动以来 80 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自己事业的核心力量，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选择并成功地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力量，青年运动的发展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我们的事业取得的全部成就始终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英勇奋斗分不开。

当代青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责任，一定要认清形势，勇于面对任何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考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开始出现，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有新的发展，天下并不太平。西方大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分化”的战略企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国的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对它的发展规律在不少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需要继续探索。我们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和困难，不可能一帆风顺。广大青年要学会用全面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形势。只看到光明的一面，看不到困难或轻视困难，盲目乐观，是不对的和有害的。害怕困难，动摇信心，无所作为，也是不对的和有害的。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当代青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责任，一定要认清形势，看到我国的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在前进道路上勇于面对任何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考验。

要求广大青年一定要响应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希望大家：第一，要坚定理想，服务人民；第二，要深入群众，投身实践；第三，要勤奋学习，勇于创造；第四，要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积

极创造无愧于前辈、无愧于后人的业绩。

胡锦涛指出，青年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热情关怀青年，正确引导青年，严格要求青年，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要发挥好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发挥好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的作用，发挥好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社会各方面都要热情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他强调指出，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就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汲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经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 8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是在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中走过来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今天，我们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引，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改革开放进一步积累起来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无论这些困难和风险是可以预料的还是难以预料的、是来自国内的还是来自国外的，都动摇不了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心壮志。广大青年应当牢固树立这样的信心和决心。在顺利的时候，不骄傲自满，始终谦虚谨慎；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悲观失望，始终坚韧不拔；在风云变幻之际，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国家行政区划的变化

行政区划是国家结构体系的安排，国家或地区根据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客观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将一个国家（小国除外）的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行政建制。因此，行政区划亦称行政区域。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其中，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目前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五个自治区、四个直辖市、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历史上和习惯上，各省级行政区都有简称。省级人民政府驻地称省会（首府），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乡镇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自治地方，它们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国家根据需要，还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此外，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国家可根据需要对行政区划作必要的调整和变更。香港和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国有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划始自秦代（公元前221年），迄今已有

2 000 多年的历史。历代行政区划多有演变，从行政区域划分层次来看：县级以上划分为二级的有秦、西汉、隋和中华民国，约 480 多年；划分为三级的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明，约 1 300 多年；划分为四级有元、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约 360 多年。这当中以三级的居多数，实行时间亦最长。从行政区域单位名称和体制方面看：县制始建于春秋时期，至今已 2 600 多年；州制始建于汉代，至今已 1 800 多年；省制始于元代，至今 700 多年。省、县始终为中国两级重要的和基本的行政区域单位，历代沿用至今，发挥了重大作用。州制从汉代迄今，除中华民国时期废止未用外，历代均沿用。唯历代州的地位和辖区范围不尽相同。例如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州，均系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域；唐、宋、明代和新中国的州均系地方第二级行政区域；元、清两代的州则系地方第三级行政区域。新中国的州辖区范围完全不同于历代的州，仅沿用了州的名称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 年撤销察哈尔省、平原省，同年恢复设置四川、江苏、安徽三省。1954 年，辽东、辽西并置辽宁省，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1955 年，热河、西康两省撤销，新疆省改为自治区。1957 年，广西省改为自治区。至此，全国共设置 22 个省建制单位。在中央之下，其行政层级以省—地市（区）—县—乡为基本分布。县的数量呈减少趋势；建制单位在规模上相差悬殊；各县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上相差很大，而且差距还在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以乡作为基层行政建制，设置一级政权。但在近半个世纪里，乡建制经历了曲折的演变：1958 年的“大跃进”时期，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实行公社化的过程中，一些公社由于是一乡一社，采用了“政社合一”体制，以公社管理组织取代乡政府管理。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后即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1983 年~1985 年，全国恢复了乡建制。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建制单位，名称分别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同时也考虑到有些民族聚居区，由于地域面积和人口等因素，不适宜也难以行使法定的自治权力，决定设置民族乡的建制。这样，民族区域型建制在当时包括三种：一、拥有自治权利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二、不拥有自治权利的民族乡，其后又发展为民族镇和市辖的民族区两种；三、被保留的传统的民族地区建制，这类建制单位后来逐渐改制，现仅留下旗、自治旗两种。



城镇型建制主要包括市、市辖区、镇。市。从隶属关系上看，市分为三个等级：直隶于中央的直辖市，直隶于省的地级市，隶属于省由地区代管、地级市领导、隶属于自治州的县级市。“2003 年底有中央直辖市 4 个，省辖地级市 282 个，县级市 374 个，县级市中隶属于自治州的有 36 个。而且绝大多数地级市都辖县、设区，在现有的 282 的地级市中，不设区的只有东莞、中山、三亚、嘉峪关 4 个，不辖县的地级市有乌海、莱芜、厦门、武汉、鄂州、深圳、东莞、中山、海口、三亚、嘉峪关、克拉玛依 12 个”^①；市辖区本是一种设置在设市的城市地区的地方行政建制单位，至今已扩及到城市外市辖的其他区域。市辖区是在城市中人口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市政府难以直接承担全部城市事务管理与服务时，为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于是分区设置政府，分担市政府的部分城市管理和服务职责，协助市政府工作。2003 年底，全国设有市辖区建制单位 845 个；镇是隶属于县、自治县领导的行政单位，改革开放后，为推动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国务院于 1984 年 10 月发出通知，将镇建制单位的设置标准改为：“凡县级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总人口在 20 000 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 2 000，可以建镇；总人口在 20 000 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 10% 以上的，也可以建镇。到 2003 年底，全国共有 20 226 个镇。”

当代中国政治性特殊地方行政建制单位有两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它所享有的各种自治权以及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赋予的，只是由国家在法律上确认原有的制度而已，其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而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以矿区、工矿区作为建制单位名称的，大都属于县一级，仅有山东省淄博市工矿区为地级市。这类建制设置后来的发展大致为：改设为市，改归市领导，撤销；无改设为县的。全国共有六个市设有六个矿区；垦区建制仅见于辽宁省：1966 年设盘锦垦区，1970 年改为地区，现为盘锦市。工农区仅见于四川省：1979 年增设华云、金口河、白沙三个工农区，华云后改设为市，金口河划属乐山市改为市辖区，白沙工农区并入万源市。盐区仅见于共和国成立时，1950 年浙江省设置庵东盐区，1956 年撤销后并入慈溪县；1951 年苏北行署区设置淮北盐区，1953 年并入连云港市。林区仅有一例：1970 年湖北省设神农架林区，现仍存在。山区仅见于云南省 50 年代的少数民族地区：1955 年增设西蒙山区、布朗山区。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 2000 多年里，经历了多次调整、变革。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都是符合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需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行政区划的设定是相对稳定的，彼此相互依存、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研究历史的行政区划改革历程，对研究当代的行政区划有重大的意义。当代的行政区划设置，一方面沿袭了历史定制和依据实际状态；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受到经济变动的推动和满足社会发展所要求的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等。行政区划的设置，关系到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这必然要求行政过程对行政区划的不断完善。

注释：

① 《中国行政区划历史回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2000 年是人类历史的千年之交。春天伊始，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2 月，江泽民到广东省考察工作，在 2 月 25 日同广东省委常委的座谈中，江泽民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我们党建设的更加组织严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这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总结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①

那么为什么江泽民要在这个时候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2000 年 6 月 9 日，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时期思考的。”在这一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西北五省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对这一问题也作了回答：“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②同年 8 月 31 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机要集中回答一些重大问题呢？从根本上说，是党的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③

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 21 世纪里，我们党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在国际上，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但世界很不安定，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加紧实施；在国内，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逐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党情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党的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发挥好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努力加强党的建设。

抓好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非常重视的工作。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就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就始终牢记人民的重托和邓小平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政治交代，始终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在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专门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等。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以推进执政党的建设。199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用了五个半天的时间，认真地进行了“三讲”活动，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的情况。2000年1月20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时，深情地回顾了邓小平在1989年对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嘱托，并指出要始终牢记：“一个是不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④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⑤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部署执政党的加速建设这个重大课题，江泽民提出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每位常委联系一个县对“三讲”活动进行指导，并亲自向该县的领导干部做“三讲”动员。2000年2月19日江泽民到达广东省高州市，第二天在高州市做了“三讲”动员。随后，又出席了高州市党政领导班子座谈会、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的座谈会等。江泽民十分关心党的建设方面的情况，为了获得详细、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他深入部分企业、公司并与他们的负责人及员工进行交谈，并参加了大量的相关活动：在顺德市举行了国有企业、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党委负责人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了党建座谈会，听取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广钢集团有限公司讲“党员本色”工程，南方日报实业集团讲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全国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示范点——广州市南华西街党委介绍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直到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各行各业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活动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党员在想什么、群众在想什么、基层干部在想什么等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为正确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应该如何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前进，如何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组织更加严密、行动更加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这一问题掌握了大量真实、准确的第一手材料。

经过这样长期的思考与准备，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终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含义之后，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一切优秀文化

成果，从而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因为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所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⑥

实事求是地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出来的。是江泽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自身建设的实际，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及对基层工作不断进行考察调研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之后，经过了长时期的思考才提出来的。

2000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在迈向21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要解决好诸多复杂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他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该贯穿‘三个代表’要求。”^⑧

为了更好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进行了持续的调查研究，先后到十几个省、区、市考察，主持了近30次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对深入开展党建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中央有关部门的80多位同志组成有关的课题组，分别前往十几个省、区、市进行调研，听取地方党委负责同志和各方面的意见。有关课题组还请一些省份有关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协助调研。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各课题组都按时交了调研报告。这些报告为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加强党的建设这一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在今后



的工作中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标志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 21 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们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已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我感到，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坚持做到这‘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①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进行了新概括，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观察当今国际和国内的发展趋势，深刻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思考而提出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注释：

①③⑥⑦⑨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2

页，第335页，第44页，第2~3页，第44页。

②《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579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1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2页。

⑧《深入基层总结实践积极探索开拓前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人民日报》，2000年5月16日。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为了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制定人口政策，统筹安排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务院决定于2000年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月10日国务院第25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

2000年3月30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2000年11月1日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是一次世纪之交的普查，意义十分重大。在我们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我们办事情想问题都必须充分考虑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把人口状况搞清楚对于党和国家制定人口教育就业等政策，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经济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开展人口普查是摸清人口状况的基本途径。从1953年到1990年我国进行了四次人口普查历次人口普查成果，在我们掌握国情搞好建设的宏观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90年以来的10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逐步建立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实施了正确的人口政策，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素质也有了较大提高。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的绝对量较大；人口迁移流动量急剧增加；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且对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也将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系统具体地摸清20世纪90年代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变动情况，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我国人口变化的规律和趋势，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正确制定面向21世纪的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才能更好地解决与人口相关的劳动就业、城镇建设和管理、教育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李岚清指出，目前世界上有近 200 个国家正在或即将进行 2000 年人口普查。我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1/5，我国将要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性人口普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对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国际上观察全世界的人口问题，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于 2000 年 11 月 1 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登记工作。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配合下，通过近千万普查工作人员艰苦努力，又经过事后质量抽查，圆满完成了人口普查的现场登记和复查任务。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 号）》中，公布了这次普查的主要数据：全国总人口方面：为 129 533 万人。其中：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下同）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 126 583 万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 678 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 44 万人。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为 2 228 万人；人口增长方面：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1990 年 7 月 1 日 0 时的 113 368 万人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 13 215 万人，增长 11.66%。平均每年增加 1 279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1.07%；家庭户人口方面：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 34 837 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119 839 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44 人，比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3.96 人减少了 0.52 人；总人口性别构成方面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为 65 355 万人，占总人口的 51.63%；女性为 61 228 万人，占总人口的 48.37%。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6.74；年龄构成方面：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 岁的人口为 28 979 万人，占总人口的 22.89%；15~64 岁的人口为 88 793 万人，占总人口的 70.15%；65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8 811 万人，占总人口的 6.96%。同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4.80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1.39 个百分点；民族构成方面：祖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15 940 万人，占总人口的 91.5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0 643 万人，占总人口的 8.41%。同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 11 692 万人，增长了 11.22%；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 1 523



万人，增长了16.70%；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方面：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109万人；接受初中教育的42989万人；接受小学教育的45191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01人。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率由15.88%下降为6.72%，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城乡人口方面：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坚持以往普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国际上的一些先进做法。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普查项目。这次人口普查按户调查的项目有23项，按人调查的项目有26项，共49个项目，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21个项目增加了28个。这次主要是增加了住房和人口素质方面的项目，普查内容比前几次更为充实。之所以增添那么多的普查项目，主要是因为，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变动呈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加快，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趋势。同时，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城乡居民的受教育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这次人口普查增加了有关人口的迁移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受教育状况等项目。这对收集有关数据，研究人口的结构和素质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应用短表长表技术。这是为了适应党政领导宏观决策和社会各界研究的需要。由于这次人口普查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调查项目，为了不过多增加居民的负担，同时也为了减少各级政府的财力、物力的投入，这次人口普查采用了短表长表技术，把普查和抽样调查结合起来。短表内容包括有关人口的自然属性等基本指标和简单的住房状况指标，由全国90%的家庭填报；长表内容包括有关人口素质、经济活动、婚姻、妇女生育状况、住房

状况等指标，在全国抽取 10% 的户填报。这样，既可以尽可能多的获得人口信息，又可以尽可能少的增加对普查的投入。

第三，增设了《暂住人口调查表》。这次人口普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依然是人口总量问题。这是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影响查准人口总量的一个难点是流动人口的登记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人们会因就业、就学、迁居等因素迁移、流动，户口观念逐渐淡薄，人户分离现象大量增加。针对这种情况，这次人口普查增设了《暂住人口调查表》，作为人口普查的附表。目的是为了防止流动人口漏报，对人口总量数据的质量进行控制。

第四，实行光电录入。鉴于日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希望尽快地得到普查成果，加上我国的计算机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次人口普查采用了光电录入技术。光电录入的优势在于节省人力，不受人工因素影响，精度高，录入速度快。但对纸张和印刷的质量要求高，填写普查表也必须严格规范。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

2000年3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即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继续落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同时，这次会议还通过了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议程。这样，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就在充分准备下召开了。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0年3月5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共有2895名代表出席开幕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次单独组团参加会议，故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分为35个代表团。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共收到议案916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议案33件，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883件。”^①

朱镕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朱镕基的报告共分十个部分：1999年国内工作回顾；坚持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推进改革，全面加强管理；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从严治政，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关于外交工作。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是全面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最后一年，各级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继续执行中央关于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世纪。

朱镕基在回顾 1999 年各项工作时说，过去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努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取得重要进展，科技教育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我们隆重庆祝了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顺利实现了澳门回归祖国。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全国上下努力奋斗的结果。他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明显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朱镕基在报告中以较大篇幅全面阐述了 2000 年政府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他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扩大内需的方针，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今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一是发行 1 万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和教育设施建设、环境整治与生态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二是继续贯彻落实去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运用税收、价格等手段，并继续清理某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和法规，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

朱镕基强调指出，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当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根本性措施。这种调整既要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更要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促进经济再上新台阶。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采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新办法。他强调，今年要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第三产业，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

朱镕基指出，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为促进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他在论述了国企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财税、金融、投融资、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后指出，现在，中央关于



改革和发展大政方针已经明确，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也已颁布。要保证中央的政策措施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当务之急是“严”字当头，强化管理。2000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要以改革的精神，突出抓好管理。工业、农业、财税、金融、贸易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行各业，也都要在加强管理上下大功夫。全面加强管理，从根本上说是要依法规范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和健全各方面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机制。

朱镕基提出，要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整体素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大力开发和推广对传统产业升级起关键作用、有共性的高新技术。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德育工作，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改革和完善优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激励机制。各级政府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朱镕基指出，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形势总体趋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加快。我们必须抓住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力争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有新的增长。

朱镕基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必须切实抓紧抓好。当前，要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过渡。

朱镕基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要从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制度建设和机构改革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厉行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朱镕基指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八项主张，继续努力做好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各项工作。我们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行“两国论”和“台湾独立”等严重分裂活动，决不会坐视不管。他还就外交工作作了阐述。

朱镕基强调，今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做好各项工作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他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坚定信心，扎实工作，为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而奋斗。

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向大会作了关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关于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作了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向大会作了关于立法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决议，关于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何厚铨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这是一次民主、求实、团结、鼓劲的会议。近3000名代表满怀使命意识、时代意识、发展和创新意识，本着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精神，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安康，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殚思极虑，尽职尽责。整个会议充溢着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求真务实的气氛，对于动员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努力完成“九五”计划和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①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 89 404 亿元。经济总量已跃升为世界第七位，人均 GDP 达到 849 美元。在经济总量实现跨越的同时，经济运行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同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1 656 亿美元。中国已是世界上排名第七的贸易体。全球 500 个最大的跨国公司有 400 多个在中国已有投资。2000 年实际利用外资 590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407 亿美元；连续 8 年引进外资仅居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位，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同家。我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与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另外，中国还拥有巨大的市场。这些，都表明中国已具备“走出去”的实力。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②2000 年 3 月，他又明确提出“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③的科学论断，形成了“走出去”战略，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投资办厂，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举。”^④“走出去”作为我国开放战略的一项必须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中国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加入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英文缩写为 WTO）成立于 1995 年 1 月 1 日，其前身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WTO 目前已经拥有 137 个成员，成员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的 95% 以上。WTO 与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WTO 的基本职能是制订和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其宗旨是：“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 and 稳定地增加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最优运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并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积极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称的份额。”WTO 的主要目标是为各成员之间的贸易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并为此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简称 MFN）和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最惠国待遇保证各成员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而国民待遇则保证出口国的产品和进口国的产品享有平等竞争的机会。

中国是关贸总协定 23 个创始缔约国之一。1948 年 4 月 21 日，当时的中国政府签署了《临时适用议定书》，同年 5 月 21 日，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在未得到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授权的情况下，台湾当局擅自于 1950 年 3 月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显然，这一退出决定是无效的。但由于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我国未能及时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伴随着我国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经济成就，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历了长达 15 年之久的“入世”谈判，谈判过程一波三折、艰苦坎坷，但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心始终不变，这也向世界显示了中国更经济更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广泛地参与世界竞争与合作的决心。

自 1986 年 7 月 11 日我国正式提出恢复我缔约方地位后，1987 年 3 月关贸总协定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开始中国的“复关”谈判。1995 年 1 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从当年 7 月起复关谈判转为加入 WTO 谈判。1997 年 5 月 23 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关于非歧视原则和司法审议两项主要条款达成协议。1997 年 8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在日内瓦结束。龙永图宣布了中国政府在进一步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和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等方面采取的重大步骤。1998 年 4 月 8 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七次会议 4 月 8 日在日内瓦结束。工作组主席发表的声明说，中国提出的一揽子降低关税的方案得到工作组成员的普遍欢迎，它标志谈判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1999 年 4



月10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舍夫斯基在华盛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此举被认为是中国加入WTO的前奏。2000年4月12日，中国和马来西亚达成双边协议。2000年5月16日，中国与拉脱维亚达成双边协议。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达成双边协议。2000年5月29日，经过友好和建设性磋商，中国与瑞士结束了双边谈判，签署了双边协议。2000年11月，中国与欧盟达成双边协议。2001年1月10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1年6月14日，中美就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遗留问题达成了全面的共识。2001年6月20日，中国与欧盟达成全面共识。2001年7月3日，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中国入世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已解决。2001年7月3日，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于11月正式入世问题达成一致。11月10日，随着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的手起槌落，中国正式被批准为WTO的第143个成员。为了这一个时刻，中国和世界等待了整整15年，中国努力和等待了15年。“这是中国20多年改革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⑤“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向新世纪做出的一项重大抉择，对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⑥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加快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扩大产品出口。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有关协议要求其成员国削减关税，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减少乃至取消对有关商品的补贴，实施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扩大产品的出口，从而在根本上改善贸易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刺激外资对中国投资，带动国内投资和扩大跨国经营。中国放宽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直接刺激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将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和扩大跨国经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和规则将引入国内，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参与世界贸易政策的制定、更好地维护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使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少走弯路。

与此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结合在一起，面临的经济风险也显著增加。能否把有利条件用足，把不

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为了迎接加入 WTO 后面对的挑战，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深化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深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继续深化改革是我们唯一出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好政府职能定位，实现政企分开，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要研究使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调控方式和手段，不断改善宏观调控，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和公平性。要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部门垄断，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各种规定；扶持和培育民营的大型服务企业已成为紧迫的任务之一，今后，凡是对外开放的领域应对民营企业也实行开放，外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对民营企业也应一视同仁；要充分利用世贸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提供的历史机遇，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加快培养一大批熟悉我国国情和法律法规、具有较好外语水平、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了解其他国家商业法规和技术标准的综合型人才和各类的专门人才；要在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我国对外承诺的基础上，抓紧制定既能严格履行我国对外承诺、又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注释：

①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1995 年 10 月 25 日。

②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 年 09 月 12 日。

③江泽民：《在上海代表团座谈会上的讲话》，2000 年 03 月 25 日。

④肖勤福：《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郑必坚、杨春贵主编：《中国面向 21 世纪的若干战略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年版。

⑤这也是 OECD 对中国入世的评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2），第 13 页。

⑥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序言），2001 年版。



我国政府上网工程主网站正式开通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科层制政府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缺乏服务意识和公共服务导向、财政赤字、规模庞大、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和活力等诸多问题日益凸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和存在的合法性。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的方式——电子政府应运而生，构建电子政府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潮流，成为重塑政府的理性选择，更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开始了走上了电子政府建设之路。中国电子政务的提出原于 1985 年的“海内工程”，当时的建设目标为：在中央政府开展办公自动化建设，逐步实现决策与政府行政管理信息网络化，并为此项工程的实施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工作组，划拨了专门的编制与经费。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所开展的办公自动化（OA）工程，建立了各种纵向和横向内部信息办公网络，为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技术奠定了基础。1993 年底启动的“三金工程”，即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这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政府信息化为特征的系统工程，重点是建设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为重点行业 and 部门传输数据和信息。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电子政务的发展进入快车道，突破了部门和地域限制，向交互性和互联网方向发展。1998 年 4 月，青岛市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网站“青岛政务信息公众网”。1999 年 1 月，40 多个部委（局、办）的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倡议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其目标是在 1999 年实现 60% 以上的部委和各级政府部门上网，在 2000 年实现 80% 以上的部委和各级政府部门上网。一年多来，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政府上网工程发起单位已从 1999 年初的 48 个中央国家机关信息主管部门增加至 66 家，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因特网上已建立站点 52 个，各级政府部门申请 gov. cn 域名已达 2 400 多个，20 多个省级人民政府积极推动政府上网工

作，”^①涌现出一大批精品站点和精品应用，在政府部门率先上网的带动下，掀起了全社会共同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良好局面。2000年5月17日，我国政府上网工程主网站正式开通。

在电子商务时代，因特网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冲击着政府部门的动作方式。因此，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

第一，构建电子政府是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以知识经济为特点的网络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社会信息化和经济信息化，也对政府提供信息服务，公民参与政府民主决策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政府工作及服务的效率，形成新的工作方式，这已成为各国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所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可以说政府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

第二，构建电子政府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必然要求。电子商务正在不断深入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构，承担着大量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它不仅要为电子商务的实施制定完备的法律以规范其行为，同时作为管理者和消费者，电子商务也给政府的职能实施和政府购买、税收带来了全新的变革。电子政府的建立是实现全面电子商务的前提。电子政府的建立，将促进政府对电子商务的管理和应用。政府部门合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建立一个文件资料电子化中心开展网上办公业务，将各种证明文件和办事流程电子化、网络化，增加办事服务渠道，减少办事环节，这些业务更能体现动态资源的再利用，并能以此扩展新的商务机会。例如，如果把各城市所有注册公司单位的情况在网上公布，供公众查询，这样各公司在进行商业交往的时候，通过上网查询，就可以方便迅速地了解到对方的资信情况，可以有效地避免商业诈骗活动，保护商业者的利益。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政府的电子化成为实现电子商务的重要条件。

第三，建立电子政府是网络经济时代的需要。精简后的政府通过自己的网站，展示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能，发布政策和政务信息，公布公众想要知道的各种问题，为公众提供高效、全天候在线服务。同时发展政府与社会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使其成为解决问题、提供服务的有效工具。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主义的体制结构，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越来越令人失望。“今天的环境要求各种体制结构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劳务，要求具有高水平的经济效益。今天的环境要求各种体制结构对顾客作出反应，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供选择，不是



靠下命令而是靠说服和激励刺激来实现领导，给它们的雇员以使命感和控制感，甚至所有者的主人感。今天的环境要求各种体制结构不是简单地替公民服务，而要把权力赋予公民。”^②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机遇，政府重塑便被提上议程，电子政府的出现正好顺应了这一趋势，为此而实施的政府上网工程在促进政府行政的现代化、民主化、公开化和效率化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成为政府重塑的理性选择，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电子政府的开展促进了新型的政府治理，促进政府治理向着政府善治发展，而善治实际上就是国家的权利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电子政府带来的新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强调合作的关系。在传统实施民主的方式上，与时俱进地增加电子民主，可以使民众通过电子化方式交换价值取向、政治观点以及其他个人意图。电子政府的建立，尤其是电子社区的建立，使得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各种电子渠道和网络平台连接起来，极大地方便了公民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参与。同时，这种互动性的网络技术增强了公共参与的实效性和有效性，提高了公民参与的热情。

而作为电子政府题中应有之义的中国政府上网工程，通过实施，将树立中国各级政府各部门在网络上的形象，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降低办公费用，提高办公效率，有利于勤政、廉政建设；并极大地丰富了网上中文信息资源，拉动电子商务行业的需求并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为我国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推进社会信息化、民主化进程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政府上网工程主网站的开通将有利于信息共享。将80%的经济、社会、文化信息和所有政策法规信息掌握在各政府部门手中，因此政府上网不仅可以及时、快捷、权威地发布信息，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还可以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吸引各方面专家学者广泛参与，从而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甚至可以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

政府上网工程主网站开通后将大大提高政府服务与办事效率。电子政府在网上建立各种服务系统，如电子税务、电子公共服务、电子福利支付，提供“一站服务”、“无站服务”，大力发展门户网站。通过这些标准化的中介工具，改变了原本需要层层审核的传统复杂的程序，使行政程序大大简化，克服了政府公务员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电子化采购和招标等电子业务的开展，节省了大量

工作时间和精力，体现了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保证了政府采购和招标的质量，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总之，政府上网工程的推进与发展，是网络经济的需要；民主政治的需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需要；是政府工作方式的变革，其意义重大。而我国政府上网工程主网站的开通，必将这一工程进一步向前推进。

注释：

①宁浩：《政府网站的作用与信息利用》，《情报资料工作》，2001年版，第1期。

②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道德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规范、教育、导向作用，所以，道德历来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

毛泽东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尤为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军、治政、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把道德建设提高到了“治”的地位，肯定道德是可以育人、可以治世的。首次把“德治”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认识并加以阐述的是邓小平。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82年，邓小平亲自提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写进宪法。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四有”社会主义公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伟大号召。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实际上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治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开辟了以德治国的新境界。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就主持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和重要措施。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这一重要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治党、治军、治政、治国的特点和规律，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而且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体现。

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体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通过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在全体人民中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需要强调以德治国。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则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所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致的。

在当代中国加强德治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社会结构的变化凸现出德治的重要性。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维持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手段也随之改变。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活动的空间越广阔，个人行为所影响的直接对



象就越少，行为后果的直接利益影响也越不明显；相反，在社会幅员广大、组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而且流动量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隐匿条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网络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却不断增加。这时，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维护中的重要性就日益凸现出来。二、科技的现代化呼唤着德治的强化。如生物学“克隆”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伦理、地球生态等问题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现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对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造就现代人，首要前提在于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意识具有广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确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养，是现代主体意识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现代人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能具备现代的民主意识。

另一方面，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德治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旦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势必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减弱；经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调整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难免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价值观念也趋向多样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渗透的情况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确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实现新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以德治国，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举措。再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德治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包括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国

民素质、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当今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尤显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贯彻执行“以德治国”的方略，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着眼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要坚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并积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要正确处理和认识各种利益关系，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周密制定和实行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建设指导计划。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搞好规划，把基本道德要求融于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完善。道德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而应该努力做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为群众所乐于接受。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德治国，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深入全体党员和干部、全体人民的头脑之中，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强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2001年2月1日，第一版。



中国反倾销案

2000年6月1日，韩国以对中国大蒜征315%的高关税，中国暂停进口韩国的移动电话与聚乙烯，从而引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中韩大蒜战”。同年9月，飞利浦将中国彩电以“倾销”之罪名告至欧盟法院。同年11月，以贝思彻姆钢铁公司为首的11家美国钢铁企业，正式向宝钢、鞍钢、武钢、马钢、本钢以及莱钢等6家钢铁企业提起反倾销指控。2000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激增。其实，“中国制造”遭到国际反倾销调查绝非今日始。从1979年6月中国出口到欧共体的糖精钠被诉倾销以来，截至2000年底，国外对中国出口反倾销投诉已近400起，直接影响出口商品额逾100亿美元。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保护国内产业的合法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投诉此起彼伏，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了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其特点突出表现为：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数量急剧上升；涉案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征收的反倾销税率普遍较高，且存在歧视性；对我国产品倾销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反倾销的国家继续增加，中国已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

2000年，中国也拿起了反倾销的武器，对多个国家的钢材、化工原料等进口商品实施反倾销措施。有影响的反倾销案主要有：2000年4月13日，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不锈钢冷轧薄板开始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2000年8月25日，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聚酯薄膜的反倾销调查作出最终裁定；2000年9月11日，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对原产于俄罗斯的进口冷轧硅钢片作出最终裁定，对以上两种进口产品分别征收为期5年的不同幅度的反倾销税；2000年11月23日，外经贸部发出公告，对原产于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进口丙烯酸酯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2000年12月8日，外经贸部决定对来自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丙烯酸酯反倾销案调查期限延长为18个月；2000年12月18日，外经贸部发布2000年第15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不锈钢冷轧薄

板征收反倾销税；2000年12月20日，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和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正式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虽然中国拿起了反倾销的武器，但是中国反倾销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中国遭到外国的反倾销，并在反倾销案件中失败是有深刻原因的。

第一，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对中国的歧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影响遍及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广泛，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出口产量稳步上升，保持对较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贸易的顺差，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而有些发达国家的大型生产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生产向海外转移造成了国内产业生产功能的变化。全球化的进程动摇了中小企业、地方经济和劳动者的生存基础，使潜在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贸易保护已经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武器，反倾销这一便利而有效的措施也便成了其当然的选择。于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竞争力的产品限制进口，在种种贸易保护手段中，反倾销手段因其简便、易行且又为国际贸易公约所允许，便成为各国最频繁使用的手段。当然，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意图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反倾销指控日益成为发起国内部政治斗争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延伸。

第二，欧美、日本等国家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虽然已于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理论上说，应将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根据WTO的规定，在中国加入WTO后的15年内，WTO其他成员国有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美国家根据这一规定，在反倾销法中，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比较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幅度时，可背离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拒绝使用中国企业本身的内销价和成本，而以替代国的正常价格作为比较的基础。替代国某种产品正常价格的认定越高，判定我国该项产品的倾销幅度就越大，这样我国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要依据倾销幅度缴纳更多地保证金和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这个征收期限是按进口国企业提出的申请取得的。

第三，从中国国内市场来看，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使得中国许多出口商品具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比较价格优势，这使本来就很敏感的中



国出口商品价格更易被抓辫子。而许多企业，则钻中国外贸政策、价格体系尚欠完善的空子，一看到有市场，不管国内国外，大小企业就蜂拥而去。接下来的就是企业间的彼此杀价、低价促销，以期抢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新产品的开发和改善产品的包装、装潢、广告促销、公共关系，以及如何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等营销的根本法则，却常被忽视。由于企业缺乏一种优良的营销组合策略，其盲目低价竞争，不但会扰乱国格体系，到了国际市场，极易引起别国反倾销。

第四，中国企业应诉不力，缺乏相应的对抗手段，导致了反倾销案中屡屡败诉。我国尚缺乏健全的应诉机制，从而也就是没有能力对外国的反倾销指控作出积极的应诉。而有些国家正是看到了我国的这一缺陷，因此某一国首控之后，纷纷继控，而最多则达七个。外国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往往使我国无暇顾及。自1989年以来，欧美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成倍增加，绝大多数诉讼案的结果，要么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要么中国企业承诺最低价格。我国反倾销诉讼的被动与消极做法其影响是十分消极的，结果使得我国企业不仅丧失了多年开辟的海外市场，而且助长了某些国家肆意对华反倾销的气焰。

由于国外对我国实施的反倾销，不仅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而且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要积极努力来应对反倾销。

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实施反倾销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放眼全球，回眸历史，国际贸易的争端最终还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反倾销的深度和广度实质上也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应当说，反倾销问题不仅仅是当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纠纷问题，而更是当事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的较量。如美国与欧盟、日本、中国都发生过贸易争端，有几次贸易战一触即发，美国通过国内的“301”条款，以制裁和打贸易战为要挟，强行要求他国为美国产品的进入开绿灯，却限制对方产品的进入。这说明了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占据反倾销战的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存在较强的依附关系，在这种较量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我们实施反倾销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力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明确、规范、强化和履行政府的职能，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要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转变为依法管理，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主要运用产

业政策、货币、财政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管理，努力创造条件，尽早实现外汇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价格体系，为我国“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创造条件，为我国企业取得个案待遇提供有力的保证。

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质取胜。在中美入世协议中明确规定美国在中国“入世”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对中国仍然适用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法律，这就意味着我国加入WTO后，从法律上仍然不能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困扰。为此，我们必须在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狠下功夫：一、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使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作用。二、变过去以“价廉取胜”为“质优价廉取胜”，运用品牌、包装、公关、广告等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现代营销手段，提升产品的竞争力。鼓励具备技术、品牌 and 价格优势的产品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转移贸易摩擦。三、优化生产要素配置，通过降低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竞争能力。四、努力提升产品结构，鼓励和扶植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加工基地和知识密集型的出口基地的发展，扩大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集中力量在某些科技前沿争取突破，然后再逐步带动其他部分的发展，进而使这方面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提高加工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利润水平。

加强我国企业在反倾销案中的应诉能力。我国已于1997年3月25日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使我国企业的对外反倾销也有法可依。与此同时，随着反倾销的频繁发生，中国越来越需要了解国际市场反倾销的人才和律师。因此必须加强人才的培养。此外，我们要建立一支有知识、懂业务的反倾销专业人才队伍，对反倾销进行专门研究和专项预防，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反倾销策略，防止反倾销案件的发生。还有，政府和商会要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和法律指导，并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为涉案企业提供经费支持或加以奖励，提高我国在反倾销应诉和胜诉的概率。最后，还要在加大执法力度上下功夫，从而使我国企业逐步摆脱被动的地位，通过反倾销寻求自我保护，同时也制约国外无所顾忌的对华反倾销。



主办亚洲博鳌论坛

2001年2月27日，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文莱、柬埔寨、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海南省博鳌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博鳌亚洲论坛。其性质是非官方、非赢利、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宗旨是立足亚洲，深化亚洲各国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同时又面向世界，增强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与经济联系；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与社会等诸多方面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通过论坛与政界、商界及学术界建立的工作网络为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非会员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提供服务。目标是力争将博鳌亚洲论坛办成高水准论坛，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近半个世纪以来，亚洲各国通过自身努力，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亚洲经济总体发展迅速，东亚经济实现了腾飞，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并成为世纪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虽然在20世纪末，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但经过自我调整与改革，亚洲经济已迅速复苏。

由于亚洲大多数国家现已实行开放政策，彼此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日益密切，双边、区域、次区域以及跨区域的合作逐步展开；各国间工商、金融、科技、交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增加；东亚地区合作（10+3）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东盟内部经济一体化、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图们江流域合作等次区域合作正在进行；亚太经济组织、亚欧会议、东亚——拉美论坛等跨区域合作也在向前推进。可以预言，亚洲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跨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日趋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发展的新形势下，亚洲各国正面临巨大的机遇，也面临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严峻挑战，一方面要求亚洲国家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同时也要求增进亚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何应付全球化对本地区国家带来的挑战，保持本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与合作已成为亚洲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参与了 APEC、PECC 等跨区域国际会议组织，但就整个亚洲区域而言，目前仍缺乏一个真正由亚洲人主导，从亚洲的利益和观点出发，专门讨论亚洲事务，旨在增进亚洲各国之间、亚洲各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论坛组织。鉴此，1998 年 9 月，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倡议成立一个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

亚洲论坛的概念一经推出即获得了有关各国的一致认同。1999 年 10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专程为“亚洲论坛”来华的拉莫斯和霍克。胡锦涛在认真听取两位政要有关“论坛”构想的介绍后，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和支持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区合作与对话，认为论坛的成立有利于本地区国家间增进了解、扩大信任和加强合作。中方将对“论坛”的设想进行认真研究和积极考虑，并尽力提供支持和合作。此后，亚洲有关国家的政府均对成立“亚洲论坛”作出了积极反应。

在此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于 2001 年 2 月 26~27 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论坛总部选择在中国海南博鳌。这是亚洲地区的一些前领导人向中国高层领导提出的建议。他们认为，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中国深化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实验区；海南省以建设生态省为目标，说明它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重点是生态产业，这是亚洲和国际社会所看重的领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海南博鳌是一个专门为论坛设计的集生态、休闲、旅游、智能和会展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有着十分宜人的自然地理环境。1999 年 10 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会见论坛发起人时表示，将为论坛的创建提供支持与合作；海南省政府已经为论坛的创建提供了多方面的实际支持，并承诺继续为论坛的创建和运作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包括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哈萨克前总理捷列先科、蒙古前总统奥其尔巴特等 26 个国家前政要出席了大会。此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尼泊尔前国王比兰德拉、越南国家副总理阮孟琴等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的



重要讲话。大会宣布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通过了《博鳌亚洲论坛宣言》、《博鳌亚洲论坛章程指导原则》等纲领性文件，取得圆满成功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博鳌亚洲论坛宣言》指出，我们聚首中国海南省博鳌，审视亚洲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熔铸亚洲观点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到为增进本地区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整合而做出持续努力的重要性。为此，我们注意到亚洲国家经济与社会环境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注意到尽管亚洲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但各国争取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各国都有着共同的前进愿望和决心；认识到使用新技术，实施外向型战略，以充分挖掘亚洲巨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潜力，是消除贫困、增进繁荣、提高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坚信亚洲各国之间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为此，我们郑重宣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建立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海南省的博鳌是论坛的永久所在地，博鳌亚洲论坛受以下前景、使命和战略的指导，力争将博鳌亚洲论坛办成高水准论坛，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博鳌亚洲论坛宣言》还指出，为达致以上前景，论坛将努力为政府要员、商业领袖和知名学者提供一个高层对话平台，以增进和深化贸易和投资联系，推动建立伙伴关系，在应对不断出现的全球性经济挑战方面，阐明各自的观点。增进亚洲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本地区私营团体的社会责任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强化商业团体在寻求增长和进步过程中的和谐共生关系，以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和增进区域内网络机制和地区战略联盟的概念，以增加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博鳌亚洲论坛宣言》提出，为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涉及本地区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重要研究活动，提供智力支持。战略为完成以上使命，论坛将采行以下战略：一、经常性地举办各种会议，如论坛大会，研讨会、座谈会和讲座，讨论贸易、投资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二、激发本地区其他机构的主动性，以促进和强化各国政府与商业团体之间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伙伴关系。三、把握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全球和地区性经济发展趋势。四、甄别随时出现的、可能影响贸易和金融的各种问题并发布相关信

息，揭示和彰显新出现的投资机会。五、独立并合作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各类研究活动。六、通过网络化的安排，增进本地区商业团体间的联系。七、成为一个研究及培训中心，以增强亚洲商业团体的管理和科技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摘自：《2001 年博鳌亚洲论坛背景介绍》，新华网，2010 年 4 月 12 日。



我国体育事业的骄人成绩

2000年9月15日~10月1日，来自全球200个代表团的11 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21世纪第一次奥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二十七届奥运会28个大项、300个小项的角逐。这次比赛的项目是历届奥运会之中最多的。在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下，他们向人类的生理极限发起挑战，展示出较高的竞技水平，共创造了34项世界纪录，77项奥运会纪录，三项奥运会最好成绩。

中国代表团此次派出311名运动员参赛。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在传统优势项目中继续保持着强盛势头，乒乓球包揽了全部四个单项的冠军，女子举重在所参加的四个级别中全部夺金而归，羽毛球金牌五中取四，跳水则在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连夺五金，与举重一样，成为中国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金牌最多的项目。此外，射击和体操各获三枚金牌。本届奥运会跳水比赛由于新增了双人项目，金牌数也增加了一倍，达到八枚。在乒乓球的四个单项中国队连续第二次包揽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全部冠军。羽毛球五项比赛中，中国除了传统弱项男子双打无缘奖牌外，在其他四个单项中全面开花。本届新增设的女子举重项目规定一个协会最多只能派四名运动员参赛，曾在这个项目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国尽管优势受到遏制，但还是由四名选手分头出击，在各自级别中如愿夺金。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悉尼奥运会上共夺得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4枚铜牌（本届奥运会闭幕时为28金、16银、15铜），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均排在第三位。中国首次进入奥运会金牌榜前三名，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运动员共有三人12次创八项世界纪录，六人11次创11项奥运会纪录，成绩比前四届奥运会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创下了参加历届奥运会金牌数和奖牌数的最高纪录。中国体育健儿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新贡献，是对祖国人民的巨大鼓舞。

本届参赛的中国奥运军团的口号是“为祖国荣誉而拼搏是我们巨大的

精神动力”，这也是中国队能够在奥运赛场取得历史新突破、展现良好精神风貌的主观原因之一。对此国家主席江泽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国体育健儿不畏强手，奋勇争先，表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精湛的运动技术和良好的体育道德。我国体育健儿的优异表现，体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民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作出了贡献，给昂首跨入新世纪的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祖国为你们骄傲。”^①

竞技体育是社会的宠儿，政府和民众哺育它成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为它提供营养。因此，它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一个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缩影，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见证。

100 多年前，首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举行时，组委会也向中国发出了邀请。有资料说，当时的清政府不知奥运会为何物，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参加。在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国人没得过一项世界冠军，未破过一项世界纪录，在奥运会上留下的只是耻辱的记录。新中国刚刚站立起来时，派出的体育代表团虽然到了奥运会举办地赫尔辛基，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武术表演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即便我们全面参赛，当时也无法取得与东方大国地位相称的好成绩。此后的 20 多年，中国体育迅猛发展，竞技水平飞速提高，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举重、田径、游泳、射箭、航模、跳伞等项目的选手接连打破世界纪录，乒乓球运动员为中华民族争得第一个男、女世界冠军，登山健儿开创了人类首次从北坡攀上地球之巅的历史……中国竞技体育与我们的国家一样，虽曾历经挫折，遭受浩劫，仍取得了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政治安定，经济腾飞，科教发展，人心凝聚……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1978 年为 3 624.1 亿元人民币，到了 1999 年达到了 82 054 亿元人民币，增长了 22 倍。我们仅用 20 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 100 年走过的路程。仅此即可说明，中国已不是过去贫穷落后的中国，渴望振兴的中华民族，正以令世人惊愕的速度在东方崛起。

国家的巨变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为体育输入发展的活力。中国体育代表团 4 次参加奥运会的成绩，正是中国通过奥运会这个“窗口”，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人的精神面貌等方面，向世界所作的一次展示。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的手枪打碎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记录，中国获 15 金，但那仅仅是“半个奥运会”，有一些强队抵制参赛。四年后，中国在



没有队抵制的汉城奥运会上得五金，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实际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16枚金牌，处“第二集团”领先地位；接着在竞争更为激烈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又得16金，保持了“第二集团”领先地位。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要在人类规模最大的盛会上向世界体育强国发起挑战。而今天，中国已经跻身奥运会金牌榜前三名；更可喜的是，中华奥运健儿在悉尼表现了中国人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四届奥运会，中国竞技体育不断取得进步乃至突破性进展，实现了巨大的跨越，正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无疑，这是中华民族崛起、国力日益强盛带来的历史必然。

1908年，在《天津青年》上一篇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里向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后来，中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的过程，从此申办奥运会成了中国人民的愿望。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时机悄然而至。1991年2月，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随后在中国奥委会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致同意了北京市的申请，并向国际奥委会和有关的国际体育组织通报了北京的申请。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1991年12月，派出北京奥申委代表团赴瑞士格桑向国际奥委会主席递交了申请书。2001年7月13日晚上，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通过投票，决定把2007年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交给中国的北京。

国运兴则体育盛。在众多的申办城市中，北京能够战胜其他具有竞争力的对手，脱颖而出，赢得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这充分说明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繁荣，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古老而充满生机的中华文明日益引起世界人民的向往。北京申奥，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一次大检阅；北京申奥成功，将进一步坚定和增强中国人民走向世界并在国际社会发挥重大作用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在欢庆之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获得奥运会举办权，还只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第一步。为了申办成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为了成功举办，我们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今后的七年，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历届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以更大的热情，勇于创新，精益求精，高质量地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各项建设任务和准备工作。

“新北京，新奥运”，是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所有成员的庄严承诺。我们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定位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通过举办奥运会，把中华文明古国的深厚底蕴和崭新气象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写下更加辉煌的篇章。

中华民族将在21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人们期待着，中国的竞技体育也在新世纪里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摘自：《江泽民主席致电中国体育代表团祝贺我国体育健儿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国务院公报，2000年9月25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召开

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这次会议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盛会，是对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一次检阅。

从2000年起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指国家奖励在科技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中国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是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奖励，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定。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崇高荣誉的吴文俊、袁隆平两位院士，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文俊院士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赴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5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0年被第三世界科学院选为院士。1952年~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副所长、研究员。1979年至现在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吴文俊院士是著名的数学家，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到数学的诸多领域。在多年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

示性类”，“吴示嵌类”，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享誉世界。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计算机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即算法化思想），转而研究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成果并已应用于国际上当前流行的符号计算软件方面。吴文俊院士热爱祖国，有高尚的科学道德，是数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至今仍在数学机械化研究的第一线。在 5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始终站在数学领域的前沿，做出了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代数拓扑学领域的奠基性工作，半个世纪以来对国际数学领域的发展一直产生着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他运用计算机进行数学定理证明和非线性方程组求解，彻底改变了数学机械化领域的面貌，为信息时代数学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袁隆平院士 1930 年 9 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西省德安县。1953 年 8 月，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到我省安江农校任教。1971 年 2 月，由安江农校调到我省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工作。1978 年晋升为研究员，被评为全国劳模。1984 年，出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1995 年，出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农科院名誉院长。袁院士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科学研究。他参加工作 50 多年来，不畏艰辛、执著追求、大胆创新、勇攀高峰，取得的杂交水稻科研成果使我国在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稻育种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杂交水稻的推广不仅解决了中国粮食自给难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袁院士的先进事迹在国内外广为传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由衷敬仰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他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家级重大奖励和荣誉，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美国“世界粮食奖”等 10 多项国际大奖。他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 50%，平均增产 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 3 500 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会上，江泽民首先向获得 200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颁发由他亲笔签发的奖励证书和奖金。



随后，朱镕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首次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院士及其他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

朱镕基在讲话中指出，要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对做出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科技工作者辛勤工作与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其他奖励，就是为了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气氛，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朱镕基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他说，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核心就是以创新促进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朱镕基提出，要依靠科技实现经济社会新发展。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是我国科技工作的根本任务。要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在本世纪初期，我们要紧紧围绕经济结构调整这一主线，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我国经济的效益和竞争力。要继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积极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力争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朱镕基提出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当今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要注重培养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当前，建立和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体制和机制，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特别是学术带头人，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在科学领域，要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创新 and 竞争、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氛围。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认真贯彻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鼓励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高科技人员特别是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的收入，充分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依法

保护知识产权。要继续支持出国留学或进修，鼓励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工作或以多种方式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还要创造条件，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专门人才。

朱镕基说，获奖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著的成就，不仅由于他们对国家兴盛和社会发展有强烈的责任心，还在于他们对科学和真理有执著的追求。他们那种朴实严谨的作风，敢于创新的勇气和追求，值得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也应该在全党和全社会发扬光大。他们的卓越成就，不仅对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这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民族。我们相信，两位院士的感人业绩，必将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努力奋斗，勇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

朱镕基最后指出，21 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我国进一步走向繁荣富强的世纪。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用科学知识造福于人民。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开拓创新，团结奋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隆重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

200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各族各界代表共 6 000 多人出席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 80 年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 80 年的峥嵘岁月和光荣业绩，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民族的空前团结；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8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江泽民提出，在21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80年，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80年，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的80年。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江泽民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江泽民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把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谈到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江泽民要求全党同志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他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50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50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

江泽民最后指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已经载入史册。在我们的前面，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党同志都绝不能固步自封，绝不能畏惧艰险，必须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鹏最后在大会指出，“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系统总结了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

标。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进一步做好全党和全国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第一版。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80 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党员只有 50 多人，面对的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80 年后的今天，我们党已成为在全国执政 50 多年、拥有 6 400 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人民已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巨大变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奇迹。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200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共四部分：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

江泽民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 80 年的峥嵘岁月并取得了光荣业绩。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在 21 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

落实“三个代表”要求。“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21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江泽民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他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江泽民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把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江泽民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



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这是因为经过 80 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最终体现在党领导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根本意义所在。同时，也充分表明我们党经过 80 年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规律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体现了我们党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反映了党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贯彻到党的建设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学习好、领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对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各级组织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审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坚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我们党就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江泽民在讲话中的最后一部分，要求全党同志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

和历史任务而奋斗。这是因为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发工作。

要求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全党同志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要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努力实现“十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的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加强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注重质量建设，实行科技强军、依法治军，努力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要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完善国防动员体制。要不断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用最大的诚意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制止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



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 20 世纪中叶到 21 世纪中叶的 100 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 50 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 50 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这篇讲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气势磅礴，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凝结着时代精神和全党智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阔的世界眼光，展示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和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科学精神。这篇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我们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进一步做好全党和全国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摘自：《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第一版。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01年9月24日~26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190人，中央候补委员13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背景下召开的。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了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一步阐明了党在21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对进一步做好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因此，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就成为了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在全面分析我国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之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全党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同时，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而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党员积



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锐意改革、致力发展，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给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广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会议指出，现在党的作风总的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求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全党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同时，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为了在新的发展阶段有效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总体要求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党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进步，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新的明显改善，使广大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

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会议强调，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是党顺应时代

进步潮流、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和建设在推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全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用“三个有利于”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而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各级干部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同不符合人民意愿和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要勤政为民，真抓实干，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力戒浮躁浮夸。

同时，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发扬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办一切事情都要遵循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原则，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党员干部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人民的公仆。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决查处以权谋私案件，严惩腐败分子。

因此，要坚持任人唯贤。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

会议还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要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从严要求，标本兼治。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各级党组织要抓紧落实《决定》精神，明令禁止的，要立即停止；



能够做到的，要马上去办；需要统筹兼顾逐步解决的，要创造条件积极推进。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尽快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从繁杂的应酬中摆脱出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表率作用。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要首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要首先做到。要把贯彻《决定》精神同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抓好落实，以优良的党风带动和促进政风、行业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建设。

这次会议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汤洪高同志为中央委员。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石兆彬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嘉廷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撤销石兆彬、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六大于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这次大会，是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参考文献：

摘自：新华社，2001年9月26日。

主办 APEC 峰会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最高级别的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共有 21 个成员。这些成员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北、泰国、美国和越南。

1992 年 4 月，澳大利亚总理基廷首次提出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基础，举行一次亚太首脑会议。1993 年，美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东道主，正式提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首脑会议。由于没有得到全体成员的赞同，美国建议召开的首脑会议被定名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3 年 11 月 19～20 日，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的布莱克岛举行。除马来西亚外，该组织其余 14 个成员的领导人或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所有领导人不着西服，而穿休闲装，为的是营造一种较为轻松的气氛。领导人的讲话内容需经本人同意才能公开。会议结束后通过一项领导人宣言，这种形式成为以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模式。

迄今为止，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经举行过 8 次，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又称《布莱克岛展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又称《茂物宣言》）、《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行动宣言》（又称《大阪宣言》）、《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从憧憬到行动》、《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联系大家庭》、《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加强增长的基础》、《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奥克兰挑战》、《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宣言：造福社会》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都是指导亚太经合组织各项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从初期的一般性地区经济论坛演变为本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组织。一年一度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成为



亚太地区合作与发展的象征，其影响和贡献已经大大超出了本地区的范围。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文莱苏丹博尔基亚、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智利总统拉戈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金大中、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莫劳塔、秘鲁总统托莱多、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俄罗斯总统普京、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泰国总理他信、美国总统布什和越南总理潘文凯出席会议。

2001年是亚太地区在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以后再次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亚太经合组织发达成员日本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加之“9·11”事件的冲击，使世界和地区经济明显下滑。恢复信心，营造振兴和发展经济的宏观环境，已成当务之急。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在这次会议上，为各成员领导人的多边和双边接触与交流提供了舞台，江泽民主席会见了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东盟国家等成员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不少方面达成共识，推动了成员间双边关系的发展。达成了《领导人宣言》及相关的《上海共识》等文件。与会领导人还与工商界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听取了工商界人士就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出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领导人还就当前国际中突出的反恐怖主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声明，一致强烈谴责恐怖主义活动，表示要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2001年APEC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启动。在6月召开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表明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这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此发出了更明确、更积极的信号，各成员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还表示将继续积极推进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作为经济总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的地区，APEC发出的声音在世界上会产生有力的影响，对将于下月举行的世贸组织多哈会议具有积极的意义。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是推动APEC前进的两个轮子，保持它们的平衡发展是确保APEC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近几年来，贸易投资自由化这个轮子转得很快，经济技术合作的轮子相对迟缓，影响APEC的平衡发展。事实证明，没有卓有成效的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投资自

由化也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不缩小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这次会议强调了加强 APEC 在经济技术及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还为实现“数字 APEC 战略”和发展电子商务规划了蓝图，以应对全球化和新经济的挑战，实现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这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题为《加强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我对当前世界和地区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推进 APEC 合作进程的主张。

江泽民指出，虽然目前亚太地区经济面临一些困难，“9·11”事件更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但亚太地区从长远看依然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从 APEC 的共同利益出发，各成员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江泽民说，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 APEC 合作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向领导人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牵头实施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促进项目和 APEC 金融合作与发展项目。江泽民说，21 世纪 APEC 应始终站在全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沿，尊重多样性，坚持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等原则构成的“APEC 方式”，增强凝聚力，缩小成员间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各成员对会议的成果感到满意，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一，这次会议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在这一重要时刻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增强了各成员应对当前经济困难、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决心。这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共识》，重申了各成员实现茂物目标、追求共同繁荣的决心。这将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会议还通过了《数字亚太经合组织战略》，该战略有助于推动各成员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 and 缩小成员间存在的“数字鸿沟”。

这次会议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确立为亚太经合组织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议题，并将努力在政府、工商界、教育学术界之间建立新型的合作机制。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中国开发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促进项目”，并出资设立了“亚太经合组织金融和发展项目”，旨在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开展实质性合作。

第二，这次会议促进了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会议期间，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盟等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见。



与会领导人还就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一致强烈谴责大量伤害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意加强在反对恐怖主义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三，这次会议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也让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会议期间，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政府官员以及工商企业界代表云集上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作为 APEC 的重要成员，中国为 APEC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加入 APEC 大家庭十年来，中国始终本着积极参与、求同存异、推动合作的精神，积极参与亚太经济的合作进程，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 1993 年西雅图会议开始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来，国家主席江泽民参加了历次会议，并亲自倡导和推动了 APEC 经济技术合作，使之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一样，成为 APEC 的“两只轮子”之一。在 1994 年的茂物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的亚太经济未来发展五项原则。在江泽民主席的建议下，APEC 在 1998 年制定并通过了《走向 21 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吉隆坡技能开发行动计划》，我国政府还专门为此设立了 1 000 万美元的科技产业合作基金。在文莱会议上，江泽民主席还就经济全球化、新经济和 APEC 的作用、人力资源开发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看法和建议，得到了成员们的重视。在今年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上，江泽民主席就 APEC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出了极富远见的五点主张，“上海会议”上再次倡导 APEC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作为 APEC 新世纪首次盛会的东道主，从一系列 APEC 会议和活动的成功举办，到此次高潮迭现的“上海峰会”，中国在推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推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经济技术和金融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摘自：《人民日报》，2001 年 10 月 21 日。
2. 《人民日报》，2001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反恐”力度不断加强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为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目的，策划、组织了发生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的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安理会颁布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如何有效地打击“东突”恐怖分裂势力，促进新疆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十分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

“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这一名词出现于19世纪末期。“斯坦”原为“地方”、“区域”之意，但“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某些老殖民主义者肢解中国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突厥最初是一古代游牧民族的专称。5世纪，它活跃在阿尔泰山一带。6世纪中叶~8世纪中叶，它活跃于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自西魏至隋唐诸王朝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交往。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辖境辽阔。在隋朝和唐朝初期，突厥曾是称霸于中国北部的一大势力。尔后，分裂为东、西两部的突厥，为争夺汗权而争斗不休。8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而11世纪以后在国外有的史籍中使用的“突厥”，已经不限于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一切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共称。到了19世纪末，有人主张把生活在波斯普鲁斯海峡至阿尔泰山脉之间的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国家。

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起，新疆就是中国疆土的一部分。此后，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没有间断。但在20世纪初以后，一小撮狂热的新疆分裂分子与宗教极端分子，根据老殖民主义者制造的歪理邪说，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理论。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



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为了达到分裂和控制新疆的目的，某些老殖民主义者进而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与之相对应，今天的中亚诸国被称之为“西突厥斯坦”），编造所谓新疆是“东突厥”人的家园的谬论。“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这是分裂主义分子将其理论变为现实的一次尝试，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瓦解了。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新疆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形势整体是好的。但是“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违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伺机从事分裂破坏活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一些“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他们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毫不掩饰地宣称要不惜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场所制造恐怖气氛。“东突”恐怖势力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血腥的恐怖事件，留下了一篇篇血淋淋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主要恐怖活动有：

一、制造爆炸。

同世界上大多数恐怖势力一样，“东突”恐怖势力热衷于借助把矛头指向无辜平民的爆炸手段，以制造恐怖气氛、扩大影响。

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的一起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恐怖分子还在县城一个体商店安置了炸弹，爆炸未遂。1997年2月25日，“东突”恐

怖组织再次将恐怖活动引向新疆首府，制造了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包括维族、回族、柯尔克孜族、汉族群众在内的九人丧生、68名乘客被炸得腿断肢残，严重受伤。1998年4月7日凌晨，恐怖组织在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住房窗台、县政协副主席和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住宅门前等处，连续制造8起爆炸事件，炸伤八人。

二、进行暗杀。

为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恐怖气氛，恐怖势力不但把矛头对准汉族群众，也对准维吾尔族干部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把他们当作“异教徒”杀害。

1996年4月29日凌晨，10余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分别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和当地的三名维吾尔族基层干部家中，采取爆炸、枪击、刀刺等手段，制造了血腥的恐怖事件。恐怖分子向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两枚炸弹，致卡及其妻重伤；卡的弟弟阿吾力托卡被恐怖分子连刺七刀致死，其妻被刀刺后又遭枪击身亡；卡吾力·托卡的儿子艾尼瓦尔卡吾力被恐怖分子连刺九刀、头部遭枪击身亡，其妻也身中八刀、头部中两枪身亡；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被刺成重伤。1997年3月23日凌晨，以吐尔逊吐地为首的一伙恐怖分子，闯入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家中，将艾夫妇杀害；同年7月3日凌晨，这伙恐怖分子又闯入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一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家中，将吐夫妇两人杀害。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买买提为首的10余名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及其儿子杀害，胡身中38刀，其子头部中枪。杀人后，恐怖分子又纵火，胡妻被烧成重伤。2001年2月3日，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家中，对买连捅38刀，将其残酷杀害。

三、袭击警察和政府机关。

1996年8月27日，六名恐怖分子身着迷彩服，乘车到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割断电话线，杀死副乡长和在此值班的一名警察；随后又闯入该乡一村，将三名治安员和一名水管员绑架到10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杀害。1999年10月24日凌晨，恐怖分子携枪支、大刀、爆炸燃烧装置，袭击了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他们包围派出所，连续投掷燃烧瓶和爆炸装置、开枪射击。之后闯入派出所枪杀了一名联防队员和一名留置审查的犯罪嫌疑人，开



枪击伤了一名警察和一名联防队员。后将派出所 10 间房屋、一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烧毁。

四、实施投毒、纵火。

1998 年 5 月 23 日，在境外接受过专门训练、被派入境的“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投放了 40 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 15 起纵火案，扬言“要将乌鲁木齐变成一片火海，要造成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的损失”。由于及时发现和扑灭，才未造成重大危害。1999 年 10 月 11 日，三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 3 枚定时爆炸引燃装置，其中一枚爆炸引起棉垛起火，烧毁棉花约两吨。另两枚爆炸装置被及时排除。

五、建立秘密训练基地，筹集、制造武器弹药。

“东突”恐怖势力为了培训骨干、扩大恐怖组织，在新疆境内，尤其是在偏僻地区秘密建立训练基地。1990 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一偏僻地建立了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该基地先后办了三期训练班，共培训了 60 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主要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训练班学员多数参与了 1991 年～1993 年发生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

2000 年 2 月 25 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七名恐怖分子，并在恐怖分子家中发现一地道和地下室。地道长 7 米，高 2.5 米，地道后面连接一长 12 米、宽 3.8 米、高 2 米的地下室，室内有通风和上下水设施。在地道内缴获手雷 38 枚，电雷管 22 枚，爆炸装置 18 个，炸药 17 公斤，拉火管 20 多个。

东突恐怖势力的所作所为理所遭到了中国各族人民，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群众的坚决反对。为了保护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为了维护中国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对“东突”恐怖势力所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坚决依法予以打击。但是我们打击的对象只是极少数策划指挥和参与暴力恐怖事件的骨干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对于那些由于受到蒙骗、参与了“东突”恐怖组织一些活动的大多数人，我们都是采取教育、帮助的态度，欢迎他们改邪归正。新疆各民族素有热爱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光荣传统，伊斯兰教

是热爱和平的宗教。我们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不是针对哪个民族、哪个宗教，而是针对暴力恐怖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保证正常的宗教活动的进行。我们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些年来，新疆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各族人民和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贯彻执行民族平等与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各族人民之间，各宗教之间，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尽管境内外还存在一小撮“东突”恐怖势力，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各项事业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大好局面。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在反恐怖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东突”恐怖势力的任何姑息纵容，受到伤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全球社会对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越来越真切、越来越深刻的今天，我们希望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不分民族与宗教，不分地域与国别，不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充分认识“东突”恐怖势力的本质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识破“东突”恐怖势力各种假面具，共同打击其恐怖暴力活动，不给“东突”恐怖势力以任何可乘之机。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举行

2002年10月29日，中央文明委召开会议，隆重表彰在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这是一次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的充分展示，是一次亿万人民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现。受表彰的563个先进单位，都是精神文明建设伟大实践中的亮点。他们表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开拓创新、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常抓不懈、务求实效的良好作风。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年年都有新举措，岁岁都有新进展。讲文明、树新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三下乡”、送温暖、心连心、手拉手、志愿者、青年文明号、五好家庭、星级文明户、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军警民共建、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精神文明建设在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提高城乡文明程度和公民素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服务人民群众、密切党群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现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正处在一个极好的发展时期。我们要抓住极好机遇，乘势而上，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总的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自觉地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定要牢牢记住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很紧要。发展是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围绕大局，走全面发展之路、文明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定要牢牢记住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素质。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使“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字基本道德规范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加强教育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增强创建活动的思想道德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

一定要牢牢记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服务群众、依靠群众。要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要满腔热忱地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把共同富裕思想贯彻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鼓舞群众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一定要牢牢记住精神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始终坚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各展所长、相互促进。各地各部门既要按照统一部署分工负责，又要注意加强联系，互相支持。创建文明城市和文明村镇，要把创建文明行业作为内在要求。创建文明行业，要自觉融入创建文明城市和文明村镇之中。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密切配合，整体推进。

一定要牢牢记住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情抓起，始终坚持重在建设，狠抓落实。精神文明建设贵在务实，抓与不抓大不一样，认真抓与一般抓大不一样。要有规划、有目标、有部署、有检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推进，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拓展，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深入，一年一个台阶地提高。要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图虚名，务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要切实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政治高度，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从把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中国带入 21 世纪的历史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增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的精神文明建设领导体制。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方面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级精神文明建设领导机构要加强同有关职能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联系，发挥他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各部门各人民团体要在动员人民群众、开展思想教育、加强社会管理、营造舆论氛围、活跃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共建精神文明。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队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政治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就要求要全面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提出的要求，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还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全党同志只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不断增强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顽强的奋斗精神，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此外，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这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确立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十五大在所有制结构问题认识上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根据我国国情，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建国开始特别是近20年来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首先，坚持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

会主义根本原则。”“社会主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的状况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等，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再次，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根据邓小平理论，我们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判断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需要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作用，而不能以公有制为唯一的经济形式，不能片面地追求统一的、单纯的所有制形式。

实践证明，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

20多年来，所有制改革是贯穿改革进程的一条主线。由于许多国人都把所有制改革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是对立的，进一步找到它们能够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统一、一致和协调的现实根据。

第一，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统一于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基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很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我们既有世界一流的、高度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企业和以航天科技



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同时也有许多接近原始的生产形式和生产工具，号称“秦犁汉锄”，至于半机械化和手工操作的生产更是大量存在。这种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决定了我国既有实行公有制的基础，但又不具备实行单一公有制的条件。如果不顾这种客观实际，硬是要搞单一的公有制，就会压制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发展停滞，造成社会普遍贫穷。我们国家在极左年代所盲目追求的“一大二公三纯粹”的社会主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存，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竞相发展，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第二，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结构改革的走向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仅仅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还不足以回答我国所有制关系面临的复杂问题，如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为何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命运如何？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在运行中统一的形式和条件怎样？这些问题，还要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和完善的现实需要出发才能得到说明。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作为调节经济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体制。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通过商品这个物的交换来实现人们之间劳动活动交换的经济关系。尽管不是生产力这一个范畴所能够容纳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与生产力最贴近的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关系，一般它能包容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于多种社会形态和不同所有制之中。特别是市场经济作为供求、价格、竞争等要素构成的联动运行系统，其特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及其在竞争中形成的客观机制，是有效配置经济资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强大动力。可见，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离不开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除了强化社会分工这个一般基础以外，还必须明确和不断强化不同的产权主体及其利益主体。包括私有财产主权、公有制及其各种实现形式在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些不同的产权形式中，私有制产权边界最清晰，与市场经济有天然的联系，它生在市场，长在市场，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市场发育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各种游戏规则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正是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注入新活力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孕育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有国营的国家所有制经济结构，是不可能以自然的方式演变成

为成熟市场经济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要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出路就在于必须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做文章。在不改变公有经济的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逐渐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构造企业法人产权主体与市场主体。这样就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不同所有制之间，不仅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在外部发生联系，而且可以通过投资的企业内部相互融合，从而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与统一。

第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股份制企业特殊的财产组织形式。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概括进一步明确，股份制是各种所有制资本都可以投入的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今后，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的国有独资企业和有规模的私人私营企业都不会很多，各种不同性质的投资者共同投资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是大量的和普遍的企业形式。这就使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不仅在企业外部通过交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且也可以在企业内部取长补短，发挥原国有企业规模大、技术先进、视野开阔、管理规范等优点，又可以取私有经济产权清晰、追求效益、市场竞争观念强等长处，从而使股份制在不同所有制的交融中，充分展示其生命力。

第四，我国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制度的确立。

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各种所有制关系借以实现的最终形式和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直接表现为产品交换，这种交换之所以能够发生，在于产品作为商品是归不同所有者占有的。产品商品的占有关系不同，取决于投资的所有权不同。所以，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实际上是投资者所有权的交换，商品经济的运行就是所有权运行和实现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项投资都应得到相应的利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只讲按劳分配，投资者表面上不参与分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那时主要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要素，由国家在社会总产品中先作了统一的扣除，这种扣除实际上就是一种要素分配形式。余下的个人消费品再按个人的劳动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在



我国现阶段，已经实现了所有制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就要求改革传统的要素分配方式，实行新的分配方式。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对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公平竞争中，真正按贡献获取相应的报偿，同股同酬，一视同仁。至于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各自的贡献大小，该分取多少，只能由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大家公认的统一尺度为标准。这里没有任何特权，只有社会平等和公正。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摸索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

第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于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产权作为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其特征就是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产权的内涵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既包括固定资产又包括流动资产；既有实物资产也有金融资产；既是有形资产也有包括信誉、商标发明专利等在内的无形资产。现代产权制度是指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对产权界定、运营、保护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规定的总称。可见，产权制度既是经济概念，又是法律概念，任何产权制度安排都要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和保护。显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必将有利于维护公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促进产权有效流动，调动企业和公众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产权和信用基础。这一切集中表现为有利于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交融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最丰富、最深刻的内涵。

不断调至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

2000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要把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突破口之一。上海市委、市政府认为，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上海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委总揽全局，抓住机遇，坚持不懈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经济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尽管遇到需求不足的压力，上海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扩大内需的正确决策，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好于去年初预期。至10月底，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9%。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有所好转，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比提高近7个百分点。1~10月外贸出口完成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9%。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1%。居住、教育、通信等服务类消费增势强劲，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投资总量继续保持较高的规模，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上海产业结构经过大调整，形成了二产和三产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产业布局的大调整，正在逐步形成市区体现繁荣繁华、郊区体现实力水平的大城市经济发展格局，促进了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增强。产业组织的大调整，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促进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的建立。

90年代初，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确定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发展方针。多年来，无论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上海都始终不渝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的转变，保持了产业结构调整连续性、稳定性和开拓性。



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31%上升到今年的50%左右。金融、航运、信息服务等产业异军突起，已成长为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近两年，房地产业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居住型消费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1~10月，全市新增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110亿元。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86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0%；房产二级市场也开始活跃，已购公房上市交易和差价换房双双超过一万户。住宅消费不断扩大，也带动了建材、家电、家具等行业的同步发展。

二、积极调整第二产业，不断壮大支柱工业。上海是一个老工业基地，门类齐全，基础雄厚，但“人多、债多、负担重”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及时采取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对上海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上海工业系统认真抓住国家实行的七次降息，兼并破产，提高出口退税，增加技改贴息贷款，债权转股权以及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等政策机遇，正在积蓄起新的竞争优势。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上海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建设工业新高地的重大举措。到今年9月，上海实际直接利用外资累计已达27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近两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上海投资的已达250多家。一批中外合资的大型工业项目相继投产，形成了在汽车、电子通讯、钢铁、石化等领域的新优势。通过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实现了支柱工业的二次创新，推动了支柱产业优化升级和传统产业更新改造。

三、加快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逐步促进产业升级。上海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首先，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去年出台了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十八条”政策，今年又进一步完善，并建立了创业投资公司、技术产权交易所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革，初步形成了适应需求、依托市场的科技创业投资新机制。第二，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快企业技术开发中心的建设。同时，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如上海仪电行业通过强化技术开发，淘汰传统元器件生产，研制开发了IC卡一条龙、智能自动化仪表、绿色照明等一系列新产品。第三，大力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是上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上海理顺了信息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制定实施了《上海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计划纲要》，预计今年通信、现代医药与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到 17.8%，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四、推进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联合，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按照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上海积极与中央单位和兄弟省市联合，避免重复建设，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带动力。在支柱产业领域中，宝钢和上钢实行大联合，优化了产品结构；益昌薄板项目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板坯供应不足的矛盾，实现了扭亏为盈，规模效益迅速显现。上海华谊与中国石化集团所属的上海石化联合开发上海漕泾化学工业区。在信息化建设中，上海与中科院、铁道部、广电总局实现联合，开发建设 IP 宽带试验网；在国家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的支持下，“三网融合”试验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

保持上海经济发展后劲，必须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是提高上海城市综合竞争能力的永恒主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能够突破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瓶颈制约，而且也是保持明年乃至今后若干年上海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明年上海仍然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紧紧围绕结构调整这个主题，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认真实施国有企业扭亏脱困计划。当前我们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率先”的要求，明确了到 2000 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明年主要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控制在 15%。同时，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要求，切实解决好 5 个问题，即国有企业多元化多渠道投融资，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资产运作，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各种要素参与分配，劳动力合理流动，通过市场再就业等。

二、实施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创新并举，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上海要一手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一手抓现有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促进技术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走具有上海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要集中优势资源，加快推进浦东张江科技园区的建设。突出重点产业，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新的增长点。培育创新主体，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机制。鼓励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开发中心。

三、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海一方面要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先



导、支撑、渗透、示范和保障作用。对有利于提高上海综合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对一般竞争性行业，要探索建立国有资本退出和民间资本进入的互动机制，营造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投资环境。凡是市场竞争性强的领域，都应向各种经济主体开放，尽快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主体，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基础设施等产业领域，拓展融资空间，逐步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

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科学概括。一般来讲，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地位，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应当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为使工农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行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对农业反哺期时，如果及时扶持农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就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如果继续忽视农业，就会导致农业萎缩，城乡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以日本、韩国为例，它们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末，当各自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实现了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从我国的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多美元，农业所占比重达70%，农业劳动力占83.5%。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实现工业化，农业必然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

要来源。据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全局来看是必要的。但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而且，还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体制，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那么，现在我国是否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呢？据测算，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约为15：85。这说明，工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根据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工业已经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应该由以农业支持工业转入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样一个新阶段。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仅是由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而且也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关。对于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扶持和保护农业，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安居乐业对于政权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工业才有广阔的市场，城乡关系才能协调，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保障。

正是在深刻分析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在，工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元，财政收入2.6万亿元。从国家财力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

我们这里讲以工促农，不是让工业企业直接支持农业，而主要是指通过适当的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总的来说就是六个字：少取、多予、放活。

首先，要少取。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在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后，党和政府决定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征农业税，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这是实施以工促农的重大举措。免征农业税，将为农民每年减轻900多亿元的税收负



担。广大农民为此欢欣鼓舞，真正感受到支农政策的实惠。

其次，要多予。继续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坚持和强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将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围，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第三，要进一步放活。少取、多予说到底毕竟还是外部条件，解决“三农”问题还是要靠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在全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全面启动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起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着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规模，着眼于保护农民合法利益，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2001年，浙江取消了农民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计划指标，对进城落户人员的待遇享受作了政策规定，建立了全省相对统一的户籍改革政策体系。据统计，近几年来，浙江城镇净迁入人口超过300万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浙江的农民得到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

以城带乡的核心，就是推进城镇化。它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其集中表现就是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这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0.53%，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在70%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期间，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

据专家分析，以 2003 年为起点，若城镇化率年均增加 1 个百分点，2020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57%，城镇总人口 8.28 亿，比 2002 年增加 3.26 亿。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将有 2.89 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其数量之大，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实施以城带乡的战略方针，关键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统筹中心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发展、城市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推进城乡的一体化发展和共同繁荣。

一、要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进城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要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切实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真正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继续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素质。

二、要创造一个农民进得来、留得住的制度环境，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 46.5%，占建筑行业就业人员的 80%。农民工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城市工作了多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收入低，无法实现在城镇买房定居的愿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很难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因此，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公共卫生、文化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以城带乡，目的是要在城乡互动中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即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到 2010 年农村人口仍在 7 亿左右，到 2020 年还会有 5 亿左右。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体制。要进一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加快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同时，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所有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带来的好处，真正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证券市场的建设

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置身事外，正在用行动积极应对环境问题，“绿色”之风已然吹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环保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和方向。这其中建设环保中国需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将稀缺的资源配置到符合科学发展的企业中去，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要让资源配置为环保服务，亟待我们构建环保证券，即“绿色”证券。当前，“绿色”证券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将“绿色”证券理念融入我国证券市场中长期规划。

推进我国“绿色”证券市场建设，首先要将“绿色”证券市场纳入证券市场中长期规划，明确其在我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中的地位，从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而且由于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绿色”证券建设必将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必然会遭遇曲折和反复。将其纳入中长期规划有利于“绿色”证券有计划、有步骤稳步推进。

二、推动“绿色”上市公司建设。

1. 推动上市公司“绿色”治理。在上市公司中要大力提倡“绿色”治理，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增加相应机构与议案，监督企业重视环保与安全生产，减少能源消耗，建立起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提倡从“绿色”产业中挖掘金矿。

2. 引入保荐人问责制度和绿色通道制度，完善环境准入机制。虽然国家环保部和证监会的文件已经规定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再融资时必须提供环保局的核查意见，但是该措施缺乏对企业环境问题的持续监督。而建立保荐人问责机制则有利于进一步严格环境准入机制。对于那些通过环保检查，但在和再融资之后很短的期限内（例如2年）发生严重环保问题的公司，其保荐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另外，环境准入机制不能只做“减法”而不做“加法”。对于那些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突出成效、参与清洁发展机制

和环保产业的公司，可以适当的简化审核程序，为“绿色”公司开辟绿色通道。

3. 界定上市公司环境管理范围和责任，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在制定具体的企业环境披露规定之前，首先要明确上市公司的环境管理范围和责任。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地理情况也不相同，环境方面所产生的问题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当务之急就是要明确上市公司应予以关注的环境问题范围，以及进行企业环境管理的责任划分，这样有利于明确企业应该披露的环境信息范围和详尽程度。目前在我国尚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行为准则。

4. 将环境指标纳入退市标准，完善环境退出机制。将环境指标纳入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之持续的关注自身的环保问题，让其意识到不但上市地位的取得需要一定的环保标准，上市地位的保持更需要企业兢兢业业的做好环境保护工作。防止一旦上市就万事大吉为所欲为的心态和行为。

5. 把创业板建设成为“绿色板块”。创业板地建设要更加突出节能减排，节能减碳的作用，要大力吸收开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等替代能源以及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的公司上市。

三、设立碳交易所。

鉴于温室效应具有全球性，且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间在减排成本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京都议定书》建立了3种灵活减排机制，即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和国际排放贸易。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即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与我国开展项目合作，项目所实现的“核证减排量”可以冲抵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完成的减排承诺。清洁发展机制构建了由我国企业、技术公司和国际买家共同组成的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延伸，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碳交易市场本身又是一个“绿色”市场，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减缓我国日益增长的环境危机。所以，构建“绿色”证券市场离不开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当这一块市场变得越来越大时，我国证券市场才能变得越来越“绿”。纽约——泛欧交易所已设立了碳交易所平台，东京、香港证券交易所也准备开展碳交易。然而，由于我国还没有自己的碳交易所，使得各级政府和企业对清洁发展机制认识不足，缺乏定价话语权，阻碍了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所以，设立碳交易所或者现有交易所开展碳排放权



交易是当务之急，是我国构建“绿色”证券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加快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发展。

社会责任投资是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投资理念，本质在于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效益，投资者不再仅仅关注企业的财务指标，而是更多的融入一些“社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用社会责任投资来保护环境已经成为证券市场发展的新型潮流。2007年美国社会责任投资涉及的资产规模达到了2.71万亿美元，在基金资产总规模中所占比例超过1/10。而在这些社会责任投资契约中几乎都关注企业的环境保护状况。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发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相关的社会责任投资产品。目前仅有1支社会责任投资基金，而且其对环境关注程度也比较弱。因此，当前应该通过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提高、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的开发与完善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大力发展我国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强化环境保护在投资契约中的分量，从而引导投资者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环境保护好的企业。这不仅可以推动企业加强环境保护建设，同时也是构建我国“绿色”证券的重要途径。

五、推动“绿色”券商建设。

券商是我国证券市场重要的参与主体，发展“绿色”证券市场离不开“绿色”券商建设。建设“绿色”券商，首先要求券商加大对“绿色”上市资源的培育力度。积极挖掘那些低污染、低能耗的环保企业；对那些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券商要通过持续有效的辅导使企业逐步认识环保的重要性，帮助企业加强环保措施，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其次，券商在进行自营和直投业务时应将企业的环境问题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加大对环境保护状况良好企业的投资比例。

六、广泛开展环保心灵建设。

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冷漠的心灵造成的，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环境危机是对道德的叩问，对灵魂的考验”。所以要改善环境，推进“绿色”证券发展必须对各证券市场参与主体进行广泛的心灵教育。

在证券从业人员和上市公司高管环境教育方面，可以将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纳入其资格考试和水平考试内容之中；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召开类似“气候变化与证券市场发展”等大型的

研讨会，举办“绿色”证券主题年活动，将环境保护纳入证券从业人员和上市公司高管的培训体系。

各证券期货行业协会要积极开展“绿色证券人”的活动，扶持“绿色”证券从业人员的壮大，制定相应公约，号召作为高知识群体的证券从业人员要采取健康永续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决策时，更多考虑对人的健康与环境责任，为全体公民做出表率。

在投资者环境教育方面，除证券业协会、沪深证券交易所积极开展活动外，投资者保护基金、券商和基金公司也应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应加大对投资者教育的投入，支持各项投资者环境教育活动；券商和基金公司也应通过宣传材料、专题讲座、网站、短信等多种形式开展环境教育，培养投资者社会责任投资理念。

中国股市从10年前的100点起步，到2000年7月19日，实现了2000年2000点的历史性跨越，股市价格的涨幅名列全球之首。2000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8.2%，再次名列世界经济增长前列。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5972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增收9971.8亿元，是1993年税制改革以来增收最多、增幅最大、进度最快的一年。其中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突出，增收额320亿元，约占总增收额的32.1%。而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267.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7%，增收15.965亿元。这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促进了股市的繁荣。而证券市场的繁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凸现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从“老八股”的成长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证券市场在上海悄然萌芽。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始交易，12月29日并正式开业，挂牌交易的仅有八支股票，人称“老八股”，而深市只有六家上市公司挂牌。沪市八家公司的股本规模小得可怜，也不具有行业 and 产业的代表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联度十分微弱，有的干脆就是“街道企业”，或是名不见经传的“试点”公司。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国证券市场是在一片“姓资姓社”的争论中磕磕碰碰地成长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束缚，我国证券市场才进入了加快发展的初创阶段。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股价波动限制的取消，是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如果说1992年5月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属于试验阶段的“小打小闹”的话，那么其后的飞速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引起国人的重视。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999年《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股市的健康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筹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资源配置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提升。

截止到1999年底，沪市的八家公司总股本已达59 295 016万股，是上市之初的1 669倍。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八家公司借助证券市场的筹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获得了持续发展能力。中国证券市场十年的发展变化，在“老八股”成长变化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从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历程看1992年以前，以试点方式运作的中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运作要求也只能是一种试点探索。虽然有从境外成熟市场引进吸收的一部分规范制度，但沪深两市14家大部分是由集体、联营、行政性企业改制过来的上市公司，其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自身的认知和自律。

1992年起，随着上市公司的批量上市，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间的纽带关系趋向紧密，加之运作要求更高的B股公司的诞生，上市公司已初步意识到“股东老板”的权益所在。5月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为招股改制后股份制企业的运作作了较详细的规定。1993年5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出台；6月，第一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发布。

与此相应，以各地“证管办”建立为标志的监管体系初具雏形。从1996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建设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期间，在“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的指引下，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股东大会制度、公司检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改制辅导制度、市场禁入制度及中介组织行为规范等相继建成并得到完备。证券交易所初步完善了对上市公司的一线监管体系，管理层同时也加大了对公司不规范行为的处罚力度。通过“规范年”和“风险防范年”的教育，推崇基本面业绩成为市场投资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达6年的不断修订，1999年7月，《证券法》终于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迈上新台阶的标志，是证券市场10年发展的里程碑。我国股市由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良性发展轨道。2000年7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旨在规范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行为，支持其通过重组提高资产质量的新政策，使重大资产重组有章可循；8月，又发布《法人配售发行方式指引》，给法人配售新股定规立矩。我国的上市公司目前正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谋求更大的发展与创新。

从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内部机制变化上看中国的上市公司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在自身规范发展道路上执著地向前走。2000年7月6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已经超越千家。我国证券市场站在了新的高度，具备了向更远目标迈进的基础。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将载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册。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时的14家，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家，跃居世界前十名，上市股票1086支，开户投资者超过5000万户。网上交易量已占交易总量的1%。目前，在全国84家证券公司中，已有10家证券公司的资金超过15亿元。沪深股票市值增加为四万多亿元，日成交量最高达900多亿元。2000年上半年，沪深两市A股成交总金额就突破了34700亿元，这比1999年全年的成交额还多一成。除台湾省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能见到挺进沪深的上市公司的身影，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几乎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这些变化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全面转型期已经到来。在这个转型期内，在政策态度上表现为坚决支持股市发展；在管理思路上，将更多依靠市场管理市场；在发展环境上，表现为坚持发展不断开放；在投资者结构上，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比例越来越大，从而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培育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群体；在证券市场的地位上，表现为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各项指标全面提升，并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国股票市场尚未成熟，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股票市场处于一种被分割的状态。目前我国上市的股份按投资主体的不同分为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内部职工股、外资股（B股）等五种股权，只有占总股本30%左右的社会公众股和B股可以上市流通，70%左右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没有上市交易，股市变成了单纯筹资的工具；我国的股票又分为A股、B股以及在海外发行上市的H股、N股等，不同类型的股票在不同的、互相封闭的市场上流通。一个公司可以同时有A股、B股或H股，但一个公司不能同时将全部募集股份在一个市场上上市。另外，一个公司不能同时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上市，造成市场之间具有有很强的排斥性。

第二，上市公司质量不高，规模不大。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是当前我国股市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差，亏损家数不断增多，净资产收益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每股收益不断降低，审计报告中出具保留意见的公司也不断增多。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并非由发行股票和上市本身造成，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股份制改造没有真正从产权关系、责权



利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进行改造，这跟上市公司基本上沿袭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有关。

第三，中国证券市场非理性，不成熟，投机气氛浓。股票 ST、PT 等本来是警告信号，然而这些股票价格却节节攀升，这说明市场惩罚在当前的中国证券市场上作用不是很大。股市过度投机的原因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比例仍然很小、发行机制不合理、股息红利不按规矩分配等助长股市的投机行为。

第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难如人意。如迟来的公告，含糊其辞的内容，自相矛盾的事情接二连三，甚至把内容大相径庭的草稿当成定期报告正文发了出来。规定“至少应披露以下内容”的多个“至少”是上市公司应该披露的底线，但仍有一些公司远离这个最低要求。

第五，证券市场监管机制尚不健全。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交响乐章中，人们也不时听到一些极不和谐的音符，面对一些“掺水产品”，中小投资者投资利益得不到保障。此外，政府行为与市场相对立。在对违法违规券商及上市公司的处理过程中，各种政府行为层出不穷，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集团保护主义盛行。政府的尴尬在于：一方面政府既是市场的监管者，又是市场的经营者。我国不少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政府控制董事会，干涉公司经营、给予差别性的补贴和优惠政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规则，但同时政府又必须保障市场规则的实行。另一方面政府缺乏对其法人代理的有效监控机制，当代理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代理人往往倾向自身，损害政府及其他投东的利益，而且可以长期不露，直至无法收拾。

第六，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时受到侵害。维护投资者权益离不开管理层的大力监管，离不开公司的自律，也离不开投资者股东意识的自觉提高。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虽然大大减少，但透支买卖，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客户股票违规行为并没有完全消除。大股东把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把上市公司“掏空”；这种状况持续下其后果不堪设想。受害最深的除了上市公司之外就是广大中小股东。进一步发挥证券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据英国《经济学家》刊载，截至 2000 年底，主要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总数已由 1990 年的 8 920 家上升为 26 314 家，市价总值达 307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股市的 85%。中国内地市场的上市公司数在印度和埃及之后，名列第三，其股价指数上涨了近 50%。但是，要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大好形势得到持续发展，还必须制定相应对策，使证券市场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西电东送工程

曾经的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的电力负荷还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广东，到2000年，不少城市还饱受拉闸限电之苦，企业“停三开四”现象普遍存在。而相比之下，西部丰富的能源资源又有劲使不上。不说大量的水能资源没有开发，就是已开发的，也无法有效利用。许多大中型水电站一到丰水期，电只好往水里放（弃水），看着真让人心疼。如今，西电东送这一伟大工程，将改变东西部能源与经济不平衡的状况。

这一伟大工程是史无前例的。在西部开发三大标志性工程中，西电东送工程投资最大，工程量最大。在我国电力建设史上，如此大规模的电源、电网建设也从未有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无论是青藏铁路还是西气东输，在地图上都可以用一条线表示，而西电东送在中国版图上可谓“遍地开花”，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有西电东送工程。据负责西电东送项目具体实施的国家电力公司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到2010年，西电东送项目的总投资在5 265亿以上，还不包括三峡电站。

西电东送同时开工的工程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单个工程的规模之大也是罕见的。按规划，仅“十五”期间，西电东送电源项目开工总规模就约有5 800万千瓦，约占我国目前总装机容量的17%。目前已开工的工程达1 800万千瓦，这其中不少工程是“世纪级”和“世界级”的，比如广西红水河上的龙滩水电站、云南澜沧江上的小湾水电站、糯扎渡水电站总装机都超过400万千瓦，而20世纪我国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二滩电站才330万千瓦。

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对施工建设者，工程难在施工条件艰苦。而对工程组织者，工程难在整体的组织协调。据国家电力公司有关人士介绍，电力工程建设本身比较艰苦，如水电站都是在人烟稀少甚至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里施工，建设队伍一干就是10年；而线路建设则要翻山越岭、跨江越河地流动作业。加上西电东送工程的工期一般都很紧，因此对于施工者是艰巨的考验。



每项大的电力工程都要涉及到征地、拆迁、移民、环保等方方面面。过去一项工程也就涉及一个地区，而现在几十项工程同时铺开，涉及到东部、西部、南方、北方。一些特大工程本身就涉及到多个地区，如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就涉及到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四川、重庆八省两市。点多面广、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实施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的确在考验着工程组织者的统一指挥、协调、调度能力。

令人欣慰的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电力部门和有关省市通力合作，广大建设者奋力拼搏，目前，西电东送工程无论施工还是总体组织都进展顺利。其中，标志性的电源建设工程如广西龙滩、云南小湾、贵州洪家渡等水电站工程都已经开工。三大通道工程中，中部通道川电东送路段已经全部建成并顺利投产。三峡输变电工程也完成了40%；南部通道天广（天生桥到广州）三回线也已经建成并顺利投产。南部通道的贵广（贵州到广州）线以及北部通道也将于近期全面启动。

电网建设也是西电东送工程中的重头戏。顾名思义，西电东送重点在“送”，要送就要有通道。据国家电力公司电网部介绍，西电东送的送出工程分为北、中、南三大通道。北部通道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北两大地区。北部通道的主要任务是将“三西”（即内蒙古西部、山西、陕西）的煤电基地和黄河上游的公伯峡、拉西瓦等水电站的电力送往京津唐负荷中心。中部通道沿长江而下，把长江流域数千万千瓦的电力送往华中、华东和福建、广东。南部通道的规划思路是：以开发云南、贵州、广西的水电为主，以开发贵州等地火电为补充，向广东等东部用电负荷中心送电。“十五”期间，三大通道将新建500千伏交直流线路2.8万公里，500千伏交流变电容量4000万千伏安，直流输电容量2000万千瓦。

与其他西部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相比，西电东送工程的最大特点是，它不仅仅是西部的工程，也是东部的工程，充分地体现了党中央提出的“东西部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

我们先看西部。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孕育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其中水能资源蕴藏量更加丰富。西部12省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约5.57亿千瓦，占全国的82%，可开发水能资源约2.909亿千瓦，占全国的76.85%。目前开发程度还不到11.4%，低于全国平均水电开发程度（20.96%）、低于世界水能资源的平均开发程度（22%），更低于水电开发程度较高的国家50%以

上的开发水平。西部已探明煤炭资源保有量为 3 882 亿吨，约占全国的 39%，但用于发电的比例较低，煤炭输出仍是主要方式。西部地区如此优越的能源优势发挥不出来，既有资金问题，也有市场问题。由于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不足，自身的电力市场有限，因此即便建了电厂，消纳电量也成问题。

我们再看东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比，资源相当匮乏。以广东省为例，广东一个省区的经济总量约相当于广西、云南、贵州三省总和的 1.9 倍。而广东能源资源总量在四省区中只占 3.5%。一次性能源 90% 以上要靠外省市输入。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广东经济快速发展，能源紧张矛盾凸显，电力缺口达 1/3。2000 年，广东省曾对 20 个城市实行限电，为此，一年损失工业产值近 200 亿元。为了缓解能源紧张矛盾，东部地区不得已办起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火电厂。比如广东，1999 年，水电（含抽水蓄能）、火电、核能发电量各占 9.8%、77.8% 和 12.4%，以燃煤、燃油火电为主的电源结构已经给广东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据专家测算，广东每年因二氧化碳和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近 40 亿元，其中人群健康经济损失近 7 亿元，农业林业经济损失达 20 亿元，对广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一边是守着优越条件“望水兴叹”、“望煤兴叹”，一边是为缺电发愁，在环保与发展的两难中痛苦抉择。实施“西电东送”，用西部的优质电能取代东部效率低、污染严重的电能，无疑可以一举两得，是既符合西部利益也符合东部利益的双赢战略。理论上如此，事实也是如此。虽然西电东送还只在实施阶段，但是为西部和东部带来的好处已经显而易见。

比如，电站建设对西部经济的直接带动作用已经显现。记者在龙滩水电站所在地广西天峨县采访，发现这个边远的小县城已经显现出活力，商业繁荣了，新建筑多了，道路拓宽了。当地人介绍，随着电站开工，建设大军进入，县城每天的生猪、蔬菜需求量就翻了一番。因此，单向几万建设大军提供生活服务和大量的劳务输出足可以让天峨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大截。

专家的测算印证了笔者的直观感受。据专家测算，龙滩电站建设期内每投资 100 元，广西经济就获得 132 元的增量。按龙滩工程总投资 243 亿元计算，相当于每个广西人增加了近 700 元的国内生产总值。2011 年，龙滩全部机组投运后，对广西当年全区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为 8.3%，专家还预计，龙滩水电站建设期间可提供直接就业机会 5.8 万个，这还不包括相当数量的从属就业机会。



和西部一样，东部地区同样在西电东送中见到了好处。比如广东，现在每年已经从西部获得了约为 115 亿千瓦时的电量，大大缓解了电力紧张局面。

再如北京市民，实际上也已经从西电东送中受益。北京的用电量一直在增加，2001 年 7 月 17 日，北京市电力负荷曾骤升至 700 万千瓦，比上年最高负荷还高出 24 万千瓦。但是，用电量增加的同时，北京为了治理环境，拆停了不少老发电机组，发电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没有西电东送，没有从内蒙古、山西送来的电，很难想象北京如何解决电力需求增长和保护环境的矛盾。

实施“西电东送”是我国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措施。根据有关部门规划，“西电东送”将形成三大通道。一、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桂、滇、黔三省区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以及黔、滇两省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开发出来送往广东，形成“西电东送”南部通道；二、将三峡和金沙江干支流水电送往华东地区，形成中部“西电东送”通道；三、将黄河上游水电和山西、内蒙古坑口火电送往京津唐地区，形成北部“西电东送”通道。

人们已经形成共识：西电东送工程是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变西部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满足东部地区电力需求，促进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2000 年贵州、云南的第一批西电东送电力项目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这一重大工程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和骨干工程，由南、中、北 3 大通道构成，2001 年至 2010 年预计总投资 5 300 亿元以上（不包括三峡电站）。南通道指开发西南地区水电和云南、贵州的火电，相应建设输电工程联合向广东送电。中通道指以三峡电力送出为龙头，将输电网络向西延伸至长江上游地区，实现川渝和华中地区共同向华东、广东送电。北通道指在山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向京津唐地区送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黄河上游水电和“三西”地区火电向华北、山东地区送电。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西电东送工程实施以来，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既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又将西部地区拥有的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同时也带动并提升了当地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农业，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西电东送工程向东部地区输送了经济、高效、清洁的电力，不仅满足了东部地区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而且平抑了东部省份过高的电价，还可以减轻东部发电地区日益严重的环保压力，从而为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西电东送工程有利于江河治理和水资源合理利用。建一个大型水电站，不仅具有发电效益，而且还有防洪、供水、灌溉、航运等综合效益，有助于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西电东送工程配套建设了一批大型水电站和高效火电机组，实现了全国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优化，特别是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我国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和生态环境改善，同时也拉动了电力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使我国电力技术装备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实现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2009年底，西电东送的配套电源中，水电规模2018万千瓦，占全国水电装机规模的10.3%；火电规模为4980万千瓦，其中绝大部分为单机60万千瓦高效发电机组，对改善电力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西电东送的水电电能也相应提高了受端地区电力消费中清洁电能的比重。

西电东送工程也使得电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优化配置。南方5省区也曾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缺电时期，电力缺口最大达940万千瓦，占到全国的1/4。2004年~2007年，是我国南方地区最为缺电的时期，就在这几年时间里，西电东送能力增长了1.3倍，西电东送电量年均增长34%。广东是一个经济大省和用能大省。10年来，西电输送到广东的年电量由73.6亿千瓦时增长到1044.1亿千瓦时，占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由5.5%提高到28.9%。这几年迎峰度夏期间，广东每天的统调电量里有1/3来自西电。

据了解，西电东送的重点在于输送水电。同时，按照经济性原则适度输送燃煤火电，其装机规模将根据输送电能及市场的需要科学确定。下一步，将继续加大西电东送力度，建设好西电东送3大通道，2010年送电规模将超过8400万千瓦。

具体而言，南通道是重点开发广西红水河、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中下游和上游、云南金沙江中游等流域梯级水电站，配套开工建设贵州和云南大型坑口火电厂，研究广东与福建电网联网、贵州与川渝电网联网的可行性，2010年送电规模达到2570万千瓦；中通道是重点建设好三峡水电站，建设金沙江和四川大型水电站，加大向华东、华中和南方送电规模，2010年送



电规模增加到 2 690 万千瓦；北通道是继续加大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向京津冀电网送电规模，积极推进陕北火电向华北（山东）送电，进一步推进西北黄河上游水电与火电联合向山东送电工程，2010 年送电规模达到 3 170 万千瓦。

西电东送，来自于泱泱大国齐振东西双翼的伟大构想，决定于电力工业的基本经济规律。我国东部地区工农业发达，但能源缺乏，而西部地区水电资源丰富，火电前景广阔。

西电东送，可以促进我国统一开放、健康有序的电力市场的形成，为电力体制改革奠定物质基础；还可以显著提高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

据有关专家介绍，西电东送将获得四个直接的效益。一、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通过企业行为来减少国家负担；二、增加当地的税收，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三、实现全国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电力结构；四、促进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减少下游的洪涝灾害损失。

专家预计说，整个“西电东送”工程在西部投入的资金将达到数千亿元，大量水电站、火电站建设需要的钢材、木材、水泥，就能带动西部三大材的工业，这是其一；其二，在西部地区大量新建电站，还能够有效地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具有市场前景的高能耗产业，如冶金、采矿、化工等产业发展，将西部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

南水北调工程

“水资源”之说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并不把水认为是一种资源，而且很有限。千百年以来，我们总以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殊不知水是地球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占地球总水量只有1%的淡水一旦耗尽，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中国政府率先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战略目标加以实施。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思路已经在中国经济发展、人口控制、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逐步得到体现和深化。与此同时，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思路也逐步完善。

应该说，中国有几千年的治水历史，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始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孙叔敖修建芍陂、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水利建设的举世瞩目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从1949年至今全国共修建加固了27万公里的江河堤防，建成了85万座水库，形成了5800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1949年的供水能力仅为1030亿立方米），治理了86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中国以只占全球6%的水资源、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全球22%的人口的温饱和发展问题。仅此而言，中国水利功不可没。

然而，我们毕竟先天不足，我们毕竟人口太多，解决中国水问题依然任重道远。水少、水脏、水土流失、水质污染，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虽然中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124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5.8%左右，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六位。但中国是世界上第1人口大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2163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银行1998年统计的153个国家中只居第88位。



另外,我国水资源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空间分布很不平衡。河川径流主要来自降水,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降水的是来自西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孟加拉湾的西南季风。东南沿海山丘区,台湾,海南东部山区年降水量超过2 000毫米,西南部分地区、平原地区约1 600~1 800毫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部分超过1 000毫米,淮河流域为800~1 000毫米,华北平原下降为500~600毫米,大西北沙漠区,降水量不足25毫米。目前,中国有18个省份低于这个标准,其中有10个省份低于联合国审议的维持生存的最低保障线,即人均低于500立方米,这也是国际上严重缺水的警戒线。

黄河是中国西北、华北地区的重要水源,全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452毫米,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580亿立方米,可开采的地下水资源量110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占全国的2.5%,2000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633立方米。淮河流域(包括胶东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854毫米,水资源总量为961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3.4%,2000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478立方米。其中胶东地区2000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330立方米,水资源开发程度已高达86%,遇大旱年份,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海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539毫米,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372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3%。2000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92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7,比全国人均年用水量还低138立方米,缺水十分严重。

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干流全长6 300余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约9 600亿立方米,特枯年有7 600亿立方米。据1956~1980年资料分析测算,长江入海水量只占天然径流量的94%以上。即实际消耗水量不到6%。尽管流域内工业及生活用水量较大且增长较快,但大多可以回归。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考虑,长江流域能够调出部分水资源,支撑北方干旱缺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此外,从地势上看,长江正好自西向东流经大半中国,上游靠近西北干旱地区,中下游与最缺水的华北平原相邻。地理条件也非常有利于兴建从长江引水到北方的跨流域调水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各方面专家对南水北调进行了近50年的勘察、调研和可行性研究,并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决策,可以说,南水北调工程,凝聚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2003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南水北调这一跨世纪的构想从此开始变为现实。

在21世纪,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

素。要使我国有限的水资源，通过合理开发、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优化配置，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南水北调工程与20世纪中国的北煤南运、21世纪初正在进行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工程一样，都是一种资源配置工作，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资源利用和资源在国土上的分布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就必须对资源进行相应的优化配置。从这个道理上讲，南水北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南水北调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远距离、跨流域、跨省市调水工程，它的建设如同万里长城、京杭运河一样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伟大工程，它将成为人类充分利用地理、地形特点优化配置国土资源的又一个伟大范例。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布局被设计为三条调水线路，即西线工程、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发展需要。通过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的联系，逐步构成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中国大水网。这样的总体布局，有利于实现我国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合理配置格局，对协调北方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个总体布局也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大陆三个地势上的梯级。西线位于最高一级青藏高原，地形上能控制整个西北和华北，但由于长江上游的水量有限，仅能为黄河上中游的西北地区补水。中线工程从第三个梯级西部通过，从长江中游及其支流汉江引水，可自流供水给黄淮海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东线工程位于第三个阶梯东部，由于地势低需抽水北送。

东线工程是在现有的江苏省江水北调工程、京杭运河工程、淮河现有工程和其他相关工程基础上建设的，包括输水系统和蓄水工程。输水工程主要包括输水河道工程、泵站工程、穿黄工程。有两个引水口，分别是淮河入长江的三江营和京杭运河入长江的高港。从长江到天津输水河道总长1 156公里。黄河地势最高，引水口处比黄河地面处低36~37米，从长江引水到黄河南岸需建设13级泵站，总扬程65米。穿过黄河将自流到天津。东线泵站特性是低扬程（2~6米），大流量（每台15~40立方米/秒），长运行时间（5 000小时/年）。目前，沿线水质污染严重，尤其是南四湖和东平湖周边地区污染特别严重，处理难度较大，这是实施东线工程的难点。

为确保东线工程全线输水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使长



江水保质、安全地输送至天津，南水北调将实施节水为本，治污为先，配套截污导流、污水资源化和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形成“治理、截污、导流、回用、整治”一体化的治污工程体系。东线治污工程安排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截污导流工程、工业结构调整工程、工业综合治理工程及流域综合整治工程等项。为保证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质安全及运行安全，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组织编制《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并将纳入中线总体方案一并实施。

中线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可基本自流输水，工程投资较大；水源水质好，规划输水干线与现有河道全部立交，水质易于保护；输水渠线所处位置地势较高，可解决京、津、冀、豫四省（直辖市）京广铁路沿线的城市供水问题，还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中线工程将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水源区工程和输水系统。水源区工程为丹江口大坝续建和汉江中、下游补偿工程。后者包括从汉江输水主干渠和天津干渠。供水范围主要包括唐白河平原和黄淮海平原的中西部，供水区总面积约 15.5 万平方米，因为汉江引水量有限，不能满足规划供水区的需水量要求，只能提供京、津、冀、豫、鄂五省市的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部分地区的农业及其他用水。为避免对汉江中下游的工业、农业及航运用水可能的不利影响，需兴建汉江兴隆枢纽、引江济汉工程，改扩建沿岸部分引水闸站，整治局部航道等四项工程，以保证调出区工农业发展、航运及环境用水。

为避免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可能造成的影响，南水北调将兴建兴隆水利枢纽、引江济汉、改建部分闸站、整治局部航道等 4 项汉江中下游治理工程。此外，通过丹江口水库的运行调度，控制下泄流量将沿江两岸的供水保证率将较调水前有所提高。采取这些措施后可基本消除中线工程调水对汉江中下游的不利影响。

西线工程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河，是解决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干旱缺水的战略性工程。近十年，集中研究从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三条河的引水方案，据初步研究结果，从这三条河最大的引水量约 170 亿立方米，其中包括通天河 80 亿立方米，雅砻江、大渡河干流 50 亿立方米，雅砻江、大渡河支流 40 亿立方米，供水范围为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六省市。黄河与长江之间有巴颜喀拉山相隔，黄河河床高于长江相应河床 80 ~ 450 米。调水工程需筑高坝壅水或水泵提水，并开挖长隧洞穿过巴颜喀拉山。引水方式考虑自流和提水两种。无论采取哪种引水方式，都要修建

高 200 米左右的高坝和开挖 100 公里以上的长隧洞。该工程引水的水源点多，调水区的水质好，但因处长江上游，水量相对有限。西线工程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属高寒缺氧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交通不便，且处于褶皱强烈、活动断裂较为发育的强地震带，地质条件较为复杂，工程技术难点相对较多，工程投资大。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西线工程不仅仅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而且还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生态环境工程。调水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集中在调水区，有利影响集中在于旱缺水的受水区。西线工程三条调水线路从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多年平均年调水总量为 170 亿立方米，将使引水枢纽下游局部河段径流量明显减少。但在坝下游距引水枢纽 4~10 公里距离内一般都有支流汇入，河川径流又明显增加。根据对当地所做的实地调查研究，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原因，维系地表植被、生物种群等生态系统的水分主要靠天然降水补给。因此，径流量及水位的变化不会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07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北石家庄到北京的“京石段”应急工程完成后，可调沿途河北省岗南、黄壁庄、西大洋、王快四座大型水库的水供北京使用，年调水 3~5 亿立方米。

2008 年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往南修到黄河，应急时可调黄河水供北京使用。

2010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线建成，实现引长江水进京的目标。

保护生态环境是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目标。针对东线工程的输水水质安全、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影响、西线工程对调水区生态环境影响以及南水北调工程对长江口盐水入侵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总的结论是：对受水区和输水区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是主要的，通过工程的建设可以促进受水区和输水区的环境治理和改善，为修复受水区生态环境创造条件；对调水区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可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予以缓解或消除，不存在制约兴建南水北调工程的环境因素。

南水北调工程是优化我国水资源时空配置的重大举措，是解决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的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和整个国土整治的关键性工程，对解决我国北方地区一系列因水资源短缺而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我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个方面专家的反复论证，南水



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已经完成。“十五”计划明确提出：“加紧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

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开始向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与前面的两步战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要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地区协调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明显改善。

我国虽然已基本实现小康的目标，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在日渐突出，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表现在城乡和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还在逐步扩大。我国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中、西三大地域之间，造成这种发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华北和西北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特别是水资源短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解决华北和西北地区缺水问题，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保障该地区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基本要求，必将有助于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鉴于我国南北之间的差异也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尽快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也将有助于控制这种差异的扩大。同时，现代化还意味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意味着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华北和西北地区水资源的短缺，不仅严重制约了这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引发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事实表明，只有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才有可能为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使该地区满足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要求。当今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92 年世界环境首脑会议指出：“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发展途径，我们能够帮助那些需要改善生活的人们，我们能够更好地管理和保护生态系统，并为我们全体带来更为繁荣的未来。”这正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宏观意义之所在。

总之，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可改善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条件，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地区长期资源性缺水的矛盾，对于控制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气东输工程

“西气东输”，是我国距离最长、口径最大的输气管道。全线采用自动化控制，供气范围覆盖中原、华东、长江三角洲地区。工程西起新疆塔里木轮南油气田，向东经过库尔勒、吐鲁番、鄯善、哈密、柳园、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定西、西安、洛阳、信阳、合肥、南京、常州等大中城市。东西横贯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9个省区，全长4 200千米。它西起塔里木盆地的轮南，起点是塔北油田，东至上海。

21世纪伊始，西气东输一线贯穿东西，把浩瀚沙漠与东海之滨紧紧连接在一起。6年来，这条4 000多公里长的“能源动脉”不仅让西部资源与东部市场实现了对接，使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悄然转变，更令3亿多人口使用清洁能源的梦想成为现实。

秋天的秦淮河畔，桨声灯影，碧波荡漾，一幅金陵古都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南京市民陆先生对天然气带来的实惠连连称赞：“南京的空气和环境明显好了，我们家用上管道天然气以后一年还能节省900元呢！”南京港华燃气公司副总经理李胜华介绍，2006年以来，南京市51万管道煤气用户全部置换成天然气，超过一半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改造为燃气驱动，2008年南京市荣获了联合国人居署特别荣誉奖。

截至2010年9月，西气东输工程累计向南京市居民和企业供气77亿立方米，相当于代替了963万吨煤，减少50万吨有害物质排放。据中石油统计，西气东输工程建成以来累计替代标准煤达8 000万吨，减少有害物质排放360万吨，许多东中部城市再现了蓝天碧水。

西气东输这个能源“引擎”将东中部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到新的高度。国内第二大聚酯生产商——扬州仪征化纤公司经营计划部负责人说，用上西气东输工程的天然气后，企业每年可节约成本近亿元，此外还减少排放二氧化硫1 440吨、氮氧化物600吨。



6 年以来,江苏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每年以约 6 亿立方米天然气为原料,打造出年产值近 200 亿元的石化企业。目前,南京市石化行业的直接从业者超过 10 万人,间接从业者约 30 万人。

我国西部地区的塔里木、柴达木、陕甘宁和四川盆地蕴藏着 26 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约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的 87%。特别是新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有 8 万多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资源总量的 22%。塔里木北部的库车地区的天然气资源量有 2 万多亿立方米,是塔里木盆地中天然气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具有形成世界级大气区的开发潜力。塔里木盆地天然气的发现,使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之后的天然气大国。2000 年 2 月国务院第一次会议批准启动“西气东输”工程,这是仅次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又一重大投资项目,是拉开西部大开发序幕的标志性建设工程。规划中的“西气东输”管道工程,采取干支结合、配套建设方式进行,管道输气规模设计为每年 120 亿立方米。项目第一期投资预测为 1 200 亿元,上游气田开发、主干管道铺设和城市管网总投资超过 3 000 亿元。工程在 2000~2001 年内先后动工,将于 2007 年全部建成。是中国目前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投资最多、输气量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实施西气东输工程,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改善长江三角洲及管道沿线地区人民生活质量,有效治理大气污染。这一项目的实施,为西部大开发、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创造了条件,对推动和加快新疆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工业发展迅速,但结构很不合理,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均高达 72%。大量燃煤使大气环境不断恶化,发展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已迫在眉睫。中国西部地区的塔里木、柴达木、陕甘宁和四川盆地蕴藏着 26 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约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的 87%。特别是新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有 8 万多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资源总量的 22%。塔里木北部的库车地区的天然气资源量有 2 万多亿立方米,是塔里木盆地中天然气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具有形成世界级大气区的开发潜力。塔里木盆地天然气的发现,使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之后的天然气大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石油勘探工作者在盆地西部的新月型天然气聚集带上,相继探明了克拉 2、和田河、牙哈、羊塔克、英买 7、玉东 2、吉拉克、吐孜洛克、雅克拉、塔中 6、柯

克亚等 21 个大中小气田，发现依南 2、大北 1、迪那 1 等含油气构造，截至 2005 年底，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6 800.45 亿立方米，可采储量 4729.79 亿立方米。长庆气区是西气东输气源接替区，天然气资源量 10.7 万亿立方米。西气东输气田勘探开发投资的全部、管道投资的 67% 都在中西部地区，工程的实施将有力地促进新疆等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沿线 10 个省市区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高。西气东输能够拉动机械、电力、化工、冶金、建材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西气东输工程从 1998 年开始酝酿。2000 年 2 月 14 日，朱镕基同志亲自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听取国家计委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气东输工程资源、市场及技术、经济可行性等论证汇报。会议明确，启动西气东输工程是把新疆天然气资源变成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经济优势的大好事，也是促进沿线 10 省市区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举措。2000 年 3 月 25 日，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西气东输工程工作会议。会议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任领导小组组长。2000 年 8 月 23 日，国务院召开第 76 次总理办公会，批准西气东输工程项目立项。西气东输工程成为拉开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2002 年 7 月 4 日，西气东输工程试验段正式开工建设。2003 年 10 月 1 日，靖边至上海段试运投产成功，2004 年 1 月 1 日正式向上海供气，2004 年 10 月 1 日全线建成投产，2004 年 12 月 30 日实现全线商业运营。西气东输管道工程起于新疆轮南，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以及浙江 10 省（区、市）66 个县，全长约 4 000 公里。穿越戈壁、荒漠、高原、山区、平原、水网等各种地形地貌和多种气候环境，施工难度世界少有。

西气东输工程在设计、施工过程中，始终把安全选择不同壁厚的管道问题作为第一要素来考虑的。根据工程管道沿线的自然环境条件及管道可靠性要求，在管道防腐上，采用外防腐涂层加强制电流阴极保护的联合保护方式，管道外防腐层采用三层 PE 防腐，全线共设阴极保护站 42 座。通过对各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进行了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及综合评估。划分出危险性等级，确定主要地质灾害类型和危险程度，对土地的适宜性做出评估，并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对策和措施的建议；对管道沿线主要断裂活动性评价，初步设计中对通过高烈度地区的管道进行了管道抗震验算，站场工程设计按



照所在区域的地震烈度进行设防；初步设计对与管道相交 8 条活动断层进行了抗震设计。与此同时，按照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分别采用不同的设计系数，确保通过不同地区的管道及环境安全。对管道通过的复杂困难地段，局部提高管道的设计安全系数，以保证特殊地段的管道安全。

西气东输管道施工作业带宽度为 28 米（平原）和 18 米（山区）两种；管沟断面一般为梯形，开挖的上口宽度不超过 5 米，管沟深度一般不超过 2.5 米。为保证通过大型河流、山地等地段的管道安全，分别采用了跨越、隧道穿越、顶管穿越等通过方式；针对管道通过的不同地区，采取适宜的管道防护措施，比如在新疆、甘肃的荒漠戈壁地带，以防风固沙为主，在豫皖平原及江南水网地带，以管道稳定为主等等。

西气东输管线在建设过程中，十分注重对沿线的环境保护。西气东输管道工程沿线生态环境复杂多变，我们开展了“长输管道沿线区域生态环境安全保障、恢复和构件研究”的课题，系统分析了管道建设与沿途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要求，并绘制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具体技术图表。在管道施工建设中，建立并完善工程建设各方的 QHSE 管理体系，从而作到管道建设与质量、健康、安全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减少施工作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杜绝工作中任何环境污染事故，各种污染物达到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后排放。例如在对管道途经的陕西钟山石窟的文物保护中，做到了尽量减少放炮开挖管沟，控制爆破药量，并进行必要的试爆，特殊情况下，可以人工开凿管沟满足对文物保护的要求；在管道通过的林木茂盛的大尖山顶部林区时，设计上不惜采取隧道施工、局部增加管道工程投资，以避免对林木的破坏；在对管道沿线通过的黄土峁峁等特殊地点，进行针对性的专项设计，采用了灰土回填加宽峁峁，修建截排水沟、植被等工程和水保措施；在设计、施工中考虑了隧道施工产生的弃渣的集中堆放和保护；采用导流排水、填堵、深埋、阻水墙等适宜的工程施工措施保证管道安全，减轻水土流失等等措施。这些看似细小的做法，其实，无形中已经对环境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同时也为管道安全创造了条件。

谈到管道安全，笔者认为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界定。一、管道自身的安全，这是来自设计、施工建设以及投入运营以后的管理层面的问题。我想西气东输工程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二、来自自然灾害、战争等影响，或者称它为不可抗力，这一点，在整个工程的设计阶段也已经形成了共识。三、你所提到的人为因素的破坏，这方面我们正在开始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西气东

输在这个问题上已遇到一些事情，我还不想具体谈。因为已有一些占用已建成管道的事例，特别是在江南的水网地带，人口稠密区，修路、修桥、建房等问题，势必要影响西气东输的管道安全。笔者认为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还将与管道沿线的地方政府进一步协调关系，建立一个有效的管道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认为对管道保护进行立法是必要的，加大对那些破坏管道的违法犯罪分子的惩罚力度，不仅仅对西气东输的管道安全，乃至对我国的整个管道安全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西气东输工程的巨额投资中，西部省区吸纳资金约 340 亿元，其中新疆约 200 多亿元，营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增加了大量就业岗位。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统计，西气东输工程每年为新疆增加财政收入 10 多亿元，东输之气每年还可分离出近 60 万吨轻烃和 90 多万吨凝析油，带动了下游加工行业的发展。新疆拜城县是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2003 年，这个县财政收入仅 4 000 多万元，去年财政收入已达 4.26 亿元。县长努尔·买合赛提说，当地财政收入 6 年间增长了 10 倍多，“气源地老百姓不仅可以直接享用天然气，通过地方财力的增长，政府还能老百姓做许多以前想做而无力去做的事。”

据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最新统计，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工程供气超过 730 亿立方米，国内 80 多个大中型城市的 3 亿多人口从中受益。中石化一位高级工程师表示，西气东输工程改变了中国能源消费结构，6 年来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中比例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达到 3.7%；受天然气消费市场迅速扩大的影响，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则由 22.3% 下降到 18.6%。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说，以西气东输工程为骨干、加速营建覆盖全国大部地区的输气管网，提高天然气利用率，用天然气替代一部分石油，应该是维护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一种现实选择。

西气东输工程是我国管道建设史上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这一工程的建设投产和运行，标志着我国天然气管道建设水平上了新台阶，为构建全国天然气管网奠定了基础。按照规划，气源同样来自中亚的西气东输三线首站西起新疆霍尔果斯，东达末站广东韶关。可以看到，“十二五”期间一个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综合天然气管网即将形成。新的西气东输管道在拉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为东中部地区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基础，并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具有重大



意义。

有关人士指出，这一工程自开工之日起就对中国东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而随着商业化供气的实现，这一影响将会变得越来越深远。它不仅能有效地将新疆地区的天然气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资源，造福新疆各族人民，而且能为沿线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清洁的能源，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能源结构，减少大气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关注工程动态的经济界人士指出，这条横贯全国的能源大动脉正式投运后，将有力地拉动相关产业，激活沿途省区钢铁、水泥、土建安装和机械电子等企业的潜在能量。

在西气东输工程的巨额投资中，西部省区吸纳资金约 340 亿元，其中新疆 200 多亿元，营造出新的供给与需求市场，并增加大量就业岗位。西气东输工程一旦达到设计规模，塔里木东输之气每年即可分离出 57 万吨轻烃和 91 万吨凝析油，并为新疆每年增加 10 亿多元的财政收入。

西气东输工程将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当东输之气每年达到 200 亿立方米时，就相当于提供 2 000 万吨原油，折合标准煤炭 2 660 万吨。如果全部用于化肥生产或者燃气发电，每年可以加工合成氨 1 500 万吨，可以发电 1 000 亿千瓦时。东输之气还可保证 8 500 万户居民生活燃料供应，这将刺激当地机械制造业和建筑安装业的发展。仅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现在就有 1 700 万户市民需要用气，10 年后用气居民将达到 3 400 万户，其机械设备需求量和土建安装工程量将超过 600 亿元。

专家们形象地指出，中国天然气的源头在西部，而市场在东部。这一严重的供求不平衡，正是西气东输工程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把西部的天然气通过长大管道运往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充分发挥西部天然气的功效，实现能源供求新的平衡，促进东西部的共同发展。可以说，这一工程是一项典型的“双赢工程”。经济界人士还指出，西气东输将有效改善中国能源结构。中国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据最新资料，中国天然气总资源量为 53 万亿立方米，预测可采资源量为 12 万亿立方米左右。现已累计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 2.6 万亿立方米。

目前，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 2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15 位。到 2020 年，中国天然气的储量仍将保持青年期的特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位主管官员介绍，西气东输管线的建成将使中国的天然气产量增加 50%，使天然气在国内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 1 到 2 个百分点。

除了拉动经济发展之外，西气东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改善生态环境。目前，东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已不堪煤炭的高排放、高污染。按照西气东输工程投入使用后每年沿线下载天然气 20 亿立方米，供长江三角洲地区 100 亿立方米的规划，这 12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意味着可替代 900 万吨标准煤，每年减少烟尘排放 27 万吨。



审计风暴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审计工作不断深化、不断提高、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阶段。五年来，全国共审计59.2万个单位；完成了对16.7万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增收节支1919亿元；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2847件，涉案人员4370人；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事件5509项，涉及人员7672人。审计监督在维护经济秩序、推动依法行政、促进廉政建设、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审计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对过去五年审计工作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

21世纪以来，在审计并非完全独立于政府体系的情况下，李金华推动下的中国审计，把更多阳光打进政府各部门。由于他矢志不渝的坚持，审计的独立性不断得到加强。李金华所守护的最宝贵财产，其实不是国库的资金，而是一个政府的基本公信力。

“只有阳光、透明，才是有力量的表现，虽然可能不一定公平，但起码是公正的，不是偷偷摸摸的。”12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履新全国政协副主席近两年的李金华。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在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他最关注的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以及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另外，一直萦绕在他心间，并让他备感欣慰的还有中国政务的逐步公开和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前行。

李金华的全国闻名起源于一轮又一轮的审计风暴。在一个为尊者讳的国度，他和他的团队顶着不可言传的压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揭开了挡在公众眼前的厚重幕布，将一个个财大气粗的部委和一项项巨无霸式的工程，解剖式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让公众知道了资金运转过程中的巨大黑洞和随意浪费。

1985年9月，李金华从陕西调任进京，担任审计署副审计长，在担任

副审计长期间，李金华的政绩多为外界所不知。回顾起来，李金华在1988年参与的打击“官倒”、整顿“五大公司”（中信、光大、康华、工商、农信）是最有影响的事件。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审计署兵分5路，李担任了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

1998年，李金华升任审计长。1999年6月26日，作为李金华第一次的公开审计报告，在《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情况》中，审计署通过对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的审计，发现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该报告被称为“多年来最好的一个审计报告”。作完报告，人大常委会各位委员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自此之后，每年一度的审计报告，总会引发一场令全社会沸腾的“审计风暴”。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国家电力公司等一批声名显赫的“国字头部门”和公司都名列其中，报告在用词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含糊温和，而代之以“疏于管理，问题严重”等严厉字眼。

2004年6月23日，李金华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更有分量的审计清单，报告中的18项内容，每一项都足够震撼。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年，审计署在审计报告公开的基础上，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重大项目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发布公告，使社会各界和公众不但了解审计情况，而且关注、参与、监督审计结果。

同样在李金华的力推下，2006年6月1日新《审计法》开始实施。中国审计不断地走向法制化、制度化，走向公众舆论的中心，同时也打上了李金华鲜明的个人化色彩。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六亲不认的耿直个性，对腐败丑陋的疾恶如仇，“你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也就谁都不得罪了”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当好国家财政“看门狗”的不遗余力，每一次审计风暴都让他锋芒毕露。以至于，在2004年一项民意调查中，76%的公众表示了对审计长的担心，认为“有人可能会打击报复”。

2008年，李金华以审计长身份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选择站在一塘盛开荷花的国画面前照了一张相。画的左上角，有他题写的“荷颂清风”四个字，他想说的话已不言自明。

李金华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铁面背后的脉脉温情，是李金华更真实的魅力。“有时只是惊鸿一瞥，但让人回味无穷。”

多年的审计生活，让李金华清楚地知道审计人员生存在怎样一个有无数



潜规则支撑着的社会环境里。而他们的职责，却是要从内部敲碎那些注定与自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东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很心疼审计干部的艰难处境。

在中央电视台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李金华赢得满堂彩，一个人赢得了两座奖杯。“您最想对全国审计干部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李金华意外地哽咽落泪。他回答：“我对不起他们。”这突如其来的泪水让全国观众震惊无比，一个掀起全国“审计风暴”的人，刹那间的柔肠竟如此令人感慨和怜惜。

“我们的审计干部太艰难了，我懂他们，我也理解他们，因为共同的事业能够使人产生忍受一切的力量，我会跟他们在一起的，一直在一起。”李金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不会过问但会一直关注中国审计人和中国的审计事业。

同时，李金华也表示了对审计人员能否抵挡外界诱惑的担心。李金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审计长任上时，他曾经努力和审计人员一起去努力去创造一个良好的审计环境，就是让审计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工作有荣誉感。因此，在李金华卸任之后，除了留下了令人至今记忆犹新的审计风暴、卓有成效的审计制度之外，更留下了一支堪称铁军的审计队伍。

2008年，李金华即将卸任时，外界曾有一些担忧，“审计风暴”的力度会不会减弱？李金华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可以肯定，我离开之后，审计风暴还会继续下去。”李金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审计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中国审计不会随着某一个人的卸任而弱化或退缩，但要实现独立审计，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李金华卸任时，给自己10年的审计工作打了70分。而对于剩下的30分，李金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30分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审计制度还不完善，比如它的独立性、规范性、建设性等方面。同时他还说：“分数打得太高就没办法前进了，要留下更大的空间和余地，让后人去发展、提高和创新。”

李金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当审计长期间写了40本日记，现在经常翻翻看看，反思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过去以为财政是政府的钱，政府在为老百姓掏钱，实际上是颠倒的，应该是老百姓委托政府花钱，所以政府必须要把你怎么花钱告诉老百姓，要对老百姓有个交代。”

审计，在李金华的眼中，就是受纳税人的委托，把政府怎么花钱做个公

正的评价。李金华谈到如何还原审计本来面目时，必须要把握两点：“第一，我们的权力是老百姓授予的，谁授你权，你就应该对谁负责；第二就是求实。你宁可不说，要说，就一定要说真话”。

正是这种从“财政监督”到“监督财政”的转变，激起了蕴藏在公众之中但久未迸发的良知和民主热情。而公众之所以如此敬重李金华，也不仅在于他一次次刮起审计风暴，更在于他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可以像主人监督雇员一样监督政府花钱，在于他给公众带来了一种强劲的公民感和纳税人地位。正如李金华所说，审计是民主与法治的产儿，也是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工具。

另一方面，审计署要被审计，也是李金华之前反复强调的。李金华没有沉浸于审计风暴给他和审计署带来的道德声望，没有利用舆论对审计的力挺而理直气壮地扩张审计权力，而是想到自己手中这种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监督权，天然地隐藏着一种滥用的风险，于是他一次次地要求审计风暴刮向审计署。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哪怕是一个团体，一个单位，他的生命力都在于阳光和透明。”李金华深深明白，权力的合法性只能存在于“自缚”中，一种受到外部监督的权力才拥有公信力和权威性。这种把自己的权力置于监督之下而不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政治品质，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显得尤为可贵，公众寄希望它能刷新中国官场的政治风气，传播一种“以受到监督为荣”的政治品性。

李金华说：“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的审计工作方针。”近年来，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审计工作“二十字方针”，始终坚持紧贴党和政府工作的大局，紧贴国家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紧贴实行宏观调控的措施来开展工作。实践证明，“二十字方针”符合中国实际，符合审计发展规律，是行之有效的，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活力。

他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之路。”中国社会主义审计制度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和全新的实践。既要学习借鉴别国经验，又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把握住改革开放的需要，把握住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需要，把握住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的需要，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审计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树



立审计权威，发挥审计功效。

据李金华介绍，近年来，审计机关坚持依法审计，加强了审计法制建设；严格执行审计工作程序，加强了审计质量管理；加强了审计队伍建设，尤其是审计队伍的作风建设；同时，不断提高审计机关管理水平。实践证明，“依法、程序、质量、文明”的要求，既是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提高审计工作水平的关键所在，还是提高审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基本要求。“必须抓住促进整改和审计报告这两个重要环节，充分发挥审计工作的效益。”

同时，李金华认为，审计工作应注重发挥最大效益，而促进整改和审计报告是审计工作发挥效益的两个重要环节。近年来，审计部门正是通过处理和纠正违法违规问题，促进了增收节支，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推动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为经济发展创建了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为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公开政府改进工作和规范管理的情况，促进了社会各界关注。“必须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保证审计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这几年的审计工作能够取得较大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所有这些，保证了审计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健康发展。审计风暴，用于形容审计署大量曝光各部委预算执行审计情况中所存在问题。

2003年，审计署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6月25日，李金华代表审计署提交了一份长达22页的审计报告，并首次在第一时间全文公布了牵涉很多重要部门的审计报告。一大批中央部委被公开曝光，被点名批评的有财政部、原国家计委、教育部、民政部、水利部等，其中，财政部被点名达9次之多。

李金华在审计报告中说，“12个部门存在违规收费或未严格执行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问题，涉及金额1.85亿元。”今天的公告，还原了这些部门违规收费的事实。2005年、2006年，国家发改委通过举办大型会议、展览会等向企业收取赞助费1340万元，最大的一笔，是为筹备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原始基金，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取赞助费500万元；在收费标准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收取“特殊标志登记”费28.5万元。

还有一些部门的直属机构，也在利用其与政府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违规收费。比如，农业部所属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违规收费3953.93

万元。2000年~2006年，教育部所属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等单位，未经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批准，收取证书工本费等3754.15万元。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等单位，将教育培训项目交由其他单位承办，2006年共收取管理费、合作费等83.84万元。

李金华曾在审计报告中强调，一些中央部门的所属单位依托部门权力收费的现象比较突出。抽查26个部门所属的138个单位的收费情况发现，有五个部门将享有的收费权转移、分散到下级单位，涉及收费4.84亿元，仅2005年和2006年，这些单位就因此受益1.15亿元；有12个部门所属或管理的28个单位依托部门的权力、影响及公共资源等收取费用，涉及45个收费项目，仅2006年收费就达3.37亿元，比上年增长10.8%。调查表明，收费已成为一些部门所属单位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有的甚至依靠收费生存，有些单位收费资金管理比较混乱。

一些实权部门的高工资、高福利究竟怎样来的？审计报告回答说，有些部门通过采取隐瞒收入、虚列支出、挪用专项资金等方式用于发放职工奖金福利等。今天的审计公告披露了那些违规发工资、福利的部门：2003年~2006年，中国工程院对财政拨款的重大咨询课题提取管理费387.27万元，用于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性支出。

2003年~2005年，农业部畜产品中心以拨付兽药停药期试验费、抽检费的名义，将其承担的“无公害农产品安全监测经费”等项目资金186.5万元转移到全国畜牧兽医总站所属的北京国农工贸发展中心。截至2006年年底，上述资金全部用于畜产品中心和北京国农工贸发展中心等单位人员工资、差旅费等基本支出。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挪用办公楼建设资金8598.42万元。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结存人民银行总行拨付的办公楼建设资金1.2亿元，其中7804万元被该分行挪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楼，794.42万元被用于向职工发放住宅楼装修补贴。

中科院、水利部等13个部门所属的50个单位对外投资管理不严，转制不规范，少计国有资产和权益等，涉及金额22.84亿元。其中，5个部门所属的39个单位在转制和对外投资过程中，少计国有资产和权益20.12亿元；4个部门所属的7个单位出借资金、对外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潜在损失2.29亿元；5个部门所属的5个单位擅自处置、核销或低价出售国有资产4300.05万元。比如，2000年经中国科协批准，所属中国科技会堂（企业）



从中国科协所拨给的更新改造专项经费中转拨 530 万元，用于补足中国科协对上海众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达公司）的投资；截至 2006 年年底，中国科协其他应收款中反映应收上海众达公司以前年度借款 1 334.2 万元。中国科协已确认对上海众达公司的上述投资和借款共计 1 864.2 万元无法收回，形成损失。

看到这很多人会想到李金华审计长描述的场景，一个铁道工在认真的检查铁路是否存在隐患。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我国审计部门的职能正在逐渐与国际接轨，逐渐充实与强化，从单纯的检查型、防护型转向查错除弊、建议服务并重。从一系列的审计报告可以看出，目前审计工作的重心已经从对财务数据、预算执行结果的审计，转向对审计对象的经济责任、经济效益等进行全方位、立体交叉式的审计。审计报告反映具体部门的具体案件，比如资金、账目情况，也更加注重把握总体情况，反映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不少审计结果直指深层的顽症。这样的审计新思维其实比单纯的审计结果更为重要。

其实，审计中发现的不少问题，在各个部门早就存在，但往往牵扯到具体的部门利益，受到机制体制的局限，无从下手。审计机关由表及里，抽丝剥茧，加以解决，这比公开曝光的难度更大。它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智慧。审计不是一场电闪雷鸣的风暴，而应该是一场缓解旱情、预防灾情的及时雨。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构成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党执政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大力加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增强党的执政意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将其成功的经验制度化、法律化。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民主法制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时候，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一些重要的制度、法律亟待研究制定或修改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以言代法、以情枉法、以权压法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纠正，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法制是民主的保障，民主是法制的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民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焕发建设国家的强大创造力量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作风的必由之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特别要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倾听人民呼声，代表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顺应民心，反映民意，贴近民生，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民主与法律互为前提，社会主义民主需要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内涵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好地协调、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增强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全面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能力；更好地在全体人民中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更好地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形成维

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确定明确方向、提供制度保障，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政治方向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就将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统一起来，明确了党与人民与法的关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了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相应保证了党的执政地位。依法治国，前提是有法可依，基础是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关键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依法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宪法乃国家之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党执政兴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保证，必须认真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保证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就必须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效率，充分发挥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实现公正司法，保障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正常秩序。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认真开展普法活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以期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



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按照党总揽一切、协调各方的原则，科学规范党委与国家机关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善于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事务。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这样做，才有利于把党的主张与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有利于把党的决策和决策的贯彻执行统一起来，有利于国家政权机关及其领导人员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保证我们党始终处于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前进。

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新概念，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政治建设理论认识的新飞跃，是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政治文明属于上层建筑，是人类在改造和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创造的财富，是一定社会形态下法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以及对人的关怀与尊重的观念和制度的总和，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进步。政治文明状况反映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程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新型的，为绝大多数人所享受的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和本质特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本质内涵和依法治

国的核心内容，从而反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放弃党的领导就是放弃党的执政地位，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做好新时期的人大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自觉地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主要是：1. 要紧紧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来开展人大工作，按照州委全委会的部署和阶段性重点工作，通过开展切实有效的工作，保障和促进党委提出的各项工作目标实现。2. 要经过法定程序将党委的意图转变为国家和人民意志，通过正确有效地行使地方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国家工作人员任免权，使党委的主张和决策在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通过的各项决议、决定和开展的各项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保障和促使其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3. 要及时向党委报告和沟通联系，凡属人大工作的重大事项如立法规划、法律草案，做出的重要决议、决定，开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述职评议、重要视察、年度工作等，都要及时向同级党委报告，使党委及时了解人大工作，自觉接受党委的领导，取得支持，保证人大工作健康、顺利、有效的向前推进。

二、认真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履行职责，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落实好。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保证人民充分有效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选举法等法律明确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的职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结合具体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宪法、法律的认真实施，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以权压法等现象，保证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四项重要职权，当前由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虚置、弱化、行使不到位、效果不明显；重大事项决定权等的法律规定笼统原则、操作性不强，程序保障法律缺位，致使现实操作过程中有名无实的现象存在；在监督工作中往往存在“弹性有余，刚性不足”，软弱无力，缺乏



锐气；执法检查中存在程式化的较多，实质性的个案监督少，形成一种图形式、走过场、例行公事、监督效果差等。以上现象，导致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缺位、弱化，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发挥作用，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1. 要勇于创新。人大工作法律性强、程序性强，但创新的空间仍然非常宽广，通过“四个创新”，即观念创新、工作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不断促进人大工作。在观念创新中要充分认识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人大及其常委会所肩负的职责，即通过行使好立法权，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法制保障；通过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防止和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决策保障；通过认真履行监督权，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提供环境保障；通过认真行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权，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在制度创新中，要根据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不断调整和完善工作制度，如制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述职评议办法、重大事项审议决定规定、常委会会议纪律等等，通过制度建设，使各项工作向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2. 加强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我国实行的代议制，即人民群众通过自己依法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政权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人大工作的基础，代表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要进一步强化代表工作，扩大代表对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工作的知情权和参与度，适时组织代表听取和视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及重大事项，旁听常委会会议，疏通代表参政议政渠道，建立代表直通车，及时听取和了解代表意见，同时还要加强对代表的教育、培训工作，增强其工作责任心，提高素质，增强代表履行职务的自豪感。

3. 大胆监督，敢于处置。要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理直气壮的监督，在敢于监督上下功夫。在日常监督中，既要全面检查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又要注意那些典型、个别的违法违规的情况，既要注意程序性的监督，又要注意实质性的个案监督，执法检查切忌泛、滥，缺乏监督效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围绕党委工作中心开展，注重关系稳定、社会发展等问题。当前在我州主要是创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活动、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企业改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开展视察及监督。要切实提高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效果。常委会会议审议效果差、形式

化是当前人大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今后在常委会审议议题前，提前十五天将相关议题发给每个组成人员，组织视察、调研和研究，使每个组成人员都熟悉议题，掌握情况，提出质量较高的审议意见。增强监督效果还必须把监督和处置有机结合，如敢于动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销、罢免等手段，不能单纯琢磨“监督艺术”，二者结合，才能增强监督的实效和权威性。

三、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保障。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努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康有序的向前推进。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突出的是要通过有效地行使职权和强化监督，使全社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实现这一目标，

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从当前我州立法工作来看，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新形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立法步伐较慢，特别是经济立法滞后；立法人员缺乏、水平较低、立法质量不高；立法的前瞻性不强，还未形成对国家法律具有补充作用、适合本行政区域需要的地方性法规系列。对此，全州立法工作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编好立法规划，选准立法项目。（二）改进立法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程度。（三）加强立法的前瞻性研究，坚持立、改、废并重。（四）加强立法人员的培训和立法调查研究。（五）突出体现地方特色，地方性法规要务实、管用。

加强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职权，开展监督的一种形式，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执法检查要贴近改革、发展，贴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热点”、“难点”，要突出重点，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完善程序，注重科学性，做好执法检查的后续机制，必要时运用刚性手段，做好复查和督查，提高执法检查的实效性。

要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作，作为担负着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任务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认真履行职责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大力加强人大宣传工作，大力宣传宪法和法律法规，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宣传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使民主法制思想深入人心。要把人大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在宪法、代表法颁布纪念日，大力宣传、举行座谈、开展法律讲座等多方位宣传。要对“四五”普法进行督促检查，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新的更高层次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大业，既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需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和重要动力，它关系到我们能否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布满生气和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带入 21 世纪，并顺利实现 2010 年的远景目标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坚持实事求是，有序推进。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负有重要使命和责任。这项工作的侧重点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长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正确领导下，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保证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能与物质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结出累累硕果。

“三个代表”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2年11月8日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但是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十六大会议现场，热烈的气氛却可以把冬雪融化。在11月8日~14日的会议期间，我党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个代表”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提出的。2000年2月，江泽民到广东省考察工作，在2月25日同广东省委常委的座谈中，江泽民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我们党建设的更加组织严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这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总结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①

那么为什么江泽民要在这个时候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2000年6月9日，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时期思考的。”在这一年6月20日召开的西北五省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对这一问题也作了回答：“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②同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机要集中回答一些重大问题呢？从根本上说，是党的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③



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 21 世纪里，我们党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在国际上，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但世界很不安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恐怖主义危害上升，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加紧实施；在国内，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逐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党情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党的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发挥好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推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努力加强党的建设。

抓好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非常重视的工作。1989 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就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就始终牢记人民的重托和邓小平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政治交代，始终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在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专门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等。199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以推进执政党的建设。1999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用了五个半天的时间，认真地进行了“三讲”活动，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的情况。2000 年 1 月 20 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时，深情地回顾了邓小平在 1989 年对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嘱托，并指出要始终牢记：“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⑤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⑥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部署执政党的加速建设这个重大课题，江泽民提出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每位常委联系一个县对“三讲”活动进行指导，并亲自向该县的领导干部做“三讲”动员。2000年2月19日江泽民到达广东省高州市，到达的第二天在高州市做了“三讲”动员。随后，又出席了高州市党政领导班子座谈会、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的座谈会等。江泽民十分关心党的建设方面的情况，为了获得详细、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他深入部分企业、公司并与它们的负责人及员工进行交谈，并参加了大量的相关活动：在顺德市举行了国有企业、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党委负责人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了党建座谈会，听取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广钢集团有限公司讲“党员本色”工程，南方日报实业集团讲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全国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示范点——广州市南华西街党委介绍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直到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各行各业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活动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党员在想什么、群众在想什么、基层干部在想什么等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为正确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应该如何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前进，如何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组织更加严密、行动更加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这一问题掌握了大量真实、准确的第一手材料。

经过这样长期的思考与准备，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期间，终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含义之后，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因为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所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⑦

实事求是地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出来的。正是江泽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自身建设的实际，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及对基层工作不断进行考察调研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之后，经过了长时期的思考才提出来的。

2000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要解决好诸多复杂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他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该贯穿‘三个代表’要求。”^⑧

为了更好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进行了持续的调查研究，先后到十几个省、区、市考察，主持了近30次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对深入开展党建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中央有关部门的80多位同志组成有关的课题组，分别前往十几个省、区、市进行调研，听取地方党委负责同志和各方面的意见。有关课题组还请一些省份有关部门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协助调研。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各课题组都按时交了调研报告。这些报告为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来指导加强党的建设这一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最终，由2002年11月8日~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为了更好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标志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们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已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我感到，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坚持做到这‘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⑨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进行了新概括，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同



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观察当今国际和国内的发展趋势，深刻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思考而提出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注释：

①③⑤⑦⑨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第335页，第44页，第2~3页，第15页。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57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2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1页。

⑧ 《深入基层总结实践积极探索开拓前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人民日报》，2000年5月16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的历史由来小康社会，是古代思想家所描绘的诱人的社会理想，也表现了普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追求。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小康之家”四个字来描述我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蓝图。从此，“小康”、“小康社会”、“小康生活”、“小康水平”等，就成了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概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确认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时，正式把实现小康作为第二步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不仅描绘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而且构想了建设小康社会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即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做出具体的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深刻分析了目前我国小康水平的特点，阐述了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而提出了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进入小康社会是一个分领域、分地区、有先有后的发展过程。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只是刚刚跨入小康社会历史阶段的大门，处于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这时候我们所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就是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全面，就是目前的小康基本上还处于生存性消费的满



足，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环境质量还有待提高。所谓发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不小。

在小康社会问题上有两种应该注意的倾向：看不到我国就要进入小康社会，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有可能又有必要集中力量办一些有力推进现代化的大事，是不对的；忘掉我们的基本国情，以为不应实行或者可以很快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策，更是不对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 21 世纪必须继续为完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历史任务而奋斗。

如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经过了多年的探索。早在 1989 年 6 月，邓小平同志就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 50 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规划了到 201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

到 20 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2002 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规划未来，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要求“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的确定，深化了邓小平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

五年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胜利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五年来的发展证明，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目标不仅完全可以实现，而且有望提前实现。因此，十七大从实际出发，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党的十六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这些要求是对党的十六大目标的补充和充实，总的来说比党的十六大目标稍高，要求更严，但经科学测算，也都是符合实际，能够实现的，尤其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规划未来五年及其之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都要以这些新的目标要求为基准。

十六大报告还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说，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一、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小康社会”，发端于邓小平同志对“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雄心壮志的现实思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它的内涵和意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起初，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侧重于解决温饱问题。而到了1997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情况下，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宽裕”的历史任务。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此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提出要在20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此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针对性。比如，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使用“人均”一词，表明我们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再比如，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表明我们党更加重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加突出全面小康社会的自然与环境内涵。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有许许多多实在的“指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新要求，具体包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这里面既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问题，也有和谐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转变消费模式等民生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就要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坚定信心，埋头苦干，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是对什么是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认识的新飞跃。党的十七大对实现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就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表明我们追求的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更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目标。这一新的更高要求，使“全面建设”的内容更加完备，特点更加鲜明，描述更加具体，蓝图更加清晰。按照这一新的更高要求努力奋斗，迎接我们的必将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更加文明的全面小康社会。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是立足中国国情，把握阶段性特征，顺应人民期待，对十六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充实和完善。过去五年的艰苦奋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如，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但与扩大人民民主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更加繁荣，但与满足人民群众的旺盛文化需求之间还有距离。如此等等说明，我们所达到的小康，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适应发展新要求，满足人民新期待，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党的十七大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把握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与十六大确定的奋斗目标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为奋斗目标赋予了新的更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使这一目标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要求，必将引导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更加蓬勃的热情，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

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道路上，总有几个关键时期、关键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关键时期对奋斗目标提出新要求，是一种自我激励、自我加压，是共产党人责任感、使命感的充分体现。未来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山东作为经济大省，有条件、有能力发展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为全省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省九次党代会确定了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的目标，做出了在工作指导上实现转变的重大决策，勾画了齐鲁大地经济繁荣兴旺、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美、文化特色鲜明、社会安定和谐的美好前景。前景灿烂辉煌，蓝图激荡人心。只要我们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刻认识把握中央、省委提出的新要求，深刻认识把握我省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拿出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的措施，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就一定能为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更加牢固坚实的基础。

小康社会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将会显著增强的社会发展阶段。邓小平说，如果进入小康社会时，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 000 美元，而人口已有 12 亿到 12 亿 5 000 万，那么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 万到 1 万 2 000 亿美元了。也就是说，在小康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800 到 1 000 美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将一步一步地走在世界的前列。

小康社会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发展阶段。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原因何在？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他的意思是说，在小康社会，从人均国民收入来讲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是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

小康社会还是一个科学和教育投入有较多增加，精神文明建设有大变化的发展阶段，还是一个在继续发展沿海地区的同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好内地的发展问题的阶段。

按《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指标测算，到 1999 年我国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 94.6% 的路程，2001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900 美元，预计到今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1 000 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 10 万亿人民币大关，我国进入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胡锦涛考察西柏坡与 坚持“两个务必”

在全党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革命圣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其中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初冬的冀中大地，瑞雪飘飞，松柏苍翠。2002年12月5~6日，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刚，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何勇，在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省长钮茂生等陪同下，来到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旧址，考察了西柏坡的生产、建设情况，看望了老区群众，并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

12月5日下午，胡锦涛一行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了这里的全部10个展室。他们认真观看馆内的陈设，详细了解每一部分的内容。在“大决战”展室，听着讲解员讲解“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故事，看着图片上挑着扁担、推着小车艰难行进的支前大军，胡锦涛感慨地说：“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我们党的事业才获得了不断胜利前进的基础。”

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旧址，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先后瞻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的旧居和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一间间普通的土屋、一张张斑驳的桌椅、一幅幅用红蓝毛线标注的作战地图以及毛泽东推过的碾子、周恩来雨夜救乡亲的马灯、董必武



纺线的纺车……这些珍贵的文物、感人的故事，昭示着共产党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对事业的执著忠诚，给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胡锦涛一行来到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仔细听取讲解员介绍会议的情况。当时，随着中国革命局势的发展，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将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向掌握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响了警钟，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面对土墙泥顶的庄严会场，重温毛泽东当年的讲话，胡锦涛说：“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

12月6日上午，胡锦涛和曾庆红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分别考察了西柏坡荒山综合治理工程、平山县圣地奶牛养殖场，并走村入户，慰问老党员和农民群众。随后，中央领导同志与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

在听取几位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的发言后，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推进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这样的时刻，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重温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艰苦奋斗的一系列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指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党对坚持艰苦奋斗的问题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总是反复地、经常地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加以强调。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艰苦奋斗，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扎扎实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坚持艰苦奋斗的论述，语重心长、

寓意深刻，我们要认真领会，切实贯彻。

胡锦涛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特别是13年来的艰苦奋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而且，必须看到，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在伟大征途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要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胡锦涛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艰苦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这是我们坚持执政为民、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同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同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发扬百折不挠的斗志，坚定不移地在工作中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

胡锦涛强调，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自觉地发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作风，弘扬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练艰苦奋斗的意志，不断为党和人民建立新的业绩。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中经受新的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两个务必”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伴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两个务必”不仅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揭示。

“两个务必”是着眼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而提出的基本要求。“两个务必”产生于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前夕。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其基本着眼点是革命胜利后的新环境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是党员干部队伍在新形势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党执政后面

临的权力的考验。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还估计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经不起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党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建设。这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物必自腐而后虫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政权，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垮台，其根本原因皆出自内部，或由于自身腐败变质，或因为政策严重错误。随着世界政治风云的变幻，我们党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这些论述与“两个务必”的要求一脉相承，是基于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而提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两个务必”要求党在执政以后应有慎终如始的思想作风。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的历史地位的根本性转变。如果不加强自身建设，党就很容易丧失在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那种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时用了“两个继续”，强调党的优良思想作风的连续性。抓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就是要抓好这种思想作风的连续性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容易松懈，这是执政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胡锦涛同志考察西柏坡时指出的：“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这种现象，如不及时而有效地加以克服，就会严重危及党的事业，甚至导致党走向失败。古人讲：“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两个务必”就是要求我们党慎终如始。永远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两个务必”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两个务必”要求党同人民群众甘苦与共、患难相依，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实践证明，党通过“两个务必”来联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通过“两个务必”来认识党。党群关系通过“两个务必”而密切与融合，党的执政基础也由此得以巩固。

“两个务必”抓住了党群关系的主导方面。党群关系是一对矛盾，既对



立，又统一。在这对矛盾中，一般说来，主导方面在党，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党的服务对象，党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好。在执政的条件下，执政为民是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本质。党的宗旨所规定的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党执政为民的这一本质，使党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党为人民群众服务得好，党群关系自然就好；党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人民群众才能真心实意拥护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两个务必”正是抓住党群关系的主导方面，从党自身来提出要求的，这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内修党性、外塑形象，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优良的思想作风，不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按照“两个务必”的要求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搞好党的自身建设，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两个务必”是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强大精神动力。“两个务必”的精神实质不是守成而是创业，不是止步不前而是奋斗不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这其中体现的就是不断进取的精神。江泽民同志将这种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奋斗精神概括为：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他强调，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凝聚党心和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就能够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就能够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两个务必”赋予党勇于创新的意志品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两个务必”和创新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两个务必”是党作为创新主体必备的意志品质，而创新则是这种意志品质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只有坚持“两个务必”，做到永不自满、不断探索、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才能勇于创新，始终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两个务必”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品格，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浓缩，赋予了我们党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

“两个务必”赋予党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两个务必”从提出到现在已经 50 多年，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形势下坚持“两个务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两个务必”反对守成而主张创业，反对止步不前而主张奋斗不息，其精神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今天我们讲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固然是要求不能居功自傲、盲目自满，但更重要的是要改进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忌浮躁，踏实工作，多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我们讲艰苦奋斗，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眼光来认识“两个务必”，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坚持“两个务必”，把坚持“两个务必”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坚持“两个务必”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新形势下坚持“两个务必”的客观要求。



万众一心、抗击严重瘟疫灾害

春天，本该是绿色的。然而 2003 年的春天，留给人们的记忆却是白色的口罩。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突袭中国大地，危害着患者的生命。这种病毒从何而来？哪一种药物能在人体内杀死它？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全国人民从最初的一无所知、恐慌惊悸，到勇敢面对，沉着抗击，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事实表明，直面“非典”灾难，只有以更透明、更开放、更务实、更科学的态度去应对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克服 SARS 负面影响的战斗也一定是我国经济走向更加稳健务实和成熟的过程。这期间，白衣战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有的医务人员在奋力抢救病人中被感染、发病，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北京的医务工作者同样经受了这场战斗的考验，他们面对病魔，不顾个人安危，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夜以继日奋战在医治患者的第一线。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 SARS，是一种因感染 SARS 相关冠状病毒而导致的以发热、干咳、胸闷为主要症状，严重者出现快速进展的呼吸系统衰竭，是一种新的呼吸道传染病，极强的传染性与病情的快速进展是此病的主要特点。患者为重要的传染源，主要是急性期患者，此时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血液里病毒含量十分高，并有明显症状，如打喷嚏等易播散病毒。SARS 冠状病毒主要通过近距离飞沫传播、接触患者的分泌物及密切接触传播，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人群不具有免疫力，普遍易感。此病死亡率约在 15% 左右，主要是冬春季发病。其发病机制与机体免疫系统受损有关。病毒在侵入机体后，进行复制，可引起机体的异常免疫反应，由于机体免疫系统受破坏，导致患者的免疫缺陷。同时 SARS 病毒可以直接损伤免疫系统特别是淋巴细胞。

2002 年 11 月 17 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现第一个 SARS 病例。1 名在深圳龙岗区当厨师的 35 岁男子黄杏初在回河源市后发病。当时地方卫生部门及医疗人员并未警觉到这一异常病例的危险性，仅以一般感冒处理，也没有立

即上报有关卫生防疫部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非典”病历记录。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种病魔竟会在半年后夺取那么多人的生命，乃至令世界闻之色变。此时，可恶的 SARS 病毒已经在人类的生命链条登陆。

2003 年 2 月初，多起“非典”病例几乎一夜之间在广州的几家医院同时出现，并有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一时间广东各地谣言四起，传闻横飞。2 月 11 日，广东省首次就 SARS 疾病举行新闻发布会，声称“疫情已经被控制”，然而，事实却是感染人数在不断增加，病例在中国境内多处出现。

3 月初，我国备受瞩目的“两会”召开，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产生。今天回顾那个时期的报道可以看到，在全国防治非典迫切需要及时、准确报道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指出要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4 月 12 日，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广东考察，在深圳会见了董建华，希望特区政府继续把疫病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来抓。次日，温家宝总理在京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温总理指出，目前局部地区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非典”防治工作的形势依然严峻。建立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问题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4 月 14 日，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温家宝总理原则上同意卫生部关于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意见。以此为标志，我国应对 SARS 灾害已由被动防御阶段进入主动出击阶段。

同一天上午，胡锦涛到广东省疾控中心与广东 23 家医院代表座谈，当总书记讲到为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揪心，海内外华人都心为之所动。17 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进一步加强非典防治工作，中央领导集体郑重提出：各位领导干部一定要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当天下午，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会议指出：“要把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至高无上的职责。”

在北京佑安医院，医护人员如是说：“都说医生这一职业见惯了生死，不容易吃惊。但这次，SARS 把我们和病人放在了同一个战壕，我们同呼吸，同被感染，经历着同样的生死。讲到老百姓知道这里是“非典医院”绕着走，4 月 12 日温家宝总理突然到医院来看望和感谢医护人员，给大家



鞠躬……他们再次洒泪说：“我们感到政府就跟我们站在一个战壕。”

18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市六一幼儿园、101中学、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和航空航天大学详细了解疫病防治工作。温家宝总理殷切地说：“一个负责人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再次强调，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绝不允许缓报、瞒报和漏报。否则，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4月2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任命吴仪为卫生部部长（兼）。此令由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由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亲自出任卫生部长，这在我国历史尚属首次。国内有媒体称：“铁娘子临危受命，总指挥发起‘雷霆行动’”为题对吴副总理的出马给予厚望。

4月27日，国务院派出的第四批“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督查组出发，分赴上海、江苏等13个省市。吴仪给督查组下了军令——任何地区、任何单位，无论是否发生疫情，都要立即行动起来，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汇报上，决不允许做表面文章。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健全组织，落实措施，查找漏洞，完善应对措施和防治预案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已经发现疫情的地区，要千方百计控制疫情，切断传染源，没有疫情的地区，要细化工作预案，层层设防，坚决防止疫病传入。要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依法开展各项防治工作。要明确一把手责任制，对于工作不力、玩忽职守者，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5月12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与此同时，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我国就出台了一系列诸如进行人群隔离、关闭公共场所、规范老百姓日常行为、组织药品生产、供应医疗器械、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治疗方面，采取了“分散接诊，集中收治”的办法。同时，北京市政府以空前的速度在小汤山疗养院附近紧急建造了一座拥有508间病房、千余张床位的野战传染医院。4月23日开工，29日通过验收，30日交付使用，仅以8个工作日完成世界最大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创下令人瞩目的世界医院修建速度记录。

进入5月以来，北京的SARS疫情渐趋稳定，日报告临床诊断病例呈不断下降趋势。抗“非典”第一阶段的努力初见成效。5月9日晚，胡锦涛欣闻北京出现好的势头，夜不能寐，亲笔写下一信，对北京防治非典工作做出重要又及时的指示，其中写道：“但也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复杂

性，看到北京面临的任务仍十分艰巨的一面，尤其要看到5月份是打好防治非典攻坚战的关键阶段，必须注意防止可能产生的松劲厌战情绪，继续下大力气把防治非典这件大事抓紧抓实抓好。要始终围绕提高收治率、提高痊愈率，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降低死亡率，狠抓落实落实再落实！……要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积极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10日下午，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电视电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提出要尽最大努力，打赢5月攻坚战。

禽流感，全名鸟禽类流行性感，是由病毒引起的动物传染病，通常只感染鸟类，少见情况会感染猪。禽流感病毒高度针对特定物种，但在罕有情况下会跨越物种障碍感染人。禽流感（Bird Flu 或 Avian Influenza）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也能感染人类，人感染后的症状主要表现为高热、咳嗽、流涕、肌痛等，多数伴有严重的肺炎，严重者心、肾等多种脏器衰竭导致死亡，病死率很高，通常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率约为33%。此病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皮肤损伤和眼结膜等多种途径传播，区域间的人员和车辆往来是传播本病的重要途径。自从1997年在香港发现人类也会感染禽流感之后，此病症引起全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其后，本病一直在亚洲区零星爆发，但在2003年12月开始，禽流感在东亚多国——主要在越南、韩国、泰国——严重爆发，并造成越南多名病人丧生。现时远至东欧多个国家亦有案例。2010年11月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现1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虽然尚未在候鸟中发现致命的禽流感，但中国政府已经把担忧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防御行动，避免因候鸟感染禽流感而快速传播带来更大的危害。2004年2月，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梁素海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虽然没有病禽出现，但当地政府还是下令宰杀了这个保护区内的所有家禽，并果断中止了1000万只肉鸭养殖项目，同时对这个保护区进行严格的封闭管理，严禁人员出入。这个保护区的一位动物保护专家说：“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家禽与候鸟间的相互传染。”这个水域面积近300平方公里的水禽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境内，每年大约有600多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并有400多万只候鸟途经这里作短暂停留。进入3月，气候转暖，将有大量的候鸟开始涌向中国的北方或继续北迁。因为它们可能携带禽流感病毒，为此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它们的警戒。

中国国家林业局做出部署，要求各级林业部门加强防范措施，严防鸟类



在迁飞中传播禽流感。位于国际候鸟迁飞路线中段的上海市即采取措施，停止在自然保护区进行观鸟、参观和旅游等活动，并组织防疫人员对迁飞的鸟类进行取样研究，以监控其是否携带禽流感病毒。

北京市则在候鸟北迁停留较集中的怀柔水库、怀九河、怀沙河等水域设立候鸟救护站，每天定点对候鸟栖息地及周边地区进行消毒，及时掩埋候鸟粪便及分泌物，严防候鸟出现禽流感。

中国的防疫学家认为，染有禽流感病毒的候鸟，哪怕是一次低空排泄，也可能导致一起大规模的疫情。“我们既要保护人和家禽，也要千方百计保护候鸟。”内蒙古林业厅厅长高锡林说，“因为，保护候鸟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地球物种，而且是为了防止禽流感通过候鸟迁飞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是世界第四大鸟类大国，有各种鸟类1200多种，其中受中国政府重点保护的200多种鸟类中不少为候鸟。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国际候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病毒炸弹，中国正在为清除这一危险而努力。

设在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全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科技组18日对媒体宣布，中国现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禽流感防控技术体系。科技组根据中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一线的紧急需求，结合多个国家科技计划已有的相关技术储备、技术平台和人才优势，迅速推出22项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技术和产品，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禽流感防控技术体系。据介绍，这22项技术和产品涉及疫苗、快速检测诊断技术、防护用品和消毒设备与消毒剂等四大类。

中国科技部官员称，目前正组织各方科研力量，采取技术推介和技术咨询相结合的方式，将这些新技术和产品迅速推广到发生禽流感疫情的地区。他透露，科技部决定在原有“十五”计划项目基础上，再调整安排一亿元人民币专项经费，用于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科技攻关，并部署了涉及特效疫苗研制、新型快速检测和诊断技术及产品研制、病原学和病毒变异规律研究、病毒跨种间传播机制、人用禽流感预防疫苗研制及防治药物筛选等方面的18个重点科研课题。

为保持和促进家禽业持续稳定发展，尽量降低“禽流感”疫情所造成的损失，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家禽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通知称，自2004年2月1日至2004年7月31日，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家禽加工企业和冷藏冷冻企业加工销售禽肉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并减免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家禽养殖业（包括

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企业进行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所取得的所得免征2004年度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或个人由于禽类扑杀所取得的财政专项补助,免征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对企业由于禽类扑杀所造成的净损失,允许其在所得税前全额列支。

通知要求,对禽类加工产品出口应退税款实行及时足额退税,对已于2003年出口但未能在规定的出口备案截止日期(2004年1月15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的部分,应在企业抓紧备案的基础上给予退税。此外,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地区对家禽行业适当减免其他一些相应税收。

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又不能盲目恐慌,一定要树立必胜的信心。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有各地区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雄厚物质和技术基础,有2003年抗击非典和多年防治动物疫病的经验,有一支吃苦耐劳的防疫队伍,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我们完全有能力防控禽流感疫情。

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党中央、国务院对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十分重视,多次研究部署,提出了防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措施。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向有关地方和部门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成立了全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指挥防治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全局和政治的高度,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把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采取综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坚决打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阻击战。

防治工作搞得好不好,首先取决于领导强不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重视和加强禽流感防治工作,把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来抓,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统一领导、机构健全、部署周密、措施有力。层层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形成保证各项防疫措施及时落实到位的有效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对防治工作负总责,地方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已经发现疫情的地区要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坚决防止疫情扩散;没有发现疫情的地区,要抓紧做好防疫的各项工作,不可麻痹大意。要不折不扣地落实防疫经费和补偿政策,调动广大群众做好防疫工作的积极性。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农村饲养条件多数还比较落后,防疫体系不健全。



在这种情况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尤其重要。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方面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大局意识，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地区守土有责，各部门各司其职，各方面协同作战，形成防治工作合力。各地都应当关注周边省份的禽流感疫情动态，及时分析研究防治形势，充分估计禽流感疫病给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切实落实有关措施，加大查堵疫源力度，严防禽流感传入。坚决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对人的感染，这是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检验预防工作的重要标志。

做好禽流感防治工作，从根本上来说要靠科学技术。禽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但是科学的屏障完全可以阻断它的蔓延。这次禽流感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有关地方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防治；有关科研部门加强科学研究，组织科技攻关，重点突出；同时各地认真做好防治工作科普知识宣传，使群众了解，懂得如何防治，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这说明，只要依靠科学，禽流感是完全可防可控的。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办事，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根本原则。尽管情况紧急，防治禽流感工作也必须依法进行。法制是做好防治禽流感工作的可靠保证。防治禽流感工作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牵涉农民群众切身利益，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既要处置果断，又要于法有据；既要有效控制疫情，又要维护群众利益，这就要依靠法制，依法办事，积极稳妥地做好相关工作。这次疫情暴发后，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及时公布疫情。有关部门和地区按照《国家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应急预案》展开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对疫区农民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执行了防疫工作制度，使防治工作有序高效进行。

在打好防治禽流感阻击战的同时，我们要坚持发展经济农民增收，这一点要毫不动摇。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广大农村仍然不够发达，有些地方甚至很困难。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前，我们要统筹兼顾，阻击禽流感与发展经济农民增收“两手抓”，防治禽流感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一心一意。雄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科技力量，是我们战胜疫病的坚实基础。禽流感，对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安全构成了威胁，也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造成了不利影响。阻击疫情与发展经济双管齐下，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也才能彻底地遏制疫情。

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全面发展观。第三，协调发展观。第四，可持续发展观。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中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

进、重点突破。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胡锦涛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



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国家的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去规定实施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

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出发，其体系具有三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一、它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发展度强调了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即判别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在真正地发展，是否在健康地发展，是否是理性地发展，以及是否是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协调度强调了内在的效率和质量的概念，即强调合理地优化调控财富的来源、财富的积聚、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在满足全人类需求中的行为规范。即能否维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市场发育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合理性。持续度更加注重从“时间维”上去把握发展度和协调度。建立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所表明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从根本上表征了对于发展的完满追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有益成果，深刻分析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发展的丰富内涵，极大丰富和推进了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

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摆脱贫困，发展就要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科学发展观对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才能确保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一定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结合实际，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推进各项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坚持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下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特别是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就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现在的关键是把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把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要正确处理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粮食生产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同时，我们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农业结构调整的方针，处理好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系，把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到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业竞争力上来。许多地方的实践证明，发展优质粮食生产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途径。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措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广先进适用的粮食增产技术，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障广大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利益，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要正确处理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和开拓非农增收渠道的关系。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一半来自农业，发展农业仍然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基础和基本途



径。要不断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开发利用各种农业资源，在搞好农业多种经营上多做文章，积极开拓农民增收的渠道和途径。同时，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融资条件、政策支持等方面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促进以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的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加快发展。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辟更加宽阔的农民就业渠道和空间。

要正确处理运用市场机制和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决反对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另一方面，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走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组织、动员、引导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要在创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作出更大努力。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体制机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创造更好的体制机制条件。

要正确处理增加政府投入和吸引社会投资的关系。农业的重要性和弱质性决定了必须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要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运用贴息、补助、奖励、税收优惠等多种手段，推动各类社会资金参与开发农业，参与发展农村经济社会事业。

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切实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

要抓住新一轮世界产业分工调整重组的重大机遇，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努力在国际分工中赢得有利位置，同时要立足本地实际，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现有基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具有本地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要积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生产技术和效率，同时又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人工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要培育和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

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又要重视形成一批小而强、小而精、小而专的小企业群，发挥中小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扩大就业、满足群众需要等方面的作用。

要全面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既要看到我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要看到在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猛。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妥善的解决，就会助长信贷规模过度扩张，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会占用大量耕地、削弱粮食生产能力。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将会更为尖锐，而且将会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最终势必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央已经对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部署，大家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要积极采取措施，坚决控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有效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总之，我们既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发挥好，又要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保持经济平稳协调较快发展。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能否抓住机遇，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必须大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选择一些有基础、有优势、有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方向和领域进行攻关，尽快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必须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档次；必须促进科技力量整合，打破部门分割，强化组织协调，实现产学研相结合，形成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强大合力；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使之真正成为进行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关键在人才。要认真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善于在创新实践中识别人才、培育人才、凝聚人才，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东部地区要增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



和合作，积极参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多作贡献。

三、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加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经过 25 年来的实践，我们大家对这一点都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改革开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深化改革必然会触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要求，打好深化改革的攻坚战，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在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时，要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开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要加快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 and 结构，积极实施股份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向优势产业、优质企业集中，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认真落实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规定，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制环境，落实放宽市场准入、促进企业平等竞争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更好地为社会和群众服务的必然要求。要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调整机构，裁减富余人员，减轻群众负担。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的职能，坚持依法行政，转变工作作风，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

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大气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引进来”的水平，引进资金、技术、人才，都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放在增强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另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要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善于利用可以为我所用的各种机遇，积极应对可能给我国发展带来风险的挑战，努力做到趋利避害。要加快熟悉和掌握世贸组织规则和其他国际经济法规、惯例，善于运用法律等手段有效保障我国的经济权益和安全。

四、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体现在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就业再就业工作作为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发展是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根本途径。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公益性事业等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和企业，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实现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要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和竞争能力。要进一步做好就业再就业服务工作，大力改善公共职业介绍服务的设施和手段，建立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为促进就业再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要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的工作，完善企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要推进医疗改革，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要继续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做到应保尽保。要切实保障农村五保户基本生活，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强化社会保障费用征缴，进一步提高保障能力。要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运行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安全和合理使用。

要维护好群众的各项权益。人民群众的权益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发展来不断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另一方面，要坚决克服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侵害群众权益的现象。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按政策办事，善于运用示范引导、提供服务等方法推动工作，运用说服教育、民主协商等方式来解决问题，特别是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征地拆迁、企业改制、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农民工工资发放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制定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在子女上学、就医、住房等方面遇到的突出问题。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惩治各种犯罪活动，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问题，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观念，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提高安全生产的水平，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五、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各地区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对我国来说，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尤为重要。一方面，总体上资源紧缺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比如，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资源

压力日益增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来实现的。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要发挥科技进步在促进资源节约中的作用,推动节约资源的科技开发,及时推广资源节约方面的科技成果,支持和引导企业淘汰浪费资源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要通过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节约资源的重大意义,促进全民牢固树立节约资源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坚决遏制浪费资源、破坏资源的现象。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在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治理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要大力宣传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要加大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的力度,严格控制高污染项目,淘汰高污染行业,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尊重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我们在抓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人文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努力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能给后人留下赞叹,而不给后人造成遗憾。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必须常抓不懈。要切实贯彻中央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这两大任务,建立健全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确保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目标。

六、坚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内在统一的。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求真务实的着力点,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坚持求真务实,用求真务实的作风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发



展观引导着正确的政绩观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又保证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创造业绩。考核干部政绩，要注重考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成效，坚持用是否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要通过健全的制度，形成促使广大干部肯干事、会干事、干好事的导向，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思想。只有求真务实，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得其要旨。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指导意义的认识，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要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善于统筹，善于协调，努力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的全过程，以长远眼光谋划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行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切实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以改革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包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关心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要关心这个地方的领导班子建设；支持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要帮助这个地方把领导班子建设好。要切实把政治建设放在

领导班子各项建设的首位，加强指导，积极推动，使各级领导班子都能坚持讲政治、顾大局、重团结、守纪律，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并在素质、能力、知识等方面形成合理的结构，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群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坚强领导集体。



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

朝鲜核问题，是指朝鲜开发核应用能力而引起的地区安全和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相关方为美国、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3年3月12日，出于美国和韩国继续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检查其军事设施，朝鲜宣布3个月后退出现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资料，朝鲜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核技术研究。60年代中期，在前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创建了宁边原子能研究基地，培训了大批核技术人才。当时，朝鲜从前苏联引进了第一座800千瓦核反应堆，使朝鲜核技术研究初具规模。此后，宁边成为朝鲜核工业重地。宁边核设施位于朝鲜首都平壤以北约130公里处，是朝鲜主要的核研究中心。宁边5兆瓦核反应堆属于石墨反应堆于1980年动工，1987年建成。这种核反应堆的废燃料棒可被用来提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钚。

美国从1958年开始，在朝鲜半岛南部及其临近地区部署了大约2600件核武器。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主要是短程核导弹、核炮弹等，其针对朝鲜的目的很明确。美国还为韩国提供了核保护伞。尽管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经对朝鲜的安全做出过承诺，但是，这种承诺似乎都不包括提供核保护伞。而且，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前苏联和中国都没有在朝鲜长期驻军，因此在核领域的安全问题上，朝鲜与中国或者前苏联的关系并不密切。

这种态势导致以下后果：第一，朝鲜在安全上更倾向于发展战略武器能力，而不是依赖与前苏联或中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其次，由于当时前苏联和中国在安全上给朝鲜的承诺不包括核领域，因此，两国对朝鲜核武器发展政策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

1974年，朝鲜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1985年12月，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按照该条约规定，成员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其核设施的检查，但朝鲜却一直拒绝接受其检查。经过多轮谈

判，1994年10月21日，朝美两国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朝核问题的《美朝核框架协议》，使第一次朝核危机得到暂时缓解。

随着布什政府上台后对朝政策强硬化，尤其是2002年1月称朝为“邪恶轴心”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为朝核危机再次出现埋下伏笔。2002年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核问题上有更多疑点，于是助理国务卿凯利10月访朝；11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决定停止向朝鲜继续运送作为燃料的重油，朝核问题再次被国际社会关注。朝鲜于2002年12月22日宣布解除核冻结，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核设施安装的监控设备，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并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

自2002年10月爆发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2年10月~2003年4月中美朝三方举行北京会谈前，这是朝核问题从再爆发到形成危机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2003年4月~2005年11月，先后经历了中美朝三方北京会谈和五轮中美朝韩俄日“六方会谈”，这是以多边会谈方式争取和平解决时期。

第三阶段：从2005年11月~2009年，六方会谈处于停滞状态，朝鲜进行核试验使朝核危机进一步升级。2006年7月，朝鲜发射导弹；同年10月9日，朝鲜成功进行第一次核爆实验；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再次核爆实验，第二次核危机愈演愈烈。

自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贯的立场是：在目标层面上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朝鲜半岛的扩散，主张半岛无核化；在解决手段上坚持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本着“劝和、促谈”的善意，积极开展“穿梭外交”，以斡旋者的身份成功地促成了五轮“六方会谈”，为化解朝美核僵局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朝核危机能否顺利解决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积极促进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自2002年10月再次凸显以来，为了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曾多方进行斡旋，最终促成朝鲜、美国、中国、韩国、俄罗斯、日本六国同意就政治解决朝核问题举行会谈。2003年8月，中国在北京举行有中国、朝鲜、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参加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确立了通过谈



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截至2008年6月,六方会谈已进行到第6轮。

第一轮六方会谈(2003年8月27日~29日)

各方认真、全面地阐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和方案设想,并达成重要共识,即确认朝核问题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原则。

第二轮六方会谈(2004年2月25日~28日)

朝鲜强调只有美国放弃对朝敌对政策,朝鲜才能放弃核计划。在此基础上,朝鲜提出“口头对口头”原则作为第一阶段行动措施,即朝鲜冻结核武器计划,美国相应放弃对朝敌对政策。美国重申,在关切的问题解决后,美国最终愿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弃核目标上,美方再次重申“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地放弃核计划”概念。与会六方最终以《主席声明》的形式阐明了各方共识,这是六方会谈首次以书面文件形式确定会谈的成果。

第三轮六方会谈(2004年6月23日~26日)

朝鲜进一步明确弃核意愿,首次表示可以透明地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相关计划。美国则提出了一项包括朝鲜弃核,同时也涵盖了朝方的安全关切、能源需求以及取消封锁要求等内容的“转变性方案”。但双方在弃核的范围和方式以及关于核冻结的范围和相应措施等方面存在分歧。最终,与会各方同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寻求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途径。

第四轮六方会谈(2005年7月26日~8月7日第一阶段会议;9月13日~19日第二阶段会议)

经过两个阶段艰苦谈判,各方通过了六方会谈进程启动以来的首份具有实质内容的“9·19共同声明”。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美方确认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各方尊重朝方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

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2005年11月9日~11日)

第一阶段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中重申,将根据“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全面履行共同声明,早日可核查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此后,会谈曾因朝鲜反对美国的金融制裁而陷入僵局。

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2006年12月18日~22日)

经过各方努力,在停顿13个月后,第二阶段会议于2006年12月18日在北京重启。在朝美及有关各方进行了密集、深入的双边和多边磋商后,22

日宣布休会。会后发表第四份《主席声明》，以“两个重申”向外界传达了六方在本阶段会谈中取得的共识：重申通过对话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各方的共同目标和意志；重申认真履行“9·19 共同声明”，根据“行动对行动”原则，尽快采取协调一致步骤，分阶段落实共同声明。

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2007 年 2 月 8 日～13 日）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磋商，六方会谈终于峰回路转。2007 年 2 月 13 日，第三阶段会议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的“2·13 共同文件”，内容包括朝方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并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验证，以及各方同意向朝鲜提供价值相当于 100 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及人道主义援助。

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2007 年 3 月 19 日～22 日）

第一阶段会议如期举行，各方听取了五个工作组的报告，就落实起步行动和下一阶段行动计划进行了探讨。会后各方发表了第一阶段会议主席声明。重申将认真履行在“9·19 共同声明”和《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中做出的承诺。

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2007 年 9 月 27 日～10 月 3 日）

2007 年 10 月 3 日，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的共同文件。根据文件，朝鲜将在 2007 年年底前完成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全面申报核计划；美国根据朝方行动并行履行其对朝承诺。

六方外长非正式会晤（2008 年 7 月 23 日）

朝鲜核问题六方外长非正式会晤在新加坡举行。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主持，朝鲜外相朴义春、美国国务卿赖斯、日本外相高村正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及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出席。

2009 年 4 月 13 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 5 日试射通信卫星的问题通过了一份主席声明，要求北韩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进行此类发射的 1718 号决议。第二天（4 月 14 日），朝鲜外务省即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并将重启核设施建设。

对朝核问题，中国显示出大国的风度和智者的风范，那么中国积极介入朝核问题有何益处呢？

利益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影响各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最根本要素，而国家利益则是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



的最基本动因。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的综合。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是调整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着眼点,解释和证明国家对外政策合理性的重要工具。在朝核问题中,中国选择了积极介入,可以从以下角度分析中国的国家利益:

一、从历史因素分析。

中国是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字国,是改变朝鲜半岛停战机制为和平机制的当事国,中国应在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朝之间的这种历史联系,成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重要动因。

二、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分析。

朝鲜半岛扼守东北亚海上交通要塞,朝鲜海峡是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海军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连接日本海与黄海、东海的捷径。朝鲜半岛位于被尼克松称为全球五大力量中心中的三大力量——中日俄的包围之下,是东北亚地区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就地理位置而言,朝鲜半岛是北太平洋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朝鲜半岛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

(一) 朝鲜半岛局势是我国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朝鲜半岛的局势稳定,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环境。

朝鲜是中国东部的邻国之一,朝鲜半岛的北部以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山水相连,朝鲜与中国有着 1 334 公里的边界线。在历史上是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必经之路。中国人过去常用“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等字眼形象地比喻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特殊关系,说明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朝鲜半岛作为中国东北的天然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有人把它形容为“打中国头部的铁锤模样。”因此,这里一旦失控,将对中国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

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上看,朝鲜半岛从陆地和海洋面对着中国东北、华北、华东等多个战略方向和地区,敌方可利用它从不同方向对我构成威胁,特别是对北京、天津一带。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半岛多次成为外部势力入侵中国的通道和威胁中国的场所。唐、明、清等朝代,曾多次出兵抗倭援朝。即使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东北部地区仍然处于被包围状

态，特别是受美国势力的包围。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在当今，国际军事战略家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一致认为，如果从俄罗斯方向入侵中国，外军可控制北朝鲜，取得对黄海的控制权。再从海上对辽东半岛、秦皇岛等沿海地区实施登陆作战，夺取大连、旅顺，攻占天津和北京。而如果美国从半岛方向入侵中国，则可由陆上突破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侵入东北，并可南下进攻北京；或者一面以半岛陆地方向的进攻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则由海上对山东半岛登陆作战，夹击华北。

可见，朝鲜半岛作为中国周边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各个层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安全利益的重点所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朝鲜半岛局势给予高度的关注，也不能不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显示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由中国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关系所决定的。

（二）朝鲜半岛是我国制衡美国的重要战略要冲。

朝核危机中困境的继续，为美国军事力量由欧洲向亚洲转移提供了绝佳机会，也为其在亚洲扩大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和美台关系提供了借口，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了严峻挑战。因此可以说，朝核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9.11”事件一样，是美国地缘战略上一次成功布局，是对中国战略空间的又一次压缩。

所以中国最有利的政策应该是和平解决这次危机，维持半岛的现状，充分利用各种矛盾和要素制约美国的行动，利用朝核危机解决的过程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继续博弈，将东北亚地区作为中国新世纪外交的重点地域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牵制其“西扩”的战略要地。

（三）朝核危机的和平解决将对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朝半岛问题似乎与中国台湾问题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两次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都是因朝鲜半岛问题而发。一次是1894年“甲午战争”，朝鲜的“事大主义”外交政策将中日俄三国卷入战争，结果清朝丢掉了东南七省的海上门户——台湾，在洋务运动之后又一次降为三流的国家，导致“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流产。另一次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将中国又一次拖进刚刚建国后的一场巨大消耗战中，进入了东西方冷战的阵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导致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受阻。所以，朝鲜问题、中国台湾问题以及中亚问题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三大



难题，中国应该妥善改善自己的地缘政治处境。

朝核问题已成为全球安全的热点问题，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朝核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在朝核试验后选择了积极介入的态度，并坚持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积极推动六方会谈，将朝核问题纳入和平解决的渠道，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完全正确的决策。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25年的跨度，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吹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号角，总揽全局，谋划长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决定》的起草，始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

十六大为进入21世纪新阶段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明确指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方向和依据。在研究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时，中央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重点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重要体制问题提出改革目标和任务做出决策和部署。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不断探索两者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也是贯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根主线。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从十三大提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



一的体制，到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伴随着认识的深化、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突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挺进。

10年前，根据十四大精神，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引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仅仅10年，亿万中国人民以创造性的辉煌实践，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我国经济存在的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深层次矛盾和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城乡发展不平衡、产权制度不健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等一系列体制性问题，警醒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继续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防治非典工作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等问题，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极端重要性。

胡锦涛深刻地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把推进城市发展和推进农村发展结合起来，把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结合起来，把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结合起来，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成为起草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许多重要指示，对《决定》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决定》，深入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贯彻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又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重大突破和创新，提出了在更宽的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改革的任务。《决定》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是我们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20多年改革开放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决定》鲜明提出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经济专家们评论，统筹城乡发展，是从全局出发看“三农”，抓住了要害和关键，必将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关注和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五个统筹”的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丰富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中这段表述，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到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十六大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0年来，我们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决定》关于公有制的新论述，是对改革经验的总结，是探索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效形式的成果，也是在继承基础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决定》在理论上的又一重大突破。改革实践证明，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就是产权清晰。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取得显著成效。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



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

“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决定》贯彻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措施。这就要求我们逐步把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是《决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坚持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发展的每一项措施中，贯彻到改革的每一个行动中。

“五个统筹”是《决定》的新战略。五个统筹指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五个统筹”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推进为目标，以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为途径，着眼于全面发展，囊括了当前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

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基本内容。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先导，三者紧密关联，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一于社会的发展之中。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简单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偏离全面发展观，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那么在“发展”中一些社会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愈演愈烈，最终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五个统筹”，牢固树立全面发展思想，不断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三个文明”整体推进是“五个统筹”的重要目标。“五个统筹”着眼于“三个文明”整体推进的目标，深刻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与之相适应，人类的文明形态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表现为社会精神产品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既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又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泉与动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三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

经济社会自然协调统一是“五个统筹”揭示的发展道路。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它包括物质生产的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三者互相依赖，不可或缺。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协调统一，是“五个统筹”的显著特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水资源贫乏、土地沙化加剧、江河水患频发、城市水源和大气污染严重等等，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于此，十六大提出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要达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五个统筹”，树立全面发展观，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努力从社会的一维经济发展，走向社会财富、健康、文明三维繁荣，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立足点。“五个统筹”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使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达到协调发展的状态。“知之非艰，行之惟难”。掌握协调发展的理论不难，难的是将协调发展理念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效。在推进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处理好城乡、区域、国内国外等方面的关系，真正做到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比如，处理好城乡关系，就是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and 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使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腹地、资源和市场，城市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人才和技术，处理好城乡关系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城带乡、城乡联动、整体发展的格局。

均衡发展是“五个统筹”的关键环节。坚持“五个统筹”，必须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条重要方针。“五个统筹”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就需要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模式，使具有地缘优势且又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深刻改变了国民经济格局。但是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实施也造成了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这种趋势若长期得不到遏制，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型，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坚持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的原则，驱动东西互动“两个轮子”，逐步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这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可持续发展是“五个统筹”的重要支撑。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总结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对坚持“五个统筹”、深化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是“五个统筹”的本质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也是“五个统筹”的本质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指出“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地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执政党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从坚持“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提出把“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是“五个统筹”的根本。我们党把执政为民作为最高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这是坚持“五个统筹”的根本所在。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奋斗的最高目标。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各项方针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才能有效推动各项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才能成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图伟业。

此外，《决定》在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等重要思想；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指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等改革任务；在宏观调控和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提出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要“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在就业、分配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提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决定》中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也是理论创新的成果，必将进一步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打开前进的道路。

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一个历史性的考验，一个新的伟大跨越，一个新的伟大实践。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必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大，但从总体上看，迄今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城乡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制度性和体制性因素造成的分割性。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要贯彻落实好《决定》的这一精神，必须切实理解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意义。

首先，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作为生产要素市场之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状况，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城乡劳动力能够真正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由流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决定》提出要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贯彻党的十六大重要思想的一项改革措施。

其次，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近些年，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其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但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如目前很多城镇仍沿用计划体制下劳动用工管理的办法，对企业使用农民工实行总量指标控制。有些大中城市设置行业和工种限制，硬性规定企业单位使用本地工和农民工的比例。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需要登记办理的证、卡少说也有五六项；收费手续多达十几项，每年至少要交费 500 元～600 元。而且，证、卡必须年年审核，手续费、管理费必须年年交纳。一些大城市还屡屡发生农民工无缘无故被遣送现象。进城农民的居住条件、工伤医疗、子女教育等，不仅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许多人在公共场合经常遭遇白眼、奚落和不公正的对待。这些不合理的限制和歧视性做法，对社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导向。这种

状况如不尽快改善，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要按照这次《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当前尤其要切实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等突出问题。应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病和治安管理工作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最后，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日趋活跃，并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据统计，2002年全国跨区域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已达9400万人。这么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的改变。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民到城里打工，就不会有今天城市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在城乡间的流动性就业，还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到城镇打工，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在城镇“沉淀”下来，成为城镇居民。而回到农村的那部分农民，由于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加上多年在外打工有了一定的收入积累，使得他们较容易在第二、三产业内创业。这样就会进一步扩大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空间，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业，由此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性循环，从而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我国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神舟” 五号载人飞船

千年飞天梦，今朝终成真。北京时间 2003 年 10 月 15 日 9 时 9 分 50 秒，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中国首位航天员被顺利送上太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在现场观看飞船发射时强调，“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荣耀，标志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初战告捷，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又迈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航天战线的同志们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建立的卓越功勋，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4 日下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刚闭幕，胡锦涛就和黄菊、吴官正、曹刚川、王刚等一同赶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并连夜听取了关于飞船发射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15 日凌晨，地处戈壁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既白，晨曦微露。5 时 20 分，航天员出征仪式在航天员公寓问天阁举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这里，亲切会见首飞梯队三名航天员。胡锦涛说，“神舟”五号马上就要发射了，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庄严时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庄严时刻。一会儿，杨利伟同志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执行首飞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激动地表示，要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个动作，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

8 时 50 分，胡锦涛等领导同志来到试验指挥楼平台，现场观看飞船发射。与此同时，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罗干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观看飞船发射实况。

飞船发射现场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长征”二号 F 型运载火箭巍

然挺立，箭体上的五星红旗和“中国航天”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时整，火箭在震天的轰鸣中腾空而起，急速飞向太空。9时42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宣布：“飞船已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成功。”指挥控制大厅内，顿时一片欢腾。

在热烈的掌声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江泽民主席，向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向所有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研制、建设和试验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他指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0多年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的不懈奋斗，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壮丽诗篇。他希望航天战线的全体同志，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科学求实、开拓创新，团结协作、不懈进取，不断夺取我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新胜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重温了激动人心、扬我国威的时刻，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有关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相关知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是“神舟”号系列飞船之一，是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行器，于2003年10月15日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这次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继前苏联（现由俄罗斯承继）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神舟”五号飞船是在无人飞船的基础上研制的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乘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道运行了一天。整个飞行期间为航天员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同时将航天员的生理数据、电视图像发送地面，并确保航天员安全返回。

2003年10月15日09时00分，负载着神舟五号的长征2F火箭发射。9时10分，船舰分离，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飞船以平均每90分钟绕地球1圈的速度飞行。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总长8860毫米，总重7840千克。飞船的手动控制功能和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分系统为航天员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飞船由长征2F运载火箭发射到近地点200公里、远地点350公里、倾角42.4°初始轨道，实施变轨后，进入343公里的圆轨道。飞船环绕地球14圈后在预定地区着陆。除了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外，“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内还搭载有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



中国国旗、一面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会徽旗、一面联合国国旗、人民币主币票样、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纪念邮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纪念封和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农作物种子等。

神舟飞船的轨道舱的外形为圆柱形的。为了使轨道舱在独自飞行的阶段可以获得电力，轨道舱的两侧安装了太阳电池翼，每块太阳翼除去三角部分面积为 2.0×3.4 米，轨道舱自由飞行时，可以由它提供 0.5 千瓦以上的电力。轨道舱尾部有四组小的推进发动机，每组四个，为飞船提供辅助推力和轨道舱分离后继续保持轨道运动的能力；轨道舱一侧靠近返回舱部分有一个圆形的舱门，为航天员进出轨道舱提供了通道，不过，该舱门的最大直径仅 65 厘米，只有身体灵巧、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出自由。舱门的上面有轨道舱的观察窗。轨道舱是飞船进入轨道后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场所。舱内储备有食物、饮水和大小便收集器等生活装置外，还有空间应用和科学试验用的仪器设备。返回舱返回后，轨道舱相当于一颗对地观察卫星或太空实验室，它将继续留在轨道上工作半年左右。轨道舱留轨利用是中国飞船的一大特色，俄罗斯和美国飞船的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后，一般是废弃不用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指出，从 1999 年到 2003 年，我国先后成功地发射了四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突破了载人飞船再入升力控制、应急救生、软着陆、GNC 故障诊断、舱段间分离、防热等 13 项关键技术。作为我国高技术领域的跨世纪工程，“神舟”飞船总体性能优越，达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神舟”飞船“三舱一段”的结构与总体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神舟”飞船起点高，一步到位，智能化程度较高。虽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较晚，但并不是从“加加林”时代的飞船起步：先搞无人飞船，再搞单人飞船，最后才是多人飞船，而是一步迈过美苏的 40 年发展历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神舟”飞船第一步就可载三人；第一次载人飞行，苏联加加林只绕地球飞行一圈，谢泼德只进行了亚轨道飞行，而中国航天员却在近地轨道飞行了一天。国外载人飞船是从搭载小动物开始试验航天员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的，我国则采用了先进的现代装置——模拟假人，模拟“航天员”所消耗的氧气与二氧化碳，通过先进的地面医监台测试“航天员”的生理信号变化。

“神舟”飞船适用性强，可一船多用，飞船轨道舱既能进行留轨对地观测，又能作为未来空间交会对接的一个飞行器。国外发射飞船一次是连续发

射两艘，而我国的方案中是先发射一艘，其留轨舱与下一个飞船进行交会对接。即为实现交会对接，国外的发射是 $2N$ 次，而我国的飞船发射是 $N+1$ 次，只要发射次数 $N>1$ ，以 N 等于 5 为例，国外需发射十艘飞船，而我国只要发射六艘飞船，如此以来我国发射的飞船总数量就少于国外，既节省了巨额的发射费用，又可利用空间留轨开展科学试验。中国走着一条低成本、高效益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

美国东部时间 14 日晚间，关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的消息成为各家媒体的重头新闻。电视台纷纷播出信息和转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画面。美国广播公司的“拳头”节目之一《夜线》对中国发射载人飞船进行了专题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作了重点播报，称“神舟”五号成功升空标志着中国在太空占有了一席之地。有报道认为，中国在航天领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世界各国分外关注，并纷纷表示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 15 日说，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他当天在俄国家杜马会议上宣布，俄国家杜马将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贺电。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乌克兰副总理塔巴奇尼克 15 日表示：“这是中国科技界的巨大胜利。”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拉迪姆说，中国顺利地用自行研制的飞船把自己培养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综合实力，也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强大。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何立强说，中国从 20 世纪初以来一直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神舟”五号成功升空是又一个里程碑。

欧洲航天局局长让-雅克·多尔丹在此间发表声明，代表欧洲航天局向中国表示最热烈祝贺，祝贺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他说：“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这表明了中国航天技术非常可靠，中国载人航天取得的成功将开启国际太空合作的新时代。”

巴基斯坦著名华人、巴基斯坦刘氏企业总裁刘江 15 日说，“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是一件值得中华民族自豪的大事。他说，近几年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正在走向世界，今天“中国制造”又升上了太空，每一个华夏儿女将更加扬眉吐气！

韩国主流媒体 KBS 电视台、SBS 电视台、MBC 电视台、YTN 电视台以及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中央日报、韩国经济新闻、韩国日报、韩国先声经



济报、韩国联合通讯社等，连续不断报道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情况，并称赞中国人民实现了数千年的宿愿，开启了空间开发的“多极”时代，步入了航天强国的行列。

日本各大报纸均在其晚报的头版头条用显著篇幅报道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消息，并且设专栏深入报道“神舟”五号发射成功的意义。

《朝日新闻》用六篇文章在四个版详细报道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背景情况和意义。评论说，“神舟”五号成功升空，不仅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而且给各国留下了“世界技术大国”的印象。这一历史性事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同时为中国和世界各国进行新的卫星技术合作铺平了道路。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全局性、长远性、关键性的问题所作的筹划和决策。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处理好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严寒和内地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些，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估量，考虑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应解决的重点和所需经历的阶段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的总筹划和总决策。它的特点是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稳定性和政策性。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建国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内地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总结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人们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



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按照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差异将连同“核心——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美国人Williamson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倾向于均衡和趋同。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就是倡导一种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一种适度倾斜的发展战略。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的倾斜。因为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易受海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易迅速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但适度倾斜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均衡布局，也不是简单的扶持东部，而是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开放体系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从总体上讲，既要有重点地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以追求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间经济关系，协调主导产业同其他产业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合理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工格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包括促进东西

部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面向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党中央提出了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发展西部地区的战略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根据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东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这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全局出发做出的总体战略部署。

毛泽东提出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和邓小平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及江泽民的西部大开发思想，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原理，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自优势，先发展东部、南部，再带动西部，加快西部的发展。我国东部有先进的技术和高科技人才，还有丰厚的资金和先进的设备，改革开放后由于政策倾斜，经济发展快，但是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

我国西部有12个省、市、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发展潜力大。西部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7%，草原面积占全国55.9%，森林面积占全国36%，而人口只占全国的23%。西部已发现矿物资源160多种，其中钛、铜、汞、铝、锌等30多种矿产储量占全国第一，石油的储量占全国的41%，煤的储量占全国38.6%，铁的储量占全国46.8%，钾的储量占全国96.7%，水能资源储量占全国82.3%。

西部地区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还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拥有大量的历史遗存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西部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征。根据《史记》的记载，传说中炎帝一族曾栖居于陕西渭水的上游，而少典氏部落的黄帝一脉，也在今陕西黄陵县境内，秦皇汉武以后，东西文化交流和贸易在西部地区广泛交汇，形成了著名的古丝绸之路。至盛唐可谓登峰造极，甘肃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更是世界文化的一个奇迹，它在继承了汉晋艺术



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兼收并蓄的文化内涵,还有至今为世人瞩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西夏王陵、楼兰古国、交河古城、布达拉宫、大昭寺、三星堆、大足石刻等历史文化遗存,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西部地区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遵义、延安、重庆红岩村等都孕育了深厚的革命文化,二万五千里长征行进西部地区,在延安,毛泽东指挥抗日军队和广大民众进行了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西部地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革命文物和纪念地,也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和精神财富。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集萃地,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成为某些古老艺术的珍贵的“活化石”,如纳西古乐、各地民间歌舞、戏曲、剪纸、刺绣、民居、岩画和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宗教艺术等、西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是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来源。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资金投入不足,技术落后,开发缓慢,使其丰富的资源未能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也降低了全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同时,可利用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联合开发、互利合作,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创造条件。这是地区统筹思想的运用,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倾斜经济发展战略,在强调经济效益目标中,忽视了平衡目标,投资重心与政策优惠一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区域利益关系严重扭曲。我国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选择时,既不能重蹈覆辙,也不能矫枉过正,另走极端,偏重地区效率,牺牲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在设计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发展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复杂和独特的区域问题,以求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沿海与内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协调发展。

目前对我国应该实行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观点: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它要求以“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

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从“九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力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色，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形成多个跨省市区的经济区域，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高起点上向前发展。二、多极增长发展战略。就是在中西部地区选择几个省、市或地区或流域（如长江流域），像过去扶助东部沿海增长极那样，培养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三、沿江经济带以互助互动为中心的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主要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的客观事实，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上，同时十分关注我国区域发展中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三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另外，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的产业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发展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下决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这将使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与此相适应，将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为最终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跨世纪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经济全方位增长，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扩张规模、经济结构转变升级和人民生活提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府宏观政策适度倾斜，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提高，有些重要指标甚至高于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逐年加快，如1999年第一季度，西部投资增幅达35.4%，高出东部一倍以上。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正在扩大。如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都已超过10 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 435元，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 500元，相差达一倍以上。这就要求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尽快缩小地区差距，逐步实现从先富到共富的目标。

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充分利用西部资源优势，实现东西

部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我国西部区地域辽阔，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人均占有资源量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潜力极大。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开发缓慢，丰富的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快西部开发，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三、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扩大内需。我国是一个大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高于出口需求。尤其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价格不确定因素增多、市场变动无常的情况下，以扩大内需为主，也是降低经济风险的重要措施。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如西部大开发必然需要大量投资，增加投资品的需求；西部城市化速度加快，也必需有大量投资；西部的开发，使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消费品的潜在市场将转化为巨大的现实市场。

四、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居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当前，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相当大。例如，199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为10.68%，陕西为5.10%，甘肃为3.82%，青海为4.50%，宁夏为7.07%，新疆为6.96%，平均比全国水平约低4个百分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增加本地区城乡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为改善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条件。

五、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稳定、政治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政治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加快西部地区开发的步伐，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各族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富裕了，无疑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进而从根本上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演变。一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不能将均衡与非均衡的发展战略绝对化。因为无论从二者功能上的差异，还是从发展的本质而言，均衡与非均衡的相辅相成才能使经济健康、快速、协调的发展。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年均 9% 以上的速度，这是我们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的重要条件。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 2020 年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要求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7.2% 左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优化全国经济发展格局，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做出更大贡献。同时，基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要尽快提升东北地区在全国经济的地位。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成为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战略。

翻开当今的中国经济版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东部地区发展并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以及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凸现东西互动、带动中部、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

东北老工业基地曾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为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目前，东北原油产量占全国的 $\frac{2}{5}$ ，木材产量占全国的 $\frac{1}{2}$ ，汽车产量占全国的 $\frac{1}{4}$ ，造船产量占全国的 $\frac{1}{3}$ 。1990 年以来，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资源性城市主导产业衰退，经济发展步伐相对仍较缓慢，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 GDP 是广东的 2 倍，而现在广东是辽宁的 2 倍；1980 年黑龙江省的 GDP 与东部 6 省市的平均值相当，现在为其 46.2%，人均 GDP 仅是上海的 $\frac{1}{4}$ 。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谋划全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继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我国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区域布局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先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改革开放以前，东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但相比经济发展更快的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慢了些。GDP 和工业增加值由改革开放初的近 15% 和 20% 下降到现在的 10% 以下。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随着振兴战略实施，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目前，《若干意见》确定的社会保障试点、增值税转型、豁免企业历史欠税、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各项政策已付诸实施。东北三省广大干部群众着力转变思想观念，加大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开放步伐，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实施振兴东北战略任重道远，需要不断创新思维和行动。巩固和提升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重要林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机械工业和医药工业基地地位和功能，是振兴东北地区的关键基础。

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革开放以来被拉开的发展差距逐年缩小，赶上了全国平均增速。东北地区率先实行了免除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粮食生产连创历史新高，作为全国商品量和肉食供应基地的地位日益突出。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进展，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利润大幅度增长，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企业技术进步成效显著，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民心工程”进展顺利，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稳步推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就业形势明显好转，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开始加快，逐步缩小了与全国的发展差距。2008 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升至 8.62%，比 2007 年高出 0.14 个百分点，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首次止跌回升。

2008 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按地区统计后折算的增长率）为 13.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这一增长率在四大板块中名列第一。以“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的三年计算，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为 13.7%，高于全国 0.5 个百分点，也分别高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0.5 个、0.5 个和 0.3 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作任重道远。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三年多来，国家现有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已经基本到位，东北三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积极可喜的成绩，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东北三省目前取得的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与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经济总量仍呈下降趋势、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深化国企改革战略重组困难重重、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面临考验、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缺少政策保障、就业民生和社会保障压力大、诸多风险依然存在等，尤其是东北三省思想观念转变和体制机制创新，以及一些历史上积累的影响长远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巨的工作，全面实现振兴目标任重而道远。

今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之后，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把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列入重要议程，根据“东西互动，协调发展”的思想，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在有关专题小组调研后，温家宝总理分别于今年5月底和8月初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实地考察了部分国有大企业，多次召开座谈会，与东北三省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共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计。8月3日，温家宝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指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把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走出加快振兴新路子。这次座谈会，标志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的实施拉开序幕。

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这既是东北等地自身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吉林省会长春市召开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策会议。将正式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国策，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措施。“振兴东北”，这不仅让东北的父老乡亲们感到欣喜，而且也令所有国人意识到：“振兴东北”攻略的成功，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之一。

为了振兴东北国策的出台，新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半年之内已经两度到辽宁做调查研究，一次是今年农历除夕之夜，温家宝到辽宁阜新一煤矿矿井下和煤矿工人一起过年。但当5月底6月初，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的时候，其经济意义已经凸显。

消息人士透露，温家宝在辽宁考察后所作的报告，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主基调。去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略。温家宝在辽宁的讲话，则首次称这一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这两个地区情况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全国经济战略的重大问题”。

温家宝特别强调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东北的振兴“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有必要把振兴东北“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中国“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中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长春会议”的召开等于一个契机。东北三省已经具备了推进大开发、实现大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像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赴会前夕向媒体所说的：“外商北上是时候了，也该闯关东了。”

薄熙来称，4年前，国务院制定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现在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际上，东北的振兴与中国整个经济战略的价值和西部大开发是等同的，辽宁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装备制造业和重要的原材料工业的基地，换句话说，就是成为共和国的装备部。他认为，敏感的商人若是到东北来，定会觉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心旷神怡，别看东北还有困难，但商机无限，很多城市都有欢迎外来投资的“饥渴症”，很可能来了以后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举成功。

因此，中央有关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指导思想：一、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促进企业改组改造。要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消除经济发展和调整改造的体制障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通过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拓展发展空间。

二、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企业重组，都应主要依靠市场来决定。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划和政策，营造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予必要扶持。振兴老工业基地，主要依靠充分发挥广大企业和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自身优势，挖掘内部潜力，激发内在活力。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效益。

四、坚持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着眼于加快科技创新和进步，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作用，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坚持少上新项目、少铺新摊子，在改组、改造现有企业上下大功夫，注重整合现有资源，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



五、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振兴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要搞好总体规划，综合治理，区别轻重缓急，分步实施。既要增强紧迫感，积极进取，又要从长计议，量力而行。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是党的十六大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后劲，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可以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和活力，东北经济区再度辉煌，使之成为全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此举具有多方面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当前，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和东北三省又面临着发展的机遇。西部地区要以重点工程的全面实施为契机，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集中力量办成一些对西部地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办好一些对改善人民生活有切实作用的实事，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改组、改造过程中，有关地方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挣脱旧观念的束缚，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胆进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各项改革，制订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既要有紧迫感，抓紧解决突出问题，力争尽快取得成效；又要有长远规划、有步骤推进。

促进中部崛起

“中原定，天下安”，中部地区指的是中国的山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六省。这六省处于中国的地理中部，好比是中国的心脏地区。有一句顺口溜——“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或许正能体现出中部的现状和尴尬。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6年2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

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个相邻省份，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中部依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全国28.1%的人口，创造全国19.5%的GDP，是我国的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中部就是中国的“腰”，只有“腰板”直了，中国这个巨人才能走得正、走得稳，中国经济才能协调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东西融合、南北对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部六省对中部崛起战略非常拥护，并报有很高期望。河南、湖北希望借此“中原隆起”和形成“武汉经济圈”；山西、湖南希望借助中部崛起政策，加快自身发展；安徽、江西既“东张”又“西望”，一方面积极融入东南沿海，一方面渴盼与中部其他省份一道崛起。中部六省希望中央加大对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力度，支持中部建设全国粮食核心主产区，支持中部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支持中部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中部解决交通设施的薄弱环节，支持中部治理生态和环境，支持中部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支持中部减轻财政负担。



事实上,“中部崛起”的意义远远超乎中部地区本身。在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中部省份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中部地区粮食产量约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40%,这个地区的山西、河南、江西等省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该地区的发展无疑有利于提高中国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缓解资源约束。

中部六省人口3.61亿,占全国人口28.1%,其中农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近1/3,在这一地区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将有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并通过农民增收最终助推“扩大内需”这一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其次,我们要了解“中部崛起”提出的大背景。中部六省矿产资源丰富,又是我国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才荟萃,是我国重要的科研教育中心。虽然中部地区具有如此的综合优势,但是中部地区的发展却不如意。中部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它的周围地区的发展过缓慢,这就是所谓的“中部塌陷”。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中部崛起”提出的重要性,在2005年的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中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中部地区的看法和期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为中部崛起指明了发展的方向,鼓足了中部地区干部群众的干劲。各省都制定了战略目标,形成了争先恐后争崛起的良好局面。

当然,实现中部地区崛起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中部地区还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科学发展步伐,努力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有关人士指出,中部的发展,今后一、要重点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建设。二、要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重点支持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三、要加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中部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的区位优势,促进商贸流通旅游业发展。四、要支持基础比较好的老工业城市加快企业改组改造。五、要在产业结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人民日报》开辟的《促进中部崛起》专栏，将集中展现中部崛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展现中部人民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的奋斗业绩，展现中部各省新的变化、新的风貌和美好前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中部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是我国重要的物资和产品集散交换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中部地区国土总面积 102.7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10.7%；人口三亿六千万，其中农村人口高达 2.44 亿。新中国成立后，中部地区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使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部地区的发展面临着新挑战新课题。首先是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开，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整体下降，人均 GDP 的水平与东部日渐扩大。其次是作为“三农”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中部怎样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并找准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其他地区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发展？促进中部崛起，是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没有中部的发展，在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是很难实现的。中部的发展，不仅是中部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不仅是中部人民的任务，也是全国人民的任务。

现在，中部崛起可以说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中部有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得“土”独厚的资源优势，得“才”独厚的创新优势。有举足轻重的产业规模，已经形成的开放格局，分合有序的经济协作。中部崛起，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

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进一步激发了中部广大干部群众的改革创新精神。他们突出重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巩固提高粮食、能源原材料、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稳步推进城市群的发展，增强对全国发展的支撑能力；立足现有基础，自力更生，在国家必要的支持下，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努力扩大就业，逐步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国人民关心中部崛起，支持中部崛起。崛起的中部，必将以辉煌的成就为“十一五”规划的实现，为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随着近期国家支持中部六省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以及中部六省加快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步伐,国家中部崛起战略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一些中部省份于20世纪初发出了立志“崛起”的誓言,而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中国的日趋清晰,“中部崛起”最终列入政府议事日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列入了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增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支持该地区煤炭基地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精品原材料基地、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等内容。

针对中部地区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2006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了36条政策措施,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中部崛起成为继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今年4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负责研究中中部地区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和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有关工作。国务院还下发了《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根据这一政策,中部六省将享受历史欠税豁免、税收优惠等多项优惠政策。

即将于4月26日在郑州开幕的第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与中部六省将签署促进中部崛起的合作框架协议;福建、上海、青岛、广州、宁波、天津、深圳七个口岸办将与中部六省签署中部六省口岸大通关框架合作协议;国家开发银行将与中部六省签署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南昌、赣州、郴州、武汉、新乡、焦作、合肥、芜湖、太原等9座中部城市将被商务部授予“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河南财经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小建说,现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部崛起已从“坐而论”进入“起而行”的新阶段。

早在国家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之前,中部六省就不等不靠,结合各自实际,开始探索崛起之路。煤炭大省山西围绕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目标,大力改造提升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传统产业,积极培育现代煤化工工业、装备制造业、材料工业和旅游业四大新支柱产业。安徽规划建设沿江城市带,2006年,安徽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9%,增幅居中部六省第二位。江西则依据区位优势,谋求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对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化,建设了特色鲜明的

昌—九江工业走廊。

湖南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沿京广线长沙——株洲——湘潭“一点一线”经济带，为加快崛起创造良好条件。湖北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黄冈、鄂州、天门等多座城市的武汉经济圈已经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河南则确立了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发展目标，东引西进，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2006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地区生产总值达42961亿元，占全国20.5%。中部各省发挥产业基础好，劳动力和粮食、煤炭、矿产资源丰富、价格便宜等优势，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通过项目带动，大力招商引资，仅第二届中博会六省就发布招商项目1万多个，吸引了国际、国内众多投资商的关注。即将开幕的第二届中博会，参会的世界500强和国内500强企业超过300家。法国家乐福、美国沃尔玛、德国麦德龙等国际商业巨头齐聚郑州，展开在中国中部抢滩布点的竞争，反映了中部崛起国家战略的实施，外部投资的“磁场效应”已经形成。

中部六省山水相连、省情相似、使命相同。近两年来，中部各省在奋力崛起中，急切地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愿望。半年前召开的“首届中博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说，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地区竞争不可避免，如果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共同发展，地区竞争将成为推动中部崛起的积极因素。

同是在2006年9月召开的中部六省省委书记、省长等领导参加的“中部崛起高层论坛”上，大家达成共识：中部崛起，需要六省改各自为战为携手共赢。中部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板块，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发展、统一市场建设等领域密切配合，更好地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增强综合竞争力。

随之而来的是，中部六省间频繁互访，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断。中部六省间多条高速公路、水运航线开工，在合作中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中部办”的成立为促进中部崛起，加强区域协作创建了新的机制，而中博会、中部崛起高层论坛等也为探讨、完善中部区域合作搭建了交流、沟通、合作的平台。有专家认为，合作发展的中部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板块而不仅是地理区划概念而存在。

中部六省对中部崛起战略非常拥护，并报有很高期望。河南、湖北希望



借此“中原隆起”和形成“武汉经济圈”；山西、湖南希望借助中部崛起政策，加快自身发展；安徽、江西既“东张”又“西望”，一方面积极融入东南沿海，一方面渴盼与中部其他省份一道崛起。中部六省希望中央加大对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力度，支持中部建设全国粮食核心主产区，支持中部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支持中部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中部解决交通设施的薄弱环节，支持中部治理生态和环境，支持中部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支持中部减轻财政负担。

事实上，“中部崛起”的意义远远超乎中部地区本身。在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中部省份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中部地区粮食产量约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40%，这个地区的山西、江西等省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该地区的发展无疑有利于提高中国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缓解资源约束。

中部崛起，是党中央继实施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做出的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前些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促进中部崛起，有利于提高我国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缓解资源约束；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良性互动的发展新格局。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做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中部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促进中部崛起，有利于提高我国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缓解资源约束；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良性互动的发展新格局。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资源、产业、人才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

谐，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

中部地区崛起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突出重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巩固提高粮食、能源原材料、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稳步推进城市群的发展，增强对全国发展的支撑能力；坚持立足现有基础，自力更生，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努力扩大就业，逐步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始于“六五”期间。20多年来，在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服务决策、服务社会，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功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深化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体制改革。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五年研究规划和年度项目计划。”切实加强、认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对进一步繁荣发展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正确与否，社会科学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命运。”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首要的是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保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本质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都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并在其指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为完成好党和政府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而共同奋斗。二、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意识，把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的主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服务，

是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贯要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科研方向。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意见》再次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可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社会发展这个大局，是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头等大事和根本出发点。基于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必须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引导、组织、动员广大社科工作者不断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只有精品才能进入决策，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只有精品才能很好地反映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精品才具有说服力，才能释疑解惑，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只有精品才能锻造人才。紧紧抓住精品生产，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社科规划工作才有凝聚力，才能吸引更多的社科工作者自觉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精品既包括应用研究的精品，也包括基础研究的精品。既要产生能够为党和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的优秀成果，也应当产生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传世之作。具体讲，一、要注重理论创新，注重原创性，注重实际价值。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把精品意识贯穿于课题指南、立项资助、成果转化、成果奖励等社科规划工作的各个环节。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扶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全局的研究项目，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二、积极有效地做好协调工作，加强科研协作，搞好联合攻关，力争多出有价值的精



品成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具有全局性，担负着组织协调科研部门与理论研究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要职责。应当全方位、多层次地面向社科理论界，面向全社会，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学科众多，门类繁杂。同时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正是在准确把握各类信息和各种需要的基础上，通过发布课题指南、制定研究规划，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党和国家所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地提供给大家，同时组织力量联合攻关。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已经形成了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龙头的工作体系；建立了以发布课题指南、立项资助、项目管理、奖励惩戒等为主要内容的较为规范的规划管理体制；国家和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经费有所保障并稳中有升；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优秀研究成果。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制度建设方面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影响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功能的发挥。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我们将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与各有关单位携起手来，密切合作，深入学习贯彻《意见》，开拓进取，加强高校和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在我国改革开放关键阶段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鲜明地、郑重地、完整地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回答了我们党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回答了我们党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对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必须深刻领会十七大报告的主题和灵魂，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的科学总结，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不同发展阶段所遇问题的成功探索和回答，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正确道路和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始终不渝的加以坚持和发展。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者，学习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

彻十七大，必须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激情，努力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以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在学习研究十七大精神上下功夫。学习十七大精神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原原本本反复深入地研读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章，全面准确领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要确定专题，系统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一系列重要论述。

二、以渊博的学识在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要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教书育人，让学生真正懂得为什么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战略目标结合起来，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三、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上下功夫。十七大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明确希望和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立足本职、只争朝夕、勤奋工作，积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领域出现的新课题，努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争取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向全党明确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的思想建设任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导和统领大学生理想教育，对实现大学生个人理想升华，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决定着大学生理想教育的基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当代大学生理想教育的“灵魂”和基础，它决定着大学生理想教育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定社会主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维度，其中三个维度都与精神领域有关。在当代中国，只有牢固地树立



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广大青年学生，才能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科学性，使他们在情感上和理性上都自觉接受、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他们的个人理想沿着正确的方向塑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衡量大学生理想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准。在教育大学生成为“四有”新人的目标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终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大学生理想教育的目的是使大学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价值目标。因此，能否通过对大学生的共同理想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既是衡量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准，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学生才能自觉地运用社会主义的道德和纪律来约束自己，才能产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的强大内在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振奋大学生精神、鼓舞大学生进取的有效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充分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要求，对大学生进行共同理想教育是促使大学生积极向上的重要途径。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可以使大学生明白，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现个人理想，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统领和引导个人理想的实现从实际出发，从自己做起，脚踏实地，积极进取；要在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中，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为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贡献力量。

民主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承认民主有其普遍价值，并且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刻地回答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实现方式与保障机制等重大问题，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在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上，报告强调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条“中国特色”道路的本质特征与基本模式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与核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政治模式，而是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为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报告从六个方面作了全面论述。从总体要求来说，就是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胡锦涛同志指出，要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等多方面来扩大民主。特别是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他还特别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民主，重要的是落实到权益保障上。他强调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等等。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途径、环节、机制与现实着力点上，要重点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紧紧抓住政府改革这个重要环节。报告指出，发展基层民主，使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他还强调，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同时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些论断，不仅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更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指南。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主题。完整准确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报告的一大亮点。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对于自觉坚持当代中国的正确发展道路和正确前进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要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握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二者互相联系各有侧重，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是什么、怎么走和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的问题。

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的三个内容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回答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也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实践的阶段性与创新的无限性的统一。党的十七大报告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准确概括。在当前，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永远与时代和实践发展同进步、永远保持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简称《意见》）是今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五个。一号文件不同一般。时隔18年后的今天，中央又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决策。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一件大事，这将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把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出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可见意义之深远。我们注意到，《意见》提出了四个“不仅”和四个“而且”，即“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这说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始终是我党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代中国农民，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农民的规模和数量都无法与当代中国相比。中国农民的这种数量特征，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国情之一，也是中国根本性的问题之一。因此，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好党在农村的工作，就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问题。



农民收入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标志。农民是否增加收入和减轻负担是检验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标准。我国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事实。我国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也是事实。但是，农民收入水平长期上不去，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甚至比改革开放前的城乡收入差距还要大（2002 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3.1 : 1，这一比例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高的。有专家认为，中国有如此之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难找到先例的）。这不能不使我们痛下决心，千方百计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重要目标，力争早日改变连续七年农民收入增长形势比较严峻的局面。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对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将发生负面影响。因为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的生力军和主力军都是农民。农民承载着近 13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民收入上不去，势必影响农民积极性，势必影响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农民增收减少，不仅制约着农民的生活改善，而且制约着农民再生产的投入。从这个角度说，农民收入问题，也是农业生产问题。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依托。农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每个农民的生产投入水平。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肩负着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证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的重大任务。促进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对于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至关重要。只有不断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才能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能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是抓住了农民增收的重点；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是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了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中共中央 2004 年一号文件突出强调支持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这是中央根据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实际情况，为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增加种粮农民收入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二、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

中央反复强调，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全局的大事。紧紧抓住了提高农民的收入，这实际上是抓住了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从巩固

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个角度去看，必须要让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提高农民收入的意义不仅在于加强农业基础一个作用，更重要的它对整个宏观经济，对整个经济全局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

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农民，农村是 21 世纪最有希望和最大的市场。目前农民人口在我们国家所占比例是 69% 左右。可是县和县以下的居民的购买力，在整个社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不到 40%，这是我们国内的市场很难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央早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作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的立足点来考虑。显然，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把农村市场做大，扩大内需这个方针才能真正的实现。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购买力就上不来；购买力上不去，农村市场就打不开，直接制约了对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再有，农民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支出，而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均为支出法计算的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际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动，直接影响用于生产和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动，从而影响 GDP 总量和增长速度。可以说，农民纯收入、农民最终消费和 GDP 三者之间紧密相连：农民纯收入增长直接影响农民最终消费增长，农民最终消费增长直接影响 GDP 的增长，农民纯收入通过农民最终消费间接影响 GDP 的增长，而国民经济的增长又影响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三、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目标。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认真贯彻的重要指导方针。农民收入水平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农村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影响农村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有很多，但首先是贫困问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生存环境恶劣，生产方式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程度低。贫穷导致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少数民族地区文盲率高达 30% 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超过 50%。有的地方不仅“普九”困难，“普六”也很困难。贫困导致的因争夺草场、水源、森林、土地的纠纷增多，成为敌对势力挑拨我民族关系、破坏我民族团结的缺口。因此要下功夫解决好我国的贫困问题，解决好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问题。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了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目标虽然已经明确,但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全国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小康不是真正的小康,没有农村与农民的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农村实现小康,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实现十六大确立的战略目标,必须将“三农”问题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三农”问题不仅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它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农业、农村的发展状况及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促进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前提。

四、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能安居乐业,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过沉痛的教训。历史告诉我们,经济问题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新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在农村工作的表现,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本,这是农村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制约郑国国民经济增长。因为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城乡居民的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培育和扩大城市居民需求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培育和扩大农民需求上,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市场广阔,购买潜力巨大。如果能把农民消费潜力挖掘出来,必将对国民经济发展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幅度较大，农民收入增幅缓慢。1997～2003年，农民收入平均增长率4%，仅为省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早改变，势必造成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过分悬殊，这不仅不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消除贫富悬殊的矛盾，而且还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农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首先要解决好农民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重视农村，关心农民，把农业发展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锲而不舍，使农业的综合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要求。党的十六大确定了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从现在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建设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个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重点、难点也在增加农民收入。如果农民不增收，农村不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就失去了前提和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难以实现。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是和人民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产业。农业又始终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是一个弱质产业。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对农业和农村给予支持和保护。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农业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农户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竞争力不强，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弱，更需要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通过宪法修正案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2004 年 3 月 14 日下午经过投票表决，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表决票数是：赞成 2863 票，反对 10 票，弃权 17 票。

根据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采用大会无记名投票方式，由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的多数通过。会议经过表决，赞成票超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是本次修正案中最大的亮点。

在本次的宪法修正案中，第十八条：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自然段相应地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

国家。”

第十九条：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第二十条：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二十三条：宪法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十四条：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

第二十五条：宪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第二十六条：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第二十项“（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修改为“（二



十) 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第二十七条：宪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二十八条：宪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二十九条：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职权第十六项“（十六）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修改为“（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第三十条：宪法第九十八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三十一条：宪法第四章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对如何治理国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模式。“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不奉法治为治国之道。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期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适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此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党的十六大又将依法治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按照执政为民的宗旨，国务院法制办从2003年1月开始研究《纲要》起草工作。为了使《纲要》既反映、吸收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又符合行政管理实际，2003年2月，国务院法制办委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研究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分别起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方案。这两个单位在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于2003年8月上旬完成方案的起草，并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方案建议稿。其中，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研究会起草的方案建议稿还在其2003年年会上进行了讨论。国务院法制办将两个方案建议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提交2003年8月中旬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理论研讨会进行了研究、论证。在充分吸收两个方案建议稿内容的基础上，借鉴全国依法行政理论研讨会的成果，国务院法制办经认真研究、反复修改，形成了《纲要》征求意见稿。2003年12月上旬，国务院有关领导主持召开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国家行政学院负责同志参加的征求意见会议。根据会议意见，国务院法制办对征求意见稿作了进一步修改。2003



年12月31日，国务院法制办将《纲要》征求意见稿印发国务院55个部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个较大的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各方面一致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国务院发布这样一个《纲要》，确立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充分表明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内容全面、具体、可行，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尽快印发。在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于2004年2月2日召开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论证会，对《纲要》征求意见稿作了进一步论证、修改，形成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草案）》。2004年3月16日，国务院第43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纲要》草案。会后，国务院法制办根据常务会议精神，对草案作了修改。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2004年4月20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纲要》。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法治政府。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把坚持依法行政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为了更加扎实、更有成效地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在集中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智慧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纲要的出台，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这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思想。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1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对我国总体有利，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国内也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中，各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也将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大调整既意味着大挑战，也蕴藏着大机遇。抓住了机遇，就能赢得历史性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维持统一、公平的竞争秩序，解放、发展生产力；还是加快科技教育进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套反映客观规律、为多数人认同并得到严格执行的法律制度作保障，都要求政府规范运作，依法办事，以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不够协调，更需要强调法治，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总之，要加快发展，要富民强国，就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政府的基础性、全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纲要》的出台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一）确保我们的政权不变质、不变色，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任务。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人民的公仆就可能变为人民的主人，人民的权力就有可能转化为个人的权力，由此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站到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就会产生消极腐败现象。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二）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迫在眉睫。政府工作涉及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诸多方面，任务繁重，要求很高。政府既要维持社会秩序、提高管理效率、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及时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要公正执法、尊重并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决策



和行政决定还要瞻前顾后、相对稳定，考虑行政管理的社会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创新，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统筹协调的能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依法行政的水平。总之，要完成宪法、法律赋予政府的各项职责，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和行使行政权力，并以此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基础。

（三）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是我们的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长期任务。总的原则是：风险分散，责任分担，瞻前顾后，及时处理。为此，需要依靠法制解决纠纷、矛盾，使纠纷、矛盾的解决规范、理性、有预期，而且后遗症少。矛盾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总之，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纲要》的出台，是国务院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

三、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必然。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也好，依法行政也好，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更在于它们本身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法制建设已经成为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纲要》的总体思路，（一）按照执政为民的宗旨，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为此，纲要确立了今后十年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二）既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保障和督促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此，纲要既从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权限、程序、责任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又从体制、财政、执法手段等方面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三）既规定推进依法行政的一般要求，又明确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法治政府的基础。为此，纲要在规定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确保法律实

施、严格各项监督等内容的同时，把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四）既要着眼长远，有指导性，又要立足于解决问题，有可操作性。依法行政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常抓不懈，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为此，纲要在提出今后10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的同时，又针对当前依法行政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近期工作的具体任务，并规定了落实目标和任务的具体措施。

概括起来讲，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权力，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依法行政之“法”不仅应包括法律规范，还应包括法律的一般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目的。依法行政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行政主体合法。行政主体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并具备相应的资格和条件。该项内容包括行政机关和其他行政公务组织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地位、资格和组织条件。如果进行行政活动的主体不是依法成立的或者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其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行政权的取得和行使合法。具体包括：一是行政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是固有的，而是来源于人民，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赋予的；二是行政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项内容包括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否则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行为；行政活动必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越权无效；行政主体不仅有消极的义务遵守法律的规定，而且要积极地采取行动或措施保证法律规范的实施；行政行为不仅要符合实体规定，也要遵守程序性规定。

三、行使行政权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责统一。具体包括：（一）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职责相统一；（二）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一致；（三）责任与违法相对应，违法必须受追究；（四）基于行政主体的地位和公务的要求，行政公务人员还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如对公务员的纪律要求。

正确理解依法行政的基本涵义，实践中需要纠正以下错误认识：

一、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理社会。依法行政要解决的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合法性问题，规范的是行政权力而不是老百姓。依法行政规定的是行政机关的责任，而不是权力。依法行政的含义是指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法去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用法去治行政相对人。克服以上错误认识，必须彻底抛弃传统的“官本位”观念，树



立“民本位”的观念，切实认识到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认识到依法行政是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要求。

二、依法行政就是按照行政机关制定的部门规章或文件规定“行政”。目前，在实践中存在着“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某些行政机关热衷于通过制定效力较低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扩大本部门行政权力，维护本部门利益。从而出现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互相打架、甚至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依法行政所依之法必须是符合法制统一原则的，仅依“从部门利益出发制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行政”不是依法行政。

三、简单地将依法行政的任务分解到各部门、行业、领域或者各级政府，如依法治山、治水、治林、治路、治火和依法治市、治县等，就可以实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一个全方位、全局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国家法制尚不健全，地区法制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在局部地区率先实现“法治”，同时“率先实现法治”的某些地区的简单相加也无法在全国实现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本质是依法规范、约束行政权力。具体来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治权，不是依法治事；是依法治官，不是依法治民；是依法治自己，不是依法治别人。为什么？

一、行政权力在本质上是非平等的，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公共力量，具有巨大的规模效益。因此，行政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最严重的方式。

二、行政权力同其他权力一样，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力，其本意是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其主体在本质上应该是非人格化的（这一点与权利是不同的，权利的主体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格化的，这样才能使支撑权利的权益在取得、分配和维护上落到实处）。但是，行政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又必须靠有意识、有个人利益取向的特定人来行使，因而又有一种本能的人格化倾向。这种人格化倾向使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谋取私利的主要根源。

三、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用反映多数人意志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行政权力在行使中出现人格化倾向。用法律来规范、约束行政权力，才能解决行政权力的双刃剑、双重性问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要按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中行政

处罚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纲要》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高执法效能。具体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特别是事业单位执法主体资格进行认定，对于不合法的执法主体，要坚决予以取消。当前，重点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进行清理。对于经清理确认的执法主体，应当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要求执法人员必须熟练掌握有关法律知识和相关知识。因此，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必须要通过有关的考试或者考核，持证上岗。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关于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的规定，严格执法主体资格认定。比如，湖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11条规定：“建立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登记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主体的登记审核工作，并将审核合格的执法主体名单向社会公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清理行政执法主体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健全执法主体资格制度，使执法主体资格认定经常化、制度化。

二、推进综合执法，逐步实现同一级政府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从而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自1997年至2002年7月底，全国共有23个省、自治区的79个城市和3个直辖市经批准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200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通过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初步解决了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城市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执法职责交叉、多头执法、执法扰民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层执法、重复执法问题。继行政处罚法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该法第25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实施，必将进一步解决执法交叉、多头执法的问题，为下一步的机构改革奠定基础。2002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了《中央编办〈关于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意见〉》（国办发〔2002〕56号），明确了开展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基本内容，并作出了部署。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国办发〔2002〕56号的要求和精神，积极推进综合执法工作，从根本上转变一级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在部门间过于分散的局面。

三、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彻底解决多层执法问题，首先必须减少执法层次。在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城市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即市、区两级政府和市、区、街道三级管理。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后，有些城市撤销了市、区两级城市管理局，实行一级执法。有些市政府下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各区设分局，对外以市执法局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其次，应当逐渐明确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法权限划分，从制度上消除上下级行政机关执法重叠交叉的现象。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市、县以上行政机关应当主要行使宏观指导职责。

四、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主要应当通过人民群众监督、新闻监督等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内部纠错方式，行政执法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一制度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对执法活动做出记录，并将记录结果整理归档。行政执法机关内部监督机构可以依据执法档案进行监督，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重点剖析教育有关执法人员。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使监督工作在实实在在的执法活动基础之上进行，避免流于形式。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首先，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保证。其次，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第三，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第四，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执政能力建设将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焦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需要准确把握执政能力、执政理论以及执政能力建设的深刻内涵。

执政，顾名思义，就是执掌政权的意思。要履行好执政的职能和责任，除了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好的组织体系、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所谓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执政的宗旨和内容是不同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所以我们所讲的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地代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执政能力”四个字中，关键是“执政”。它的所有“能力”，或者说，它与其他能力的不同之处，都是围绕着执政展开的。而执政本身，包含着丰富和复杂的内容。所以，执政能力如果展开来说，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 10 个方面的内容：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的纲领、路线的能力；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从严治党、拒腐防变、保持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当然，这十个方面，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和划分的。作为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明确为什么要干、干什么、怎样去干。



执政是受执政理论指导的。胡锦涛同志在今年6月29日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他在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又加了一个“执政环境”。这样七个有关执政的基本范畴，就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加强对执政理论的研究。

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七个基本范畴，好几个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对其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其中主要的应是价值取向。我们党长期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如何执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正确的理念，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就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我们的执政理念。

二、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人民基础。只有人民的拥护、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执政，也才可以执好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在人民这个基础中，我们还可以区分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法律基础问题。

三、执政方略。就是执政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执政，是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当然就要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着眼于宏观大局，谋划执政的大势、大事，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一些重大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执政的方略。如“三步走”战略、依法治国方略等等。

四、执政体制。经济有体制，文化、科技、教育有体制，政治也有体制。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作执政体制。至于其他体制，多少也与执政有关。体制，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体制与制度共同构成我们执政的制度框架。执政，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样也要在体制上下功夫。新中国成立55年来，我们已经确立了执政的基本制度，但具体的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

完善。

五、执政方式。在体制的基础上，执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具体执政，效果不一样。改革开放到今天，管理国家和社会，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行了，必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老方式管用的就继续用，不管用的就要及时舍弃、改造。

六、执政资源。办什么事情都要有资源，执政当然也不例外。哪些是执政的资源？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资源，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资源。我们一定要充分珍惜它们，恰当地使用它们，精心地保护和爱惜它们，使这些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同时还要更多地创造资源、扩展资源、积累资源。

七、执政环境。执政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研究和改善执政环境，是我们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政理论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内，我们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宽裕的经济生活环境；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一种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生活环境。在国际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构成执政能力的基本要素来看，直接影响和决定执政能力的主要有三大方面，这也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

一、执政的制度和体制。这是执政能力的基础。一切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如何、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便捷，这个制度和体制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在建立和完善执政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执政能力问题。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否设计和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体制，以及怎样运用制度体制，也是执政能力



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定要首先在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不断推进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为党的执政活动搭建一个更为广阔和良好的平台。

二、执政的主体。这是执政能力的直接载体。执政能力，最直接地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主体是谁？应该是指整个执政党。分解开来，既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也包括作为组织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执政能力是所有这些执政者和执政机构，科学驾驭和运用执政的制度、体制、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在完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领导干部素质是否优秀、能力很强还是很弱，领导机关结构是否合理、运转是否良好，都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能力的高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五个能力，虽然并不等于执政能力的全部内涵，但它们针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对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执政的方式方法。这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执政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对执政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方法对路、得当，执政水平相对就高，反之，就会遇到种种麻烦和问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执政方式，适应世界文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潮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从执政的内容上来说，21 世纪新阶段，我们提高执政能力，是要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条件下，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党的执政能力给出了一个科学而简明的定义，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这一定义，阐明了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要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就需要深刻领会这

一定义所蕴含的五个关系：一、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的关系；二、执政能力与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三、执政能力与领导制度、领导方式的关系；四、执政能力与党制定的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关系；五、执政能力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系统总结了从1989年至2002年13年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经验。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深刻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这六条经验，既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执政实践的规律性认识 and 理论升华，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始终坚持和充分运用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就一定能够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五个以”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要求，分别从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骨干力量、体制保证和组织基础的角度，指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关键、重点、基础，是对55年来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是我们党执政半个多世纪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能力”涵盖了治党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党执政活动的全部领域，它于十六大提出的“五种能力”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从最根本、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这五个方面能力，是我们党执政最全面、最根本的能力，其他能力都是包含在



这“五种能力”下面的从属能力。能否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是对我们全党的重大考验。正如《决定》指出的：“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效，最终都要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的要求。按照《决定》的要求，我们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作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简称宏观调控）是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是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增长，但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高潮后所跟随的衰退却使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种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及生产力都构成严重影响。所以宏观调控是着重以整体社会的经济运作，透过人为调节供应与需求，来达到计划经济之目标。

宏观调控是国家运用计划、法规、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多采取以下手段：

一、法律手段，指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主要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进行调节经济，有权威性和强制性；

二、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主要方法有：（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二）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规划、计划等，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是一种间接手段，但是主要手段。

三、行政手段，指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如利用工商、商检、卫生检疫、海关等部门禁止或限制某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有直接性、权威性、无偿性、和速效性等特点。

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目标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经济增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要条件。因此，促进经



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增加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就业的情况如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是我国政府的责任。我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显得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就业的增加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要增加就业，首先要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增加就业的基础。同时还必须提高就业弹性。为了提高就业弹性，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加快小城镇建设。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的波动是价格发挥调节作用的形式。但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生活是不利的。如果物价大幅上升和通货膨胀，会刺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经济效益下降；如果物价下降和通货紧缩，则会抑制投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但政府可以运用货币等经济手段对价格进行调节，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某些行政手段（如制止乱涨价、打击价格欺诈），以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

国际收支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三处谈到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凸显宏观调控在 2006 年政府工作取得重要成绩和做好 2007 年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报告第一部分在总结 2006 年完成的主要工作时，第一项工作就是“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2006 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突出的矛盾是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多大，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等。为了处理好这些问题，保持宏观经济的较快平稳增长，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一）加强土地调控，从紧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二）加强货币信贷管理，两次上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三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三) 加强财政税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 (四) 加强新上项目市场准入审核和监督检查; (五) 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监管, 着力调整住房供给结构。随着这些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落实, 其成效逐步显现, 到 2006 年年底,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出现回落, 银行信贷投放增速放缓, 部分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趋稳。可以说, 由于 2006 年我们及时而适度地采取了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 比较好地防止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有效地避免了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其次, 报告第二部分在部署 2007 年总体工作时特别强调, 为了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必须把握好一些重要的政策原则。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2007 年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 是继续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银行信贷投放规模, 注意在优化结构中努力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2006 年我们虽然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贷规模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但是与 GDP 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相比,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仍然显偏快, 目前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投资反弹的可能; 由于较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顺差的存在和外汇储备数量的大量增加, 人民银行增发基础货币的压力不减, 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缓解, 以从根本上克服投资增速过快。这都需要我们继续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报告同时强调,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 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要坚持有保有压, 不搞“一刀切”, 促进结构优化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需要在宏观调控工作中, 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各类经济行为, 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另一个方面, 是要注意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既避免出现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又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

最后, 报告第三部分在论述 2007 年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需要着重抓好的几方面工作时, 将“坚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列为了第一项任务。报告指出, 2007 年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方面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一) 2007 年要继续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 (二) 政府预算支出和政府投资要注意优化结构和突出重点, 确保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增长, 加强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资增长, 用于西部大开发的投资增长以及对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的支持; (三) 合理安排中央财政超收收



人。二、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方面政策的主要内容有，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有效缓解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积极探索和拓展国家外汇储备合理使用的渠道和方式，逐步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三、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这方面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有效增加消费需求；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条件；完善消费政策，扩大居民即期消费。四、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五、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这方面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住房；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正确运用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两个手段，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深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第8期，刊登了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韩康教授的文章，题目为《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文章认为，这一轮经济虚热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在增长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大规模发动引起的。

如何进一步实施宏观调控？文章认为，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宜全面提高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紧度。以货币信贷政策为例，如果全面性地进一步收紧货币信贷政策，不但调控杠杆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且负面效应也可能发生。对由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大规模推动起来的增长力量，中央政府进行了强制性的和行政性的举措，例如撤消了大量没有实际效率的各种开发区、严格审查并取消了一批违规项目。这些举措尽管在理论的意义不能算做市场调节行为，但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是有充分经济理由的，也肯定是有有效的。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处于上升周期，如果现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仅仅同经济上升周期可能带来的总需求过度扩张有关，似乎也不值得特别紧张，只要政府适当选择使用反周期的政策杠杆就可以了，例如适时收紧利率和紧缩政府财政开支等等。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明显具有我国特色，这些问题和矛盾同现存市场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的重要缺陷

有关。例如我国土地要素的配置几乎还没有进入市场化过程，土地价格的制定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旦出现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机会，政府就可以用土地要素最迅速、最有效地加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使用的调节土地价格的办法，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同时，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也有较大缺陷，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大量使用债务信贷，不但是形成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凭借这种没有多少市场约束的投融资方式，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和最迅速的组织方式进行项目开发，进而大幅拉动经济增长。

所以，从当前这一轮我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和经济虚热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来看，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程度、成长水平不能评价太高。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基础或制度基础，其改进和改造还要走很长的路。为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和水平，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还需要在深化体制改革、克服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方面做文章。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

历时两年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圆满结束。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并将陆续向社会公布普查的其他主要结果。

为全面掌握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等情况，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系统，为国家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服务，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在2004年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普查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内容主要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

为科学、有效地依法组织实施全国经济普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415号国务院令，公布施行了《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成立了以曾培炎副总理为组长，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民政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统计局，具体负责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两年来，经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广大普查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现已圆满完成。

这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进一步摸清了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基本情况，初步建立了全国第二、三产业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系统，并建立了基本单位名录库的维护更新制度，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以及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信息。为使普查资料能够得到充分开发和应用，依照有关规定，普查的主要汇总结果将分三期向社会发布。《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主要公布

了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基本情况，第二号、第三号公报将于近期陆续发布。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还将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开展普查资料开发应用课题研究，并陆续编辑出版经济普查资料汇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2003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已接近1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左右。但目前我们对第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状况的把握还不够全面，了解还不够深入。开展经济普查，是掌握国情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依据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本世纪前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实现工业化。通过这次普查，可以进一步认识国情，更好地发挥国力，在此基础上落实国策，更好地贯彻国法。可以跟踪产业发展动态，了解产业发展状况，摸清家底，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供科学的统计依据。这对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拓新的就业渠道，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开展经济普查是履行政府职责，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任务。随着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各方面对统计信息的需求迅速增长，信息已经成为生产要素，统计数据带有公共产品属性。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统计信息，已成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和履行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基础。另外，企业和个人对统计信息也很关注。普查得到的信息，能够引导企业正确判断行业发展和市场走向，适时做出生产经营决策，赢得市场先机和竞争优势；能够引导公众正确了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更好地发表意见，自主做出就业、消费、投资等选择。因此，进行这次普查有利于深化改革，完善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统计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市场经济各类主体。

第三，开展经济普查是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推进统计改革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这次经济普查是我国对现行统计普查内容进行改革后的第一次普查。通过普查弥补基础统计资料特别是服务业统计资料的缺口，建立健全基



本单位名录库和数据库系统，能够提高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为今后开展各类统计调查乃至实行电子政务提供抽样框架和参照系，为今后做好周期性普查与经常性抽样调查的衔接摸索经验。同时，积极采用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一般规则相衔接的统计指标、调查方法和标准，也为下一步统计改革打下基础。

第四，合并进行经济普查，是减轻基层负担，提高统计工作水平的重要措施。这次改革普查制度，把第三产业普查、工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合并为经济普查，并把建筑业纳入普查范围，使普查的项目和次数都比以往减少，周期安排也更加合理。这不仅减轻了基层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填报普查表的负担，而且提高了普查资料的可用性和可比性，有利于推进统计信息的互联互通和社会共享。这是在统计管理中体现服务于基层、提高工作效率的具体行动。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普查的结果显示，2004年末，我国共有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 516.9 万。在这些法人单位中，企业法人为 325 万个，机关、事业法人 90 万个，社会团体法人 10.5 万个，其他法人 91.4 万个。统计显示，第二、三产业活动单位为 682.4 万个，其中第二产业 167.5 万个，第三产业 514.9 万个。个体经营户 3 921.6 万户，其中第二产业 588.7 万户，第三产业 3 332.9 万户。

第二、三产业单位半数以上集中于东部地区，单位拥有量自东向西呈递减态势。在产业活动单位中，从事制造业的单位 137.5 万个，占 20.1%；批发和零售业 120.2 万个，占 17.6%；教育 59.6 万个，占 8.7%；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54.4 万个，占 22.6%。这四个行业合计占总数的 69%。个体经营户较为集中的五个行业是：工业 532.3 万户，占 13.6%；交通运输业 621.7 万户，占 15.9%；批发和零售业 1831.1 万户，占 46.7%；住宿和餐饮业 293.9 万户，占 7.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413.8 万户，占 10.6%。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刘煜辉表示，尽管在整体企业实收资本来源中个人资本只占 28%，比国家资本低了 20 个百分点，但个人资本对 GDP 的贡献度已经达到六成以上，有的估计甚至超过 7 成，因此，个人资本的效率显然更高。哈继铭也认为，个人资本对改善微观经济结构是好事，个人资本的投入，一方面降低了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也提高了公司治理的水平，相比银行资金等“别人的钱”来讲，个人资本显然更加重视回报，爱惜企业前途。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它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党中央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根本举措。贯彻落实《实施纲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主题和灵魂。按照中央要求和中央纪委部署，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现就贯彻落实《实施纲要》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1. 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围绕司法行政工作改革与发展这一中心，突出监狱劳教和法律服务两个重点，实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龙头工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拳头工程”、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源头工程”，全面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努力构建司法行政特色鲜明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腐败，为司法行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2. 主要目标。2005年，深入学习宣传《实施纲要》，逐级制定贯彻意见，认真做好任务分解，为全面落实《实施纲要》奠定坚实基础。到2007年，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巩固，司法行政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进一步健全，内外结合的监督网络进一步完善，案件查处的整体效能进一步发挥，司法行政领域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进一步解决，司法行政



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到 2010 年，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司法行政特色鲜明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惩治和预防腐败功能充分发挥，实现党员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党风政风警风行风进一步好转。

3. 工作原则。坚持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既要反映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普遍规律和基本要求，又要体现司法行政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的个性和特色。坚持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统一，既要 对 2007 年底前的工作做出具体安排，又要对 2007 年以后的工作做出远景规划。坚持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统一，既要 对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和改革各项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又要突出重点工作、重点环节、重点任务。坚持科学性与操作性相统一，既要体现规律性、前瞻性，又要切实可行、便于操作。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既要总结、发扬、运用多年来好的经验和做法，又要深入研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推动司法行政系统惩防体系建设与时俱进。

二、深化教育，打牢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

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服务为民为目标，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坚持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从业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坚持主题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普遍性教育与行业性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党组织进行灌输教育与党员干部进行自我教育相结合、运用“三会一课”等传统教育手段与运用信息技术等现代教育手段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通过教育，打牢“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思想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

切实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以执政为民为中心，加强对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教育，规范从政行为，提高办事效率。以执法为民为中心，加强对监狱、劳教人民警察严格、公正、廉洁、文明执法教育，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以诚信为民为中心，加强对法律服务人员恪守诚信、廉洁执业教育，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不断改进教育形式。从现在起到 2007 年底，主要推行五个方面的工作：
1. 认真抓好教育培训。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全系统各类培训之中，纳入各级司法行政院校、司法警官院校的培训计划。
2. 大力宣传正面典型。积极发现、总结、表彰、宣传勤政廉政典型，广泛开展“身边人说身边廉政

事”活动，充分利用正面典型进行示范教育。3. 在监狱统筹建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确保本系统处以上干部每年至少接受一次警示教育，并为外单位进行警示教育提供服务。4.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在法制日报、中国司法杂志、中国普法网等司法行政系统的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加大反腐倡廉宣传力度，有条件的开设党风廉政专栏、专页，努力扩大教育覆盖面。5. 将反腐倡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列入修订的《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建设规划纲要》。

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教育制度。健全各级党组（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每年安排两次专题学习。建立完善廉政党课制度，各级党组（党委）书记、纪检组长（纪委书记），每人每年至少讲一次廉政党课。各单位每年集中举行一次反腐倡廉形势报告会。把反腐倡廉教育列为“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廉政谈话制度，对新任领导干部进行任前谈话的同时必须作廉政谈话。各级各单位要抓紧建立健全以上教育制度，到2007年底要全部建立健全起来并坚持下去。

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把反腐倡廉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将廉政法规宣传教育纳入“五五普法规划”。在各级司法警官院校开展廉洁教育。广泛开展学唱《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等廉政歌曲活动。各单位普遍建立廉政教育宣传栏。2007年前，举行全系统反腐倡廉征文活动，编写全系统正反两方面典型录，摄制全系统反腐倡廉教育片。

三、健全制度，完善反腐倡廉的保证措施

努力构建有效制约司法行政权力行使的制度规范体系，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从业行为、按制度办事、按制度管人、按制度理财的有效机制，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制度规范就约束到哪里。及时做好制度的废、改、立，不断提高制度建设水平。通过建立健全制度，狠抓各项制度落实，努力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保证作用。

1. 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认真贯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方针，正确处理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关系。班子成员职责分工合理，权力配置适当。完善决策机制，做到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按程序决策。凡涉及重要决策、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对全局和战略性问题、重要人事任免，逐步实行票决制。健全各



级党委（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建立健全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建立健全廉政谈话制度和诫勉谈话制度。建立健全廉政档案制度。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和追究制度。探索建立对监狱劳教单位的巡视制度。

2. 建立健全行政审批制度。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不断健全并严格执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实施与监督工作程序。建立健全与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的管理和规范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建立健全行政许可项目的后续监管制度。

3. 建立健全监狱劳教执法工作制度。完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加减教期、提前解教、所外就医、所外执行、离监（所）探亲以及禁闭、严管、戒具使用等管理和监督的具体制度。健全罪犯、劳教人员日常考核、立功（记功）呈报、安排会见通信、服刑（劳教）场所调动、工种安排等环节的工作规范和程序。建立健全违法执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4. 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制度。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5+1”法规性文件。完善干部考核考察工作的制度和办法。认真落实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和管理人财物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轮岗交流制度，实行任职回避制度。建立健全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干部推荐、考察、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责任制以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逐步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

5.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预算管理和财务审批。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认真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健全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制度。积极探索会计委派制度。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服务所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

6. 建立健全工程项目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制度，实现工程建设全部实行招投标。建立健全监狱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中，土地置换、出让及资产重组等事项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所建设项目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制度。

7. 建立健全纪检监察工作体制。司法部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直属单位，建立健全内设纪检监察机构。完善省厅以下纪检监察领导管理关系，省（区、市）司法厅（局）可根据实际，稳妥地开展监察机构再派出制度的试

点。进一步推行监狱、劳教所向监区、大队派驻纪检监察员的做法。基层党委均应设立纪委。监狱劳教单位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监狱企业要建立纪检监察机构，配齐配强人员。

8. 建立健全保证制度落实的责任制。各级各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保证制度落实的责任追究机制，包括决策失误、执法过错、用人失察、失职渎职、违规违纪等方面责任追究制度。

2006 年为制度建设年，2007 年底以前建立健全以上八个方面的制度。

四、强化监督，抓住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

逐步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把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结合起来，既防患于未然，又及早发现和解决发生的腐败问题。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增强监督的整体合力，提高监督的实际效果，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

1. 突出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监督。认真监督他们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认真监督领导班子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包括议事规则的情况，认真监督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的情况。

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强对《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行政许可法》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法律服务行业管理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加强对监狱、劳教所减刑（期）、假释、保（所）外就医、监（所）外执行等执法活动的监督。加强对直接从事罪犯、劳教人员管理、改造工作的警察日常执法工作的监督。适时组织专项执法检查或抽查。规范监所管理，落实“三个杜绝”（杜绝打骂、体罚、污辱、虐待罪犯和劳教人员现象，杜绝罪犯劳教人员超时超体力劳动现象，杜绝监狱劳教所乱收费的现象）。建立健全警务督察制度和工作机制。

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把监督工作渗透到推荐提名、考核考察、酝酿讨论、任免决定等各个环节之中。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提出的“十不准”纪律规定。确定的考察对象和决定任命的人选，要予以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各级各单位对拟提拔任用的干部，在提交党组（党委）讨论前，均要先听取纪检监察机关的意见。



加强对资金、资产运行的监督。规范财务管理，加强对企事业单位资金运行的监管。加强对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考核、评估及责任追究。坚决杜绝“小金库”。加强对专项资金重点是监狱体制改革及布局调整专项资金、基层司法所建设专项资金以及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等使用情况的监管。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防止资产流失。适时组织专项检查。

2. 发挥监督主体作用。加强党内监督。各级党组（党委）、纪检组（纪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章》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全面落实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重点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的监督。认真执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按照《党章》的规定，逐步实现基层党委由选举产生。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监督作用。

支持和保证法律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自觉接受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政协的监督。坚持和完善聘请特约监督员的做法。做好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建立健全监狱、劳教所与驻监（所）检察室的联席会议制度。

深化行政监督。认真贯彻执行《行政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按照《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的意见》，开展廉政监察、执法监察、效能监察，维护行政纪律，保证政令畅通，促进严格执法，改善行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全面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坚持离任必审，逐步推进届中审计，保证重点工程和项目的审计，运用好审计结果。做好行政复议工作。

接受社会监督。省厅（局）以下单位继续深化民主评议活动。设立公开举报电话、举报箱和电子邮箱。司法部和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认真贯彻《国务院信访条例》。基层司法局、监狱劳教单位的领导要定期接待群众来访。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进一步推行并规范政务公开、狱务公开、所务公开、厂务公开、校务公开。有条件的单位积极推广电子政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在切实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要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做廉洁自律和接受监督的表率。

3. 扩大监督效果。建立监督反馈机制。对各方面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认真听取，及时研究，切实整改、解决或落实。办完一件即向监督主体反馈一件，重要情况随时反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

正确对待、处理监督情况的监督检查。

五、严肃惩治，为预防腐败创造条件

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处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以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坚持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惩治腐败与保护党员干部权利并重的原则。坚持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原则。坚持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限制从业资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强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

1. 加大办案力度。既要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也要注意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问题。严肃查处司法行政系统发生在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案件；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执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的案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肃查处重大工程项目中发生的案件；严肃查处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严肃查处监狱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发生在法律服务行业的违纪违法案件和不正之风。对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钱送钱和买官卖官，参加赌博，以及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等顶风违纪的案件，及时严肃处理。

2. 依纪依法办案。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严格依纪依法办案的意见》。坚持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方针贯穿于整个办案工作的全过程。严格按照法定权限使用办案手段和措施，切实保障被调查处理人的合法权利。切实加强对办案工作的指导、管理、监督和协调。建立协作办案机制。

3. 深化办案功能。建立大案要案通报制度，警示党员干部防微杜渐。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推行“一案双报告”和“一案双建议”制度（案件查结后，调查组提交案件调查报告和案件分析报告，提出处理建议和整改建议）。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督促有关单位或部门认真整改；对一些带倾向性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对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的弊端和薄弱环节，向有关方面提出源头治理的建议。对经过深入调查确实没有问题的，



要及时澄清是非，保护坚持原则、敢于改革的干部。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总结一次教训，制定和完善有关制度，努力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条件，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工作的治本功能。

六、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按照《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初步意见的分工方案》的要求，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提高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积极探索，为全系统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1. 努力推进司法行政法制建设。积极配合做好《律师法（修订草案）》的审改工作，继续推动《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的出台，加快人民调解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调研论证工作。根据立法进展情况及法制建设的需要，及时制定、修改相关的部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 深入进行监狱体制、劳教管理和社区矫正工作改革。按照“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目标，深入推进监狱体制改革，实现监管改造与生产经营分开运行、执法经费支出和监狱生产支出分开运行，切断监狱执法与经济利益的联系。深入推进监狱布局调整，进一步整合、配置、优化监狱工作资源，逐步解决因地缘关系带来的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回避存在的问题。深化劳动教养管理模式改革，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积极稳妥、依法规范进行社区矫正工作改革，加强对重要执行权限的监督制约，实现公开、规范运行，防止出现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3. 认真做好法律服务等业务领域的改革。深化法律服务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服务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业绩评价和考核体系，防止法律服务执业活动的趋利化倾向。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确保司法鉴定的科学、客观、公正、中立。健全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及其纪律保障体系，努力实现“最权威、最规范、最严密、最廉洁”的目标。加强法律援助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机制，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4. 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探索工作。围绕司法行政系统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紧密联系实际，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探索工作，为推动反腐倡廉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各级领导要进一步重视反腐倡廉理论研讨

工作，带头开展理论探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组织和协调好反腐倡廉理论研讨工作。各级研究机构要把反腐倡廉理论研讨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各级各单位要建立健全理论研讨制度，制定年度理论研讨计划。近几年要重点研究如何构建司法行政特点鲜明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如何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作用。要认真做好理论研讨成果的转化工作。

七、加强领导，确保《实施纲要》落到实处

1. 各级党组（党委）要把惩防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各级党组（党委）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纲要》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贯彻落实。把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融入司法行政中心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充分发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或反腐倡廉联席会议的作用，根据中央的新要求和司法行政改革发展的新实际，及时调整、补充和完善惩防体系建设的有关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中主要领导负总责，确定一名领导具体负责，其他成员根据分工各负其责。各业务部门要认真完成实施意见的分工任务。2005 年底，省（区、市）司法厅（局）、部直属单位出台实施办法；2006 年 6 月底前，各基层单位制定工作意见。

2.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各级纪检组（纪委）要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积极协助党组（党委）及时制定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及分工方案，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3. 建立健全保证实施意见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机制，把任务分解到单位、部门，落实责任，落实措施，落实要求。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加强对任务分解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把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终考核。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实行奖优罚劣。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为实施意见的落实提供有力的组织和物质保障。通过建立健全司法行政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全面推进中国司法行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颁布《反分裂国家法》、遏制 “台独”分裂势力

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颁布第三十四号主席令，宣布《反分裂国家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05年3月14日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主张，同时表明了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实践证明，《反分裂国家法》对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遏制“台独”嚣张气焰，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政府把以往对台政策的精髓内容加以法律化，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反分裂国家法》。首先，《反分裂国家法》是应对“台独”活动猖獗的产物。在岛内，李登辉在权力基础逐渐稳固后，逐渐抛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开始推动“宪政改造”、“重返国际社会”及“台湾问题国际化”等分裂活动，加紧制造“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陈水扁上台后更加快了“台独”分裂步伐，抛出“一边一国论”，推行“防御性公投”，制定所谓“台独时间表”等，将台湾同胞的身家性命作为“台独”冒险活动的赌注。

同时，国际反华势力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美国等还大量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试图通过所谓“军力平衡”来维持两岸分裂的状态。“台独”分裂势力不断散布“大陆不能打也不会打”、“即使真打美国也会帮忙”等谣言，还不断在两岸间制造事端，导致台海紧张局势步步升级。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台独”分裂活动“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如不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势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断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其次,《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不仅加剧了岛内蓝绿恶斗、族群矛盾,还将两岸关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严重干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中国大陆要谋求经济发展,就必须去除“台独”分裂活动的影响,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

再次,《反分裂国家法》与“胡四点”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核心。《反分裂国家法》总结了中国政府20多年来对台方针政策的精髓内容,以法律形式对台湾地位、台湾问题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处处体现了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诚意以及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的决心。2005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两岸关系,发表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的四点意见。《反分裂国家法》与“胡四点”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对台政策的核心,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进入了“以法制独”的新阶段。

回顾两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反分裂国家法》有效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推动两岸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一、为大陆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反分裂国家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同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反分裂国家法》对台湾地位、台湾问题的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增强了中国政府采取任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也是中国政府根据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加强构建国家对台政策法律体系的战略性举措,使大陆处理台海问题的手段越显成熟。

二、严厉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提出,“‘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分裂国家法》将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方针政策上升至法律层次,把大陆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上升为国家意志,清楚表明“‘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陈水扁面对《反分裂国家法》,也不得不无奈地表示“‘制宪’、



‘正名’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李登辉也一样做不到”。富有“深绿”色彩的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则公开表示，“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把人民拖向灾难”，“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和《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遭受连续重挫。

三、中美联手反“独”已初步形成。中国政府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向国际社会表明反对“台独”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向支持“台独”的国际势力表明坚决反对分裂国家的坚定立场。国际社会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美国等也开始意识到“台独即意味战争”的严重后果。两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台当局则不断抛出“正名制宪”等敏感议题，冲击大陆对台政策底线，破坏台海地区稳定。这也让美国逐渐认清“台独”才是台湾海峡的麻烦制造者，放任“台独”将会损害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根本利益。中美对联手反对“急独”已初步形成共识和默契，并开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条件的反“独”合作。同时“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台海稳定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台独”活动的国际空间进一步缩小，台湾“邦交国”也不断减少，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大框架更加稳固。

四、增强了岛内“反独”力量。《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不久，大陆便相继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大陆，并与三党确立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共同主张。随后国共相继举办了“经贸论坛”、“农业论坛”、“青年论坛”等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岛内掀起了一波波“大陆热潮”，民进党的“抹红”伎俩逐渐失效，泛蓝反“独”的信心与斗志不断增强。同时，《反分裂国家法》与“胡四点”都非常重视推动两岸间经贸文化交流。中国政府相继宣布简化台湾居民入出境和居留手续、正式开放台湾18种水果登陆、放宽台湾民众在大陆就业的条件限制、统一台湾学生与大陆学生的收费标准、正式宣布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并积极促成台商春节包机、推动两岸客货运包机谈判，成立中央对台经贸小组和保障台商合法权益的国台办“投诉协调局”等。两岸的深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破除了“台独”分裂势力关于两岸关系的负面宣传，逐渐化解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误解，两岸“和平发展双赢”逐渐成为岛内主流民意，“台独”市场不断萎缩。

“台独”分裂势力虽然气焰受到重挫，但并不会停止分裂国家的罪恶行为，《反分裂国家法》未来仍是“反独促和”的有力武器。《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击中了“台独”分裂势力的要害，重挫“台独”嚣张气焰，但是他们仍在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台独分子”不仅污蔑《反分裂国家法》是“战争动员法”，还极力阻挠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特别是陈水扁陷入弊案后，为维持其权位，不断抛出冲击两岸关系的敏感议题，挑衅大陆对台政策底线。2006年《反分裂国家法》颁布一周年前夕，陈水扁就强行宣布终止“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适用；2007年3月陈水扁又公然抛出“四要一没有”，声称“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只有统‘独’问题”。

回顾两岸关系的发展状况，《反分裂国家法》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陈水扁意图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冒险行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反分裂国家法》，不断强化打击“台独”分裂活动的战略优势和有利条件，维护海峡两岸和平稳定，促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的共同利益表现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的意志、共同要求、共同愿望；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不能使中华民族出现分裂。我也注意到本次表决中有两张弃权票，但弃权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上是不可能弃权的，他弃权的理由可能是对本法的某种表达方式有看法或在立法的技术性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比如有代表认为本法对“台独”的惩罚措施规定得还不够。维护这三种利益，就是本法的根本目的。它的直接目的就是一反一促三维护，即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地区、一个区域宣布独立于国家之外，这种国际惯例就变成了现在国际法上的维护领土完整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既是国家的权力，也是国家的义务。对外就是权力，维护领土完整，是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涉的内部事务。对内就是义务，保持领土的完整性是属于一个国家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要求，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满足人民的共同诉求。所以本法中第三条规定得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无论文字记载还是其他史实，都能证明这一点。中



国从明代以来，无论是荷兰占领时期，还是日本占领时期，历史记载与国际社会都认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从来没有发生改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尽管大陆与台湾没有实现统一，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现实。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均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联合国常务理事国及国际社会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即使与台保持外交关系的少数国家，他们承认的也同样是台湾是中国，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宪法在《序言》第九段对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十分明确的表述，这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神圣”一词在宪法中共出现了三次，其中两次出现在这一段落中。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对台政策的主线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从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到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再到胡锦涛的四点意见，主线都是一致的，这种稳定的一贯的对台政策上升为法律，是将执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在恰当时候通过立法方式达到高度一致。最根本的法理依据是以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法的产生。维护祖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必要指出，祖国统一问题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最高利益，这就决定了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这就是最大的法理。以法律处理分裂行为是国际通例。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容忍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都有反对分裂国家的相关法律。中国以法律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另外该法还遵循了立法的科学性原理和完备的程序。草案是经过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后，又提交到全国人大三次代表大会上审议并通过的。既有引导性的条款，也有鼓励性的条款，还有保护性的条款，当然也有禁止性条款、反对性条款和预防性条款，这些条款非常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活动可以归为3部曲，即“以武谋‘独’”、“文化台独”、“法理台独”，其所推行的“台湾正名”、“宪政改造”、“制宪公投”等分裂活动，均是“法理台独”的组成步骤，甚至公然列出时间表。“台独”分裂势力活动日渐发展到明目张胆的地步。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目的在于反对和遏制日益严重的“台独”分裂活动。从当前台海两岸关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看，对“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活动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否则，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就难以消除，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机遇就会遭到破坏，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就会被断

送，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会受损害。同时，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国 13 亿人民民意的要求。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会议，在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以空前的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这说明制定本法律，充分反映了 13 亿人民的意愿，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分裂国家法》是被逼出来的。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学习贯彻《反分裂国家法》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在会上指出，《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施行，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台盟中央坚决拥护。张克辉说，《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得到了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积极支持。然而，少数别有用心“台独”分裂分子却故意歪曲该法，误导、欺骗广大台湾同胞，煽动台湾民众敌视大陆的情绪。事实上，《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法律。采取非和平方式制止分裂国家，完全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相信大多数台湾同胞能够客观、理性地理解祖国大陆的立法宗旨。他指出，《反分裂国家法》以大部分篇幅规定鼓励和推动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直接“三通”，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的一贯主张，也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台盟今后将认真贯彻《反分裂国家法》以及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维护广大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把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落到实处。

张克辉表示，希望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化解分歧，解决争端，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共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共同开创中华民族光明璀璨的美好明天。

台盟中央副主席刘亦铭在发言时谈到，他在 2004 年 3 月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曾提出“建议制定《祖国统一法》”的提案，而现在《反分裂国家法》颁布实施了，他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刘亦铭说，制定《反分裂国家法》顺应民意，反映民情，是包括 2 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 13 亿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必将进一步激发起全体中华儿女反“独”促统的决心和力量。



《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代表人民意愿，以法律的形式反对分裂、促进统一的法律，标志着中国依法治国进入了新阶段，对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用法律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一旦发生非常事件，此法为将来采取非和平方式和其他必要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此法的制定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表明台湾问题属中国内部事务，是内战时期遗留的问题，具有国际法上公认的排他性，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当然，这部法更重要的法理意义在于定位了台湾的法理地位。即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 13 亿中国人的台湾，不仅仅是 2 300 万人的台湾，就像大陆也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大陆，不仅仅是大陆同胞的大陆一样，台湾自己无权决定自己的法律地位。除了这些法理上的意义之外，《反分裂国家法》以法的形式保持了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中国的对台政策被固定化、法律化，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本法不仅不是战争法，反而应视为是和平促进法、战争预防法。本法的大多数条款都是用来促进两岸和平交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和平交流达到最终和平统一的目的；同时设立一个禁区、高压线或者叫雷区，给“台独”分子戴上“紧箍咒”，使之只能在“如来佛”的手心里上蹿下跳，不能为所欲为。只要极端的情势不出现，战争就可以避免。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本法属于宪法相关法，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一国两制等国家的基本制度。

本法另外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它具有特殊性，也有人理解为特殊立法。首先是适用范围特殊，一切特定措施只在特定地区——台湾适用。其次是指向特定对象，在反对和遏制上指向“台独”分裂势力，在鼓励和保护上指向台湾民众。第三是针对事项特殊，即指遏制和反对分裂国家的活动，该法是为“台独”分裂势力划定底线的法，同时也是追求和平统一的目标的法。第四是具有法定授权意义。一旦“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线，分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时间是很短暂的。

1987年夏天，历史学家黄仁宇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借鉴历史经验，我们的党和政府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智慧、包容度和灵活性，《反分裂国家法》不但规定了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而且指出了海峡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步骤、方式。海峡两岸除了可以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的规划、和平统一的步骤和安排、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进行协商和谈判外，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也都可以谈。也就是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什么问题都好商量。两岸同胞同是龙的子孙，同属一个中国，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环球大洋科学考察

占地球表面 40%，总面积达 2.51 亿平方公里的大洋国际海底区域，是人类尚未充分认识和开发利用的最大战略资源宝库和共同财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加，大洋国际海底区域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是 21 世纪高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领域。

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建设海洋强国，走和平崛起与发展之路，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查清中国海、登上南极洲、进军三大洋”成为几代海洋人梦寐以求的夙愿。

我国开展大洋多金属资源的综合调查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借重“大洋一号”，这一我国大洋考察的主要海洋作业平台，在 90 年代初，我国成为了继印度、法国、前苏联、日本之后的第五个先驱投资国。

2005 年 4 月 2 日，为实现我国几代海洋人的夙愿，展示我国的综合实力，“大洋一号”船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开始了我国首次大洋环球考察的探索之旅。此次大洋环球考察历时 297 天，航行 43 230 海里，跨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出色地完成了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水文、生物等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和国际大洋科技交流的光荣任务，在我国大洋考察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矗立起我国大洋事业新的里程碑，也进一步丰富了“自强、探索、奉献、和平”的大洋精神。

我国首次环球大洋考察不少项目处在国际大洋科学研究的前沿，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突出的国际显示度。考察队员们以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志向，实践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实施海洋开发”宏伟战略。考察过程中，他们牢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开展环球科学考察，对提高海洋科研水平，掌握国际海底资源情况，增强国际海底事务中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指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超人的胆识和勇气，以卓越的才能和智慧，过运河、跨赤道、横渡好望角、穿越马六甲，航迹遍布三大洋。在西北太平洋进行了 4 座火山的多金属结核

海底资源调查和大洋环境基线调查；在北太平洋开展了环境调查；首次对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中脊设定靶区和已知区域的热液硫化物及相关海底资源进行了考察；对印度洋海啸区域进行了初步调查等。

这次环球大洋考察，全体船队员不畏艰险，探索出了一条由单一区域（太平洋）到覆盖全球各大洋区（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大洋考察新路，实现了大洋考察由单一资源调查（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向资源与科研相结合的综合考察的历史性转变，拓展了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研究开发的新领域，检验了我国自主研发的调查、科研设备，锻炼培养了一支热爱祖国、追求科学、勇于奉献、顽强拼搏的大洋科考队伍，取得了圆满成功。

考察还向世界证明了我国的海洋科研能力和水平，展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胆略和魄力，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兴海强国之路。这一创举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明、探寻海底资源、拓展生存空间，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

探索未知是科技活动的永恒主题。“大洋一号”承载着中国人民利用和开发大洋矿藏及生物资源的信念，寄托着人类探索和认识海洋的共同愿望，进行了长达 297 天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通过在北太平洋海山区实施加密地质取样和视像调查，初步圈出富钴结壳的富矿区；开展了海山区地球物理调查，完善了矿区申请背景资料；成功收回 2 套在深海地放置 2 年的深海锚系，获得了深海海底长时间系列环境参数，将为研究深海海底底层动力和环境的变化提供宝贵的资料；在多金属结核合同区开展了环境基线和多金属结核调查，履行了中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勘探合同》；对我国几年来自行研制的多项深海高新技术装备进行了试验和使用，促进了我国深海探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西北太平洋环境调查，为我国深海基础科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环境资料；获得了大量三大洋中脊海底地质、摄像和水文资料、捕捉到明显的热液喷口浊度变化；获取了硫化物、玄武岩、“黑烟囱”、橄榄岩石和生物基因等大量样品，在印度洋中脊发现了喷出的黑烟和具有热液活动明显特征成群海虾和成片海葵等生物景象，获得了海虾、海葵等多种生物样品；获得了热液硫化物样品和极端环境下生物样品；在未知区域发现热液活动异常，技术千米不同层位的海水和热液羽的信息；收集到反映海底地形和地质构造特征的各类地球物理资料和数据。自主研发、创新的电视抓斗、深海浅钻等 10 多项仪器设备得到了应用和检验。



本次科考还创造了科考时间最长，考察范围最广，航程之最远，取得的观察资料样品最多等我国海洋科学考察史上 16 项之最。

考察期间，“大洋一号”全体船队员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选择与党的需要、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世界大洋科学研究和人类和平利用大洋资源作出了突出贡献。

笔者现在就“大洋一号”船做一下简要介绍。“大洋一号”船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大洋调查科考船舶，也是我国最主要的大洋科学考察现代化平台。

1994 年，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由国外购进该船，对其进行了简单的适应性改装后，即开始执行我国大洋调查与科考任务。在执行了 4 个远洋航次的调查作业后，该船暴露出实验室、舱室布局、作业甲板、调查作业设备与现代大洋海上调查作业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加之原设计没有动力定位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等缺陷，难以满足我国大洋调查作业要求。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为了实现国家“十五”“十一五”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察和研究开发的战略目标，将“大洋一号”船打造成我国大洋科学考察的现代平台，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在 2000 年~2001 年底对“大洋一号”船进行了长达 2 年的改造论证调研和设计工作。2001 年底“大洋一号”船被送进上海中华船厂进行了为期 1 年的现代化改造。

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装备处王道顺处长介绍，“大洋一号”船在改造期间主要完成了船舶稳性的改善，使船舶的初稳性高度由原来的 0.33 米增加到 0.78 米，同时将作业甲板的高度从 5 米降至 2.7 米。更新了甲板调查设备，更换了承载能力强的 A 型架和起吊能力强，并带有减张力及止荡装置的液压吊车，同时加装了万米光缆绞车。这些改造与改装大大提高了“大洋一号”船的深海调查作业能力，通过改造与改装后的“大洋一号”可以进行声学、光学拖体作业、海底浅地层钻探、电视抓斗、保真取样等多种高精尖大洋调查作业。

在对“大洋一号”船船体和甲板调查设备进行改造、改装的同时，有关方面还重点对船载实验室进行了改造。化学、生物、地质、深海拖曳、水下机器人、多波束和重力等实验室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并增设了甲板磁力、地震、物理海洋、X 荧光、生物基因、浅剖等实验室与计算机网络中心，使实验室面积从 231 平方米增加至 524 平方米，不仅满足了当前阶段调

查任务的需求，还为以后实施新的考察项目作了前瞻性考虑。

新增设的动力定位系统，使该船在不大于6级风、一级流的情况下定点控位精度可以达到1米，航向控制精度可达1度，并能使船舶具有循迹航行和自动目标跟踪能力，大大提高了作业能力和作业精度。在对机电设备的改造中，船舶主动力、主电力和辅助机械的改造被列为另一个重点。由厂家对主机、变距桨、轴带发电机等进行了大修和改造，恢复了主推进系统的功率和主发电机的发电能力，使船舶主动力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和供电安全性得到了极佳的改善，为提高航行能力和科研仪器的电力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大洋考察是远洋作业，具有出海时间长、海上工作生活环境艰苦的特点。为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该次改造还突出改善了舱室居住性，使改造后的人均居住面积由5.3平方米增加到9.1平方米，单人住居率从12.5%增加到49.3%，同时会议室面积增大了78%，餐厅面积增加30%，并增设了图书室、桑拿浴室、改造了洗衣房、健身房，安装了空调设备，改良了通风效果。此外，通信、导航、船内通讯和娱乐设施也有了质的飞跃。

2006年1月，在海上航行300多天，执行完我国首次大洋环球科学考察任务的“大洋一号”船顺利返回青岛。这次环球大洋科考的实践充分证明：经过改造后的“大洋一号”船能够满足我国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察、研究、开发的需求，是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海洋科学调查船。

在环球大洋考察过程中，“大洋一号”临时党委精心部署，周密安排，扎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做到要求不放松，标准不降低，环节不减少，力度不减弱，激发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献身大洋事业的热情。船长陆会胜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大洋事业上，先后3次执行大洋科考任务，3年的时间，他与家人相聚的时间不到3个月。年仅39岁英年早逝的原大副刘福军，几年前患上了肝病，直到在船上吐血被船员发现后才被送进医院，医生不敢相信他从未停止过工作，船员们说他拼命工作就是为与生命抢时间。他病逝后，无论是谁，一提到他都会说：好人、好领导、好党员！

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是“大洋一号”首次环球大洋考察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法宝。参加环球考察的120名船队员，来自全国27个单位，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23岁。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踏上“大洋一号”船，就是一家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全体船队员凝聚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积极上进、工作有序、生活和谐的团队。大家相互关照，相



互支持。看到考察队员没有工作鞋，船员们自发地把新工作鞋献给考察队员；当调查仪器出现故障，船员们主动请缨帮助排除；当船员们有了困难，考察队员也是竭尽全力帮助解决。科考队员还总是将自己的取样目标和船员反复论证，最大可能减少船员劳动强度和机器消耗。真情换真心，团结出力量，正是凭着这种团结协作和甘于奉献的团队精神，“大洋一号”克服了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环球考察任务。

此次环球大洋科学考察，不仅吸纳了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科学家随船工作，还发扬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笃信和睦的优良传统，给所到各国人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成为和平的使者，友谊的桥梁。

考察期间，“大洋一号”充分利用停靠外港补给和人员休整时机，举办不同类型的对外宣传活动。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波纳佩和牙买加的金斯敦举办了两次“开放日”活动，“大洋一号”整洁靓丽的船容船貌、先进的调查设备、现代化的实验室、着装统一的船员、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队员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热情谦逊文明的态度，给参观者和当地华人华侨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开放日活动不仅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大洋前沿领域科学考察成果和高科技仪器装备，而且加深了与所到各国人民的友谊，密切了与国际海底资源管理局的关系。“大洋一号”投放到三大洋中象征和平和国际友好的“漂流瓶”，不仅代青岛小朋友向全世界朋友发出了观看 2008 奥运会青岛奥帆赛的邀请，还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大国形象，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

“大洋一号”的三大洋探索之旅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军三大洋的梦想，为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创立的“大洋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大洋事业中的延伸和升华，它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 启动节能环保工程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强化节能工作，是缓解能源约束，减轻环境压力，保障经济安全的现实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长期战略任务，必须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下大气力，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十一五”能源节约目标的实现。

能源、矿产、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各地方、各部门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建设、流通、消费领域浪费资源的现象相当严重。一些城市建设贪大求洋，汽车消费追求豪华型、大排量，住房消费追求大面积、高标准，有的产品过分包装，一些活动讲究排场、大吃大喝。这样，不仅造成资源供求矛盾日趋尖锐，煤电油运紧张，环境污染加重，导致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而且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我国资源支撑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承受。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还要增



长，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路子。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and 生活质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工业化不断推进，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城市化步伐加快，资源需求持续增加，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将越来越大。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节约资源。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既是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保障经济安全 and 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资源问题，着眼点和立足点必须放在国内。近年来，我国石油、矿产等重要资源进口越来越多，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过多地进口资源，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会加剧国际市场供求矛盾，带来一系列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控制和降低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于确保经济安全 and 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工作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切实用大力气抓紧抓好。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总的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约使用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以

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推动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科技和教育等多种手段，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节约资源，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建立节约型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城市建设模式，务求建设节约型社会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明显成效。

对于很多环保总局的工作人员，2005年的8月28日只不过是一个又需要加班的周末；但对于正推行“可持续发展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中国来说，这一天却也许具备标志蕴涵——原先个案管理层面的环保努力正试图立体出“规划与战略决策”层面的手段。

当日，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参加“绿色中国论坛”时指出，中国将积极推动以规划环评为主的战略环评，将环境因素更为系统地纳入宏观战略决策。“经过数年的摸索，环保总局认识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虽然曾在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局限和缺憾。”按照解的定义，规划环评是环境影响评价从微观到宏观的拓展，是对战略、规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系统评价。“其目的是将环境更为系统地纳入宏观的战略决策中，通过分析、预测和综合评价，提出最佳的减缓措施和政策建议，并将评价结论体现在最后的决策中，提高战略决策质量，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潘岳副局长也分析以为，就现有国情而言，战略环评的切入点在规划环评。“与传统的建设项目环评相比，规划环评定位更高，范围更广，对我国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伴随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长期任务。今明两年，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大力节约能源。认真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中提出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抓紧启动节约和替代石油、热电联产、余热利用、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重点节能工程。突出抓好钢铁、有色、电力、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大力发展节能型交通运输工具和农业机械，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控制高耗油汽车的发展。推动新建住宅、公共建筑节能和现有建筑节能改造。推广节能环保型空调、冰箱等家电产品，在公用设施、宾馆商厦、居民住宅和全社会推广采用节能照明产品。严格执行公共建筑夏季空调室内温度最低标准。在农村大力发展户用沼气工程。积极开发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二、大力节约用水。积极推广节水设备和器具，加快供水管网改造，推进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加快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搞好农业节水灌溉。大力实施高耗水行业节水技术改造，推进沿海缺水城市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严格限制超采、滥采地下水。

三、大力节约原材料。加强重点行业原材料消耗管理，严格设计、施工、生产等技术标准和材料消耗核算制度，使用再生材料，提高原材料利用率。推行木材节约代用。大力节约包装材料，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食品和用品等过度包装问题，大力推广散装水泥。

四、大力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坚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按照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要求，修订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完善土地使用市场准入制度，推进土地复垦。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试点。严格限制毁田烧砖，大搞墙体材料革新，实施第二批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计划。

五、大力推进资源综合利用。以煤矿瓦斯利用为重点，推进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以粉煤灰、煤矸石、有机废水为重点，推进工业废物综合利用。以再生金属、废旧轮胎、废旧农膜、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为重点，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积极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和秸秆综合利用。

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促进资源循环式利用，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倡导社会循环式消费。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在重点行业、领域、产业园区和城市积极开展循环经济试点。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促进产业转型、老工业基地和重化工业集中地区的调整和改造。

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形成长效机制，建立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体系。

加强宏观指导和规划，建立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城市建设模式。在生产领域，推行节约型增长方式，着力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注重发展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严格控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产业的发展，坚决淘汰严重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能力。在消费领域，大力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公用设施、公务活动、住房、汽车及日常生

活消费中，要大力倡导节约风尚，使节能、节水、节材、节粮、垃圾分类回收、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逐步形成与国情相适应的节约型消费模式。在城市建设方面，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淡水、能源等资源。要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把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和改善环境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建设节约型的交通运输体系，充分利用各种可用水资源，建设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目前正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规划的重要内容，提出明确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同时，要加快制定节水、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规划和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计划。

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构建节约资源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大对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组织开发和示范有重大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大力推广应用节约资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国家要加大对节约资源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各地区、各部门要重点支持一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技术开发和改造项目。

深化改革，建立节约资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注重运用价格、财税、金融手段促进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逐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水价、电价和油气价格改革。制定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的税收政策和发展节能节地型建筑的经济政策，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使用和运营的规定，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措施，继续实行限制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

强化监督管理，坚决制止一切浪费资源的行为。目前，我国在资源开采、储运、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普遍存在着大量损失浪费现象，重要的原因是管理松懈，监督不力。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持科学管理和严格管理，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在近期内都要认真开展资源使用情况的大检查，找出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认真整改，坚决改变各种浪费资源的现象。建立资源节约的统计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为企业和各个方面节约资源提供良好的服务。当前，正值用电高峰，电力供需矛盾突出，要加强协调调度，强化需求侧管理，鼓励节约用电和提高用电效率，确保安全迎峰度夏。



加强法制建设，完善节约资源的法律法规体系。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节约使用和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各项国家标准。建立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强制淘汰制度，完善重点耗能产品和新建建筑的市场准入制度，建立新上建设项目的资源评价体系。特别要加大资源保护和节约的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种破坏和浪费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

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认识，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放在重要议事日程。要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抓紧制定具体方案、目标、任务和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对本地区建设节约型社会负总责，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层层抓落实，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要把资源节约纳入政绩考核指标，建立节约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更好地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工作。

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都要认真履行职能，按照职责分工，围绕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指导各地方、各方面节约资源工作。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作用，共同搞好资源节约活动。

政府带头，做好表率。政府带头节约资源，既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任务，又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加大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工作力度。严禁滥用公款消费，杜绝办公浪费，实行“阳光”采购。国务院各部门要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走在全国前面，自觉做资源节约的表率。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带头做好节约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公务员都要率先垂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当前，所有政府机构都要采取严格的节约措施，突出抓好节约用电工作。要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夏季办公室、会议室等办公区域的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除重要活动和外事活动，其他公务活动可不着正装，以利节约能源。要养成随手关灯习惯，杜绝白昼灯、长明灯。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要在全社会树立节约意识、建设节约文化、倡导节约文明，教育每个公民过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要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资源节约活动，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

一粒粮。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正确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努力营造浓厚的节约资源社会氛围。宣传我国面临的资源形势，进行资源“国情”教育；宣传节约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大意义；宣传党和国家关于资源节约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标识；宣传普及节约的基本知识和方式方法；宣传节约资源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先进单位、个人的事迹，揭露严重浪费资源的现象。教育部门要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聪明才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资源节约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活动。共青团组织要在青少年中开展资源节约宣传和实践活动，教育青少年从小养成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要广泛组织开展创建节约型城市、节约型政府、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区活动。

狠抓落实，注重实效。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对各地方、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切实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和推广本地区、本部门资源节约的经验，注意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要真抓实干，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加强监督检查，把各项工作和措施落到实处，务必使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迅速行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活动，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联合国改革、胡锦涛提出四点意见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步伐意味着变革是持续不断的。联合国也毫不例外。

会员国对联合国及其秘书处、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要求大量增加。对联合国在更多的地方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服务的期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仅仅过去九年中，在维持和平行动中部署的文职人员和士兵人数已从2万增加到8万。同一时期，秘书处经管的财政资源总数增加了一倍，达到180亿美元。人道主义和人权行动的数目也急剧增加。如此大量的业务活动，更强调联合国要有能力履行为其规定的日益增多和更加复杂的任务规定，有能力以负责和合乎职业道德标准的方式经管委托给它的资金。与此同时，这些要求和期望也超过了联合国现有的结构和制度之所能。

今天，《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如同1946年那时一样依然重要。但我们实现这些目的和目标的方式则必须与时俱进。自秘书长上任以来，改革一直是优先事项——从提高和平行动的效力，到密切与民间社会和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从改进管理结构和制度，到外地工作人员的安全。

去年，秘书长在题为《大自由》的报告中阐述了他的愿景。报告筹划了包括减缓贫穷、发展、防止冲突和人权在内的组织优先事项。

2006年的报告《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涉及到秘书处的管理问题，确认了联合国在人员征聘、发展和保留的方式方面，在采购货物和获得服务来源的方式方面，以及在经管纳税人的资金并对其做出说明的方式，以全面提高效力和成果方面，需要进行大力改革。

世界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要求提出几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第一份报告于2006年3月提出：“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这份报告勾勒出今后3~5年秘书处管理改革的宏大远景。2006年下半年，又有三份报告出台，对这一愿景做出了详细论述，这三份报告是：关于“全面审查治理和监督情况”的报告、“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重新设计小组”的报告，以及“联合国全系统一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

的审查报告。这三份报告都就具有关键重要性的管理程序和结构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建议，如果获得会员国批准，将会为联合国的工作开辟出全新的途径。

一个由公共行政领域知名专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于7月向秘书长提交了全面审查治理和监督情况的报告。委员会成员对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内部的治理和监督情况进行了独立的评价。报告中所建议的一系列改进措施，将会在今后若干年中对现有的管理和治理结构产生影响。许多建议——包括设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和增强内部监督事务厅的业务独立性——具有深远影响，需要由联大第六十一届会议进行缜密审议。

也是在2006年7月，由外部司法专家组成的“重新设计小组”提交了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审查报告。重新设计小组认为，现有的内部司法系统“不合时宜，运作不良，效力低下，缺乏独立性”，所以建议设计一个“全新的司法系统”，要使它“具有专业水平，具有独立性，实行分权制”。秘书长对这一报告表示欢迎，打算在同工作人员密切协商，并且计算出所提议的新系统所需的经费总额之后，于2007年向联大第一次续会提交对这一报告的回应。

最后，一个由莫桑比克、挪威、巴基斯坦三国总理担任共同主席的高级别小组于2006年11月初向秘书长提出了全系统一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的建议。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帮助联合国对目前庞大而又分散的联合国大家庭进行精简，使它能够发挥潜力，支持各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小组指出，联合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便能够以“一体行动”履行它的使命，特别是在国家一级，如果能够克服不同机构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联合国将可发挥比现在大得多的作用。联大主席将会就高级别小组的建议展开磋商和对话。所设想的改革将要由即将就任的新秘书长和他的团队负责贯彻执行。

这三份报告如果能够导致具体而又有意义的改革，将有可能提高本组织的效力，使它更好地对各种需要做出回应。不过，由于这些建议牵涉到影响深远的组织（和财务）方面问题，所以很可能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一一实施。

与此同时，联大第六十一届会议正在处理2006年8月发表的有关人事改革的详细后续报告——“着力加强人力建设”所提出的有关人力资源改



革的详细提议。这一揽子综合性建议提出了多项根本性的改革，以使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最佳做法接轨。这些建议包括建立更积极主动、更具针对性、更快速的征聘制度，在流动性方面将总部与外地工作人员合为一体处理，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精简、简化合同安排，统一服务条件，特别是要照顾到在艰苦工作地点服务的人员。

秘书长安南将继续推动他的全面改革议程，直至他任职的最后一天，并希望会员国尽可能地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主要会期结束之前做出决定。候任秘书长潘基文将会在 2007 年 1 月 1 日接任后，确定他推行改革的优先次序。他已经强调指出，改革必须持续进行，要继续努力推进本组织的现代化。安南在当天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希望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和威望。事实上，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冷战之后，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随着美国实力的极度膨胀，联合国的制约机制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一意孤行，甚至凌驾于联合国之上。2003 年 3 月，美国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不仅动摇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机制，还对联合国这个拥有 191 个成员国的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构成了公然挑衅。为了改变联合国被逐步边缘化的局面，国际社会纷纷呼吁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安南认为“其决定性意义可能不亚于创建联合国”。实践反复证明，作为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权威，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共同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期待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联合国。安南表示，2005 年为联合国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了机遇。希望联合国把握契机，顺利走上改革之路，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国家主席胡锦涛 15 日下午出席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圆桌会议，并发表题为《坚持民主协商推动改革进程》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面对新形势，联合国面临着新挑战。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性机遇，对联合国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

胡锦涛在讲话中就联合国改革问题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要着眼大局，坚持原则。联合国改革事关联合国的前途命运，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本着对各国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加以处理。改革应该有利于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维护会员国的共同利益。这是衡量一切改革措施的重要准绳。

第二，要发扬民主，广泛协商。联合国改革涉及各方切身利益，应该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尊重各方意见，照顾彼此关切。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得到广泛支持，才能具有坚实基础。

第三，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联合国改革确有紧迫性，但越是紧迫越要把握好节奏，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对已有或能够达成共识的改革措施，可以尽快决策，及早落实。对尚有较大分歧的改革措施，可以进一步交换意见，寻求共识。这样，既可以推动改革多出成果，又可以维护会员国团结，保证改革成果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第四，要把握重点，全面推进。联合国改革涉及安全、发展、法治、机构改革等各个领域，需要统筹规划。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2/3。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得到切实维护，这是联合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大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投入，推动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应该成为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

胡锦涛最后说，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同各会员国携手努力，推动改革健康发展，让联合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稳健发展的中俄关系

2006 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接下来的 2007 年将是俄罗斯的“中国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与北方邻国俄罗斯正走得越来越近。

新年一开始的 1 月 3 日，新华社就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阿列克谢耶夫表示，在刚刚过去的 2005 年，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发展达到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最高水平。

就在不久前，新任的俄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首次以副总理身份率代表团来到了中国。2005 年 11 月 14 日下午，俄罗斯总统普京改组政府后，刚刚将他从总统办公厅主任升任为第一副总理。

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俄“国家年”活动中方组委会主席吴仪邀请，同时兼任俄方组委会主席的梅德韦杰夫，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就相互举办“国家年”活动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双方对“国家年”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仅从双方组委会主席的级别来看，和中法文化年就不同。中法文化年，中方主席是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法方主席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皮埃尔·昂格鲁米。

“中俄国家年的内涵和中法文化年（2003～2004 年）是有差别的。国家年是综合性、总体的活动，涉及贸易、科学、技术、投资、教育、卫生、两军合作等各个领域。”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年活动会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拉佐夫说，俄中政治关系在各个层面上进展得“非常好”。两国元首一年中四次会晤，两国总理举行了第十次会晤，两国议会之间互访频繁。

2005 年 6 月，中俄两国外长互换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标志着中俄边界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现在，双方专家正在协商开展边界地段的勘界工作。勘界工作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全部完成。

7 月 1 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就如何建立

21 世纪国际新秩序共同提出了 12 点主张。

8 月 18 日~25 日,中俄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一年,中俄两国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发展得很快。预计 2005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将达到 2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中国有望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俄两国高层和事务层的接触从非机制性走向机制性,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陆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5 年,两国之间建立了实质上的新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已经启动的两国战略安全磋商机制等。唐家璇国务委员率领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夫率代表团访北京,都是通过两国元首决定建立的专门沟通渠道。

“通过这个渠道,俄中就双边、多边的关键性安全问题开展实质性对话。现在,两国现有合作机制有新的增加,各专业分委会数量增加至 15 个,这些分委会覆盖中俄合作的各个关键性领域。今年,这种合作机制运转非常有效。”拉佐夫说。

不久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证明了双方的关系已是经得住考验的。事故发生后,中俄双方沟通合作渠道畅通,共同争取把污染可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陆钢认为:“松花江事件处理得非常好。”

2006 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的第 10 年。

1991 年 12 月 27 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92 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

1994 年 9 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双方签署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 年 4 月 24~26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再次访华,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而从 1997 年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到 2005 年的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国际战略观日



益接近。

2005年7月5日，中、俄共同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要求西方势力从中亚撤军。

“中俄双方配合非常好。中亚地区发生颜色革命，使原有的地区秩序受到冲击，上海合作组织起到了稳定地区的作用。中俄在上合的合作，表明两国不再局限于双边事务的互动，同时形成某种价值观上的判断。不是我们的利益是什么，而是我们认为应该追求怎样的国际关系体系。”陆钢说。

“我们在谈到人类的处世价值的时候，总是提到西方的民主、人权。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其他层面的处世价值是被西方所忽略的，譬如‘上海精神’里提到的一些元素，现在中俄正在用行动向人们宣示这种价值观。”

2001年6月15日，随着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宣布成立，体现这一组织宗旨的“上海精神”被首次明确提出，这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未来，在“上海精神”基础上对新价值观内涵的丰富将是中俄需要面对的挑战。

两个大国越走越近，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和猜测。然而，“当今世界的潮流就是发展，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都希望与各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复旦大学俄罗斯中心主任赵华胜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而且俄罗斯应该也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周边的稳定因素，对俄罗斯来说也是稳定的因素。”

专家们认为，在国际事务、周边安全和能源供给等方面，中国需要和俄罗斯合作。“对于俄罗斯来讲，中国是俄罗斯从地缘战略考虑可以抗衡或者抵御美欧东进战略的协作伙伴。俄罗斯现在的繁荣主要靠油，实际的国际战略环境非常恶劣。欧洲在整合成一个整体，美国不能对俄罗斯直接发生影响，但是可以通过欧洲，这点他们是一致的。同时，美国也开发了新战场，那就是中亚和中东。两边地缘战略的挤压，对俄罗斯影响非常大，俄希望和中国合作抵消这样的压力。”陆钢说，“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良师益友。”

“在普京自2004年进入第二任期后，为实现GDP翻两番奠定基础是其治国方略的核心目标。普京强调，俄罗斯外交应为实现‘提升经济竞争力、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全民族任务’服务。因

而通过强化中俄合作以稳定东部环境、搭乘亚太经济快车、促进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也是俄罗斯既定的战略选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冯玉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正在进行的改革，标志着普京开始正式运用中国的发展经验。9月16日，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特列季亚科夫在官方媒体《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他认为，普京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标志着普京要全面摒弃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学习中国发展模式。

另一名俄罗斯学者斯特罗卡尼在俄《政权》周刊上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经验，在普京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斯特罗卡尼认为，普京提出的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做法就是从邓小平理论中得到启发的。

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中国学习前苏联，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腾飞给了俄罗斯很多启示。

2002年12月3日，普京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普京说，他的两个女儿在学习中国武术，其中一个还开始学习汉语。

2008年，普京的任期将满。不管普京是去还是留，赵华胜认为，俄罗斯的制度应该是延续的，政治制度体系应该不会因为一个人而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会由俄罗斯的宪法框架来约束。“最主要的是，受普京路线影响的人进入俄罗斯的决策层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陆钢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在中国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党和国家的全局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简单地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必然性，又有紧迫性。

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第一，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历史的机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必然要求。依据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参照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和城乡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第二，我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但城乡之间反差拉大，“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迫切要求。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幅提高。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农业面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和市场约束、体制障碍等严重问题，成为三次产业中效益最低的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一个很难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将直接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影响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重点、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结合起来，不仅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而且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应对之策，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久之计。

第三，近年来，党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明确回答了新时期为什么要重视“三农”、怎样重视“三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和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一贯高度重视“三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和政策的集成、完善和发展。

第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始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伴随。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随后不久便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无论是在盲目冒进的“大跃进”时代，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阶段，党和国家一直不断地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现阶段党中央再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到全党面前，是在几十年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党在农村一贯的奋斗目标，是坚持党始终不渝的农村工作方向。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老题目以崭新的内容。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推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进”，重点在“建设”，核心是“社会主义”，亮点是“新”。

第五，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有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而且有着各自的特点。韩国农村建设经历了新乡村运动、到农村地区综合开发、再到农村定居生活圈开发三个阶段。起初“新农村运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援助的，不太具有可持续性，随之开展了农村地区综合开发战略。其出发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落脚点就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动农村基础建设，稳定农村社会。韩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以国家投资为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的地区开发项目，带动农民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新农村，对我们颇有启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农村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参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



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从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开始，至今共发出了从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开始，至今共发出了八个“一号文件”。今年出台的“一号文件”开宗明义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最关键的问题在农村，在农业，在农民。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此应当有明确而又深刻的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地为之努力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我国城乡差别越拉越大，198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例是1.84：1，1994年是2.86：1，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为3.22：1。在这个阶段，只有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

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强调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牢牢把握这个战略任务，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系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全局，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顺利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深刻反映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认识和把握农村问题的新高度。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业是安定天下的战略产业，农民过去是至今依然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根基。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农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目前，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三农”工作指导思想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深化、升华和发展。党的十七大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出发，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作出全面部署。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并从战略高度确定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为我们坚定意志和信心，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亿万农民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意味着在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农民工作过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牛鼻子和总抓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个目标涵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描绘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宏伟蓝图。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努力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就要深入总结农

村工作多年实践经验，认真把握新时期农村工作规律和特点，坚持农村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一、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二、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四是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五是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必须始终不渝地把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要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用更多的力量，在制度、政策、投入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进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必须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和创新。改革创新始终是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已经进入重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把成熟的改革措施制度化，探索建立新制度，以制度建设和创新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不断深化，是健全农村制度体系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我们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努力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就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尽快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状况，既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我们



要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的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财力增强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切实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化，推动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和农村民生加快改善，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必须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大趋势，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同时也要看到，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农村生活，进城务工农民相当一部分还会“双向流动”，必须建设好农民的家园。因此，既要有序转移农村人口，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发展奠定基础；又要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积极稳妥引导农村人口转移。要使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任重道远。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要把中央的精神与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提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要尽力而为、锐意进取，又要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对于那些条件已经具备或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一定要积极去做；对于那些条件尚不具备、一时难以做到的事情，要多做打基础的工作，逐步创造条件加以实现。亿万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和依靠。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进一步发挥农民首创精神，有效维护农民权益，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通过不懈奋斗，使我们广袤的乡村真正成为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十一五”期间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二、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不断凸现，使贫穷落后的乡村与现代文明的城镇处于对立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为了消除城乡分割和城乡对

立，构建城乡和谐社会。三、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社会深层次突出问题逐渐显露，特别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此，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我国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做出了部署，提出了明确任务，要求“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比取消农业税更深刻、更艰难。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意义重大，十分必要。

第一，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迫切需要。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14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和农村教育集资，还取消了种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按理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各种不合理负担也都应该取消了，但实际情况并非这么乐观。千万不能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解决了。从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一些地方农村教育、计划生育、用水用电、修建道路、农民建房、农民外出务工等领域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问题仍然存在；越权审批涉农收费项目或超范围、超标准收费，强行服务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一再发生；一些乡镇为了解决税费改革以后的财政收支缺口，出现了用行政办法大搞招商引资和以举债弥补经费缺口的现象。如果不及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下决心解决“食之者众”和转变政府职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势必是“税取消了、费又来了”，农民负担就会加重，就会失信于民。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赋税制度改革，从隋唐的“租庸调”、“两税法”，到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之所以都没能跳出周而复始的“黄宗羲定律”，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税制改革后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部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任務已经完成。只有下决心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

税费改革取得的减负成果。

第二，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键所在。为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逐年增加了对基层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从2006年起，国家财政将安排支出1 0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780多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250多亿元。尽管如此，由于转移支付的标准和额度留有缺口，而且没有考虑到近年来乡镇经费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的因素，在不少地方取消农业税势必给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造成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会带来两种严重后果：要么是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要么是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应尽的职责。解决好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减轻基层财政支出压力，做到减人减事减支；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和乡镇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机制，使乡镇财政收入能够随国家整体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必须明确，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既是为了巩固减负成果，也是为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不能以减少对“三农”的服务为代价。乡镇机构该履行的职能、该提供的服务，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逐步加强。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工作基础。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做出了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方针，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现在，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国家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已经有条件推进以前多年想改而未能付诸实施的改革。农民盼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各级政府支持农村综合改革，社会各界关心农村综合改革，共同构成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一些地方进行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进展，探索了一些路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奠定了良好工作基础。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必须抓住三个关键环节。一、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认真总结各地改革试点的做法和经验，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



个重点，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工作方式。精简人员和机构，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保证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常开展。二、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更多地承担经费保障责任。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有关规定，使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三、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提高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奖补办法。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等改革试点。按照公共财政原则，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比重。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关键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一、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

十七大报告既回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又提出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发展观念为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以此来检验改革的成败；要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和抉择，妥善解决好农村的体制机制等问题；要注意改革的全面性，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发挥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的作用；要统筹推进三大改革，并兼顾农村其他各项改革，做好综合协调，做到把握全局。

二、充分认识十六大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取得的成效及经验

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农村综合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效。（一）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农村社会安定和谐。改革以来，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屠宰税、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全面取消农业税等，理顺了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据统计，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

村税费改革共减轻农民负担总额约1 250亿元，人均减负约140元。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刺激了粮食增产，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大大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二）财政“多予”力度明显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在对农民“少取”或“不取”的同时，各级财政“多予”的力度明显加大。可以说，农村税费改革的几年，也是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力度最大的几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五保供养、农民工培训、小型水利建设等方面投入大幅度增长，初步形成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快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三）加快推进各项配套改革，促进农村体制机制变革。随着取消农业税改革进程的加快，各地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消除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弊端，不断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使农村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农村全面可持续发展。

回顾十六大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成功做法，有以下基本经验值得总结和记取：

1. 改革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曾是影响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焦点问题。农村税费改革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代表了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改革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农民、基层干部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使改革赢得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

2. 改革要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农村税费改革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利益关系复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改革中认真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总揽全局，又重点突破，保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

3. 改革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完善改革政策。取消农业税以后，影响农民负担反弹、阻碍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科学决策，适时提出农村综合改革的新任务，出台有关改革政策，一步步将改革引向深入，保证了改革既积极又稳妥地向前推进。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报告同时强调“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对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寄予了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要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十一五”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此带动和促进其他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作，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以及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建立繁荣、和谐、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在谈到发展基层民主时，报告专门强调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当前要加快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强化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等方面的职能。同时，合理调整和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确保五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创新服务方式，妥善安置分流人员；积极稳妥地推进乡村区划的合理调整。

（二）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契机，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报告提出要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政府投入办学、各级责任明确、财政分级负担、经费稳定增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对投入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要加快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教育经费支出向农村倾斜，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因地制宜地促进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合理调整，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办学质量。

（三）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报告强调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明确界定县乡政府支出责任，合理调整政府间

收入划分，加大对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财政奖励补助政策，切实提高基层政府经费保障能力；落实和完善财政对村级的补助政策，确保乡镇机构和乡村组织正常运转；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进一步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不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

（四）以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为突破口，严格控制和妥善化解乡村债务。乡村债务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要继续按照国务院关于“制止新债、摸清旧债、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原则，以地方为主化解乡村债务，优先化解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基层矛盾比较集中的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债务。当前要重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清理化解试点工作，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普九”债务化解工作做得好的地方给予适当补助。分类清理化解其他乡村债务，明确分阶段化解乡村债务的目标和步骤。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制止乡村新债的“约法三章”，严肃查处违反规定发生新债的各种行为。

（五）以解决区域性、行业性农民负担问题为重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农民负担事关农村和谐稳定。为避免改革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要密切关注农民负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切实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当前要认真巩固好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和湖区农民负担综合改革的减负成果，研究提出农业用水负担综合改革政策措施，进一步把农民水费负担减下来，从根本上解决好区域性和行业性农民负担偏重问题，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体制性因素。同时，健全对农民负担的全方位、动态化监管体系，从政策管理、机制约束、民主监督、法制保障等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在中国，农村改革问题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改革问题。譬如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保改革，还有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这些改革还是属于局部领域的、一个大的方面的改革。相对于八亿左右的农村人口，相对于发展程度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广大乡村，中国农村改革则不同了，它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意义。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说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意义可以从两



个方面来看：

一、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 30 年的道路，历经风雨取得巨大成就。30 年成就起步于农村改革，又受制于农村改革。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上考虑，中国下一个 30 年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起步于哪里？新的战略突破口在哪里？再过 30 年，也就是到了 2038 年，已接近于 21 世纪中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的目标是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等发达国家是个什么含义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标准呢？

尽管我们不赞同“唯 GDP 主义”，但我认为人均 GDP 终究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2007 年中共十七大之后，我国专家做过测算：200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210 871 亿元，约合美元 2.645 万亿，人均超过 2 000 美元；按照预计年均增长 7.5% 并以当年不变价和汇率计算，到 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约为 7.2 万亿美元，按当年总人口 14.5 亿计算，人均约为 5 000 美元。广东的专家测算是，到 2020 年，广东人均 GDP 可达 7 000 美元（其中珠三角 18 000 美元，粤东西北朝鲜 5 400 美元）。我国还有专家测算，到 2050 年，按当时 15 亿人口计算，我国人均 GDP 约为 12 000 美元左右。

上述这些数字可以大致上为我们勾画出下一个 30 年以及再长一点的时间里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目标。在已走过的 30 年里，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 9% ~ 10% 的高增长；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为了达到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我们还需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约为 6% ~ 7%）。考虑到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再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总量，人均 GDP 的指标要上去难度会更大；而人均 GDP 提高最大难度在农村。因为中国人口总量的约 60% ~ 70% 在农村，即我国现有 8 亿左右的农村人口（我认为我国农民工群体仍应属于农村人口，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群体的法定身份、主体消费和基础财产都还在农村）。中国下一个 30 年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如果不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我们一方面自豪于已有的奇迹，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奇迹背后的困难和再发展的难度。

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中央再次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农村改革，再次向全党提出农村改革发展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对中国下一个

30年的发展具有核心的、战略的、全局性的意义。

“从这个国际比较中，更能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说明中央关于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是抓住了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事关全局的要害问题。”

从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30年前改革开放伊始（1978年），中央派出了多个高级别代表团对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其中以谷牧副总理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历时36天，这个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同志20年后回忆这次考察时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这一年的6月份一个月内中央政治局开三次会听取各考察团的汇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主要领域的交往，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已成为我们党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

二、从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

从国际经验来看，或从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实地考察得到的印象和感受来看，发达国家之所谓发达，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城市建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们的农业和乡村建设也达到了现代化程度。可以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城乡生活水平同质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生活情趣、乃至衣着打扮基本相同，你很难分清谁是城市人谁是农村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保障、退休养老保障等主要社会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如可以常常看到校车接送乡村的孩子上学；城乡基础设施同步化，即道路、水电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与城市同步同标准地建设。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现代工业体系已基本建成，中国已经有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杭州、青岛、大连、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一长串的现代城市，但中西北部大多数的农村却还非常落后，更不用说城乡二元结构在管理体制上、在公共财政投入上的巨大差异了。对这种现象，有评论说“中国城市像欧洲，中国农村像非洲”。从这个国际比较中，更能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说明中央关于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是抓住了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事关全局的要害问题。



还有一点,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旦步入现代化之后其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8%。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中国的农业人口是否也要减到5%~8%呢?即便是减少到10%,意味着在未来的三四十年内我们要把现有的和新增的六七亿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能否做到这一点?能否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口转移?或者说,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无必要完全按西方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走?我们能否摸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能不能在保持相当农村人口的情况下,譬如说保持在20%左右而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可否设想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不放在城市而放在乡村居住,如果那时乡村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达到甚至超过城市的话,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可以在乡村安置相当数量的人口(加上为老年人服务的劳动力人口)吗?现在西方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是已不工作的老年人口。借鉴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之路。这是不是我们在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中可以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问题呢?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因此,我们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好的经验,又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我国国情,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

青藏铁路通车

“清晨我站在清清的牧场
看到山鹰披着那霞光
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
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
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
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唉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悠扬的歌声，优美的歌词，2006年，这一首传唱大江南北的《天路》记录了青藏铁路修建的艰辛，也记录了藏族人民对这条蜿蜒巨龙的感激和热爱。西藏，这个传说中的圣洁之地，因为这条巨龙的相连，对我们不再遥远。这一年，国人多了一个梦：坐上火车去拉萨。神秘的西藏因为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毫无疑问，将来准会有一天，横穿亚洲的快车将把坐在非常舒适的豪华火车车厢里的旅客运往那里。”法国已故著名女探险家、藏学家大卫·妮尔在1923年穿越西藏腹地时曾作的预言终得以实现。这是一项让西方媒体称之为“堪与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完成了人类铁路建设史上亘古未有的穿越。



这里有诵经的朴实的人民，这里有珍贵的藏族中草药，这里有一尘不染的蓝天，这里有稀薄却纯净的空气……西藏藏族自治区，简称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青藏高原的西南部。面积 122.84 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 1/8，仅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北最宽约 1 000 公里，东西最长达 2 000 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它北邻新疆，东北紧靠青海，东西接连四川，东南界云南，南边和西部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 3 842 公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300 年前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曾是内地进出西藏的主要通道。这是一条用生命和鲜血奠基的道路。古往今来，人们改善进藏交通的努力充满了悲怆。1953 年打通青藏公路时，平均每修一公里就有一个人倒下。为修建另一条进藏通道——川藏公路，4 000 多名解放军官兵献出了生命。新中国成立之初，修建青藏铁路被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列入议事日程。1955 年开始勘测，但很快被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打断。1974 年，全国 1 700 多名科技人员汇聚青海，展开进藏铁路“科技大会战”。然而，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实在无力承担这一艰巨工程。

好山好水好人家，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也是一种无奈的资源浪费。为了带动青藏两省的经济的发展，并增强与内地的交流；为了使内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西藏，满足西藏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利国利民；为了加强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人才流、物流、信息流，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做出积极的部署。

1983 年，邓小平同志听取西藏交通发展的汇报后说：“看来还得修青藏铁路。”1984 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艰难建成。1994 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提出修建进藏铁路。2000 年 11 月 10 日，江泽民同志在铁道部的报告上批示，要求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青藏铁路。半个多世纪，几番沉浮，进藏铁路终于在 2001 年 6 月 29 日全面开工建设。恶劣的高原气候环境严重威胁着建设者生命健康安全，随时可能引发肺水肿、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高原病。

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提出“先生存，再生产”。工程沿线建立了三级医疗机构，平均每十公里一座医院，职工生病在半个小时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施工大规模采用现代化机械设备，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青藏铁路沿线建立了 17 座制氧站，职工每人每天平均强制性吸氧不低于两小时。

在海拔4600多米的世界最长冻土隧道——昆仑山隧道施工阶段，每个施工人员都背着五公斤重的氧气瓶，边吸氧边工作。施工期间，全线共抢救脑水肿、肺水肿等急性高原病近千例，成功率100%，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

攻克禁区，筑就世界冻土工程奇观复杂的冻土环境，是制约青藏铁路建设的又一世界性难题。青藏铁路穿越了550公里长的多年冻土地区。冻土随气温变化胀缩，会导致路基破裂或塌陷。由于冻土危害，世界冻土区铁路列车时速一般只能达50公里。风火山隧道全部位于永久冻土层以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区最长的高原永久冻土隧道。风火山下冰厚150多米，这样的地质环境一直是隧道施工的禁区。中铁二十局创造性地研制了两台大型隧道空调机组，控制隧道施工温度，有效防止了地下冰融化滑塌。他们和多家科研单位合作，相继攻克了20多项世界性高原冻土施工难题。青藏铁路堪称冻土工程的“博物馆”，长达111公里的“片石层通风路基”、总长156.7公里的“以桥代路”都称得上世界奇观。专家指出，青藏铁路未来大规模出现冻土工程病害的可能性较小，行车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以上。

在西藏“神湖”错那湖畔，一条用13万条沙袋筑起的20多公里长的矮墙蜿蜒而过，将青藏铁路工地与碧波万顷的湖水隔开，有效预防了泥沙、污水进入湖中。工地建设如火如荼，“神湖”依然圣洁如昔。

青藏高原植被稀少，环境脆弱，一旦破坏，无法恢复。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青藏铁路建设要珍爱高原一草一木。20世纪50年代修建青藏公路时的取土区，至今还是白白的沙坑。因此，在新修建的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线上，青藏铁路的决策者、设计者、建设者都细致入微地将“环保”两个字坚决地渗入每一段路基、每一根钢轨和每一座桥梁上。青藏铁路环保工程的投资大约21亿元，占整个项目总投资的8%。青藏铁路总体设计师李金城说，在自然保护区内，铁路线路遵循“能避绕就避绕”的原则进行规划，施工场地、便道、砂石料场的选址都经反复踏勘确定，尽量避免破坏植被。施工沿线选用清洁能源，采取太阳能设备和电取暖设备。为防止水污染，采用先进的旋挖钻机进行钻孔，施工废水全部经沉淀、隔油处理后再排放，生活污水也都经氧化处理后再排放。

为保障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迁徙和繁衍，青藏铁路全线建立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国家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产仔迁徙时，相关施工单位主动停工为它们让道。为了恢复铁路用地上的植被，科研人员开展了高原冻土区植



被恢复与再造研究，科研人员采用先进技术，使植物试种成活率达70%以上，比自然成活率高一倍多，这些举措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青海、西藏环保部门检测结果显示，青藏铁路建设对河流水质无明显影响，冻土环境未出现明显改变，沿线野生动物迁徙条件和铁路两侧自然景观未受破坏，沼泽湿地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块净土”。历经千万年枯荣形成的草皮仅十几厘米厚，黄色沙砾被覆盖在这薄薄的腐植层下。人类在这里的任何不当行为，都会破坏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冻土融化、土壤沙化等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绝不破坏环境的罪人”，这是所有青藏铁路建设者的铮铮誓言。

谈到青藏铁路工程的环境保护，中国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王志坚透露，所有需要开挖土方的地方，施工人员会首先将草皮连根一块块深挖起来，放置在事先铺好的彩条布上，浇水养护，等工程完工后再植回到原来的土地上。管桩技术施工中使用的旋挖钻机，一台就重达60多吨。为保证这一重型机械转场时草地不被破坏，项目部专门购置了四块厚钢板，作为机械运行时的垫板。草地上，钢板一块一块的轮换着向前铺垫，托负着沉重的钻机一米一米地艰难向前延伸，每百米的转场距离，竟要耗费八九个小时！

在中铁十六局的工地上，工人们仍会记起当时施工便道两边遍插的彩旗。这些彩旗不是装饰，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环保标志。在施工过程中，为了保护草皮，施工车辆通过的便道都有严格规定，便道宽度仅3.5米，会车处为4.5米。两侧插着的彩旗就是标出的范围，决不允许车辆在草地上轧出一个印子。

十六局集团青藏铁路工程指挥长程红彬到工地检查工作，拣到一只受伤的雏鹰，立即让工作人员抱回驻地让医生进行了包扎，并指示炊事人员每天把新鲜的肉食切碎了精心饲喂。小鹰痊愈后，指挥部工作人员又把他抱回原地，并举行了放生典礼。而“家住长江尾，来到长江头，保护长江源，龙脉万古流”这则工地上的宣传标语成了大家相互激励的箴言。

第二项目部管段内有几百米施工段为野生动物通道，施工大忙季节也正值野生动物频繁过往的时节，项目部为此作了一项特殊规定：该段的一切施工项目全部安排在上午9时至下午6时之间进行，夜间禁绝施工，为野生动物夜间过往留出空当。为了降低对野生动物的惊扰，集团公司还投入800多

万元，专门购买了噪音较小的旋挖钻机。

即将全线开通的青藏铁路不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环保投资也高达15.4亿元，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工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司司长祝兴祥介绍，青藏铁路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第一个在建设施工期开展工程环境监理试点，并建立了工程环境监理制度的项目。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对穿过可可西里、楚玛尔河、索加等自然保护区的线路区段进行了多方案比选，尽量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干扰。在桥隧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野生动物穿越铁路的需要，共设了33处野生动物通道。为保护湿地，要求选线、取弃土场的选择尽量避开湿地，必须通过湖泊、湿地时，首选以桥代路方案；工程设计中充分考虑线路对地表径流的切割影响，采用桥涵措施保证地表径流对湿地水资源的补充。

祝兴祥表示，环保部门还将对青藏铁路通车后的旅游开发规划开展环评，严禁在沿线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内开展旅游。在青藏铁路正式投入运营3到5年后，还将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进一步完善、改进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青藏铁路的广大建设者表现出了“开路先锋”的精神。建设期间，许多事迹感人至深。

在清水河特大桥施工中，为解决桩基施工偏孔、塌孔的问题，中铁十二局青藏铁路指挥长余绍水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几十米深的桩孔。建设者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孤寂和艰辛，奉献出青春、亲情甚至是生命。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在海拔4900多米的冻土观测站默默坚守了40多年。原党支部书记王占吉20世纪80年代死在观测站时留下遗言：要把自己埋在风火山，一定要等到火车从身边通过。青藏铁路开工后，他的儿子王耀欣又来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工作。青藏铁路工地有五位年轻的母亲，她们的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七岁。为了能听到千里之外孩子的声音，她们每人买了一部手机。有了电话，却又怕打电话，因为一听到孩子叫妈妈，就会忍不住流泪。

“海拔高追求更高，风暴强意志更强”，这是青藏铁路建设者的钢铁誓言。青藏铁路将于2006年7月试运行，火车开进拉萨进入倒计时。火车载来了西藏人民更多的梦想。中国工程院首位藏族院士多吉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愿意拒绝现代文明和进步，铁路的建成必定会加快西藏对外开放步伐，促进西藏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根本上提升西藏的自我发展能



力。”青藏铁路的建设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就会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各族人民众志成城，是创造人间奇迹无坚不摧的力量。

青藏铁路仅通车一个月，当地群众已经从中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利益。吴英杰举例说，北京有一个西藏中学，每年西藏从当地选派优秀学生去这里学习。在铁路没有通车前，由于路费高达5 000元左右，同学和家长无力承担，学生们往往多年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而现在坐火车仅需1 000元左右的路费。青藏铁路恰逢暑假通车，很多在京的西藏学子选择坐火车回家。

党委的领导干部吴英杰在新闻发布会中说，青藏铁路开通后，建筑材料成本大大降低，目前，西藏正在积极进行农牧民安居工程改造工程，通过这项工程，将使农牧民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屋，实现人畜分离。青藏铁路的开通将为农牧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积极意义。

对于目前受关注的西藏传统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问题，吴英杰认为，西藏文化本身就具有多元化，吸取了诸多外来文化，包括一些寺庙建筑也采取了汉藏结合的形式。青藏铁路的开通对于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铁路的开通，将让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让藏文化可以走出去，更加繁荣。

加强对药品食品的监督管理、 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2006年，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将科学监管理念融入药品监管实践，为确保公众用药安全做出了不懈努力，药品监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们正处于药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药品安全需求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比较突出，药品市场秩序的混乱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安全风险仍存在于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等各个环节；防控安全风险的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集中度低，结构不合理，产品同质化严重，质量保障水平参差不齐，违法广告屡禁不止，不合理用药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药品在一些地方还有生存空间。梳理当前社会关心的药品监管热点问题，解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维护公众用药安全，促进药品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开展“再注册”淘汰问题药品。

2006年5月和7月相继发生了“齐二药”假药案件和“欣弗”劣药事件。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查封并组织召回涉案药品1944万支（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假劣药品对公众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200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还及时处置了14起药品群体不良事件和17起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坚决撤销“奥美定”产品注册文件，停止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和使用。对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鱼腥草注射液等七个品种注射剂采取控制措施，积极稳妥地开展了再评价工作，有效地防范药品安全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李连达指出，由于目前药品审批管理的政策法规存在一些漏洞，而一些不法分子又想方设法钻政策法规的空子，导致药品市场管理混乱。比如在新药审批方面，2006年批了几千种“新药”，而真正的新药却没



多少，很多所谓的“新药”，都是通过改剂型、改药名的方式生成的。药厂生产这些“新药”并不是为了提高药品质量，而是为了追求利润。问题药品出现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大了监管力度，颁布了一系列药品监管的新政策，如 GMP 飞行检查制度、驻厂监督员制度，以及计划实施的药品审批集体负责制等。李连达委员建议药品监管部门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一要狠抓队伍建设，确保监管人员廉洁自律；二要完善政策法规，确保监管措施到位。

2007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对 2002 年换发批准文号的品种和 2003 年新批准上市的品种进行再注册。药品再注册，是指对药品批准证明文件有效期满后继续生产、进口的药品实施的审批过程。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进口药品注册证》、《医药产品注册证》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生产或者进口的，必须按照规定进行药品再注册。药品再注册是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性不断提高的重要措施。通过药品再注册，可淘汰一些不具备《药品管理法》规定的生产条件，未按要求完成Ⅳ期临床试验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质量不能保证、安全风险较大的产品。

启动药品再注册工作将采取以下措施：1. 与药品批准文号普查和清理工作相结合。药品批准文号普查和清理工作是药品再注册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查明批准文号的可溯源性，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药品批准文号普查、清理工作的重点。2. 与药品再评价工作相结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组织对同类药品进行再评价，确认淘汰的品种将不予再注册。3. 与药品现场核查工作相结合。通过现场核查，重点审核药品生产工艺、条件与申报资料的符合性。

二、实施“阳光审批”加大权力制约。

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受理服务中心被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命名为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获此殊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明立做出批示，要求大力宣传，并以此推动全系统作风建设，提高工作效率。3 月 2 日下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刘怡来到局行政受理服务中心，为这支年轻的队伍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揭牌。局直属机关团委发出通知，号召直属机关全体团员青年向行政受理服务中心学习：学习他

们爱岗敬业、勤奋务实的责任意识；学习他们热情服务、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优良品德。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有清在谈到“有权必有责”时说，过去是“权、责、利”，现在是权责一致，把政府以行政手段进行权力寻租的路给堵死了。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凯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落实。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肖建章委员谈到职务犯罪时说：“只有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才可能从根本上约束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像简化审批机制、政务公开、政府大的决策采取公示制度、举行听证会这些都是改进的措施。”

2006年4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受理服务中心正式对外运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批的行政许可事项实行行政受理、技术审评和行政审批分离，彻底改变了原来行政受理与技术审评或行政审批相“捆绑”的模式。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力举措。

行政受理服务中心正式运行后，行政审批工作坚持依法审批和“集中、透明、便民、高效”原则，整合、规范了行政审批工作程序，建立行政审批工作的“阳光运行机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承担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GMP以及特殊药品生产经营等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制证与送达工作由该中心统一办理，实现了“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一次性收费、限时办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受理服务中心依照《行政许可法》，根据各业务司（室）制定的形式审查要求，负责对行政相对人申请的形式进行审查，申请受理后，在规定期限内移交到技术审评或行政审批部门处理。技术审评、行政审批部门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审评、审批工作。制证、送达等工作由行政受理服务中心统一进行。技术审评、行政审批部门的工作如果超过规定时限，行政受理服务中心要及时予以提醒、督促，并要求其说明原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明晰部门事权划分及职责分工，逐步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和技术审评联席会议制度、主审集体负责制度、审评审批检验人员公示制度、审评审批检验及现场考核人员责任制及过错追究制度、注册信息发布制度等，真正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和管权。

三、实施 GMP 飞行检查加大监管力度。



2007年1月1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媒体通报,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和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因涉嫌严重违反GMP有关规定被查处。这两家企业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飞行检查中被发现涉嫌违反GMP有关规定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依法收回其《药品GMP证书》的同时,责成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收回相关药品。

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国务院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加大对违法生产药品行为的打击力度:对24家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飞行检查,收回《药品GMP证书》13张,责令整改9家。与此同时,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专项检查工作,对8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分别采取了责令限期改正、停产整顿、收回《药品GMP证书》等行政处理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晓恩建议药品监管部门在今后的药品监管工作中继续加强对制药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李晓恩说,由于在日常生产中严格按规范运作,2005~2006年,他们的公司接受国家、省、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GMP跟踪检查”、“飞行检查”、“专项检查”等各项检查多次,均顺利通过。

对策:世界各国的监管经验证明,药品GMP是保证药品质量的科学、系统、有效的制度。

我国1985年实施的《药品管理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药品GMP的地位。2000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药品GMP组织生产。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1998年起开始实施药品GMP认证。从2004年7月1日起,我国实现了全部化学原料药和药品制剂在符合GMP条件下生产的目标。

但实际生产中,由于受经济利益驱使,部分企业质量意识、法治意识淡薄,放松对药品生产的质量管理。部分企业人员素质不高,对关键岗位人员的资质把关不严,培训不到位,极个别企业甚至有擅自改变生产工艺、改变处方、私自接受委托生产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企业违反GMP规定的行为,对药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取切实措施,加大了督促企业执行药品GMP的力度:

一、在生产领域进行全面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国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方案》,从2006年6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和

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全面检查药品生产企业执行 GMP 情况，落实生产企业质量责任和监管责任。

二、加大认证后的跟踪检查力度。每年将百余家药品生产企业列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跟踪检查计划，明确对重点企业、重点环节的跟踪检查要求，保证跟踪检查效果。

三、开展飞行检查。制定并出台了《药品 GMP 飞行检查暂行规定》。对群众举报和发生的药品不良事件（不良反应），及时派员对药品生产企业进行有因检查，发现问题，依法处理。

四、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了对重点企业的日常监管，将血液制品、疫苗、特殊药品生产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明确监管责任人和监管职责，要求监管责任人对生产企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有针对性地对重点品种、重点环节开展专项检查。

五、加强检查员队伍建设。通过制定《药品 GMP 认证检查纪律》，加强对检查员廉政教育，提高监管人员的政治素质，同时，强化对检查人员业务素质的培训，细化检查要求，严格把关，不走过场。

下一阶段，药品监管部门将结合当前药品生产监管实际，进一步完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强化药品生产动态监管，对注射剂等高风险产品生产企业实行驻厂监督员制度，进一步探索我国药品 GMP 发展方向，完善 GMP 制度，加强监管，切实提高我国药品 GMP 实施水平。

六、治理“一药多名”规范医药市场。

日前，在山西省太原市一家药店，前来买药的陈先生抱怨说，不少他原本很熟悉的“老药”纷纷改变名称，换了包装，如“伤风胶囊”现在叫“氨咖黄敏胶囊”，“咳特灵”现在叫“马来酸苯那敏片”。陈先生说，“伤风胶囊”以前3角钱一板，换名后成了2元钱一板。

一些医学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一药多名”问题。天津市民族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建华多年来一直关注“一药多名”问题。他建议应加强对药品命名的监督管理。药品命名应以化学结构为依据，若有出入应申请审批。若文字较多可附一商品名，以最先注册者为准；进口药品译名应统一。

对于仿制药命名，陈建华认为，可在 TM（商标）或 R（注册商标）后面标注国家或地区英文大写字首，如中国（China）的“C”，然后在其后根据老药品出厂先后，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商品名。如 R（或 TM）-C-1，表



示我国第一家复制的商品名，而第二家生产的为 R（或 TM）-C-2，以此类推。对于中外合资生产药品命名，则把合资双方英文大写字首并列，其他标识同上。如中国和美国（America）合资，即 R-C-A-1。

陈建华还建议药品商品名不应在社会上流通，要吸取青霉素、链霉素等药品的命名经验，同类药品重复生产，不应另起商品名称。

近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从法规建设和市场稽查等方面入手，加大监管力度，有效地规范药品名称的使用。

一、从源头上控制商品名的泛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名称管理的通知》中要求，药品必须使用通用名称，除了新化学药品、新生物制品、具有化合物专利的药品外，其他药品，包括原料药、中药，一律不得使用商品名称。对于商品名的命名范围、商品名与通用名在标签上的表现形式及字体颜色和单字面积、商标的使用位置及字单字面积等，也做了详细规定。

二、在审批环节上建立预警机制。针对“一药多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在审批环节中逐步建立预警提示机制，即当某一成分的同剂型品种申请达到一定数量时，审批部门会及时提醒药品生产企业及研发单位，从而有效地减少盲目开发和低水平重复生产。

三、加大市场稽查力度。药品监管部门陆续开展了药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专项整治活动，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品种，在严肃查处的同时，勒令企业限期改正，并通过媒体曝光。2006 年共查处了 3 435 个品种，同时还出台了加强药品广告宣传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单独宣传药品商品名，必须与通用名同时传播。

四、积极开展专项行动整顿药品市场秩序。

“自 2006 年 5 月开展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以来，我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铲除质量安全隐患。截至目前，我们的行动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6 年 12 月 28 日，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叶耀宇这样评价江苏省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所取得的成果。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员介绍，通过强化监管，监督实施药品 GMP、GSP 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了我国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了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使我国药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公众的用药安全得到进一步保证。但药品市场秩序的混乱局面尚

未根本扭转，安全风险仍存在于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等各个环节，假冒伪劣药品在一些地方还有生存空间，给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行为，消除一切不安全因素，确保公众用药安全，是当前药品监管工作的当务之急。

2006年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国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方案》，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自身职能出发，研究制定了《整顿和规范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秩序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各级药品监管部门按照统一部署，积极组织辖区内药品市场秩序整顿和规范专项工作。

在药品研制环节：全面启动药品注册现场核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组成了38个工作组，对128家企业和234个新药注册申请进行现场核查，各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照统一部署，对24610个品种进行现场核查。在此期间，企业主动撤回注册申请和品种3049个。药品注册申报严重弄虚作假行为得到严肃处理 and 纠正，药品注册申报工作进一步规范。认真开展药品批准文号普查工作，着手建立全国药品批准文号普查数据库。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严格注射剂等安全风险较大品种的技术审评标准。加强药品研究监督，组织查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违规案件30件。

在药品生产环节：加大执行GMP情况的检查力度，制定了《药品GMP飞行检查规定》、《医疗器械生产日常监督管理规定》等制度，开展药品生产专项检查。全国共派出3100多个检查组，对45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依法严肃查处偷工减料、掺杂使假、违规生产等不法行为，其中依法吊销4家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收回GMP认证证书86张，责令142家药品生产企业停产停业整顿。组织开展了血管支架类、骨科内固定器材生产企业质量体系专项检查和疫苗专项整治工作。

在药品流通环节：加大市场抽验和查处力度，2006年，全年查处各类药品、医疗器械案件33.2万件，涉案总值5.7亿元，捣毁制假窝点440个，向社会公告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违法药品广告51289件，累计依法吊销160家药品经营企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收回GSP认证证书135张，责令停业整顿药品批发企业114家，限期整改11681家。

在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的高压态势下，制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活动



受到严厉打击，药品市场秩序混乱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感有所增强，整顿和规范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07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力以赴，深入开展药品市场整治各项工作，力争在注册申报、生产经营规范、合理用药、广告整治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五、严格审查监测药品广告确保公众用药安全有效

家住北京的马先生最近听信了厂家派发的“健阳丸”虚假广告，特地到某药店买药，在药店里又听推销小姐说这个药确实好，于是掏钱买了两大盒。可服用后不见一点效果，马先生大呼上当。

跟马先生有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无任何副作用”、“根治”、“疗效最佳”等不科学表示药品功效的断言，以及“治愈率百分之x”、“获得xx最高、最新奖项”等使用绝对化语言表示药品疗效的违法药品广告，一直混淆着公众视听，成为药品监管工作的一大难点。

全国人大代表、鲁南制药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赵志全认为，遏制违法广告，关键有三点：一、执法者严格执法，让违法者不敢为；二、消费者擦亮眼睛，让违法者不愿为；三、医药企业严格自律，让违法者不能为。

针对违法药品广告屡禁不止的现象，赵龙、郑建和两位委员开出了四个“药方”：一、要修订和完善《药品管理法》和《广告法》，为药品广告的审批、监督、管理和处罚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二、要加大打击和处罚违法药品广告的力度，使得其违法成本大大高于违法收益。三、要加快企业信用分类管理体制和企业信用档案建设，把是否存在发布违法药品广告行为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依据之一，使那些无视法规、不讲诚信、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受到制约。四、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按照法律授权和职能分工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在违法药品广告泛滥的地方要开展联合执法，专项整治，重拳打击。

2006年，药品监管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整治虚假违法药品广告专项活动的部署，积极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大力开展违法药品广告整治工作。

一、严把药品广告审查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先从建立健全广告审查制度入手，通过建立“药品广告电子政务审批系统”，实现所有的药品广告在线审批，审批后的药品广告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便于公众查询和社会监督。制定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复审制度》，加大对各

省药品广告审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力度，强化药品广告审查部门的责任意识。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还加强了药品广告审查队伍建设。2006年，全国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通过“广告审批电子政务系统”审查批准的药品广告共计12319份，没有发生任何违法审查药品广告的情形。

二、加大对药品广告的监测力度。2006年1~1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对466份报纸和55家地市级电视台（频道）进行监测，共发现违法发布药品广告48990次，均移送有关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处理。同时，各省也加大了对辖区内媒体发布药品广告的监测力度，将发现的违法广告通过印发《违法药品广告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各省《违法药品广告公告》的基础上，共印发了4期《违法药品广告公告汇总》，撤销药品广告批准文号33个。同时，印发的违法公告汇总都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曝光，加大了社会监督力度和对违法发布广告的威慑力度。

三、各地积极探索整治违法广告的新举措。吉林、云南、江西、河北、山西等地对违法发布药品广告的产品在流通环节实行必要的控制措施；浙江、北京等地向违法发布药品广告的媒体发送了停止发布违法广告的建议函；陕西、浙江等地对严重虚假的药品广告向社会发布安全警示，提醒消费者安全购药；江西、山东、吉林等地把违法广告整治工作与药品零售企业监管和产品抽验工作相结合，查出一批假劣药品，部分违法违规的零售药店受到停业整顿的处罚。

此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制定了《违法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食品广告警示制度》，对违法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违法药品广告，向社会发布安全警示。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与国家工商总局就《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和《药品广告审查标准》修订内容达成一致，已在日前印发，并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在起草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管理条例》中，提出加大对违法药品广告打击力度的建议。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规范了药品广告审批，加强了后续监管，特别是加大了对违法药品广告的打击力度。如将药品广告管理与药品管理挂钩，增强了对违法企业的威慑，明确规定：对任意扩大产品适应症（功能主治）范围、绝对化夸大药品疗效、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违法广告，省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一经发现，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暂停该药品在辖区内的销售，同时责令违法发布药品广告的企业在当地相应的媒体发布更正启事，



以消除不良影响。

今后，药品监管部门将严格执行《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加大打击违法药品广告力度，同时积极探索药品广告监管与推进药品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的措施。对企业违法发布药品广告的行为予以记录，并建立“黑名单”制度，通过政府网站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视其违法情节向社会发布药品广告安全警示。严格广告审查标准，充分利用《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复审制度》和“广告审批电子政务系统”，从制度上、程序上保证广告审查公正。将违法药品广告整治与规范药品市场秩序有机结合，通过加大对违法广告的监测以及对监测结果的分析 and 汇总，为针对性地开展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管以及药品抽验工作提供有益的信息。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他强调，要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高举伟大旗帜，唱响奋进凯歌，振奋民族精神，服务人民大众，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良好氛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思想文化保证。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宣传思想战线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各项工作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在改革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宣传思想工作保持了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

胡锦涛强调，党的十七大站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和各族人民对文化工作的新期待出发，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和我国文化建设地位的准确把握，也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

胡锦涛指出，我们要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审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意义。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宣传思想工作担负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大任务，担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使命。

胡锦涛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要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高举旗帜，就是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围绕大局，就是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 and 精神，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创新，就是要用时代要求审视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精神推动宣传思想工作，积极创新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努力做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胡锦涛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全民族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培育文明风尚；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文化发展活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进一步展示和提升国家

良好形象。

胡锦涛强调，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才能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准确把握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新变化，深入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形成鼓励创新创造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丰富文化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极大丰富文化品种、样式、载体、风格，让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才华充分施展，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努力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胡锦涛指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各级党委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强和改善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全面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把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把原则要求与具体措施结合起来，加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宣传思想工作扎实推进、富有成效。

李长春在主持座谈会时说，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十分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精辟论述了宣传思想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新成绩，深刻阐明了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宣传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讲话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十七大代表在讨论报告时说，任何社会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此来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在新形势下，如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宣传思想战线按照这一要求积极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工作成果。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代表们表示，一定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凝聚起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1 世纪新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至为关键。

如何理解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理解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作了清晰的分析和回答。从 2003 年出版《干部群众关心的 25 个理论问题》至今，每年一本的该系列读物，针对当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解疑释惑，实现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与群众理论渴求的有效对接。

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战线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努力做到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大学生为重点，掀起全党全社会的理论学习热潮。组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团，做好《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工作，推动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纵深发展；通过推出《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等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等通俗理论读物、《复兴之路》等电视理论专题片，开展“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等主题宣传，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使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益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同时，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以多种形式析事明理，统一思想。

“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思想保证。”代表们表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

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

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用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愈显重要。这个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代表们说，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宣传思想战线肩负重要的责任。

党的十六大以来，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根本任务，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主攻目标，落实“三贴近”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等重大主题宣传，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宣传，重大纪念活动的宣传。各媒体持续掀起宣传报道热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日益深入人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成就宣传，青藏铁路、南水北调、三峡工程、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报道，“时代先锋”、“永远的丰碑”、“劳动者之歌”等栏目，有声势有力度，鼓舞和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理想是灯塔，是引领社会进步的航船。”十七大代表、山东日照市委书记李兆前深有体会地说，依靠人民群众写好经济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正是宣传思想工作到位，共同理想深入人心，才有了近年来日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增10%、生产总值突破500亿元的发展成绩。

代表们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中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目标追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是引领和激励我们团结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致的体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精神品格，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代表们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树立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的精神旗帜，激发全体人民共同奋



斗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战线集中推出郑培民、牛玉儒、杨业功、李素芝、许振超、王乐义、任长霞、宋鱼水、张云泉、方永刚等重大典型。这些典型产生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代表人民群众意志和社会前进方向，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崇敬，起到了很好的典型示范作用。同时，利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抗击非典斗争、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等重要契机进行宣传，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红色旅游，使更多人受到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思想基础。”十七大代表、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说，回顾历史，无论面对多少困难挫折、艰难险阻，中华民族始终高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火炬，生生不息，奋发进取。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振兴的精神源泉和保证。”代表们表示，一定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推进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就业和再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约为1 400万到1 500万人，而且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但有关人士认为，解决上述问题还是有条件的。

首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的政治任务，作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措施。

第二，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我们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巨大就业空间，当前，就业的潜力还很大。预计“十五”期间，将新增就业岗位4 000万个。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为就业岗位的开发创造了条件。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的主要出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一般在70%左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50%左右，而我国只有28%；发达国家社区服务从业人员约占就业总人口的30%左右，而我国只有4%。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企业结构看，我国新增就业岗位的80%以上来自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另外，国家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扩大就业将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中央确定了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方针，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和养老、医疗保险制



度，取得了重大成效，为进一步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在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对就业困难群体实施就业援助、加强就业服务和再就业培训等方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切实有效的做法，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2日下午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统筹协调做好各项工作，实现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学习内容是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弘研究员、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何平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社会保障工作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认识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工作扎实推进，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胡锦涛强调，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把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优先目标，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城乡、整体设计，分步实施、配套推进，积极而为、量力而行，逐步将各类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实现城乡统筹和应保尽保。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以及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已有的各项保障制度，要不断完善政策，扩大覆盖面。特别是要适应统筹城乡发展新形势的要求，抓住社会保障制度薄弱环节加以推进，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制定实施适

合农民工收入低、流动性强特点的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加快解决关闭破产和困难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切实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逐步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保障范围。要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发挥失业保险基金预防失业、促进就业作用。要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逐步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等待遇水平，切实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城镇困难家庭、离退休职工、在校贫困大学生基本生活。

胡锦涛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整合，抓紧制定实施全国统一的各种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程度，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增加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助，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工伤保险待遇，不断充实和壮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增强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社会保障权益。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社会保障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统筹协调、抓好落实。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研究，深刻把握社会保障特点和规律，增强社会保障工作系统性。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尊老爱幼、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好局面。

社会保障是指当社会成员因为年老、疾病、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致使生活困难时，能够从国家、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的保障体系。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搞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失业保险的范围覆盖到城镇的各类企业和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覆盖到城镇全部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的所有职工。同时，努力探索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办法。



近5年来,中国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扩大就业,加强人才制度改革方面取得良好的进展。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民生问题仍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今后人社部的工作重点仍是民生为本,人才优先。

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是中国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就社保制度进行立法。尹蔚民说,《社会保险法》是一部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关乎每个公民的福祉保障的法律。

尹蔚民说:“《社会保险法》最重要的一些亮点和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覆盖全民,二、统筹城乡,三、突出维权,四、规范管理。统筹城乡应该是这部法律的一个很大的特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从城市开始建起,逐渐向农村延伸,这次法律明确的把十亿农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的体系当中。”

未来五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将在医疗、养老保险等领域加大工作力度,希望在“十二五”期间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是民生之本。过去的五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累计2700万人,毕业生离校时的初次就业率稳定在70%左右。与此同时,统筹城乡就业也取得新的进展,取消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建立了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未来的五年,作为一个拥有13亿的人口大国,尹蔚民说,就业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尹蔚民说:“‘十二五’期间我们预计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仍然会达到2400万到2500万,比‘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还要略多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结构性的矛盾,我们有大量劳动力和岗位不相匹配,企业急需的一些岗位找不到一些合适的人,所以会产生一些结构性的矛盾。”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才是最主要的推动力。民生为本,人才优先。过去的五年,中国的人才队伍建设得到了有效推进,均衡发展,统筹兼顾,选拔精英。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推进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这些都说明了国家对于人才的重视。今年,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尹蔚民说,今后将从三个方面培养人才。尹蔚民说:“我们在‘十二五’期间,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就是着眼于创新型国家的建立,要大力培养创新型的科技人

才，第二就是着眼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一些领域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第三就是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队伍为主来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这次《人才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大工程，确定了若干个重大政策，就是通过这些工程，通过这些政策把我们对人才工作提出的目标最后落到实处。”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我国今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社会发展目标，胡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笔者认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崇高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全面深入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城市-农村将由原来的相对独立和隔离的二元对立状态走向依赖型、融合型、互通型的新型关系。目前社会关系也由原来的土、农、工、商演变成更复杂的各种利益主体，应对经济、社会已经出现的各种变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平衡、发展新型社会各种社会、经济、利益问题的中心杠杆，通过不断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生活和医疗卫生问题都可以纳入到这一核心体系中，政府在民生这一块的职能将进一步向服务型转变，整个社会将变得更加有序和谐。

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是日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大功能将能极大的调节、平衡、满足“社会保障群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社会形成一种有弹性的内在稳定型的形态，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形成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生态系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是一个质的跨越，将极大的焕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从对土地、对家庭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意义上、法律意义上、社会意义上的个体存在而生存发展，这对建立一个成熟、理性、法治型的现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是巨大的。

我国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大国正在兴起，在当前各项事业不断欣欣向荣的发展的繁荣局面下，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必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注入更大的活力。因而，大力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成为可能，也成为时代赋予的紧迫任务。



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

实行改革开放 30 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政府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各级政府机关加强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严格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大行政救济力度，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走过了一条艰难前行、成果丰硕的政府法制建设道路。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经过起步发展、规范发展、全面发展这样三个发展时期的我国政府法制，逐渐发生了如下 8 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法治观念逐步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反思传统人治观念的基础上，我国政府法制逐步确立起依法行政观念，进入 20 世纪末期又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并上升为宪法原则。第二，政府法制的权力结构从重权力、轻权利向权力和权利并重转变。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使权力结构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促进了这一转变，初步形成了权力和权利良性互动的局面。第三，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随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将部分职能让渡于社会，发生了公共事务民营化的转变，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职能，例如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职能。第四，行政法治机制从单纯的制约机制转变为制约和激励的兼顾协调。第五，行政行为方式从纯粹的命令—服从模式发展成为强制与非强制手段并用的多样化局面。第六，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上，从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发展到实体和程序并重，结果和过程并重。第七，在对行政的监督上，从单纯的权力监督，发展到权利救济和权力监督并重。第八，行政法制模式从单纯依靠政策行政到依法行政，再到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变化是广泛和深刻的，对于政府法制建设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但是，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现代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相比，我国政府法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和差距，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亟需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我国的政府法制建设，不能简单地把国外东西照搬进来，必须注重与本土资源的结合改造。事实上，以往不少地方行政改革创新的本土经验，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央层面的立法建制和整个政府法制建设，都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促使我国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模式，在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行政理念的指引下，由过去的集权行政、粗放行政、人治行政、管理行政，逐步转向民主行政、科学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正稳健地走向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个中经验值得认真研究。行政法学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法制的理论发展、观念演进特别是方法论改进表现出5个突出特点，其第一个就是从简单拿来主义，到选择他山之石与挖掘本土资源、创新中国经验相结合。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服务型政府建设蓄势待发。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纲要开启了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建设的先河。随着纲要的发布，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各地陆续启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开始提速。2008年5月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用法律打造透明政府”，条例被各界评价为“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日前，来自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民政部等国家机关的代表及众多知名学者齐聚湖南长沙，参加第二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代表们感兴趣的不只是论坛的主题“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更兴奋的是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我国首部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省级规章，也是全国第一个为服务型政府立法的“法律蓝本”——《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征求意见稿）》。

“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将政府服务固定为法律上的义务，



使政府服务成为一种硬约束，既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的有效途径。”在向与会者作起草说明时，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张建华谈出了自己对服务型政府立法必要性的认识。而正是基于对立法必要性的充分认识，在初步完成法治政府建设五年规划目标的基础上，湖南省政府决定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和服务型政府法治化进程，并决定今年制定出台《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就服务型政府立法，在全国还是第一次。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即怎样给这个《规定》定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张建华介绍说，“对《规定》的起草工作，我们拟定了四个指导原则：起点较高、理念较新、内容较全、措施较实。”

正在征求意见的《规定》分为总则、政府服务主体、政府服务内容与措施、政府服务平台、政府服务公开、政府服务保障、监督管理、附则等8章，共206条。不仅明确了政府服务应该遵循合法、公平、公开、参与、高效便民、普遍、适度、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等原则，而且规定市（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统一的全天候的社会救助中心、公共企事业单位要编印服务手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该设立行政效能中心并在30日内办结行政效能投诉案件。这是继2008年出台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划行政程序的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和2010年出台《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之后，湖南省政府法治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引人瞩目的一步。

湖南的服务型政府立法正待瓜熟蒂落，而各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为了规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为，不少地方制定和发布了专门的有关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间有先后，亮点各不同。

早在2003年2月，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出台了《关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推行行政法治化，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快建设公平、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快建立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等任务及措施。服务型政府建设有了具体的操作指南。

2005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服务型政府机关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按照以市场和企业为社会主体的要求，切实把服务作为政府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能的起点，通过更新行政理念，改革行政体制，转变政

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该意见明确要“使政府治理模式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2008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推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系列举措，打造与群众“零距离”的服务型亲民政府。引人注目的是，该意见将企业管理模式首次引入政府管理，提出“在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教育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7个部门试行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期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升行政效率。

从今年5月1日起，一项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创新立法——《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在行政服务项目的设定、提供机关及方式、程序、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制定规范管理行政服务地方性法律制度。通过这项立法，政府为公众提供行政服务将成为一种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如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服务申请不予受理、不提供或不及时提供都将被追究责任。这部颇具特区特色的立法也填补了我国行政服务立法的一项空白。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需要观念更新，更需要法治保障。“建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由原来的单纯控制者和裁判者，转变为引导者和服务者，意味着施政目标完全由行政机关和专家决定，转变为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政府从以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提供服务为要务，管理目标由经济领域更多地转移到公共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认为，“服务型政府适应了我国面向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两个过程一起走的现实，是一种更理性、有效率的政府模式”。

“现代政府首先是法治政府，对行政权力的法治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张穹指出，“依法履行职责，对法律负责，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法治的具体体现和重要载体。推进依法行政，关键是提高政府的法治水平，将政府服务纳入法治轨道。”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熙瑞认为，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形成一整套规范公务员服务行为的法律法规。刘熙瑞建议，在服务型政府法治建设上，要做到“问政于民”、“决政于共”、“行政于和”、“监政于公”。其中，“监政于公”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政府必须接受公民监督；二是服务过程和内容必须公开；三是监督的标准要体现公平公



正；四是发展各种公共渠道，保护人民群众利用网络、报刊等各种传媒监督政府的积极性。

努力建设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政府，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我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深深启迪我们，谋求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之一，在于准确把握政府职能定位，全面实现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从“信用缺失”向“诚信政府”转变，变“细职能、大政府”为“宽职能、小政府”，其核心是建设法治、诚信和服务型政府（以下称“三型”政府）。具体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坚持高效便民，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责不是计划、组织和指挥经济活动，而是指引经济发展方向、创造环境，为经济和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其重点强调的是政府履行职责不是管理、管制，而主要是服务。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管理就是服务，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做社会公众的“忠实服务员”。结合卫东区实际，要重点推进“四二五四”工程，即构建四个制度框架、建设两大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五个服务中心、做好四项重点工作。

构建四个制度框架：（一）构建便民服务体系。全面实施便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实现为民服务的高效快捷；不断完善电子政务；推行首问负责制。（二）构建民主科学化行政决策机制，包括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调研、咨询、公示、听证制度等。（三）构建规范的政府行政行为制度，主要是对政府投资行为、政府采购行为、行政审批和许可行为、行政执法行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行为等进行规范。（四）构建行政监督制度。主要是建立行政效能投诉和告诫制度、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政务公开投诉制度、领导引咎辞职或申请处分制度等。

建设两大服务体系：（一）构建社会服务大厅服务体系。以区社会服务大厅为龙头，完善区、街道、社区三级服务网络，赋予区社会服务大厅对基层服务中心（站）的业务指导和效能监察权。（二）构建劳动保障服务大厅服务体系。以区劳动保障服务大厅为龙头，在完善三级劳动保障服务网络的基础上，促进辖区居民充分就业，夯实就业这一民生之本。

建立和完善五个服务中心：（一）要完善国库集中收付中心，控制、压缩不合理开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二）要完善政府采购中心，规

范政府采购行为，不断扩大政府采购覆盖面。（三）要完善招投标管理中心，主要是集中统一管理、规范政府招投标活动，克服招投标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四）要尽快建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要完善效能监察投诉中心，统一受理对公务员效能的投诉举报，提高政务系统的工作效能。

做好4项重点工作：（一）深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二）积极推进政务公开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同时把政务公开的范围向公众服务部门延伸，形成宽领域、覆盖广的政务公开体系。（三）强化市长热线功能。一方面建立有反映、有落实、有反馈的长效机制，不断加强市长热线网络平台建设，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加强跟踪问效和效能建设，确保事事有落实。（四）继续完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扩大便民服务网点覆盖面，规范代理审批项目。

二、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区别于权力政府的重要不同在于职权法定，主要标志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职能到位。

（一）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健全对行政管理权的监督机制。

（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理顺部门间的工作职能和权限，明确部门分工，逐步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的行政执法体制，严格按法定权限行使职权。

（三）完善科学决策机制，建立行政决策执行情况跟踪反馈制度，制定和完善内部决策规则，明确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决策责任，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

（四）建立清正廉洁的监督约束机制。五要建立领导干部责任考核评价制度，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审计。

三、坚持诚实守信，建设诚信型政府。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

（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政府决定的事项。

（二）要建立社会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制度，把与社会关系密切的执法部门和行业职责、办事程序和违诺责任制度向社会公开；完善现行文件查阅中心、项目审批中心等，公开政策文件规定，提高工作透明度。

（三）要重视诚信教育，加快诚信体系建设。在全区开展“诚信卫东”



活动，培养“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尚；依托卫东网，开辟专栏，设立诚信曝光台，形成全社会对政府承诺的监督网络，从根本上形成良好诚信社会氛围。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作为改革性的新观念，发展的阻力还是存在的。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由于官本位意识的束缚，现代公共服务理念尚未真正形成

服务型政府是遵从人民意愿的民主政府，是严格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并且履行法律义务的法制政府，是人民利益至上的政府，是公开透明的政府，是人性化的政府。在这种服务行政理念下，政府在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应该多考虑群众方不方便，群众满不满意，群众需不需要，还要考虑怎么满足群众在得到服务时的心理感受，让人们感受到政府是亲民的，是为人民考虑的，政府的服务是充满人情味的。然而我国行政管理思想深深植根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意识，受官本位意识的束缚，形成了管制型的行政理念，把公共行政直接当作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忽视了其服务性作用和导向性作用。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行为缺乏制约和监督，“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和官僚态度普遍存在，导致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公共行政权力寻租，行政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现象的产生，甚至成为腐败的根源。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条件不够完善

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在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基础之上的，只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支持，才能保证服务理念贯彻实施，才能保证政府真正做到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才能保证政府各项工作高效有序运行。但是由于传统的“重人治，轻法治”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1. 行政权力划分不合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府不是直接对人民负责，而是对党负责；政府部门之间权力交叉模糊，职责不清，政出多门，从而导致政府部门中官本位现象严重；行政职能配置不科学，政府机构臃肿，冗员充塞，国家财政不堪重负。2. 政府的责任机制不健全。目前政府缺位、越位、错位以及不到位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威望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一个服务型政府应该明确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后果，有效地责任机制的建立使责任明确到人，明确到岗，在制度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3. 绩效考评制度不健全，评估方法缺乏科学性。地方领导的绩效考核和升迁、任免都是由上级部门决定的，影响了考核的公正性，这样

也容易形成各领导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违背了民主的本意。

三、服务型政府建设呈现政府热、公民冷的现象论文代写

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机关强调的比较多，在报纸、网络上宣传的也比较热闹。但是在广大的市民中间，在群众里面，耳闻的人不多，关心的人也比较少。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为广大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的应该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和影响才是正常的。市民的冷淡说明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政府的多大变化，更说明政府还是封闭起来建设，而没有把服务的供给者和消费者有机的连接起来，形成了服务过程的裂断。如果没有政府和公民的互动，服务型政府是建设不成的。另外，恐怕是政府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还没有和大多数的市民相关，他们没有领受到政府的服务。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政府热、民众冷漠这样的现象是需要改变的，政府要尽快打破公民的冷漠，这样才能使政府和公民共同致力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四、公务员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服务型政府怎么服务，让老百姓直接感受到服务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因为老百姓是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的。所以，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能离开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的建设。然而目前我国公务员在素质上还有些缺失。（一）服务的主动性不强。作为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公民需要办理业务时不是主动提供相关的咨询或指导服务，而只有被问到才会回答，使群众深感“脸难看，事难办”。（二）服务效率不高。机关工作人员没有把效率放在心上，往往达不到行政目标。而人民需要的是高效率的政府，希望政府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既能及时为人民群众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又能快捷、经济地达到行政目标，实现社会的进步。（三）服务的公正性有待加强。行政机关的活动及其相关的制度对任何人都应该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然而工作人员在办事时倾向于优先办理领导下达命令的事务和有利于政府经济效益的事物，而普通人民群众的事务一般都放在后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社会资源和福利不能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的分配。

法治是政府管理的基础和方式，服务是一种基本的政府职能又是一种管理方式。不同时期，政府的管理模式有所不同，例如：建国初期，政府的管理职能主要是抓阶级斗争，而现阶段，政府必须及时转换政府管理模式，突出管理和服务两大基本职能，然而公共服务的政府也必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法律框架内突出管理与服务，在管理的内容上，服务型政府必须体现出保证社会公正、公平，充分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



原则，这种平等不仅体现立法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实施过程中的平等，不是对一个特定的群体管制，而是为所有的社会主体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管理程序上，服务型政府有固定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也应该是完全公开的、透明的、合乎法律、法规的，在管理结果上，服务型政府充分考虑政府公务员在执行法律、法规时有可能产生的非理性行为及政府官员谋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因而建立一套相应的纠错机制，确定法定的救济措施对建设服务型政府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及管理机构的产生来源于人民的委托和赋予，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受公众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对一个现代政府而言，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责，要求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无疑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也是现代政府管理方面、服务方面值得探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政府应该树立管理和服务的核心价值观，追求卓越的管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公正与进步，为公众谋取最大利益。最终实现政府在管理和服务上得到国家、集体、公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这种认同与法治为基础建设服务型政府无疑是分不开的。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所谓农民工权益，是指暂时或长期离开农村土地到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而身份或户籍仍是农民的劳动者，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等基本权利及其依法获得的利益。农民工权益包括两个方面：一、被宪法确认并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作为公民所不可缺少的权利；二、农民工作为城镇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还应享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劳动者的权益。因此，以公民基本权利和劳动者的劳动权为核心，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根本出发点。

一、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

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受损和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1. 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2. 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3. 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

（二）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近几



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 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1. 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2. 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3. 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四) 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路径选择与机制完善。

(一) 立法保护——加快制度创新。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农民进城的一道门槛,户籍世袭制度不仅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要将农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通盘考虑,有关部门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如以居住地登记制度或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管理制度,把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等,清理针对农民在城镇就业、上学、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等,让农民逐步融入城市。

其次是构建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现行《劳动法》对农民工权益的一些规定相当笼统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从而给有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具体的劳动立法中加以细化。其中如下几方面迫切需要解决:1. 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禁止包括劳动力城乡歧视在内

的一切与能力无关的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2. 加快制定《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强化农民工利益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3. 抓紧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4. 尽早制定《社会保障法》，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

（二）执法保护——制约行政权力。

要确立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制度。我国法律对行政权力制约的乏力，造成一些人滥用行政权力，行政工作人员侵犯农民工权益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因此必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

要加强劳动监察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配备和支持，加强劳动处罚力度。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不力是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加大劳动执法力度，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

（三）司法保护——确立司法特护制度。

设立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事劳动审判。借鉴国外劳动争议司法机构的做法，设立由专业法官和兼职法官组成的特别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按照特殊的劳动诉讼程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律关系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劳动关系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此，用民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并不恰当。建立专门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有利于提高法院处理案件的专门化程度。同时加快案件审理的节奏，缩短案件审理周期，逐步建立相关案件的快速裁判机制。

规定较为特殊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不同，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在现有的诉讼制度基础上制定特殊的规则。1. 改变现有的“先仲裁，后诉讼”的制度，建立类似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制度，以便节约成本，提高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2. 扩大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加重在各种资源上均占优势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3. 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以法定方式明确规定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一律缓交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改由判决时由败诉方一并承担。尽量降低农民工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从而降低诉讼成本，使农民工能够切实、方便、快捷、经济地获取公正的司法保护。

搭建法律援助通道。解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



共同承担。1.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给农民工更多的事前法律援助。2. 政府要为农民工维权提供财力保障。3. 建立公益基金等民间慈善团体。通过广泛的社会捐助，解决法律援助资金不足问题。4. 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简化手续，及时受理农民工的申请，支持农民工权益的司法救济行为。

（四）组织保护——完善维权组织。

在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必须增加农民工的自治组织和博弈能力。首先是工会保护，由于工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合法组织机构，而农民工属于半工半农的身份，也由于他们的权益受损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可以试行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纳入工会组织的保护之下。同时修订现行《工会法》，使工会真正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其次是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协会，从而实现农民工享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及其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体。农民工协会主要由当地政府拨款，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工资中按比例上交一部分经费，建立一个类似于消费者协会的民间组织，专门负责对本地区的农民工被侵权事件的咨询和调解。

三、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意义。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阶级性特征。这一群体的出现和形成是中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又一伟大创造。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人们都能看到的，他们已成为建筑业、制造业、纺织业、餐饮服务业、零售业员工的主体。农民工不仅对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农村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一亿多农民进城务工，每年可为农村增加现金收入5 000亿元以上，这笔钱对农村来说是目前任何投资都不能比拟和代替的。亿万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对城乡结构、农村人口结构、农民观念结构的影响极其深刻。农民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顺应以市场为基础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规律，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突破的背景下，闯出了一条统筹城乡就业、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新路子。如果让政府每年安排这一亿多人就业，那是难以想象的。

事实证明，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工业发展增强了竞争力，为城市繁荣增加了活力，为改革开放增添了动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切实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保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改善他们外出务工的环境，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就业，关系“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关系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可以说，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

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各级政府积极行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农民工问题仍然不容乐观，从表面上看，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给予农民工公平待遇等问题。而实质上是解决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体制和机制入手，是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落实城乡一体化方略，使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1.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在现阶段，对于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农民工户口准入政策，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把一部分就业稳定、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户口落在当地，另一部分地区可以加强对办理城市暂住证的管理，把农民工纳入到本地区的户籍管理当中；2. 扩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社区或街道对办理了暂住证的农民工登记入册，对其中符合条件、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可以纳入大病救助体系和城市生活最低保障体系；3. 农民工子女同等接受义务教育。4. 取消对农民工子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时收取的借读费、择校费等，可以凭农民工的暂住证明、劳动用工合同等，依照临时居住地就近入学，如果学校班额已满，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到有关学校就读；5. 政府应将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当地基础教育发展规划，对辖区内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应给予相应的补贴；6. 对困难农民工子女实施救助，特困生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和补助生活费；7. 鼓励并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立，实行同规划、同指导、同评估、同发展。

（二）规范就业管理，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平等就业的环境。1. 建立企业招用农民工向劳动就业部门备案制度，建立农民工档案，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市场体制外就业和流动的总是；2. 要加快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严禁越权对农民工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任意提高收费标准；3. 改善就业服务，开放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



绍服务，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职业介绍领域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规范企业招用工行为；4. 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在劳动合同期间，农民工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有关部门要健全对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从源头开始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监控用人单位在使用农民工时与其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对就业时间短、流动性大、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用人单位要与农民工签订带有劳动合同性质的用工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在劳动部门备案；5. 要针对大量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现象，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作用，把农民工的宏观预测、规划调控、引导服务等作为其职责，并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劳动力资源市场体系和高效的市场运作机制，保证劳动力之间的公平竞争，从根本上解决使用大量廉价临时工、劳务工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三）部门整体联动，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1. 加强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工商、税务、劳动、经贸、工会等部门要相互协作，定期检查企业工资支付情况，对有欠薪苗头、经营者有逃匿迹象的企业要及时提出预警并采取措施限期解决；2. 加强劳动监察队伍的建设，可聘请同级工会组织的工作人员担负兼职监察工作，以缓解当前执法队伍人员不足的状况；3. 建立健全欠薪举报制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凡因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造成严重后果的，都要依法查处；4. 探索企业诚信网络建设，由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劳动保障部门参加，全面建立政府监管信息系统和市场信用评价体系，科学评价企业的信用状况，建立失信惩戒制度，并将评价结果和惩戒情况随时向全社会曝光，将企业的行为置于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5. 针对建筑行业特殊的现状，借鉴外地经验，建立和完善工资准备金制度，规定企业在建设项目开工之前，将工程总造价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工资准备金存入指定的财政专户，工程竣工时，经审核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该项资金及利息可充抵建设项目工程款。

（四）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各地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进程尚不统一，城乡差距较大，给社会保险的支取、转移和接续都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要逐步有序地推进城乡社会保障接轨，为农民工面临的实际问题制定相应的社会保险政策。根据我市农民工反映的问题，建议借鉴外地经验，对现有规定作一些适当修改。1. 降低进农

民工的参保门槛。对收入不确定的农民保险费征缴起点基数可由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改为本地最低工资标准，对外地来的短期、不拟定居的农民工，可先解决其急需的工伤（或意外伤害）、大病统筹保险，同时还应依据农民工参保自愿、退保自由的原则制定相关政策；2. 将农民工列入我市社会保险扩面范围，要求各类企业依法为农民工投保，让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3. 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意愿不强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参保不能接续，不能像城镇职工那样退休和享受社保待遇。因此，要认真研究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保险续保、城乡接轨、部分统筹金可以随个人账户转移等政策。

（五）加强劳动安全监管，大力改善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条件。1. 加强对农民工的安全知识培训，使他们充分了解应当如何做到自我防范和保护，提高自我保护意识；2. 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企业劳动保护措施。劳动保障部门在检查劳动合同时，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要督促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先知的义务，并在合同中写明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岗位待遇；3. 加强农民工职业病的监测和预防。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企业职业病的监督检查和治理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益；4. 安全生产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安全卫生状况的日常巡查，督促各类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改善现场作业条件，健全安全防范、劳动保护措施，对有毒有害生产岗位加强安全监控，对无视安全卫生条件和侵害农民工安全健康权益的单位及时责成整改、纠正；5. 发挥安全生产监督员队伍的作用，把农民工吸纳到安监队伍中来，及时消除生产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六）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1.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工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扩大工会组织在非公企业的覆盖面，真正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2. 根据中小企业务工人员分布零散的特点，将农民工行业工会、非公企业工会联合会、社区企业联合工会等新的组织形式全面推广。随着劳务企业的发展，还可通过劳务公司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相结合的工会组织，探索流动会员会籍管理的模式，把流动的农民工最大限度地组织到工会中来；3. 政府要支持工会组织开展维权工作，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构建劳资双方对话沟通、协商共议、双向支持的平台。要落实《集体合同条例》的有关规定，支持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事业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4. 各级工会组织要真正代表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把工作切实做到农民工当中，及时向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使农民认可工会的维权功能，愿意通过工会提出自己的正当权益诉求。

（七）依法履行民主监督，重视和维护农民工的政治权益。1. 企业工会要组织农民工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依法行使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权利；2. 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农民工中的先进模范人物，树立榜样和标兵，安排一定比例的农民工作为企业职代会代表，使广大农民工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以更高的热情参与到城市的经济建设中来；3. 要发展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待遇。

（八）开展寓教于乐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1. 要给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鼓励企业与驻地社区开展文化共建活动，鼓励社区为农民工提供各类服务；2. 向农民工开放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农民工图书报刊阅览室，吸纳农民工参与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建设，开展文娱活动、体育比赛、技术练兵等活动，把农民工吸引到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来；3. 可以适时组织文化团体为农民工进行文艺演出，满足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九）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1. 要大力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和社会所做的贡献，客观反映农民工的现实状况，让社会公众了解农民工，在社会生活中尊重农民工、平等对待农民工，主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关心他们的精神和政治需求；2. 要向企业经营者宣传有关政策法规，引导他们依法管理企业，改善与职工的关系，与员工经常性地进行沟通，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互利共赢；3. 大力宣传农民工中的优秀代表和典型，为广大农民工树立学习的典范，切实增强对社会和企业的认同感。

中国铁路进入高速时代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其他行业相比，铁路发展相对滞后，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一票难求、一车难求”的现象十分突出，铁路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做出了加快发展铁路的重要决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站在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高度，铁路系统加快实施国务院批准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全面推进大规模铁路建设和技术装备现代化。其中，高速铁路是铁路发展的重点之一。

铁路系统瞄准世界铁路先进水平，运用后发优势，博采众家之长，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用短短几年时间，推动我国高速铁路技术走在世界最前列。到2009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8.6万公里，居世界第2位。目前，已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431公里，居世界第1位。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引领着世界高铁发展的新潮流。

当今世界上，铁路速度的分挡一般定为：时速100~120公里称为常速；时速120~160公里称为中速或准高速；时速160~200公里称为快速；时速200~400公里称为高速；时速400公里以上称为特高速。对于高速的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提高。西欧把新建时速达到250~300公里、旧线改造时速达到200公里的称为高速铁路；1985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日内瓦签署的国际铁路干线协议规定：新建客运列车专用型高速铁路时速为300公里，新建客货运列车混用型高速铁路时速为250公里。

中国高速铁路，常被简称为“中国高铁”。高速铁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运输方式，中国的高铁速度代表了目前世界的高铁速度。中国是世界



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在运行速度上，目前最高时速可达 350 公里，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速铁路最高时速将达到 380 公里，堪称陆地飞行；在运输能力上，一个长编组的列车可以运送 1 000 多人，每隔 3 分钟就可以开出一趟列车，运力强大；在适应自然环境上，高速列车可以全天候运行，基本不受雨雪雾的影响；在列车开行上，采取“公交化”的模式，旅客可以随到随走；在节能环保上，高速铁路是绿色交通工具，非常适应节能减排的要求。

2004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大气魄绘就了超过 1.2 万公里“四纵四横”快速客运专线网。“四纵”是指：北京至上海高速铁路，贯通环渤海和长三角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北京—武汉—广州—深圳（香港）高速铁路，连接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北京—沈阳—哈尔滨（大连）高速铁路，连接东北和关内地区；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深圳高速铁路，连接长三角、东南沿海、珠三角地区。“四横”分别指：青岛—石家庄—太原高速铁路，连接华北和华东地区；徐州—郑州—兰州高速铁路，连接西北和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高速铁路，连接西南和华东地区；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昆明高速铁路，连接华中、华东和西南地区。同时，以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地区、江汉平原、湘东地区、关中地区、成渝地区、海峡西岸等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为重点，建设城际高速铁路，覆盖区域内主要城镇。

2004 ~ 2005 年，中国南车青岛四方、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和唐车公司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2007 年 4 月 18 日，全国铁路实施第六次大提速和新的列车运行图。繁忙干线提速区段达到时速 200 ~ 250 公里。这是世界铁路既有线提速最高值。同时，“和谐号”动车组从此驶入了百姓的生活中。2008 年 2 月 26 日，铁道部和科技部签署计划，共同研发运营时速 380 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2008 年 8 月 1 日，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京津城际高铁是中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运营速度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不仅使北京和天津这两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间形成“半小时交通圈”，实现了同城化，同时也打开了中国铁路迈向“高速时代”的大门。作为中国第一条真

正意义上的高速铁路，京津高铁从一问世就站在世界前沿，创造了运营速度、运量、节能环保、舒适度四个世界第一。中国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高速铁路发展历程。2009年12月26日，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工程类型最复杂的武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2010年2月6日，世界首条修建在湿陷性黄土地区，时速350公里的郑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2010年5月6日，成灌快铁正式运行进入倒计时，都江堰车站，和谐号列车正在进行试运行。众多都江堰市民提前体验快铁带来的全新感受。2010年7月1日沪宁城际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2010年9月28日，沪杭高速铁路从杭州到上海虹桥试运行途中，最高时速达到416.6公里，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

从2010~2040年，用30年的时间，将全国主要省市区连接起来，形成国家网络大框架。考虑现实，线路东密西疏；照顾西部，站点东疏西密。所有高铁线路的规划和建设，全部由中央政府集中组织实施，建成后的营运，交中国高铁公司集中管理。本方案除京广和京沪线外，所有线路建设应采用磁悬浮技术方案，规划简称为“五纵六横八连线”。“五纵”分别为哈沪线、京沪线、京港线、集昆线、西湛线；“六横”分别是沈兰线、青银线、盐西线、沪蓉线、沪昆线、沪南线；“八连线”分别是指津唐线、开河线、宁南线、宁宁线、金温线、汉福线、南厦线、衡南线。

从2040年~2070年，再用30年的时间、最迟到2100年前全部建成。实现东部加密、西部连通成网（即连通西部主要交通枢纽），连接全国主要交通节点城市和旅游景点，使西部地区主要城市可通达任何沿海省区。国内客运主要依靠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简称为“八纵”。“八纵”内容为新哈沪线、京沪线、大京港线、济茂线、新集昆线、徐三线、太温线、包湛线。

中国高铁不但集合各国高精技术之大成，还通过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技术体系。铁路系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的部署，按照“先进、成熟、经济、适用、可靠”的技术方针，瞄准世界高速铁路最先进技术，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成果，系统掌握了集设计施工、装备制造、列车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于一体的高速铁路成套技术，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

一、工程建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针对我国复杂多样的地质及气候



条件，攻克了湿陷性黄土和软土地区沉降变形控制难题，掌握了复杂地质条件下高速铁路地基处理和路基填筑技术。系统掌握了常用跨度简支箱梁的制造、运输、架设成套技术，攻克了跨大江大河和高架站桥等复杂桥梁建设难题，建成武汉天兴洲、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济南黄河大桥等世界一流的新型结构大跨度桥梁。攻克了大断面复杂隧道建设技术难题，建成复杂地质山区高速铁路长大隧道群和 underwater 铁路隧道，首次实现了高速列车在隧道内以时速 350 公里交会。系统掌握了高速铁路有砟、无砟轨道成套技术。自主研制了满足时速 350 公里要求的高速道岔，掌握了百米钢轨制造、运输、铺设、焊接成套技术，攻克了长大桥梁无缝线路技术难题。构建了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设计、施工、检测技术平台，研发了大容量供电、大张力接触网、高速接触网检测、远程监控等成套装备，攻克了高速列车重联运行接触网关键技术难题。

二、高速列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系统掌握了时速 200 ~ 250 公里动车组核心技术，全面构建了设计制造体系。在此基础上，攻克了制约速度提升的技术难题，在高速列车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制造工艺、试验评估等方面实现了系统集成创新，成功搭建了时速 350 公里动车组技术平台，国产时速 350 公里动车组大批量投入运营，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上表现出良好的运行品质。为适应京沪高速铁路运营需要，成功完成了时速 380 公里新一代高速列车的设计生产，并投入了沪杭高铁运营。“和谐号”动车组以运营速度快、运量大、节能环保、平稳舒适等特点，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三、列车控制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系统掌握了满足时速 250 公里的 CTCS-2 级列车运行控制技术，成功应用于既有线第六次大面积提速和新建的时速 250 公里高速铁路。研发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 CTCS-3 级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基于无线通信网络系统实现地面与动车组控车信息的双向实时传输，满足动车组列车时速 350 公里、最小追踪间隔 3 分钟的安全运行要求，适应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度、高密度及不同速度等级动车组跨线运行的特点，成功应用于武广、郑西、沪宁、沪杭等高速铁路。

四、客站建设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按照“功能性、系统性、先进性、文化性、经济性”客站建设的新理念，广泛采用大跨度钢架结构、悬垂结构无柱雨棚设施以及冷热电三联供、智能化分级光控系统等先进技术，成为与城轨、地铁、公交，乃至航空港等多种交通方式紧密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北京南、天津、上海南、上海虹桥等 150 多座现代化铁路新客站已投

人运用。

五、系统集成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系统掌握了高速铁路总体设计、接口管理、联调联试等关键技术，实现了高速铁路工务工程、动车组、牵引供电、通信信号、运营调度、客运服务等各子系统的集成，使整体系统功能达到最优。在不同速度等级列车混合运行、高速线与既有线互联互通、地车安全信息连续传输、轨道电路对无砟轨道适应性等方面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形成了先进完善的高速铁路系统集成技术体系

六、运营维护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研发了现代化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实现了基础设施检测监测的自动化和养护维修的机械化。开发了安全防灾预警技术，实现了对雨雪等灾害的实时监测和自动应急处理。开发并广泛采用调度集中系统，全面实现了运输调度集中统一指挥。研制了适应大客流量、响应时间快、系统安全性高的综合客运服务系统，较好地满足旅客自助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积极开展高速铁路减振降噪、节能环保等技术攻关，大量采用新材料、新能源及现代信息技术，使高速铁路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高速铁路运营总体情况是好的。线路基础、通信信号、牵引供电、动车组等主要行车设备质量稳定可靠，运行安全平稳。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为人民群众创造了美好生活的新时空，不仅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中国高铁，正在改变世界高铁时代的潮流。



为适应新形势中央进行 新一轮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经济列车平稳快速前行。然而，自 2003 年开始，中国经济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已经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煤电油运持续紧张等势头，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增长质量较差，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大制约。在新的发展阶段，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沿用传统的外延型、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面对这些新情况，在 200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清醒判断。会议强调，愈是形势好，我们愈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同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明确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势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会议明确指出，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确定了“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宏观调控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抑扬有致，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而在制定出及时、有效、综合的调控政策同时，迅速把各地的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上下一盘棋，使宏观调控举措迅速落到实处。新的宏观调控政策已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式治理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对症下药的多种调控手法并进的方式，正是依靠这种适应新形势的调控手段，不仅保证了调控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成效，更显现了政府与时俱进的经济驾驭能力。

此次宏观调控，为从源头上控制资金规模，从2003年8月~2009年4月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两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一次扩大再贷款浮息范围。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联合开展土地市场整顿，按《土地法》要求严格控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过度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在注重运用经济办法的同时，对一些不顾政令，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对盲目投资行为推波助澜的个别地方领导，中央则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分别进行了严肃处理。通过信贷、土地和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使钢铁、房地产等过热行业的减速、刹车自然而然，即使在采取的法律和行政手段上，也充分体现了依法行政的精神。这次宏观调控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的能力和谋划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深远用意。中央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必须在坚持搞好总量调控的同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从宏观上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实现工业化的支撑产业，是技术、资金、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但是钢铁等行业投资过热，对煤炭、电力等能源产品的需求猛增，导致中国能源供不应求。为确保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中国采取了控制土地和信贷投放总量等宏观调控措施，遏制这些行业盲目投资，在我国经济波动和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我国钢铁工业也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涨落起伏。钢铁工业如何发展，对钢铁工业本身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早就成为世界钢铁生产第一大国。2004年，中国粗钢产量已达到2.72亿吨，占全球钢产量10.5亿吨的25.8%。自1996年中国粗钢生产突破一亿吨以后，我国钢产量一直快速增长。2003年，中国钢铁产量突破两亿吨，成为世界上唯一年产钢超过两亿吨的国家。伴随着我国钢铁产业迅猛发展，原料紧张、资源透支、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也一一凸现，对中国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指导钢铁产业的发展，经过两年多的酝酿，我国首个国家钢铁产业政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于2005年7月20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制订的新的《钢铁产业政策》，通过设置市场准入门槛，规定新的技术装备要求，引进循环经济的思想，推动中国钢铁产业向集约型工业转变。该《政策》明确规定：原则上不再单独建设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独立炼铁厂、炼钢厂，不提倡建设独立轧钢厂，必须依托有



条件的现有企业，结合兼并、搬迁，在水资源、原料、运输、市场消费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改造和扩建。新增生产能力要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相结合，原则上不再大幅度扩大钢铁生产能力。这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铁企业政策，是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将对我国钢铁工业今后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

新的《钢铁产业政策》最后定稿是9章40条。新产业政策最突出三点是产业规划布局、技术行业准入、循环经济。在产业布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钢铁产业布局不合理现象，产业政策特别强调，钢铁产业的布局调整要与城市发展相结合。要综合考虑市场分布、矿产资源、能源、水资源、交通运输、环境容量和利用国外资源等条件，必须依托有条件的现有企业，结合兼并、搬迁，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改造和扩建。针对我国钢铁产业实际产能已基本满足国内需要的现状，产业政策规定，原则上不再单独建设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独立炼铁厂、炼钢厂，不提倡建设独立轧钢厂。新增生产能力要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相结合，原则上不再大幅度扩大钢铁生产能力。重要环境保护区、严重缺水地区、大城市市区，不再扩建钢铁冶炼生产能力，区域内现有企业要结合组织结构、装备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压产、搬迁，满足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要求。产业政策规定，大型钢铁企业应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钢铁企业应结合本地市场和矿石资源状况，以矿定产，不谋求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可持续生产为企业生存的主要目标。而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国的钢铁业发展正在向国际看齐，因为国际上大钢厂基本都分布在沿海地区。在行业准入方面，为确保钢铁工业产业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政策也给出了相当严格的标准。权威人士透露，产业政策要求现有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一定要努力达到：建设烧结机使用面积180平方米及以上；焦炉炭化室高度六米及以上；高炉有效容积1000立方米及以上；转炉公称容量120吨及以上；电炉公称容量70吨及以上。沿海深水港地区建设钢铁项目，高炉有效容积要大于3000立方米；转炉公称容量大于200吨，钢生产规模800万吨及以上等。而钢铁联合企业技术经济指标也应达到：吨钢综合能耗高炉流程低于0.7吨标煤，电炉流程低于0.4吨标煤，吨钢耗新水高炉流程低于六吨，电炉流程低于三吨，水循环利用率95%以上。钢铁工业是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消耗的密集型产业，也是最具潜力、最有条件、最迫切需要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因此，在新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循环经济概念被首次引入。国家出台

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既起到政府指导行业发展，企业又可据此规范发展方向和重点的作用，对推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全面提升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转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土地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与其他调控政策相辅相成，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重要环节。2005 年中国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系统公布部分城市土地市场的监测分析报告，这是政府加强信息披露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换的一个好的表现。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传导机制仍不顺畅、见效缓慢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对土地市场特别是土地供应量的调控，进而影响房地产市场和各产业部门，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土地一级市场供给的减少，特别是严把土地增量供给的闸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宏观经济的局部过热，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加快存量土地入市，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这在 2005 年房地产开发用地的供应结构上有显著体现。严控土地供应总量，但普通住宅用地的供应得到了有效保障。2005 年普通住宅用地占房地产开发用地总量的比例达到 48.7%，经济适用房用地比例达 9.3%。普通住宅供给的增加，将会通过调整住宅供给结构，起到稳定房价的作用。2005 年中国土地市场的另一特点是，工业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的供应仍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大部分，二者合计超过 60%。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这一土地供应结构是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姿态相适应的。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在有偿出让比例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工业用地出让开始尝试采用招拍挂方式，如深圳、青岛、杭州、苏州等。此外，部分城市的公共市政基础设施等用地也开始实行有偿出让。在城市土地国有、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供给的制度约束下，努力创新竞争性供地机制，引导土地需求方的合理竞争，有利于理顺土地价格机制，显化土地要素和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形成投资者和开发商的稳定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抑制土地投机和寻租行为，提高土地市场的效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大方向不会逆转，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在完善土地一级市场供应机制的同时，应加强对土地需求的监控，并加快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步伐。

从 2003 年酝酿实施，到 2004 年上半年强力推行，再到初现成效，新一轮宏观调控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大势奠定了健康前行基础，几乎是在宏观



调控进行的同时，一些陆续汇总的数据开始接连印证了决策的“先知”和可贵：从二季度开始，一度投资热情四溢的钢铁、电解铝、玻璃等行业相继出现高额库存。即使在宏观调控取得公认的明显成效时，中央仍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在投资增幅、煤电油运等方面仍然存在的严峻问题。在有关会议上，中央再次明确：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刻，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见微知著，科学判断，中国政府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成功驾驭中显现出非凡的执政能力，中国民众与世界也从中看到了中国政府睿智、果断的执政形象。

教育部颁布《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教育摆在现代化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民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但是，教育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整体水平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在顺利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特制定本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是在充分总结 1998 ~ 2002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教育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基础上制定的，是教育系统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兴国战略，加快今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蓝图。

我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巩固成果，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持续发展，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历史性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为建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奠定基础；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强教育同科技与经济、同文化与社会相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大的智力支持和知识贡献。

《2003 ~ 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共有十四部分五十条，包括两大战略重点、六项重大工程和六个重要举措。其中，两大战略重点是推进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与之相配套的六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新世纪素质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促进毕业生就业”、“教育信息化建设”、“高素质教师



和管理队伍建设”等工程。同时,《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还提出了六个重要举措,分别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依法治教”、“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

未来中国教育将以何种方略实现怎样的跨越?由国务院批转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此做出了完整而明确的回答。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将全部享受“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新一轮高水平大学建设将通过构建科技创新平台的方式进一步推进;以就业为导向的新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最终将为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大批高技能人才——系列全面、务实、颇具操作性、指导性的工作计划,为实现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大使命拟就了一个闪亮的开篇。

温家宝总理在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用更大的精力、更多的财力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实施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这充分表明,实施新一轮《行动计划》应是各级政府、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

新一轮《行动计划》,是在1998~2002年顺利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践证明,每五年制定一个行动计划的做法,非常切合教育工作实际,能充分体现新一届政府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上的意图,为教育多办实事。因此,2002年十六大闭幕不久,教育部决定继续采取行动计划模式,在充分听取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谋划发展,规划未来。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的形势下,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竞争,是人才资源优势的竞争。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奋斗目标,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决定。根据新的战略部署,为制定和实施新一轮《行动计划》,我们要深刻思考教育与现代化的三个方面重要关系:

首先,要深刻思考教育发展 with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我国

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困难是人多，最大的优势也是人多，这是一个突出矛盾，矛盾转变是有条件的，最基本的条件是教育。要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关键在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其次，要深刻思考教育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面旗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始终是教育系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使命。

再次，要深刻思考教育体制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发展教育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具体体现，要始终摆在公共行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突出位置，不断加大政府的教育投入，保障教育公平，履行促进教育发展的职责。

近一年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始终关心和亲自指导了新一轮《行动计划》的起草工作。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教育是政府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本届政府一定要把科学和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陈至立国务委员指出，这一计划是今后若干年全国教育工作总体性、指导性和操作性的计划，必须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她曾多次听取教育部汇报，并召开有十多个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部际协调会议，对有关政策、措施及经费进行统筹与协调。国家科教领导小组 2003 年 12 月 30 日第二次会议审议了新一轮《行动计划》，会后，又要求教育部征求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中央和人民团体的意见，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积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的实际行动。

新一轮《行动计划》是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蓝图，凝聚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和行动方向。其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巩固成果，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持续发展，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实现党的十六大对教育工作提出的三大历史性任务。简要归纳起来，就是坚持一个宗旨、实现三大任务和贯彻八字方针。

坚持一个宗旨，就是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教育系统坚定不移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的根本立足点，也是教育界和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

实现三大任务，是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一、构建体系，就是构建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二、培养人才，就是造就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三、知识贡献，就是促进教育同科技和经济、同文化和社会的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知识贡献。实事求是地说，三大历史性任务是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组成部分，在近五年中不可能全部实现，但是我们要为实现三大任务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贯彻八字方针，就是“巩固、深化、提高、发展”，这是贯穿于新一轮《行动计划》的一条主线。

一、巩固成果。我们要充分总结第一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教育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巩固我国92%人口所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成果，巩固高中阶段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成果，巩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已迈进“大众化”门槛的成果，巩固其他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成果；

二、深化改革。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重点推进，必须坚持从宏观到微观，逐步深化。要大力推动培养模式、管理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三、提高质量。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从严治教，强化管理。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改进质量评估体系，引导学校公平竞争。

四、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是要使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没有持续发展，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要考虑教育自身的持续协调发展，更要考虑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世纪之交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跨越和教育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开创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但是，教育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同教育供给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而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水平远远不能适应现

代化要求，教育观念、培养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许多问题，这都需要坚持办让人民满意教育的宗旨，按照“八字方针”来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有关《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教育部长周济解读道：研究分析背景性、宏观性、长远性的问题国内外现状应当摸清；论证需要直接进入文本的，特别是经费项目必须进行测算；拟订落实行动计划的保障性措施必须体现可操作性——按照以上原则，由教育部主持起草的《行动计划》分14部分，总计50条，其核心内容包括两大战略重点、六项重大工程和六个重要举措。

一、抓主要矛盾，定关键措施，遵照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部署，《行动计划》将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问题和高水平大学与重点学科建设摆在了极其突出的位置，分列两大战略重点。为此，《行动计划》将集中力量，至2007年实现西部“两基”攻坚、中部“巩固提高”、东部“双高普九”的目标；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落实“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健全贫困学生助学制度；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实现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为使以上计划得以落实，教育部已与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协商，确定2003～2007年中央本级财政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行动计划》的农村项目。而作为另一大战略重点，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将在继续实施“985工程”、“211”工程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的基础上，启动研究生教育创新、高校科技创新和高校社科繁荣计划；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推进制度创新，充分集成各方资源，教育部在财政部的支持下，与科技部、发改委、自然科学基金会及有关省级政府协力共建，将成为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的崭新模式。

二、与两大战略重点相配套，“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促进毕业生就业工程”、“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和“高素质教师和管理队伍建设工程”将全面覆盖2007年前教育系统的主要工作。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中包含的“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将大大加快我国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培养进程，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提供服务；首次提出的“促进毕业生就业工程”，将通过加强就业工作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框架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使该项工作更趋制度化、系统化；“高素质教师和管理队伍建设工程”则将通过资格准入、全



员聘任等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最终将全国任职教师的学历控制在大专以上。

三、为确保以上两大战略重点和六大重大工程的实施，《行动计划》拟订了六个重要举措——“加强制度创新和依法治教”；“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

四、对大家普遍关注的教育投入问题，据悉，仅就《行动计划》专项而言，预计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额将不会低于上期行动计划的 489 亿元，《行动计划》同时还提出，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1998 年，当时政府组成后即宣布把科教兴国作为最大任务，教育部为此起草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自 1999 年实施，5 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世纪之交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2 年，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教育部党组决定继续采取行动计划的模式，谋划发展、规划未来，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教育系统的支持。经过 100 余次研讨会、座谈会，并向各级教育系统征求意见，《行动计划》草案在 70 多个专题报告和方案基础上 50 易其稿。2003 年 12 月 30 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在提出修改意见的同时，原则同意这一行动计划，并要求再次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中央、人民团体等方面的意见。2004 年 2 月 11 日，29 个省、区、市政府、10 个民主党派中央和人民团体对《行动计划》提出了反馈意见，回复率近 90%。至此，新一轮《行动计划》宣告完成。

中央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提出 《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 政策的意见》

2005年1月30日，新华社授权全文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指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意见》共27条，分九部分，约9800字。包括：稳定、完善和强化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坚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发展环境；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竞争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健全农业投入机制；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业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颁布了六个中央“一号文件”，涉及三农问题。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突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抓住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保障粮食稳定发展的关键。针对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有建立的严峻形势，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政策集中指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中央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2005年农村工作文件的主题，有极其深远的考虑：第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近年有所下降的国情和现实迫切需要改善生产条件，把粮食稳定增产的基础打牢。第二，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要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土地产出率提高了，才能腾出更多的耕地调整结构，靠结构调整增收才能有空间；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才能够旱涝保收，生产出优质高效的农产品，农业增效才能有保障；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改善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能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农

民才能有条件更多地外出务工增收。第三，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农业物质装备条件差，许多农活还靠人工畜力；农业技术水平不高，科技贡献率低；经营管理也比较粗放。只有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建设现代农业。第四，是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重大举措。目前大多数农村还停留在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如不从现在起就抓紧改变和扭转这种局面，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就可能推迟甚至落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抓住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关键，是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结合点，是解决当前矛盾和促进长远发展的结合点。既有利于抵御农业自然风险，又有利于防范市场风险；既能够提高土地产出率，又能够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既是缓解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又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治本之策。这是农业和农村的一件大事，是一项长期管用的基础工程。抓住了这个重点，就抓住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夯实了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做好了这项工作，就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的繁荣。

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国家财政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积极变化。在继续坚持“减法”“少取”的基础上，今年“加法”“多予”的政策更多：2005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2005年国家科技投入将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

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



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要让中国农民“减负”前行。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税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变小，2004年已降至不到1%。去年出台的“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标志着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标志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变革，标志着中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从国外经验看，这一阶段是就业结构变革加速的时期，更是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时期。从国内实际看，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在经历多年的农业支持工业后，客观上需要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这表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着三个深刻变化：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的到来。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将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中国将在规划制订、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农村的发展全面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将科学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把农民增收放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考虑；中国将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下大力气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再次做出承诺：明年各项支农政策要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这承诺句句都有实实在在的含金量：加大农业税免征减征力度。重点向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倾斜；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要提高补贴水平。大幅度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建立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财政支持力度。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

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实行转移支付；加大扶贫开发和农村社会事业投入力度。明年对农村教育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有较大幅度增长。

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表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正在实现重要转变，也要求对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工作布局进行重大调整。中央今后将坚持把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作为制定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原则。

各地各部门正在积极践行中央一号文件，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从掀起清欠风暴，到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各项农村改革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如何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不仅是农业部门的头等大事，也是各部委正密切关注、统筹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财政部到国家税务总局，从国土资源部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从铁道部到建设部，都把统筹城乡发展确定为2005年工作的重点之一。发展改革委为此进行了全面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在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过程中，免征农业税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超过20个。人们预期，温家宝总理一年前承诺的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可望提前两三年实现。

人们在欣喜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三农”问题积累多年，不是一朝可以解决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有清晰的判断：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目前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有利条件很多，困难问题不少。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势头，对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意义非常重大。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当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加强“三农”的决心不动摇，扶持“三农”的力度不减弱，强化“三农”的工作不松懈，把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千家万户，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探索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登上新台阶。



海峡两岸在“正视现实、开创未来” 旗帜下加强往来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日本强行霸占台湾。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回归祖国。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产生造成两岸暂时分离，这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也是“台独”分裂势力阻挠和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但是，这种分离是隔断不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亲情的。1987年底，长达30多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随之发展起来，同时也衍生出种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台湾不得不调整“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得到官方授权的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推动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1992年10月28日~30日，两会在香港商谈中，就海峡两岸事务性（公证书使用）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海协的基本态度是，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协商。在这次会谈中，双方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被称为“九二共识”。60多年来，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从未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全世界中华儿女，为实现两岸统一一直在进行不懈的

努力。

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此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也提出要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容忍“台独”，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种种努力使得两岸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新的积极因素，台海紧张局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但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仍然是严峻的、复杂的。在这种新形势下，胡锦涛就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石。他表示，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他指出，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两岸同胞之福，是地区和世界之福。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胡锦涛表示，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这是我们对广大台湾同胞的庄严承诺。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他表示，台湾是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亿人民共同决定。这四点意见是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在他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来的。这四点意见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了海峡两岸的交流，同时也开启了两岸政党对话交流的大门。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访问大陆。这是国共两党一次重要的交流与对话。在两党“正视现实，开创未来”的共同体认下，4月29日下午3时整，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两岸



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两党交往事宜，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会谈中，胡锦涛说：“你们的来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前两岸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从你们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起，我们两党就共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连战说：“历史的辛酸让我们曲曲折折，一直到今天才能够见面，所以我说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会谈后，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远景”。文中指出，目前两岸关系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上，两岸不应陷入对抗的恶性循环，而应步入合作的良性循环，共同谋求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机会，互信互助，再造和平双赢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实现光明灿烂的远景。为实现这一目标，两党共同体认到：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二、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有助于消弭隔阂，增进互信，累积共识。三、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两党基于上述体认，认为今后应当共同促进以下工作：一、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促进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速恢复平等协商，就双方共同关心和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推进两岸关系良性健康发展。二、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三、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两岸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建立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放海空直航，加强投资与贸易的往来与保障，进行农渔业合作，解决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的问题，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的问题。四、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将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五、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包括开展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进行有关改善两岸关系议题的研讨，举行有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议题的磋商等。这份新闻公报集中体现了连战主席访问大陆所取得的成果。

国民党主席连战结束对大陆的访问之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于2005年5月5日~13日率亲民党大

陆访问团正式访问大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亲民党之间首次进行两党交流对话，5月12日，胡总书记与宋主席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促进两岸关系改善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及两党交往事宜，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胡锦涛强调，讨论两岸关系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必须以宽广的眼光审视当今世界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顺历史潮流而动，应人民要求而行。两岸关系发展的大势，顺历史潮流而动，应人民要求而行。两岸共同发展繁荣正面临着历史性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携手合作、开创未来，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宋楚瑜表示，亲民党始终坚持三个基本立场。第一，坚持“九二共识”，从来没有动摇。第二，反对“台独”，这个立场坚定不移。从来不认为“台独”是台湾的选项。第三，反对“台独”，这个立场坚定不犯错误。从来不认为“台独”是台湾的选项。“台独”之路行不通，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同“台独”。因此，我们主张诚实地面对现实，务实地面对未来。第四，两岸要和平。两岸人民血浓于水，同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两岸和平是两岸中国人最大的期盼、共同的心声。中国人要重新振兴，是大事。会谈后发表了新闻公报，公报中说：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通则双赢。双方愿促进加强推动两岸经贸等实质性交流；在互惠合作、创造双赢的基础上，开展两岸关系良性互动。两党达成九项共识，包括：一、积极推动两岸通航。二、促进实现两岸直接贸易和直接通汇，进一步实现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三、促进两岸恢复协商后，就建立两岸贸易便利和自由化（两岸自由贸易区）等长期、稳定的相关机制问题进行磋商。四、加强两岸农业合作，扩大台商在农业领域的投资，增加台湾农产品在大陆的销售。五、促进实现两岸企业双向直接投资。六、促进两岸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商谈解决保护台商投资权益的问题；商谈处理避免对台商双重征税的问题。七、扩大两岸民间交往，为两岸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大陆方面进一步简化台湾同胞往来大陆的人出境手续。八、大陆方面尽快实施在大陆就读的台湾学生与大陆学生同等收费标准，并争取于年内设立台湾学生奖学金。九、扩大两岸人才交流。大陆方面逐步放宽政策，鼓励和促进台湾同胞在大陆就业。

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对大陆的访问，宣告两岸主要政党交流的大门轰然开启。尽管两岸对话谈判由于台湾当局领导人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而未能恢复，但是两岸之间开辟了新的政治对话渠道，两岸主要政治力量建立了交流平台，彼此之间的交流对话空前活跃。



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措施遏制 房价上涨过快问题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投入资金过热的倾向，许多城市的房价畸高，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投机性购房活跃，空置土地、空置房不断增多。这种局面已经损害了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利益，导致城镇居民对房地产消费的信心出现滑坡，这种情况不利于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各界要求对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加强调控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房地产市场既然是要素市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它的调节主要应由市场来进行。但是，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采伐分配还存在一定不平衡的社会来说，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不能完全靠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党全国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住房作为城乡居民生活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由政府给予切实的保障。因此，政府必须负起责任来，扮演好市场监管者的角色。采取果断措施抑制房地产开发投入资金和投入资金性购房需求，构建合理、稳定的房价形成机制，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健康的轨道上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房地产市场不平衡问题抑制很重视，不断采取积极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对于房地产政策要从1998年说起，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开始了对房地产业的扶持。这一年“扩大内需”作为一种战略部署被提出来，启动居民住房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着眼点，住宅建设被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国务院发出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宅建设的通知》。

自此，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税收政策和住房金融政策鼓励住宅消费，其中包括放开住房按揭业务、房地产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等，税费方面，也相继出台了营业税、所得税、契税等的优惠。同时，还及时取消了实物分房，以货币分房的形式刺激民众购买商品房。此后几年中，房地产业发展迅

猛。但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地位没有得到确认。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即所谓“18号通知”），首次明确了房地产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位。但这恰恰也是调控的开始，为此后的宏观调控定下了基调。支柱产业需要稳定有序健康发展。为了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是为了整个经济运行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18号文件拉开了立足于稳定和发展的宏观调控。2003年宏观政策开始着手的除了房地产市场还有土地市场。这一年2月18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紧急通知》，拉开了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序幕。《通知》内容包括土地市场的整顿清查以及清理开发园区，整个过程，显示了政府对于掌控土地资源的决心，这种调控思路一直延续到2004年，其间还有五个政策出台：一、2004年3月30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即71号令），要求从即日起就“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执法监察，各地要在2004年8月31日前将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否则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收回土地，纳入国家土地储备体系。二、2004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中组部发布《关于调整省以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干部管理体制的通知》，要求省级以下国土资源部门从现在的政府组成部门转变为政府工作机构，领导干部则由地方党委管理为主改为由上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管理为主，宣告土地垂直管理开始。三、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对所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全部清理，重点是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同时明确提出在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的半年时间内建设用地审批管理的“三个暂停”：即全国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暂停新批的县改市（区）和乡改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暂停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的各类规划修改。四、2004年7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其中进一步明确8月31日后，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协议出让土地的要从严查处，体现出中央政府对规范土地市场的决心。五、2004年12月2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开展全国城镇建设存量用地



情况专项调查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国土部门将以200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期，到2005年3月31日，对全国城镇的存量用地、闲置用地情况进行地毯式调查。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轮调控仅限于土地管理系统内部，虽然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规范了土地市场的供应方式，但是这种调控效果对于抑制房价并不明显，一、此前开发商手上已经积累了不少土地，足以支持若干年的开发所需，并不会迅速受到土地政策的影响，而且还有“鸡蛋换粮票”的获取办法；二、土地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要的财政支柱，并成为“城市运营”中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对于土地价格的迅速上涨有所偏好。2004年政府虽然出台了许多土地政策，但是这一年的重心仍然是金融手段。2004年1月7日，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协作共同做好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各有关部门之间工作分工，并对组织工作机制、相关制度建设提出了要求。2004年4月28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适当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提高到40%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由20%提高到35%以上。2005年3月17日，央行调整房贷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从2005年3月17日起再次上调。将现行的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下限利率水平为相应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虽然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房价，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这导致政府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通知强调：由于市场需求偏大，部分地区投资性购房和投机性购房大量增加，以及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开发建设成本提高等，导致一些地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抑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以后应该加强以下几项工作：一、高度重视稳定住房价格工作；二、切实负起稳定住房价格的责任；三、大力调整和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四、严格控制被动性住房需求；五、正确引导居民合理消费预期；六、全面监测房地产市场运行；七、积极贯彻调控住房供求的各项政策措施；八、认真组织对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督促检查。

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同意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转发了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监会等七部门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然而，一些地区仍然存在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商品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供应结构不合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等突出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引导和调控，及时解决商品住房市场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以下8条意见：一、强化规划调控，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各地要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需求情况，尽快明确今后两年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规模、项目布局以及进度安排。二、加大土地供应调控力度，严格土地管理。各地区要在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的前提下，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供应方式及供应时间。三、调整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政策，严格税收征管。要充分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房地产市场，加大对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等房地产交易行为的调控力度。四、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防范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要加大“窗口指导”力度，督促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调整和改善房地产贷款结构。五、明确享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标准，合理引导住房建设与消费。为了合理引导住房建设与消费，大力发展省地型住房，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对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住房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六、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各地要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4〕77号）和当地政府的规定，落实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招投标的制度，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严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控制套型面积和销售对象，切实降低开发建设成本，建设单位利润要控制在3%以内。七、切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销售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禁止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在预售商品房竣工交付、预购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之前，房地产主管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转让等手续；房屋所有权申请人与登记备案的预售合同载明的预购人不一致的，房屋权属登记机关不得为其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手续。八、加强市场监测，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各地要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加强对房地产特别是商品住房市场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加强对同地段、同品质房屋销售价格和租赁价格变动情况的分析，准确判断



房价变动趋势。

国务院先后发布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与《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被分别称为“旧八条”与“新八条”。这些措施被各部门、各地区贯彻执行之后，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初步得到抑制。但是，房地产领域的一些问题尚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2006年5月24日，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统计局、银监会等九部委出台了《关于调整住房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即“国六条”），国六条具体内容为：一、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各地都要制定和实施住房建设规划，对新建住房结构提出具体比例要求。二、进一步发挥税收、信贷、土地政策的调节作用。严格执行住房开发、销售有关政策，完善住房转让环节税收政策，有区别地适度调整信贷政策，引导和调节住房需求。科学确定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规模，加强土地使用监管，制止囤积土地行为。三、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和进度，减缓被动性住房需求过快增长。四、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房地产开发建设全过程监管，制止擅自变更项目、违规交易、囤积房源和哄抬房价行为。五、加快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规范发展经济适用住房，积极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六、完善房地产统计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房地产市场信息透明度，全面、及时、准确地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国六条”拉开了2006年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序幕，是其后出台的各项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此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号）印发后，各地区认真落实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的规定，大力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房地产市场一定会朝着健康、公平的方向发展。

胡锦涛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议

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提出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面对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中国共产党倡导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观？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大胸怀。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奋斗，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树立这样的目标并朝着它努力，是要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发展走向的一种期望和追求，表明我们采取各种行动的一种价值导向。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 and 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和谐世界的最终实现无论多么遥远、多么艰难，总要有人去倡导并吸引大家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追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中国古人肯定“和为贵”，认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友好相处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断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和为贵”是以“和而不同”为前提的。“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既要保留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展示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权益，发挥



自己的作用，但同时又必须承认世界的多元性、多样性，容纳不同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承认别人也有权展示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权益、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涵义精深，自成体系，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批判吸取，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政府向全世界表达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是根据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时代特征、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提出的，同时也继承了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合理内核。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和平发展进入 21 世纪新时期的外交理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领导集体关于国际政治、对外关系的认知与主张的集中体现。“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可以综合概括为：以开放包容的思维，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对话与合作谋求共存共赢。“和谐世界”理念的外延可引申为：不同文明需要相互借鉴、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各方要以互信、互利、互补为原则共同分享发展的利益，在市场准则和法律框架下，营造开放、公正、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各国要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和灵活务实的态度，通过加强沟通、对话与协商，化解矛盾和争端；国际社会成员要携手合作，应对威胁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众多新型安全风险和挑战。

和谐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最新发展和全球战略的核心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尽己所能支持被压迫民族独立与发展事业。在睦邻外交中，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成为中国处理同一些周边国家领土纠纷的指导思想。在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上，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指导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实践。他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命题，成为今天和谐世界理论的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新安全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人本外交、新的发展观、新文明观，和谐世界理念正是其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表达。在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建设方面，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各国可以不受歧视、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以联合国宪章精神为基础，改革和创新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和地区机制，使平等、公正获得强有力的法理保障和制度保障。在国家行为规范塑造方面，新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倡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倡导互利、互信，促进共赢和实现共同安全；倡导开放包容，呼吁对话合作，努力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猜疑与隔阂；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

当今世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条件正渐趋成熟。首先，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各国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正在日益加深；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各国人民的利益交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千丝万缕。这种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基础。其次，当前国际关系民主化日益发展。虽然国际力量对比呈现一超与多强并存的状态，但是单边意志不能不考虑多边意志，单边主义不能不最终屈从于多边主义，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通过多边协调合作来应对重大国际问题，比单边主义更有效，任何超级大国都不能为所欲为。再次，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虽然仍有众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有待改善，但是确实也有大量的、系统性的国际规则为人类国际交往的协调提供了方便。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提出这个目标也正当其时，既符合当今时代潮流又顺应国际社会民心所向。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发展问题尤为突出。世界需要协调、均衡、普遍的发展，因此特别需要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要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要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要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要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需要；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加快发展和繁荣，发达国家的稳定、安全、可持续的发展和繁荣是缺少保障的。全球化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和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性合作与一体化发展也非常迅速，在各个区域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尽管程度不同，但是发展都是空前的，为区域内的协调发展不同程度地提供了积极因素。多边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国际问题有了积极的进展。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诸如传染性疾病、严重自然灾害、严重的环



境污染、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行动、共同对付。这一切说明，求和平、求合作、求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我国不失时机地提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充分表达了我国求和平、求合作、谋共赢的愿望，符合我国国家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要构建和谐世界，但当今世界仍处于矛盾多发、突发时期，传统的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现实世界并不和谐。联合国历来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实质上一些国家往往不愿意让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强权政治依然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联合国历来倡导国际政治民主化，让世界各国都真正享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但是奉行霸权政策的国家仍然企图垄断全球治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单极化与多极化的矛盾，全球主义与国家至上主义的矛盾，都客观存在着。因此，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必然会碰到种种困难，需要世界各国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

构建和谐世界，第一，要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坚持平等、民主的原则。第二，要尽力实现互信、互利和协作共事。第三，要寻求共同发展。第四要发扬包容开放的精神，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第五要充分发挥现存的较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的作用，并不断完善那些尚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与会者还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构建和谐世界要强调处理好四方面的关系：一、大国关系；二、南北关系；三、不同宗教、文明的关系，包括东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四、地缘政治关系，妥善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主权、领土纠纷和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产生的海洋权益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构建和谐世界是个很高的要求，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对我国来讲，更重要的是与邻近国家一起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进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妥善化解各种挑战，在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同时，向世界全面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首先是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和解决发展问题。贫穷是导致动荡最主要的因素，建设“和谐世界”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近些年，中国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方面通过保持自身经济的高速发展，成功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并

有效带动周边国家及主要贸易伙伴走向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很多国家提供信贷支持。比如在希腊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时，不仅其国家主权债权被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到“垃圾级”，甚至连欧盟内部也对希腊进行批评和谴责，但这时中国仍然及时伸出援手，支持他们度过危机。

第二，努力促进大国合作。最典型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自己深受其害，直接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不仅如此，部分国家还通过无理的贸易保护等方式企图向中国转嫁危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依然加强同各大国的战略对话和沟通，增进互信，维护与主要大国关系的稳定，促进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第三，推动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推动由中、朝、韩、美、俄、日参加的六方会谈。这样的机制使朝核问题的总体局面多年以来始终得到控制。这其中不少工作如果缺少了中国的努力是难以取得成功的。而对于发生的“天安号”事件，在有关各方激烈争执、对抗不断升级之时，中国努力居中斡旋，提出解决问题最核心的两条主张：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安理会发表了兼顾各方关切的主席声明，使紧张的局势逐步缓解。

第四，推动“和谐地区”的建设。中国领导人在2005年提出建设“和谐世界”之后，陆续又提出“和谐地区”、“和谐亚洲”等概念。“和谐世界”首先要从周边做起。尽管中国的周边局势比较复杂，但总体上来讲，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中国和周边各国的共同愿望。中国经济本身的蓬勃发展，对亚洲邻国，包括日韩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南亚、东南亚等经济欠发达地区都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实际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已经反映出中国推动建设“和谐地区”的努力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响应。

第五，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尽管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愿意看到，但实际上，近几年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都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G20一跃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核心机制。在G20的成员构成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数量大体相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会形成由少数发达国家垄断世界事务的局面，同时也避免了机构臃肿、决策困难的弊端，使决策和行动的有效性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其中，中国的作用也是非常积极的。



第六，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承担应有的责任。2009 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发挥了负责任的重要作用。尽管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欧洲国家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批评的声音，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不少欧洲政要都坦承，中国制定的自主减排目标是具有相当雄心的，如果没有中国，可能哥本哈根会议将走向空转，什么协议也达不成。

第七，推动文明多样性。“和谐世界”理念本身就包含了文明多样性的内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先后爆发，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欧洲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都受到质疑。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中国模式”备受关注。尽管各方对这一提法尚未形成共识，但“向东看”正在成为世界的一种潮流。事实上，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更强调的是不同文明、文化和发展模式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将来一个和谐的世界应该具有多样化的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存，是一个共同发展的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高度概括了中国外交的理想追求与全球战略的核心内涵。实践证明，中国通过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不仅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和谐世界”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理念和主张。

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

从1953年开始，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开始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到了“九五”和“十五”期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让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8%。这种方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为此，2005年8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十一五”规划专程赴豫赣鄂三省调研，考察的重点是提高自身创新能力问题。他强调，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在此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5年7月25日召开会议，决定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指出，“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研究和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对于做好“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指导全党全国在今后五年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开放水平，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强调今后五年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表明，“十一五”将是一个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规划。

2005年10月8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1人，候补中央委员150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了



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2010年）。温家宝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与以往相比，新的五年规划更强调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体现了中国政府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的决心和努力。

全会首先充分肯定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我国经济社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高度评价“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过去的五年，各地区各部门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加强。这些都为“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十一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全会指出了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

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全会还制定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这一目标是按照十六大对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而提出的。

我国现在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任务，会议认为应该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会议指出在“十一五”期间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科学技术发展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



社会。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建设,抓紧培养专业化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

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会议强调: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全体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兢兢业业地工作,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继续搞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将以往五年计划提法用规划来取代了,从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虽然只是一字之变,但是这反映出中国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变政府主导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进一步转变,展示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体,是世界众多市场经济国家一员。我国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市场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在此背景下,体现计划经济特色的五年计划到了淡出之时。科学发展观是编制“十一五”规划最重要的指导方针。它意味着,中国要从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加依靠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发展。自主创新将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一字之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相连。构建和谐社会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规划中去,从单纯以增加GDP为出发点,变为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核心,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重大举措,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规划取代计划,是政府工作方式转变的一项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工作方式发生变化。由过去的指令性计划,转向战略性、政策性、指导性规划;由过去注重产业发展、指标分配的规划,转向强化公共资源、公共产品、服务配置和空间定位的规划;由过去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规划,转向政府、社会、企业全方位合作的开放型规划。规划取代计划,是中

国为适应加入 WTO 后的新形势而做出的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改动，是中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一个举措。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体现“普惠原则”，规划将有利于穷人收入的增长。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首先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打破了绝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探索了新经验、新路子，并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 1 000 美元，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3 000 美元。2004 年，中国提前实现了“十五”规划确定的 GDP 总量 12.5 万亿元和人均 GDP 9 400 元的目标。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在这一关键阶段，要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否则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为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 20 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这是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后，五年规划制定理念所作的一个重大调整和历史跨越，表明中国执政党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表明中国将进入全面改革、全面开放、全面创新的时代。这个规划将是中国迈向更大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一定会激励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团结协力，取得辉煌成就。



我国航天事业的新发展

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60年代,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至今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资源卫星、气象卫星、通讯卫星等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掌握了使卫星返回地面的回收技术,用一枚火箭把多颗卫星送入轨道的“一箭多星”等世界尖端技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里,迸发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取得了令国人自豪、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完全有信心依靠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从此拉开序幕。1970年4月24日,中国长征1号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迈出了中国发展航天技术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进入航天时代,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1981年9月20日,中国用风暴1号运载火箭同时将三颗卫星送入轨道,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实现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1984年4月8日,中国用新研制的长征3号火箭首次将东方红2号试验通讯卫星送入赤道上空静止轨道运行,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三个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和第五个独立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1988年9月7日,中国长征4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风云1号A气象卫星,它表明中国是世界第四个掌握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技术的国家和第三个拥有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1990年4月7日,中国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美国制造的亚洲1号通信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进入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的国家。1999年5月10日,长征4号乙火箭首次发射获得成功,并把风云1号C气象卫星和实践5号科学实验卫星送入轨道,这也是长征系列火箭第65次飞行,总计发射卫星80颗,其中中国卫星51颗,外国卫星29颗。

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于2003年10月15日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这次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继前苏联（现由俄罗斯承继）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

中国第二艘搭载太空人的飞船，也是中国第一艘执行“多人多天”任务的载人飞船，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2005年10月12日上午9: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费俊龙和聂海胜两名中国航天员被送入太空。2005年10月12日17时29分，航天员费俊龙打开神舟六号返回舱与轨道舱之间的舱门，进入轨道舱开展空间科学实验。2005年10月13日4时开始，航天员进行在轨干扰力试验，在舱内有意识加大动作幅度，以试验人的扰动对飞船姿态的影响。在进行了开关舱门、穿脱压力服、穿舱、抽取冷凝水四大项“在轨干扰力”试验后，航天员的活动对飞船姿态的影响很小，飞船可保持正常飞行，所以不需纠正飞船姿态。2005年10月14日清晨，神舟六号在第30圈进行变轨后的首次轨道维持，即根据轨道精测参数进行微量调整，使飞船回到预定的正常轨道。维持时，神六发动机共点火6.5秒，将飞船抬高了800米。2005年10月15日16时29分，胡锦涛与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通话。18时05分，航天员向北京航天飞控中心传送他们拍摄的飞船太阳能帆板的数字图像。2005年10月17日凌晨4时33分，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成功着陆，两名太空人费俊龙、聂海胜自行出仓，他们在太空逗留了115.5小时，是神舟五号太空船飞行时间的五倍多，创造中国人在太空逗留最长的时间，圆满结束中国首次“多人多天”特点的太空旅程。

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发展载人航天技术、进行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活动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神五”只有杨利伟一名乘客，而10月12日，太空迎来了两名客人——中国“神六”的两名航天员费俊龙和聂海胜。人数的增加给飞行任务的各个环节和工程各系统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携带的装备要增加一倍，两名航天员存在协同配合的问题等等。双人飞行，比单人飞行更能全面地考核飞船和工程其他系统的性能。“神五”仅飞行了21个小时，绕地球14圈。费俊龙和聂海胜在轨运行多天，飞行圈数、距离大大增加。在空间停留的时间越长，意味着发生问题的概率越大，飞行控制越复杂。飞控系统人员对计算机终端进行了更新，数据记录方式也实现了更新换代。“神六”制定了在轨运行时的150余种故障模式和对策，如果故障严重，飞船在每一



圈都能应急返回。“神五”飞行中，杨利伟一直待在返回舱内，没有进行空间科学实验操作。这一次，两名航天员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生活并开展了空间科学实验。这是我国第一次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实验的内容和效果将受到很大的限制。人的参与将使空间科学实验实现质的飞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1月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庆祝大会，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神州六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凝聚着所有参加工程研制、试验、建设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航天员的指挥、心血和汗水。费俊龙、聂海胜作为执行神舟六号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不畏艰险、坚毅果敢，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表彰他们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费俊龙、聂海胜“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中国第三个载人航天飞船神州七号飞船，于2008年9月25日21点10分04秒988毫秒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升空。于2008年9月28日17点37分成功着陆于中国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神舟七号飞船共计飞行2天20小时27分钟，中国首次实现了宇航员太空行走。

神舟七号飞船载有3名宇航员分别为翟志刚（指令长）、刘伯明和景海鹏。神舟七号飞船候补梯队航天员分别为陈全（指令长）、费俊龙、聂海胜。飞行任务的主要目的是实施中国航天员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突破和掌握出舱活动相关技术，同时开展卫星伴飞、卫星数据中继等空间科学和技术试验。飞船运行期间，一名航天员着中国的飞天舱外航天服出舱进行舱外活动，回收在舱外装载的试验样品装置。9月27日16:35经过刘伯明，景海鹏的帮助下，航天员翟志刚打开舱门，开始出舱活动，翟志刚首先探出头，并向舱外默认的闭路镜头挥手，之后全身走出舱外。刘伯明也把头探出机舱外，交给翟志刚一面小型五星红旗。翟志刚接过五星红旗，向镜头挥动片刻。随后翟志刚取回舱外装载的固体润滑实验试验样品。16:58航天员成功完成舱外活动，返回轨道舱内。17:01轨道舱舱门关闭，完成了预定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国家。

11月7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庆祝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

满成功大会。胡锦涛亲自为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颁发“航天功勋奖章”和证书。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研制、建设、试验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向荣获“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和航天功勋奖章的翟志刚同志，向荣获“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和航天功勋奖章的刘伯明、景海鹏同志，向所有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神舟七号飞天的三名航天员所完成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飞天之旅，在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出舱活动中，中国航天员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足迹印在飞船舱外的茫茫太空之中。中国航天员走出飞船舱门迈进太空的第一步，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又一个全新的开始。中国航天员在太空留下的“第一步”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大步，是践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必然结果。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航天员迈向太空的“第一步”，将引领一个时代，开辟一个新世纪。这次神七的发射，意义深远，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振奋国人精神。让中国人民感受国际地位深层次提高，这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鼓舞，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其影响极其深远。

按照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规划，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分三步来实施，其中，第一步是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将航天员安全地送入近地轨道，进行对地观测和科学实验，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第二步是继续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舱的交会对接。在突破这些技术的基础上，发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建成完整配套的空间工程系统。第三步，建立永久性的空间试验室，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系统，航天员和科学家可以来往于地球与空间站，进行规模比较大的空间科学试验。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计划完成后，航天员和科学家在太空的实验活动将会实现经常化，为中国和平利用太空和开发太空资源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我国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于2003年10月16日安全返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的任务已经完成。神舟六号与七号的成功返回，标志着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步计划的逐步成熟，是推进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转折。

航天事业的发展，考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也是一个国家在高新科技领域能否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它充分表明国家科技力量在发展和推动



航空航天技术中起到的至重要作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也预示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未来。载人航天作为我国尖端科技领域的一重大工程，承继了无数前辈创业者留下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技术出口限制，对载人航天核心技术更是严格控制。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不能依靠别人、依赖别人。中国搞载人航天，只能立足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一定要以持续的技术积累作为基础。我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以来，广大航天工作者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培育和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航天事业培养了一批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人才队伍，培育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都将激励着中国航天人不断前进，推动我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谱写航天事业新的壮丽篇章。

8 亿农民免征农业税 “皇粮国税” 被取消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2005 年 12 月 29 日高票通过决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国税”。《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春秋时期的公元前 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成为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从那时至今，中国农民缴纳农业税这一“皇粮国税”已经延续了 2 600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农业税。从 1983 年开始，除农业税外，国务院还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决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 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至此，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实际上包括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三种形式。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从 1949 年至 2000 年的 52 年间，全国共从农民手上征收了 7 000 多亿公斤粮食；农民人均负担农业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49 年每人负担 28 公斤，减到 2000 年的每人 13 公斤，实际负担率即征收额与实际产量的比例也从 13.5% 降至 2.4%。但从 2000 年开始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来由农民负担的费也被纳入税里，农业税比例有所增加。

2004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4 年财政部对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了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五个省份宣布自主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加上西藏自治区一直免征农牧业税，全国共有八个省份免征农业税。今年元旦前后，广东、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西、海南、宁夏、贵州、重庆、安徽等 14 个省市区宣布，从 2005 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使免征农业税的省份增加到 22 个。免



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 500 亿元左右，到 2005 年已有近八亿农民直接受益。2005 年新年前后，江苏、重庆、河南、四川、山西、内蒙古、贵州、安徽、海南、广东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全部免征农业税。

我国所行农业税体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年产量基础上征收的农业税收，名义税率为 15.5%，实行以征收实物和征收代金大致各占 1/2 的定额征收方式。常年产量以 1998 年前五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确定，并且保持长期稳定。另一方面，1994 年，我国进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流转税为主体、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辅的新的税制体系。新税收体系基本没对农业税做改动。2000 年，中央开始在部分农村推行税费改革，改革内容之一就是调整农业税政策，对农业税税率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农业附加税并入新的农业税。新的农业税实行差别税率，最高不超过 7%。

农业税属于间接税税种，具有累退性。近几年，我国每年征收的农业税占总税额的 3% 左右。根据统计：1999 年，全国税收总额 10 682.58 亿元，农业税 423.50 亿元，占 3.96%。直至目前，每年的农业税额也不足 500 亿元。

我国农业税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建国之初，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政府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的贡献，在那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确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税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行的农业税制呈现出很多缺陷和弊端。

第一，不合理的农业税制对农民不公平。农民所承受的税负比城市工商业者的更繁重。有人做过调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取消其他统筹收费后，农民的负担水平为 8.4%。如果考虑我国农产品平均商品率只有 40%，则换算后的农产品商品的流转税税负高达 21%。对于城镇工商业者，增值税销售货物的起征点是月销售额 2 000 ~ 5 000 元，折合年销售额 24 000 ~ 60 000 元。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产品销售额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不应该缴纳流转税。如果比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月基本扣除额 800 元，折合成一年就是 9 600 元。照此标准，农民也不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农民作为消费者已经为国家税收做出了应有贡献，其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中的外购式消费占到农民纯收入的一半以上，并且他们还要承担其他税负，如消费税。这种现行的城乡二元化税制格局，对于农民来说极不

公平。

第二，所行农业税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一般是针对商品流转额，或者是针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或其他性质的净收益。我国所行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颁布的。该税制既不是针对农业生产净收益征收的所得税，也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的商品税。不论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率是多少、效益好或坏，只要使用了土地都必须交税。而且，农业税的计算没有扣除生产成本，计征基数中连农民的自食口粮也包括在内，农民的生产耗费（包括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消耗）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反而必须交税。实质上，这种农业税是一种类似“地租”的土地税。

第三，所行农业税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且降低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农民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经济比较优势。我国现行农业税制，一方面使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本来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离开了土地，结果使得大批农田被抛荒；另一方面束缚了我国农产品进一步扩大的国际市场，减少了国内市场占有率，从而减少了农民的就业总量。大量农民收入不固定，难免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稳定问题，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如若将我国的农特税定位仍为农业税，我国无法对进口国外农产品征税，也无法对出口国内农产品退税。这就削弱了我国本身脆弱的农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在WTO成员国中的严峻竞争。因此，减免农业税，势在必行。

2006年在中国农民加速告别“皇粮国税”的同时，中央财政支农力度进一步加大。2004年，中央财政为顺利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安排转移支付219亿元补助地方财政减收缺口。与此同时，为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粮食生产，还实施了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财税优惠政策，取消3项、免征8项、降低4项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全面推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补贴资金总额达116亿元，近6亿种粮农民直接得到实惠。对13个粮食主产省还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8.5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7000万元。同时，积极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分流冗员，促进粮食价格的市场化进程，逐步减少对中间环节的补贴，为巩固粮食直补创造了



条件。

农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中央财政 2004 年用于农业的国债项目资金 376 亿元，占国债项目资金的比重达 34.3%。将农业综合开发新增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粮食主产区，并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 63.16 亿元资金全部实行无偿投入。大力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2004 年，已有超过 150 万农村劳动力完成培训，120 多万人转移并就业。

取消农业税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首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不可否认，在经济总量比较薄弱的农业经济年代，农业税作为财政支撑，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万亿元大关的前提下，第二、第三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主导经济，第一产业即农业税收退居次要位置。据报道，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在低谷徘徊，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的势头，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转向非农产业，2003 年国家粮食播种面积曾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粮食产量下降到近 14 年来的最低点。所以，减免农业税，是政府对农业问题的重视，更能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注入政策活力和经济活力。并且有利于加快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逐步实现基层政府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等供给由农民提供为主向政府投入为主的根本性转变，有利于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

第二，能减轻农民负担，依附农业税的各种附加税也将失去存在理由，有助于社会稳定和民心稳定。农业税的征收本是国家正当税收手段，可在某些地方，农业税却成了“公交车”，什么乱收费都硬挂靠，其结果是国家的好政策在有些基层往往变味，农民负担有增无减，怨声载道，加剧了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危害当地的政治生态。取消了农业税，乱收费必将失去存在的土壤。一两千元的农业税对于当地财政也许分量不是太重，而对于农民家庭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用这笔钱发展再生产，改善劳动、生活条件，安居乐业，提高务农积极性。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农民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广大农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三，对基层政府职能转换意义重大。由于农业税的特定征收对象和现行农村的治理特点，只要农业税存在下去，基层政府与农业税的征收行为始终会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而且某些基层政府把农业税的征收演化成了竭

泽而渔式的恶性“收、养”机制，这不利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农业税的取消无形地剥离了基层政府不规范权力的又一依仗，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将会逐步得到规范，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

第四，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征收农业税，无疑会提高农业生产成本，使得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美国、欧盟等不仅不征收农业税，反而给农民大量补贴，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国家没有经济实力对农业实施补贴，取消农业税，就是给给予农民帮助和支持，能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取消农业税，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免征农业税给农业、农村、农民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农民负担过重、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纯务农农民家庭和耕地面积比较多的家庭增收效果比较明显。农民把上交农业税的资金投资到种植、养殖等方面，其利益相应增加，增强了农村发展的后劲。取消农业税还提高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和土地的利用率，减少了土地抛荒现象和盲目外出打工的现象。农民没有农业税的负担和压力，就会主动抓住惠农机遇，自由地选择增收行为。同时由于取消农业税为有意进行耕种更多土地的农户腾出了利润空间，使他们有可能将这部分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从原承包农户手中按照一定价格将抛荒土地转租过来，这有利于土地逐步向部分农户集中。此外，一些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户可将土地按照一定价格转租给其他农户，使农村自由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步伐。

免征农业税，彻底改变两千多年来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这是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这项改革关系全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全省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农业税的取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发展，但伴随着新的机遇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情况，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去创造和谐的社会。



整顿社会风气、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

2006 年新年伊始，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总结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情况，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对 2006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出部署。

2005 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狠抓《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教育、制度、监督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过去的基礎上又取得新的成效，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实施纲要》抓住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提出有效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政党，如果不坚决反对和有效预防腐败，就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腐败，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格格不入。早在 1926 年 8 月，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从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带领全党开展“三反”斗争，邓小平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江泽民号召全党“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 85 年的奋斗历程。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推动认识实现新的飞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崭新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十五大

以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倡廉方针，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根据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的部署，2004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启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起草工作。历经半年多的调研、起草、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审议通过，2005年1月3日，《实施纲要》正式颁发。

《实施纲要》充分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坚强决心，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鲜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最新认识成果，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上下交，则国泰”。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为人民群众之所需，这是党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人民群众信赖和依靠我们党，我们党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各项工作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施纲要》一颁布，就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肯定，也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实施纲要》，成为2005年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地，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行动——印发《实施纲要》单行本、组织编写辅导读本、制作辅导光盘、印制宣传挂图、建立16个工作联系点……在学习、宣传的过程中，中央纪委领导多次强调，要从讲政治的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抓好贯彻落实的各项工作。他们成立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派人到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宣讲。全国范围的《实施纲要》知识竞答活动，吸引2313万名党员干部参加，其中省部级干部2057人。

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辅导讲座、知识竞答、演讲比赛、文艺晚会……各地区各部门普遍成立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充分利用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活动，广泛宣传《实施纲要》。

实行任务分解，建立工作责任制，是推动《实施纲要》切实得到贯彻



的重要举措。截至2006年,129个省部级单位已经制定下发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了落实《实施纲要》2007年底前《工作要点》,把其中的68项任务,分解到23个牵头单位和31个协办单位。

责任落实、措施落实、人员落实、时间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及时分解任务,细化责任。北京市把77项任务落实到42个牵头部门和47个协办部门,天津市18个区(县)、13个直属委口全部出台了落实《具体意见》的具体办法。新闻出版总署把60项任务、79项各类制度分解到13个职能部门,国家工商总局等结合实际,制定了自己的2007年底前实施的《工作要点》。目前《实施纲要》确定的教育、制度、改革、监督和惩处的231项任务,已分解到中央和国家机关65个部委,落实工作的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已全部明确。

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成效,表明中央的战略方针、工作部署符合实际、切中要害,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展现出生机和活力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区各部门把制度建设作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进一步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反腐倡廉进程相协调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惩治腐败,绝不放松。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积极应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挑战和考验,加快构筑惩治、预防腐败的科学体系

按照《实施纲要》的要求,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对党员干部参与赌博和领导干部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进行专项整治,韩桂芝、田凤山、马德等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严惩。

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成为过去一年反腐倡廉工作重点。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利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进一步得到遏制。一年来,全国共查处7.8万多件假冒伪劣药品案件和5140起企业违法排污重点案件,查处并清退教育乱

收费3亿多元，医务人员退还和上交回扣、“红包”以及各地查处这方面的问题涉及金额1亿多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撤资5亿多元。

《实施纲要》在各地区各部门的贯彻落实，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信赖和支持。

尽管如此，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虽然这些年来，查处案件总体上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但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同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仍然时有发生。

坚持不懈，才能巩固成果；稍有放松，势必功亏一篑。中央政治局2005年底研究部署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深刻指出：反腐倡廉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同志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继续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抓紧落实《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一项长期紧迫的任务，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为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做了许多工作，但构建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历史课题，还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中央纪委一位负责同志说。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纲要》规划的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这一时期，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经霜历雪梅犹艳，风舞霞映旗更红。《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新的阶段。经过全党上下的不懈努力，历经风雨伟大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构筑起惩治、预防腐败的科学体系，以更加雄迈的英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反腐败斗争目前正呈现出五个新的动向，中国的反腐败战略正在发生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变化。中央纪委有关人士将这些新动向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在打击腐败分子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人权；推进反腐败政策的法制化；预防腐败与推进改革相结合；在打击高官腐败的同时，高度关注基层腐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斗争。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推动科技不断创新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需要相应的奖励制度来促进其发展。科技奖励是对在科技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的褒赏，是科技人员获得科学共同体承认的重要方式，也是从古至今乃至未来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奖励工作。1950年8月至1955年8月，国家先后颁布了三个科技奖励条例。科技奖励体系初具雏形。但在10年动乱期间国家科技奖励事业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对7 657项科技成果进行了表彰，这是科学春天的号角，标志着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恢复。纵观此后五年的工作，几乎是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重建：重新颁布了多项条例，恢复了国家发明奖，正式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大批科技成果获得不同程度的奖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科学奖励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了更宽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内涵，开始更多地依据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导科技创新方向。而这一原则，也成为我国科技奖励工作一直延续至今的基本精神。针对当时我国科技发展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跟踪国外发展为主的特点，为推动行业的科技进步和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鼓励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1984年，国家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该奖项的设立，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我国科技奖励体系基本构架已经建立。此后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奖励在发展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科技成果，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增列“国家星火奖”；为奖励对中国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公民和组织，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设立。

然而，到了20世纪末，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科技奖励制度已不能适应科技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奖励数量过多、缺乏权威的最高奖项、奖励项目与经济社会发展

脱节、部门单位和境内外组织乱设奖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以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为例，该奖项的奖金额度为10~20万元，而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高达100万港币，远远超过了国家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提出：应当加大对科技拔尖人才的奖励力度。1999年，国务院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其内容主要有：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奖励，这一奖项的获奖者必须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获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建树的，在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当中也创造出了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这样的科学家，获得者的奖金是500万元人民币；完善了四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提高国家科技奖励的奖励力度和授奖标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对科技奖励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加强对部门、地方和社会力量设立科技奖励的管理。此外本着国家发展需要的原则，对科技进步奖也作了调整，把奖励行业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作为主要内容和条件。经过此次改革，我国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科技奖励制度及评审体系，科技奖励基本形成了一个“国家科技奖‘少而精’、省部级奖和社会力量设奖健康有序发展”的新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奖励制度的建设并没有放慢脚步，而是仍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科技奖励工作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对原始性创新的奖励力度，在奖项设置、奖金额度、奖励数量、评奖机制以及鼓励社会力量设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在国家三大奖中，都突出了获奖成果的自主创新水平：国家自然科学奖突出对具有科学价值并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奖励；国家技术发明奖突出对核心技术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发明的奖励；国家科技进步奖把奖励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重点，鼓励科学技术研究与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并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的奖励数量和奖励比重，鼓励原始创新。在社会力量设奖方面，一批专门奖励自主创新成果的奖项先后登记并开展奖励活动，那些已开展多年的奖项也进行了调整，加大了奖励自主创新的力度。如在科技界享有广泛声誉的何梁何利基金奖自2006年起增设了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并分设产业创新奖、区域创新奖和青年创新奖，奖励具有高水平科技成就而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包括原始



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建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和著名品牌，创造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杰出贡献者。科技奖励工作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进一步突出了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推动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面对新形势和历史机遇，如何更加切实有效地发挥在激励科技人才和科技队伍建设方面的作用，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成为当前我国科技奖励工作的重大课题。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2006年1月9日上午9时，全国第四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会议为期三天，被认为是继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的“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媒体称“科学的春天又来了”。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部署实施国务院此前于12月30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动员全党全社会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一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对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又对今后的科技工作提出了六点具体要求：一、要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著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增强科技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多部门协作、多学科集成，共同搞好重大科技攻关，突破核心技术，建设重大工程，形成战略产品。同时，培养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锻炼和凝聚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二、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科学技术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和支撑。要特别重视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加强高新技术产业、资源能源开发与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农业增产、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领域的重点科技项目攻关，带动相关领域技术水平整体提升，增强科技服务人民生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三、要切实加强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抓住世界科技前沿制高点，部署和落实一批重大基础性、公益性科学研究项目，建设科技基础平台，建立开放共享机制，全面提高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增强自主创新的后劲。四、要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进国外重大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可

以提高我国科技进步的起点，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开阔视野，学习先进，兼收并蓄，大胆吸收国际上一切优秀科技成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积极引进智力和人才，为加速我国科技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五、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科学工作者要有为追求真理而埋头苦干、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克服心浮气躁，反对弄虚作假，树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领导干部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和科学家交朋友，广泛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要发扬学术民主，倡导百家争鸣，活跃学术气氛，为科技进步和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六、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国民的科学素质是自主创新的土壤。世界发展史证明，富于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不断发展进步。要广泛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用科学思想战胜愚昧落后。在全社会形成学科学用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2009年，是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建设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我国又相继实施了一批关涉科学发展的新法，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政府在对待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走在世界先进之列的重要标志。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标志着我国对企业国资管理有了最高层级法律的刚性约束与规范。同样于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防震减灾法，充分吸纳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经验，对防震减灾规划、地震监测预报、地震应急救援、震后恢复重建等内容作了修改、完善。通过每一部法律的实施，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轨迹，聆听到中国社会进步的足音。

在党和国家的不断努力下，我国在众多前沿技术领域取得了系列突破，显著提高了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研制成功曙光4000A高性能计算机，实现了峰值速度每秒11.2万亿次，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制造和应用十万亿次级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以龙芯、众志等为代表的高性能通用CPU设计技术经历了从初步掌握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初步改变了我国信息产业“空芯”的状况；我国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填补了我国百年通信史的空白，规模网络应用实验顺利完成。在生物技术领域，我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掌握了人类基因组大规模测序技术，获得一大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人类重要功能基因；药物研发取得突破，研制成功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上市的基因治



疗药物。在新材料技术领域，以碳纤维为代表的一批国防关键材料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碳纤维实验线和中试生产线五条；攻克了高性能碳素钢先进工业化制造技术，为我国钢材品种的更新换代奠定了技术基础；突破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铋系高温超导长带材产业化关键技术，高温超导电缆成功并网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温超导研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先进制造技术方面，我国也是硕果累累，1.5万吨水压机研制成功，大型国产水压锻件实现应用，装备制造产业取得重大进展；研制出100纳米高密度等离子体刻蚀机和大角度离子注入机，实现了高端集成电路核心设备零的突破；用于城市地铁工程的6.3米土压平衡盾构机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月掘进400米的良好成绩，打破了国外盾构机垄断国内市场的局面。在水稻科研方面，继独立完成籼稻全基因组测序和粳稻第4号染色体测序后，我国的水稻功能基因组再获新进展，获得一大批具有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此外，我国已率先在世界上研究成功亩产800公斤的二期超级稻，并开始向亩产900公斤的三期超级稻目标迈进。

中华民族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国曾是科技发达的文明古国。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正在大踏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其中离不开科技奖励制度的贡献。在引导科技发展方向和创新模式、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道路上，科技奖励制度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 收入分配秩序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社会收入差异也逐渐扩大，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低、中、高三类社会收入群体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纺锤型”结构：低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太大，高收入群体也有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相对较小。分配不合理与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关乎社会公平问题，同时会影响到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让普通劳动者真正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调整利益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成为谋求福利转向公共政策的重要议题。

我们所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有三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那么这些差距究竟有多大那？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 513元）、北京（7 836元）、浙江（7 771元）、广东（7 264元）和福建（5 879元），平均为7 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的两倍还多。2006年2月2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2月5日发布报告称，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把后者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此外，最高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已由“八五”末期的2.3、“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但是更加让人忧心的是，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



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

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包括已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由各主管部门分别按不同群体设计的，对各群体在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顾及不足，收入分配政出多门管理体制混乱。对本应讲求公平的社会保险制度，实际上因群体的差异而造成了不公平；即使是同一群体中，也存在着研究少数人的问题多，研究多数人的问题少的现象。

二、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各方的需求，制订规范分配行为的法律法规不及时，调整收入差距过大的可操作的措施不多，对一些部门或地方自行其是的行为纠正不力，以致造成分配秩序混乱，处理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不足。

三、现行调节收入的手段乏力，调节社会各群体财富存量及收入分配流量之间的关系缺乏整体的考虑，个人收入所得税制急需改进。

四、在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职能“缺位”和行政干预共存，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同时政府也存在着诸如拖欠工资、随意增加工资外补贴等不规范的分配行为，以致影响了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权威和自身形象，也引发了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人的心态的不平衡。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那么和谐社会就应该是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合理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分配政策的灵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更应该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与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当前，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日益突出，由此而引发的人的心态失衡和不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这些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些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以解决。

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之后首先为社会弱势群体办了几件实事：一、对农民“多予少取”，出台减免农业税政策。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终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坚持多予、少取”农民的方针。这一政策的出台使8亿农民受益。二、各地陆续提高了（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

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12月份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将妥善安排困难群众生活作为各级政府当前工作的第一位予以考虑，并作出了具体部署。为此，各级政府将采取下列措施，一、2008年继续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提高幅度要明显高于前3年每人每月80元的平均水平，执行时间由原定7月1日提前到1月1日。二、各地人民政府要在2008年8月和10月两次发放城镇低保对象临时补贴的基础上，再次适当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确保困难群众生活水平不降低并有所改善。三、对未纳入低保范围、但实际生活困难的城乡低收入居民，各地要采取临时补贴等措施救助。四、充分发动社会各界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捐助活动，健全完善社会化的灾害救援和救助机制。五、切实安排好老干部、军烈属和城市低保户、农村特困户等家庭的生活。六、各地要根据物价上涨幅度和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情况，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标准。七、研究提高乡村教师的工资水平，完善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八、增加医疗救助资金，扩大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范围，缓解群众“看病难”的矛盾。九、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成品油价格调整对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政策。十、继续做好清理拖欠职工和农民工工资工作，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十一、继续落实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各项政策措施，增加住房供给，稳定住房价格。十二、切实落实国务院对大中专院校学生食堂的补贴政策，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增加补贴资金，稳定大中专院校食堂饭菜价格。此外到2010年全国已有27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均在20%以上。然后，政府将视线又转向了中低收入阶层：一、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二、颁布并实施《公务员法》，让政府公务员人员的工资上涨有法可依。

除了上述几件中央领导班子所办的实事之外，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采取了许多其他的措施。2006年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了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八部委共同参加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座谈会。会议就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初稿）进行了专题讨论。虽然此次没有敲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但低、中、高收入群体均被纳入此次改革的范畴，而改革也将朝着“规范收入分配制度、理清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公共服务”的方向进行，达到“限高、提低、促中”的目的。加强对高收入群体、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分配收入监控也成为《意见》涉及的重点之一。



这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6年5月26日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

会议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要求，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努力解决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以促进公务员队伍建设，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要完善地区津贴制度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完善机关工人工资制度。要随着经济发展，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并注意提高其他低收入人员待遇水平。

会议强调，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把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扎实工作，把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这次会议对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方针。但是，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不是

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这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因此，中共中央于2006年7月6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出席座谈会。温家宝通报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有关情况。

在这次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梅颖、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无党派人士陈章良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利于逐步建立科学完善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大家在发言中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中需要注意解决和完善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胡锦涛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解决公务员收入分配问题的同时，要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要关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问题，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胡锦涛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公务员法规定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和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是贯彻落实公务员法的要求。形成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工资体系和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适应经济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要求的公务员工资管理体制，有利于保持公务员队伍稳定，有利于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也有利于为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和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面临的情况相当复杂，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问题的切入点，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逐步推进、逐步完善。



胡锦涛指出，在解决公务员收入分配问题的同时，要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要关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问题，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为了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适当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倾斜，照顾低收入者的利益，这次在考虑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时，要完善地区津贴制度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同步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机关工人工资制度，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有关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待遇标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并注意提高其他低收入人员待遇水平。

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所采取的一连串的动作脉络清晰、节奏分明，这充分说明了一点：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并不像以往所做的那样，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局部调整，而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大变革。

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提出“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重要论述）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内容上看，它体现了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有机统一。它既贯穿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又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做出了高度概括。二、肯定与否定的有机统一。“八荣”是从肯定方面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精辟概括，从正面强调了要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八耻”则从否定方面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进一步阐释，明确提出要反对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的言行，对当前社会的不良品德和歪风邪气进行了有力鞭挞。三、现代社会优秀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有机统一。它概括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提出



了具有时代精神的道德要求，又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具有民族性的特征。四、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荣辱观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的历史。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追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贫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时代，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者为荣，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为耻；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者为荣，道德缺失、麻木不仁、见利忘义者为耻；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者为荣，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不思进取者为耻。正是这些深刻体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知荣明耻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

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重，认真继承，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精华。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大旗，使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它是我们党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后发表的又一重要理论。它表明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思想。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指导方针，起着明确指导思想、统一意志、增强凝聚力、打牢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于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中存在的紧迫问题而提出的。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各种思想大量涌现，不同思想文化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热爱祖国、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科学文明、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已成为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另一方面，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混乱，荣辱不辨、善恶不明、美丑不分，甚至颠倒黑白；一些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道德观念侵蚀人的心灵，金钱、权力、地位成为一些人追逐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模糊或消解，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严重冲击。因此，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多元时代的社会价值导向，确立正确的社会道德标准，就成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其次，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但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也容易诱发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制度和法规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一些经济领域中的不道德现象、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甚至有蔓延之势。如使用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偷盗等多种极不道德、违法的手段谋取一己之利；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违约、毁约、行骗；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党风，涣散了民心，损害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胡锦涛同志适时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明确了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倡导了平等、诚实、信用、公平的经济伦理准则，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提供了思想保证。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相连、有机统一。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我们党只有不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永葆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指导。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此具体地谈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且把荣和辱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却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目前思想道德建设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他还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

导什么、抵制什么不能做到旗帜鲜明，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前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进而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营造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第三，是当前形式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十一五”规划纲要描绘的美好生活蓝图，让人民群众怀喜悦和期待。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泛滥成灾，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所谓“八耻”就是典型的写照。反映在一些社会现象上，一盒天价月饼、一顿天价年夜饭，使勤俭节约教育变得软弱无力；盗版、虚假广告、考试作弊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良知。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第四，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



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功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 21 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

何为“耻”？何为“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一把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为我们确定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衡量标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奢侈腐朽、没落颓废的社会风气；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公民道德，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言行。弘扬“八荣”，从善如流；对“八耻”说“不”，针锋相对。在道德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提倡“八荣”，反对和抵制“八耻”，这是一件扬正气以利千秋的大事情。

中国科学家完成庞加莱猜想

2000年5月，美国的克莱数学研究所筛选出了七大世纪数学难题，为了求解，不惜每道题悬赏百万美元。这七大难题包括庞加莱猜想、黎曼猜想、霍奇猜想、杨-米尔斯理论、P与NP问题、波奇和斯温纳顿——戴雅猜想、纳威厄——斯托克斯方程。时至今日，对这七大难题的破解工作进展如何？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指出：很多人攻关的黎曼假设还没有看到破解的希望；引起很多著名数学家兴起的霍奇猜想进展不大；和流体有关的纳威厄——斯托克斯方程离解决也相差很远；P与NP问题没有什么进展；杨-米尔斯理论太难，几乎没人做；与数论有关的波奇和斯温纳顿——戴雅猜想目前国际上有很多人在做，但是中国国内做的人却不多。以上六大难题的破解工作可谓是任重道远，但是令人振奋的是，在美、俄等国科学家的工作基础上，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和旅美数学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曹怀东已经彻底证明了庞加莱猜想。

庞加莱猜想是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在1904年提出来的。庞加莱猜想在拓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拓扑学？简单地说，拓扑学就是研究有形的物体在连续变换下，怎样还能保持性质不变的学问。比如，把面团揉成一个圆球（其表面叫做球面），或压扁成一个烧饼，或拉成一根面条，它们的几何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它们的拓扑性质却相同（拓扑等价）。但如果在烧饼上挖个洞，变成一个甜甜圈（其表面叫做环面），则拓扑性质就变了。为了研究高维空间中曲面之间拓扑性质的异同，庞加莱提出了他著名的猜想。他认为：任何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只要它里面所有封闭曲线都可以收缩成一点，这个空间就一定是一个三维圆球。那么该如何来理解这一猜想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伸缩围绕一个苹果表面的橡皮带，那么我们可以既不扯断它，也不让它离开表面，使它慢慢移动收缩为一个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象同样的橡皮带以适当的方向在一个轮胎面上收缩，那么不扯断橡皮带或者轮胎面，是没有办法把它收缩到一点的。因



此，我们可以说，苹果表面是“单连通的”，而轮胎面则不是。大约一百年前，庞加莱就已经知道了，二维球面本质上可由单连通性来刻画，他提出三维球面的对应问题。这个问题提出之后，立刻变得无比困难，从那时起，许多数学家就在为破解这一难题而奋斗。

对于一个学术难题的解决，需要人们付出很多的汗水，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一百多年来，许多杰出的数学家都在致力于破解这一猜想的研究工作。高维庞加莱猜想的证明比低维庞加莱猜想容易些，因此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两位美国数学家斯梅尔（Smale）和 Stallings 发表论文，证明了五维及五维以上的庞加莱猜想，斯梅尔因此获得 1966 年的菲尔茨奖。1972 年丘成桐和李伟光发展出用非线性微分方程的方法来研究几何结构，丘成桐用这个方法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和复几何上的庞加莱猜想。1978 年，美国数学家 Thurston 在庞加莱猜想证明中引进做切割的几何结构方法，这个方法很重要，他因此获得 1983 年的菲尔茨奖。1983 年，美国数学家弗里德曼（Freedman）发表论文，证明了四维庞加莱猜想，因此获得 1986 年的菲尔茨奖。在此之后，美国另一位数学家汉密尔顿在这个猜想的证明上也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2002 年 11 月，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在网上公布了一个研究报告，声称证明了由 Thurston 在 25 年前提出的有关三维流形的“几何化猜想”，而庞加莱猜想正是后者的一个特例。四个月后，佩雷尔曼在网上发布第二份报告，介绍了更多的证明细节。2003 年 4 月 5 日的《纽约时报》曾以《俄国人报告著名数学问题解决了》为题，首次向公众披露了这个消息。但随后，数学家们发现佩雷尔曼的证明不完整，有漏洞。奇异点的产生有很多种，多姿多彩，必须掌握控制它们的方法，这需要很多仔细的分析和几何结构上的研究，正是在这些重要工作的基础之上，中国数学家朱熹平教授和曹怀东教授运用汉密尔顿和佩雷尔曼的理论，对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进行了完全证明，并写出了长达 300 多页、题为《庞加莱猜想暨几何化猜想的完全证明：汉密尔顿·佩雷尔曼理论的应用》的长篇论文，这篇论文被美国出版的《亚洲数学期刊》以专刊的方式进行了刊载。这篇论文发表后，庞加莱猜想再一次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说：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数学期刊上完整证明庞加莱猜想，这是极其突出的成果，是在理论上的重要突破。而丘成桐教授认为：这一证明意义重大，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研究三维空间，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认识人类所生存的空间。并将对物理学和工程学都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这两位中国数学家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国际领先成果。

对于中国数学家朱熹平教授和曹怀东教授在破解这一猜想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丘成桐多次用“封顶”一词来形容中国科学家的作用。这就好像盖大楼，前人打好了基础，但是最后一步——也就是“封顶”工作是由中国人来完成的。他反复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科学家和俄罗斯科学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而最后完成“封顶”工作的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为了受人追捧的学术明星。但是，对于这些荣誉两位科学家都表现出了谦虚、低调的态度。

朱熹平 1982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系，1984 年在中山大学数学系取得硕士学位，1989 年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兼任广东省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面对记者的采访，朱熹平说：“破解这道数学百年难题，是一个历史产物，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只是比别人快了一步。今后，从这个证明出发，可能会影响诸多学科的思维方式。”“我始终觉得，这不算什么。任何科学成就都是很多人一步一步累积的结果，自己只不过是完成了最后一步而已。数百年来，庞加莱猜想是当今数学界最热门的难题之一，近两年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全世界这么多研究团体中，我们算是比别人先踏出了一步。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走一步，我走一步，已经有很多著名的数学界预见到这个难题即将被破解。这次证明是一个历史产物，不是个人英雄。”与朱熹平一起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数学界曹怀东 1977 年考上清华大学，后来出国留学，师从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1986 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任讲座任教，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面对荣誉曹怀东教授指出，这是丘成桐教授的关注和洞察，使他和其他几位“师兄弟”从 20 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庞加莱猜想。“丘先生 30 多年前就创立了几何分析学派，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后来提出的一个方程就是几何分析中的重要方程。汉密尔顿提出了解决庞加莱猜想的纲领，为破解猜想奠定了基础。”

虽然，两位中国数学家已经对庞加莱猜想作出了完全的证明，但是，我们在振奋之余，也应该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因为对于一项世界难题的证明往往需要经过数学家们长时间的系统审查之后，才能最终确立其在数学界的



地位。因此，摆在中国数学家面前的还有一条很长的道路，这一成果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同行的评议。从2006年9月一直到2007年3月，朱熹平教授和曹怀东教授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以每星期3小时的时间，连续20周，向包括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在内的五位科学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但这也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还需要冷静的、审慎的看待这一成果，要借鉴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当这一成果真正被世界科学届论证的时候，国人扬眉吐气也为时不晚。

当朱熹平教授和曹怀东教授的成果发表之后，有人向世界著名科学家丘成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数学真的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了吗？”丘教授沉吟片刻，这位迄今唯一一位获得“数学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华裔学者吐出了五个字：“差得还很远。”丘成桐说：“我们科技水平和国外确实有一段距离，数学也比较落后，对世界影响不大。”从古代到近现代，我国产生过祖冲之、刘徽、华罗庚、陈省身、陈景润等许多数学大家，然而，环顾当代国际数学界，却很难看到中国学者的身影。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提出过“放大眼光展开壮志，把中国建为数学大国”的希望，我们不仅要问这样的希望是不是要落空那。数学史专家张奠宙介绍说，1988年，我国数学界曾对国际数学研究格局做出判断：美苏继续领先，西欧紧随其后，日本迎头赶上，中国是个未知数。“经过十多年发展，这个未知数初步有了一个‘解’，这就是，我国现在是一个潜在的数学大国，但是还没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需要继续努力。”数学家陈木法教授也说：“我国数学水平排在美、德、法、日、俄、加等国之后，仅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方阵，只能在某些领域和世界对话。”而这位博士生导师已经多年“无博可导”，因为一直没有人报考他的博士生。陈教授说：“现在高考中分数高的都不填数学系了，而数学系的优秀毕业生不是出国就是转行，继续深造的很少。”数学的这种尴尬境地只是我国基础学科研究现状的一个缩影，比如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连续四年空缺，科技国际竞争力连续多年下降，我国对世界科学的贡献率现在还只有万分之几。

尽管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但喜悦的背后，我们面对的是缺少“叫得响”的世界级成果、缺乏领袖数学家和人才断档之忧。除此之外，我国数学家还面临着许多的尴尬，例如，眼下浮躁的学风、短缺的经费、僵化的科技评价体系等。业内人士呼吁，考核体系是困扰数学乃至我国科学发展的一大因素，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急需调整，应该让“以论文数量论英雄”

成为历史。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从事科研30年，论文仅40多篇，成就却至今无人逾越。专家们指出，数学研究“一个人一张笔”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交流机会太少仍制约着我国数学和科技的发展。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然而交流和合作需要经费支持。数学教授陈木法感叹说，作为国家973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科学家，包括助手在内一年的经费才五万多元，人头费占了一大截。许多时候得跟校长磕头要钱，再从项目经费中提一部分，勉强维持少量的图书杂志。“数学这样的基础研究很重要，是提升整体科技水平的基础，是营造全社会科学文化氛围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丘成桐严肃指出，“如果基础科学水平上不去，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不会强起来。比如，IT产业的发展，几乎全部依靠数学。如果数学水平上不去，IT产业就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为此，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已组建了两个国际化团队，强强联手，挑战世界性的数学难题。目的就是希望最优秀的年轻人不受现有评价体系的束缚，不是为生存去做一些一般问题。当然，基础研究有自己的规律，不是事先能设计好的。也许会失败，但我们在努力。为了促进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政府也应当给科研人员营造更宽松的科研环境。“庞加莱猜想”的成功破解是科研领域的一股“东风”，科学界应该努力的借这股“东风”，在社会上广泛的引起政府、社会对做基础性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抱以更大的宽容和鼓励，同时屏弃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学术评价机制。不能使庞加莱猜想的论证仅仅作为实验室里的摆设品。因为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具有重大的意义，庞加莱猜想证明可揭示了点有三种实在论的性质，可联系宇宙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要素”；用庞加莱猜想证明可分析超弦理论并列构造的开弦、闭弦；用庞加莱猜想证明的分析，不但能分出了开弦与闭弦的对立，也能分出三维空间与额外维空间以及宏观与微观的定量区别。此外该猜想的证明，还凝结了中国五六个科学家的贡献，是人类在三维空间研究角度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属于代数拓扑学中带有基本意义的命题，将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研究三维空间，其带来的结果将会加深人们对流形性质的认识，对物理学和工程学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会对人们用数学语言描述宇宙空间产生影响。我们的民族是一个自信的民族，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敢于在科研领域保持理性的民族，庞加莱猜想的成功论证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我们今后的道路还很漫长。



《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

经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于2006年8月10日起在全国发行。

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后，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引向深入。2003年11月，党中央作出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的重大决定。《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江泽民文选》收入了江泽民同志在1980年8月至2004年9月这段时间内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命令、题词等203篇，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江泽民文选》生动记录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深刻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重大成果。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以1980年8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五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设置经济特区，加快经济发展》为开卷篇，以1997年8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批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为结束篇，收入江泽民同志的著作81篇；第二卷以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开卷篇，以2000年2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结束篇，收入江泽民同志的著作59篇；第三卷以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为开卷篇，以2004年9月20日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后、在经过调整充实的中央军委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为结束篇，收入江泽民同志的著作63篇。

《江泽民文选》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其重大成果，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和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作出的杰出理论贡献。《江泽民文选》收入的著作包括：全面论述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着重论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农业和农村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科技创新、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的重要著作；着重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统一战线、民族、宗教、人权和工会、青少年、妇女工作等的重要著作；着重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道德建设、科教兴国、哲学社会科学、宣传思想工作和文艺、卫生、体育等的重要著作；着重论述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关心困难群众生活、扶贫开发、计划生育、残疾人事业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等的重要著作；着重论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军



事战略方针、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家战略能力等的重要著作；着重论述“一国两制”方针、港澳工作、对台工作的重要著作；着重论述国际形势、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非关系、周边外交、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的重要著作；着重论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制度建设等的重要著作。

《江泽民文选》记录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江泽民文选》集中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集中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容、深刻内涵、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三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21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了，必将有力地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贯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创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些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取得的重大认识，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从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强调了党的建设这个重大问题。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根本的坚持和最重要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宣告：“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实践证明，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江泽民同志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树立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良好形象。我们努力增强综合国力，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广泛开展互利合作，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鲜明地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这是江泽民同志的名言，反映了他对与时俱进对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重要作用的深邃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形成并发挥强大理论威力的根本原因。

自《江泽民文选》发行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各地干部群众踊跃购买。大家认为，《江泽民文选》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重大成果。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文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2006年8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上，李长春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江泽民文选〉的决定》，掀起了社会各界学习《江泽民文选》的高潮。

《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发行，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十一五时期文化规划纲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回顾历史，中国文化部党委书记、部长蔡武在会上认为，过去 60 年的文化建设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1949 年到 1960 年的文化大革命；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三、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历史时期。在第一阶段，新中国百废待兴，科学教育加紧为文化大厦奠基。建立新学校，实施新学制，设立人民助学金，实施扫除文盲行动。在开国礼炮的余音里，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奠定了国家科学研究体制的基础。中华民族迈开“向科学进军”的步伐，侨居海外的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等和一大批留学生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造了原子弹爆炸、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等一系列奇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文艺的百花园姹紫嫣红，文化艺术工作者以澎湃的激情拥抱、创造新文化。艾青、郭小川等诗人向着新时代放歌，《红岩》、《红旗谱》等长篇小说风靡全国，《上甘岭》、《青春之歌》等影片激励人心，《白蛇传》、《天仙配》等剧目推陈出新，《梁祝》、《二泉映月》为民族音乐赢得了持久的声誉这一时期我国文化事业取得了许多成绩。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步伐，这是一场灾难，给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端正了新中国巨轮的航向。在此之后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不仅得以复苏，而且走上繁荣发展之路。在文化教育方面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在科学技术方面，科技人员勇攀科技高峰。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加速器。0.8 微米集成电路芯片、6 000 米水下机器人等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新水平；在文化艺术方面，文化艺术大放异彩。电视文艺精彩纷呈，每年的春节电视晚会成为全国百姓的“文化年夜饭”。《于无声处》、《丝路花雨》、《人到中年》，一部部作品笔力扛



鼎。《渴望》、《四世同堂》、《周恩来》、《离开雷锋的日子》，或雄健，或隽永，呈现出一个伟大时代厚重而细腻的文学艺术质地。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进程还不相适应，文化体制机制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还不相适应，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品种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为了更好的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2006年9月13日我国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个《纲要》，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幅壮美蓝图，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一部分首先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纲要》提出到2010年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完成“十一五”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赋予文化建设的任务，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的创新能力和整体实力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更好地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促进城乡和区域之间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发展的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相适应。

《纲要》中还提出了我国十一五期间工作的六个重点：一、抓好基层文化建设，加大力度改善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力争到“十一五”期末，城市的文化设施、服务网络和文化产品基本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享受文化服务的需求，在农村基本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

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二、抓好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推出一批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文化艺术精品，创作生产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三、抓好文化产业体系建设，重塑市场主体，优化产业结构，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门类，培育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十一五”时期，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增加。四、抓好文化创新能力建设，以内容创新为核心，着力培育创新主体，加速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我国文化自主创新能力，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创新成果。五、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六、抓好人才培养，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素质较高的文化工作者队伍，为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纲要》指出，我国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落后，城乡之间文化发展不平衡。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纲要》提出了四大重点工程来缩小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四大重点工程分别是：一、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充分利用无线、卫星、有线、微波等多种手段，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套数更多、质量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全面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通广播电视。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做好农村电影拷贝配送工作，丰富电影片源，加快推进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加强农村电影院更新改造，增加固定或流动放映点，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三、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在欠发达地区新建、改扩建2.5万个左右综合文化站，配备必需的设备，完成对农村危旧公共文化设施的改造，基本实现全国乡镇均建有综合文化站。四，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对西部及其他老少边穷等地广人稀适宜开展流动服务的地区，为县乡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车、流动电影放映车，开展集影视放映、文艺演出、图片展览、图书销售和借阅、科技宣传为一体的流动文化服务。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将着力发展的九类重点文化产业：影视制作业、出版业、发行业、印刷复制业、广告业、演艺业、



娱乐业、文化会展业、数字内容和动漫产业。同时列出了重点支持的九大文化会展：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国际音像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纲要》还确立了四个重大文化产业推进项目：国家数字电影制作基地建设工程——采用数字电影摄制技术与工艺，推动传统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形成数字电影规模化生产和制作能力，全面提高我国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水平。国产动漫振兴工程——建设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和教学研究基地，建立动漫技术设备和公共技术平台支撑服务体系共享机制，增强国产动漫的原创制作能力和衍生产品开发能力，培育一批充满活力、专业性强的中小型动漫企业和具有中国风格、国际影响的动漫品牌。“中华字库”工程——建立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重点研发汉字的编码体系、输入、输出、存储、传输以及兼容等关键技术。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以各种信息资源为基础，采用现代人工神经网络、数据库和计算机信息检索等高新技术，建立新一代综合各类知识信息的数据库，提高我国信息资源深度综合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一个好的规划方案，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其实施，为此本《纲要》中也制定和完善了更加有效的政策与措施，来确保《纲要》中各项任务的实施。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责，始终把握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动员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良好氛围。其次，要通过健全宏观调控，完善文化工作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同时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强对文化发展的方向、总量、结构和质量的宏观调控，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推进文化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有组织有领导、分阶段分步骤地将改革从试点向面上推开，逐步引向深入。第三，要加大和改进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支持文化发展的经济政策。《纲要》明确了要继续执行“十五”时期的宣传文化经济政策，同时根据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设立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基金，重点用于扶持国家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支持文化创新和精品生产、扶持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文化产业项目的研发；用于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支持

地方重大文化工程项目的建设；用于支持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出版物的出版，以及无线广播电视的覆盖。最后要加强文化立法工作，为文化发展提供法制保障。第四，加强文化立法。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加快文化立法步伐，抓紧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图书馆法、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电影促进法和长城保护条例。抓紧修订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执法行为。深入开展文化法制宣传教育，继续做好普法工作，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守法经营和维护文化权益的自觉性。

《纲要》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为我们描绘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壮丽图景。可以说《纲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推动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是努力实现“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对指导未来五年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进一步引导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文化建设事业中来，把握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全面实施文化发展战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更大繁荣。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06年10月8日~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5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吴邦国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取得新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进展。

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一致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全会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

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

全会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全会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全党同志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全会强调，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全会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部署。要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要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

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要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要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各级党委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推进党务公开，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进党的团结统一，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明确工作分工，搞好协调指导，增强政治敏锐性，加强对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章和法纪学习教育，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和思想道德修养，健全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领导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对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高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解决好本地区本部门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吸纳社会工作人才，提高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已经具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迎来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机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万众一心，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巩固党执政的基础、实现党执政的任务，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世界有目共睹。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由于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发展不平衡，城乡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遇到新的挑战；由于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与社会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为我们认识 and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速度加快，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给我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提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强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强调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等，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的进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and 力量统一起来、凝聚起来，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物质力量，可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也只有把社会建设搞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有广泛的世界意义。我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国家，努力使当代人类 1/5 以上的人口进入和谐状态，这无疑具有世界意义。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探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将对当代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做出新贡献。

这次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中央政治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取得新的成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取得新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实现了“十一五”时期的良好开局。实践再次有力地证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赖，完全有能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提法，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曾经使用过的“多快好省”和“又快又好”的提法相比，“好”字首次排在了“快”字之前。“好”与“快”，两字顺序的对调变化，看似简单，其实绝非易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记录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探索历程；充分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鲜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理念的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10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这是“多快好省”这个提法的雏形。紧接着，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首次完整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由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普遍原则。到了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再次重申“多快好省”方针，并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1958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就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有了一个初步的表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不久，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

详细的阐释，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等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重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做了客观公正的分析：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提出：“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这就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但是，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在治理经济过热中，党中央一再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在“又快又好”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



速增长。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提法，进一步提出：“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这时，进一步加进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更丰富的内涵上，形成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在提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里，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到了“更要注重”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又好又快，“好”字在前，已呼之欲出。而此时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这一基础条件可概括为六大历史性变化：一、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三、经济运行，由大起大落转变为快速平稳；四、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四位；五、外贸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3位；六、人民生活，由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人均GDP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00美元上升到近2000美元。这六大历史性变化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性基础条件、必要的市场供求格局、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和新的发展动力。

2006年11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时经济形势和研究下一年经济工作。这次会议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进一步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再次强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是十七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和突出贡献，也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大突出亮点。胡锦涛说，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中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三、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四、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七、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八、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



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几个方面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仅要在“快”字上做文章，而且更要在“好”字上狠下功夫。为了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需要做到四个方面，一、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这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二、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这就是要推动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这就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四、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更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要使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总之，“又好又快”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使我们继续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建设和谐文化

所谓和谐文化，基本的含义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多种存在方式。

既然谓之和谐文化，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崇尚和谐理念，体现和谐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和谐的理想信念，坚持和实行互助、合作、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准则。也就是以和谐理念贯穿于相关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之中，以和谐作为该类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以此影响其他各种文化形式，促进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

为什么要建设和谐文化？我们党提出和要求建设和谐文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大力研究、倡导和宣传和谐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更坚实的思想基础，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矛盾，鼓励一切有助于促进和谐的思想行为，不断增加社会生活中的和谐因素，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和谐的各种法律的、制度的、道德的规范体系，努力使我们的社会呈现一种既充满活力，又团结和谐的局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

对这个问题，从现实的社会层面，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人类社会基本的发展规律来认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过多种多样的状态。动荡、混乱、失序，是一类状态；稳定、和谐、有序，是又一类状态。两类之间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过渡状态。矛盾激化，就有可能发生战争、暴乱、杀戮等等，或者发生起义、造反、革命等等。当一种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阶级取代旧阶级时，某种程度的动荡、混乱、失序，是不可避免的。从本质上来看，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

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样两种状态，总是交替地出现和存在的。稳定、和谐、有序，不会始终存在。永远处于这种状态，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



的幻想，而且还会阻碍一些重大的社会矛盾的解决。但同时，动荡、混乱、失序，当然也不可能永远存在。大乱之后必须大治。乱，根本上也是为了治。如果社会始终处于动荡、混乱、失序状态，生产力就会受到极大破坏，社会生活就会受到极大破坏，人类自身也会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的动荡、混乱、失序之后，人们总是渴望着治，渴望着实现新的稳定、和谐、有序，渴望着这种状态给人类自身带来福祉。纵览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比较地稳定、和谐、有序的状态，在时间上总是长于动荡、混乱、失序的状态。比较地稳定、和谐、有序，是一种常态；而动荡、混乱、失序，则是一种非常态。比较地稳定、和谐、有序，总体上，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 85 年的历程中，经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状态。以 1949 年为界，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并不一般地反对动荡、混乱、失序。反动势力的所作所为，会造成动荡、混乱、失序。革命斗争活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动荡、混乱、失序。某种程度的动荡、混乱、失序，甚至是开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着异常艰巨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坚持斗争。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味地制造动荡、混乱、失序，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努力尊重和维护普通老百姓社会生活的平稳、秩序，努力与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力量进行团结合作，甚至与敌对势力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合作。在党内、革命队伍内，更是努力讲求团结、维护和谐。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便处在了执政党的地位。执政，就要遵循执政的规律，就要代表和维护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就要实行最有利于国家、民族、社会 and 人民的治理方式。古今中外，治国理政，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以乱为荣，以乱为佳，把乱当作一种常态的。治国理政，根本上都要讲秩序、讲规范、讲稳定，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讲妥协、讲合作、讲礼让。至于和谐，则是一种最高境界了。所以，对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在治国理政的全部过程中，当然要明确自己的价值取向，坚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有序。尤其要把追求社会的和谐，当作一种不懈的最高目标。

和谐，是人民团结、社会稳定、制度规范、关系融洽、发展有序的最高

表现。和谐，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有利于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使命，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既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划、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和谐文化，是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以文化形式外化的一种表现和展示，也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武器和具体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建设和谐文化。根本任务，是用“和谐”的思想方法来思考问题、解决矛盾。在和谐文化的帮助和影响下，采取各种现实的措施，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从而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得到加强。

具体来说，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通过对和谐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建立和发展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思想内核；就是要大力倡导和谐的思想观念，促进人们对社会和谐的认知和理解，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就是要通过对和谐的肯定评价和相应的奖惩褒贬，形成以尊重和实践和谐为荣，以背离和破坏和谐为耻的社会风尚；就是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体系以及法律规范、行为准则、道德标准等等，使之成为指导和约束社会各种行为的框架体系。当然，也包括将和谐理念和价值取向融入到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去，以美的形象和方式促进和谐理念的传播和应用。

我们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和理念，但对和谐问题也要持辩证的观点。要看到，和谐，只是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最高境界、最高理想。现实存在的事物和社会，既没有绝对的和谐，也没有绝对的不和谐。和谐与不和谐始终是相伴而生，同时存在的。某些情况下，不和谐的因素超过和谐的因素，社会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和谐的因素超过不和谐的因素，社会就比较地稳定有序。和谐不和谐都是相对的。社会是否和谐，并不是看是



否彻底消除了不和谐因素，而是看整个社会的和谐因素是否占主导地位，特别是一些关键的领域和环节是否比较和谐。

所以，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并不是无视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更不是要去掩盖和抹杀这些矛盾。恰恰相反，是要正视这些矛盾，鼓励人们用适当的方式去解决这些矛盾，在解决矛盾的基础上争取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在采用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时，不是要激化和扩大矛盾，而是要尽最大努力弱化这些矛盾的强度，通过寻找和扩大共同点，取得有利于矛盾各方的最佳结果，从而促成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的团结、和谐。

这样的和谐文化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为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始终是在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给自己设定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而是把和谐作为一种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取向，努力消除或减少一些影响全局的不和谐因素，使社会的和谐因素不断增长，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加全面、均衡和协调地发展。即使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也不必大惊小怪。在一些具体的文化形式中，某种形式的不和谐，也很可能是一种必要和合理的存在。

因此，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一定要把握和谐的相对性，掌握和谐与不和谐的辩证法，在两者的矛盾运动中，处理好和谐与不和谐的关系。以和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价值目标，坚定不移地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前进，尽最大努力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但又不要盲目追求无法实现的空想，不给自己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要创造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培养和谐的社会文化精神，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长期过程中，陶冶民族精神，提高文化素质，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追求的社会理想。但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使关于社会和谐的理想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把握上，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实现的。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反映了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和实践，都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基础。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和方向。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和方向，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支柱和动力。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引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指明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支撑起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世界，是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并引导现实社会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决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必将使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形成万众一心、共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基本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在割断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在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今天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支撑。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当代中国人民又形成了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改革创新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反映了时代发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创新变革的要求，同时又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价值的科学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代中国社会形成的新的文化价值的科学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对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认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基本内容，指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



作用。良好的道德对形成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风尚具有重要的作用。道德是基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光荣与耻辱等一系列价值评价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规范。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道德价值产生和形成的内在客观规律，将社会主义道德的历史传承性与时代性融为一体，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中的作用。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需要，也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努力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

物权法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上午高票通过了物权法。这次会议有近3000名人大代表参加，其中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法律通过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物权法通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了第六十二号主席令，公布了这部法律。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

其实，早在1993年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启动还是在1998年，因为期间主要工作是制定合同法。1998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组，开始了物权法的起草工作。该小组委托中国社科院的梁慧星教授和中国人大的王利明教授负责起草《物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物权法》的起草工作，虽然是由立法机关直接发动的，但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把这部法律制定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2002年12月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此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又对草案进行了八次审议。2005年7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并先后召开了100多次座谈会和几次论证会，并到一些地方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而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以及在此之后于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使私有财产上升为宪法权利。这些步骤都为物权法的最终出台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这部法律历经了13个春秋的酝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记录，最后终于出台了。虽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但是这部法律的立法过程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物权立法的过程，既是向广大百姓普及物权概念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不同意见通过民主协商最终取得一致的过程。”它的出台，



被看作是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

这部物权法分为总则、所有权、有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等五编，共247条。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制定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物一权、物权法定、公示公信，此三者在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中被称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构成物权法的基本原理，物权法的具体制度内容和理论架构均在此基本原则之下展开。

那么这部法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并且在我国法律史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物权法是一部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这部法律被认为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起到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家福教授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讲所有制，不讲所有权，没有物权法。结果不同程度造成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遭到侵犯甚至被摧毁。《物权法》则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了平等保护。对此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物权法还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当然，这里所说的物权是指国家、集体、私人所拥有的合法的财产，非法取得的财产非但不受法律保护，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物权法，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物权法对国有财产做了明确的规定，而且从五个方面强化了对国有财产的保护。《物权法》高度重视农民利益的维护，以专门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规定。它不但第一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界定为物权，而且规定了土地承包期届满可以继续承包。物权法中规定：耕地、草地、林地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城乡居民的房屋，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这一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为此，物权法对征收补偿的原则和内容也作了规定。《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这就对补偿的范围作出了规定，也起到保障被征地农民正常生活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认为这一规定体现了物权法对不同物权主体实行平等保护的原则，既尊重了国有财产，也保障着城市富裕人群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利益，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于这部法律所起到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认为：这有利于激发民众的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王家福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对国家与公民的财产权利进行必要的保护，才能更好地激发中国 13 亿人创造财富、爱护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热情，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有分析人士指出：（物权法的颁布）这是中国践行宪法理念、弘扬宪法精神的一座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精神以及确立的有关原则在相关条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物权法的一大特点。这部法律也被对于推进经济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都有着重大意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以及政治文明迈出重要一步的标志。

物权法的颁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加快，企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企业形式和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劳动用工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地区、行业 and 单位甚至相当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比如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讨薪主要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工厂、商店、饭店等员工的讨薪，包括恶意克扣工资、不给加班费、随意辞退等，另外一个讨薪集中的领域，就是建筑企业农民工。建筑领域的欠薪问题，涉及违法分包的比较多，往往都跟包工头有关。企业多是把工资交给包工头或带工老板，在工程结算之前，农民工只领基本的生活费。在一些项目中，由于拖欠工程款，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于是层层拖欠，导致农民工无法及时拿到工资。还有频频发生非法用工问题的“黑煤窑事件”、“黑砖窑事件”，这也暴露出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薄弱环节。因此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为更好保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应明确规定劳动者权益被侵害时的救济渠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一些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侵害劳动者权益，以及用人单位强迫劳动等等问题。因此制定劳动合同法，完善劳动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007年6月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145票赞成，一个未按表决器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公布法律。这部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劳动法共分8章98条，包括：总则、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特别规定、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附则。劳动合同法是规范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属于社会法。

这部劳动法是在1994年劳动法的基础上，经过两年多的酝酿、讨论才最终通过的。与旧的劳动法相比，这部法律进一步提高了对员工的保护力度，提升了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的管理成本。许多条款都有利于对劳方的保护，例如，工作地点和职业病危害等防护条款，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条款、合同到期前终止要付经济补偿金条款等等。在拖欠工资、强迫劳动和其他劳工虐待行为被屡屡曝光的今日，该法无疑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福音。

这部新的劳动合同法有十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民办非企业职工有法可依。《劳动合同法》扩大了《劳动法》的使用范围，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及其劳动者。二、违法不签合同单位须付双薪。根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除在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期间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工资外，还应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续订“无固定合同”劳动者有权做主。根据规定，在“连续工作满10年”等3种法定情形下，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予签订。四、1年期合同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同时，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五、“违约金”有“上限”。根据规定，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除培训服务期和竞业限制可以约定劳动者违约金之外，其余任何名义的违约金都属违法。六、单位未依法缴社保费，劳动者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七、劳务派遣员工的劳动合同最短须签2年。在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八、非全日制员工工资不能按月结算。其结算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5日。九、收取押金最高可罚2000元。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以担保等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标准处罚。十、恶意欠薪将加付等额赔偿金。赔偿金的具体标准为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

新劳动合同法草案全文曾经向全社会公布并广泛征询意见。这一举措体现了我国立法的公开、透明。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并最终获得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民意。但是，对这部新法社会上也有着不同的声音。

有外资机构公开表示，新法的实施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竞争，增加了劳动成本，给中国投资环境带来消极影响，该法律是一种倒退。看一部法律是否具有负面影响，主要还得看其实施效果，在法律颁布之初不能妄下结论。当然对于社会上的不同声音，我们应该把它当做一种客观的评价，而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一种对新法的威胁态度。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们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的任务，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注新法的实施能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问题，尤其是底层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纸面上作无谓的争论。

这部法律公布后，有关部门调查了实施情况，在调查中发现当前贯彻实行《劳动合同法》、学习贯彻《劳动合同法》有相当的用人单位采取了正确的方法，为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但是，根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违反和规避劳动法律和《劳动合同法》的行为。这类行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劝说、辞退甚至胁迫职工辞职。近期，少数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这段时间，对一部分工龄比较长的职工，用人单位采取了要求辞职或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我想他们是为了规避工龄十年以上的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客观上在部分区域内已经引起了连锁反应，甚至在一些小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风潮。第二种是逆向派遣，即与本单位部分或者大部分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后，让这些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再与本单位指定的某一劳务派遣机构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然后由该派遣机构将这些职工再派回本单位继续工作。第三种是裁员，非法裁员，即一次或分批进行较大数量的裁减人员。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的制止这些行为呢？全国总工会对这些违法行为已经或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首先，组织职工学习《劳动合同法》法律。懂得这部法律，了解这部法律的相关内容，包括职工应该履行的责任和应该享有



的权利，也包括用人单位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这样把法律武器交给职工，使广大职工敢于并善于运用这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利。第二，各级工会要调查研究在学习贯彻《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和规避《劳动合同法》，侵犯职工权益的行为，要求用人单位依法坚决予以纠正。对于用人单位强迫职工辞职，要求职工转换“劳动用工身份”，比如将原来的劳动合同转换成劳务合同，还有违法裁员的，要积极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且积极配合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依法严肃查处。第三，切实发挥基层工会在学习宣传贯彻《劳动合同法》中的作用，根据《工会法》的规定，要帮助、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监督检查劳动合同履行，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和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积极参与用人单位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制定，创造条件，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第四，积极推动和参与立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做出解释。

国务院发布《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

2007年4月4日国务院第17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处分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的原则、种类、适用、权限、程序和申诉等做了具体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配套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行政纪律惩戒工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行政纪律惩戒工作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方针政策。1957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1988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公务员纪律惩戒作了原则规定;2005年发布的《公务员法》,也对公务员的纪律和惩戒作了规定。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公布施行,对于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从政行为,严肃行政机关纪律,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廉洁、高效履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深化,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行政纪律惩戒规定,使得一些违背公务员职责的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严重影响了行政纪律惩戒作用的发挥。因此,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规范行政纪律惩戒工作的行政法规。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在总结行政纪律惩戒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修改,形成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草案)》,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政府人事部门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主管部门,对行政机关公务员队伍建设负有重要职责。我们要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贯彻实施好《条例》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做好公务员纪律惩戒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制定颁布《条例》，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工作法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加强行政机关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条例》对处分的设定、处分的种类和适用、处分的法律后果、处分的程序、不服处分的申诉以及具体违法违纪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种类和量纪幅度等作了全面规定。《条例》的公布施行，对于严肃行政机关纪律，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行为，加强行政监督，有效预防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严肃行政机关纪律，保证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履行职责，保障行政工作的正常进行，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颁布实施《条例》，是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实施公务员法要求建立较为完备的公务员管理法规体系。《处分条例》的颁布实施，填补了公务员法配套法规体系的一项空白，是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步骤，为依法开展公务员纪律惩戒工作，实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颁布实施《条例》，是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行政机关公务员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管理社会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肩负着治国理政的重任。公务员队伍的纪律是否严明，行为是否规范，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公务员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条例》的颁布实施，要求公务员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务员的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对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颁布实施《条例》，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规范行政权力，大力加强政风建设，建设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规范、高效地行使行政权力，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处分条例》的

颁布实施，明确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各项纪律，有利于促进公务员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全面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建设。

《条例》共7章55条。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处分的依据和处分的设定以及处分的原则等；第二章“处分的种类和适用”，规定了处分的种类和期限、处分的法律后果、解除处分的条件、数种违纪行为合并处理运用规则、从重从轻减轻以及不给予处分的条件、共同违法违纪中行政纪律责任适用规则、单位违法违纪以及依法被判处刑罚应当如何给予处分等；第三章“违法违纪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规定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失职、渎职和滥用职权，严重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等行为及相应的处分种类和幅度；第四章“处分的权限”，规定了给予公务员处分的权限；第五章“处分的程序”，规定了任免机关调查处理政纪案件程序、监察机关调查处理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案件的程序所应适用的法律依据、调查人员及非法收集证据、回避制度、办案期限等；第六章“不服处分的申诉”，规定了行政机关公务员不服处分如何提出申诉、有关机关如何处理申诉、变更处分决定的条件和权限等；第七章“附则”，规定了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所取得财物的处理、参照执行《条例》的人员范围以及条例的施行日期等。《条例》内容丰富，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是行政纪律惩戒工作的一部基础性、实用性都很强的行政法规。

行政机关公务员具体的违法违纪行为及其相应的处分幅度，是实施处分的实体规范，《条例》在总结多年来行政纪律惩戒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列举与归纳相结合的方式，对行政机关公务员与履行职责直接相关的应当给予处分的主要的违法违纪行为作了7个方面的规定：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罢工，违反国家民族宗教政策造成不良后果，非法出境或者违反规定滞留境外不归等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二、违反议事规则，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拒不执行交流决定、回避制度，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的判决、裁定、决定等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三、违法设定或者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违反职责纪律的行为；四、贪污、索



贿、受贿、行贿、挪用公款、挥霍国家资财，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等违反廉政纪律的行为；五、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违法摊派、非法拘禁等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六、失密泄密、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等违法和违反公务员职业操守的行为；七、拒不承担赡养、抚养义务，虐待家庭成员，组织迷信活动，参与“黄赌毒”活动等违法和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其中，对参与赌博、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条件、在工作时间赌博、挪用公款赌博，以及利用赌博索贿、受贿或者行贿等行为，都作了明确、具体的界定。

《条例》以宪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依法、系统、全面规范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为，从四个方面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公务员纪律惩戒制度的特点：

一、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条例》系统总结了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惩戒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科学实践，充分吸收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果，将党和国家对公务员的各项纪律要求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规条文。在处分的种类、权限和程序等方面都继承了已有规定。同时，《条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纪律惩戒内容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创新。

二、体现了教育与惩处的统一。教育与惩处相结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也是公务员纪律惩戒工作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教育是根本，惩处是保障。为体现重预防、重教育、重挽救的方针，《条例》规定，给予公务员处分，应当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原则；对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等；同时，《条例》还规定对有“隐匿、伪造、销毁证据，包庇同案人员”等情形的公务员，应当从重处分。

三、体现了原则性与操作性的统一。《条例》既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惩戒工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做了原则规定，又对违纪行为定性量纪的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力求做到原则概括，简略精当，符合实际，便于执行。《条例》明确了给予公务员处分应坚持的依法实施原则，公正、公平原则，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原则，错责相适应原则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的原则。《条例》还对每种违纪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量纪幅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四、体现了严格管理与保障合法权益的统一。为严格管理行政机关公务

员队伍,《条例》加大了对公务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改变了以往对判处刑罚宣告缓刑的公务员有的仍留在机关继续工作的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一律给予开除处分。《条例》还规定了不服处分申诉的提出、受理、处理,以及受处分影响的期限和解除处分等,为维护受处分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了避免出现处分设定政出多门、处分幅度畸轻畸重现象的发生,规范行政纪律惩戒工作,切实维护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条例》对处分的设定作了严格规定:(一)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本条例给予处分;(二)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其他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违法违纪行为作了规定,但是未对相应的处分幅度作规定的,适用本条例第三章与其最相类似条款有关处分幅度的规定;(三)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可以补充规定本条例第三章未作规定但应当给予处分的行为,以及相应的处分幅度;(四)除监察部、人事部以外,国务院其他部门制定有关处分的规章应当会同国务院监察机关、国务院人事部门联合制定;(五)除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决定外,行政机关不得以其他形式设定处分事项。

行政纪律惩戒工作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督促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廉政勤政,保证政府政令畅通,提高政府效能,维护正常行政管理秩序的重要措施。《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国务院着眼于加强政府系统的廉政勤政建设,着眼于维护行政纪律、保证政令畅通,着眼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着眼于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大局,所作出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 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

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对于进一步统一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更好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继续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锦涛同志讲话有以下要点：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第三，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第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第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我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相适应。

第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第七，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第八，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九，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第十，做到四个“一定”。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一定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大家普遍认为，这个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新时期 29 年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政治宣言，是一篇反映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和把握水平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

“一个始终不渝”和“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思想观点，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一个始终不渝”和“四个坚定不移”，阐明了现阶段中国发展进步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阐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阐明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的重要思想观点，要求我们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旗帜就是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旗帜就是党的共同信念、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集中表达。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联系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联系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建设、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进行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主义、别的道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进步问题。

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重要思想观点，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再次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是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的。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保证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一些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可以说，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重要思想观点，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使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感召力，使我们党焕发出新的创造力和战斗力。把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正是我们

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和必胜信念的根本原因。我们要清醒认识和把握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关键阶段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课题新矛盾，特别是要顺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党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情况，把坚持改革开放同继续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结合起来。要在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的同时，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从而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戮力改革攻坚。要坚持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来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科学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观点，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而又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出来的，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四个方面，即：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落实这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就是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政治保证、社会环境保证、体制机制保证和组织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思想观点，要求我们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随着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相应地，四大建设的目标要求也更加明确、更加配套了，这就是：在现阶段，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党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观点，要求我们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是要建成创新型国家。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大势，呼唤我们在党的自身建设中也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的 development 变化，不断创新党的理论、丰富党的实践、完善党的制度的历史。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为我们在新形势下以改革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拓宽了视野，指明了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突出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一鲜明主题，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要求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最新的精辟阐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新任务，对于统一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凝聚各方力量团结奋斗，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 21 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使命很光荣，任务很艰巨。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一定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这“四个一定要”和“三个始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我们面对复杂环境和严峻挑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保证，也是新形势下保持和发展共产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

2007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 80 个春秋，回首 80 年前，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时代，为了振兴中华，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当大革命蓬勃发展之际，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大革命惨遭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了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8 月 1 日凌晨，宁静的南昌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声，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震撼了全中国，也震撼了世界。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决心和胆略。八一南昌起义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成为“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的标志，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探索中国革命新路的历程。无疑，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极其重要的地位。1927 年 8 月 1 日这一天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从此，开始了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

南昌起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先后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而其中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又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1927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在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这支起义部队进行了转移，当部队转战到三湾镇时，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一切工作要经过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在执行，提出连以上要建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营团设立党委的制度，要求加强思想领导，对党员做正确的教育等。此后这支部队转战到井冈山，并在此创建了根据地，这又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斗争形势。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与湘南暴动的农军艰苦转战到达宁冈，与毛泽



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5月4日，井冈山军民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对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朱毛会师”的意义，史沫特莱曾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此，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珠联璧合的“朱毛时代”。此后，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经历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经历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印、中苏、中越三次边境战争。千百万优秀的中华儿女参加了这支队伍，并且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在抗美援朝时期，这支部队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在自卫反击战中又被称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在各种灾害肆虐之时，处处可见人民子弟兵抢险救灾的身影。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人民的子弟兵。

我们的人民军队已经走过了8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80年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以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安业明、麦贤德等为代表的，以及在自卫反击战中、抢险救灾中英勇献身的英雄们，还有千百万活着的英雄们，党、国家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逝去的英烈们，也在时刻关注着活着的英雄们。

200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日子。在建军节前夕，中央政治局于7月26日集体学习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军事科学院齐德学研究员、黄迎旭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学习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我们重温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

这次会议之后，200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

春、罗干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胡锦涛回顾了人民解放军80年的发展历程，称赞人民解放军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战斗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各个岗位上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同时深切缅怀人民军队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

80年来，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不断发展，今天，我们的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弱小的单一军种发展成为诸军种合成、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国防实力不断增强。对于今天的成就，我们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以及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创建和培养人民军队、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所作出的巨大功勋。

一支军队要想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必然要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建军治军原则。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就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代军事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三大军事理论成果。胡锦涛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我们党正确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以及取得全国政权后建立现代国防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我们党正确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指引我们党正确解决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引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科学指南，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宝库的丰富和发展。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台独”分裂



势力严重影响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这一切，迫切要求我军创建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军事战略思想，迫切要求我军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迫切要求人民军队更好地肩负起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稳定的神圣职责。正是深刻把握了这一时代发展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军队建设的新要求，胡锦涛从国家总体战略需要出发，站在党、国家和军队建设的战略高度，在2004年底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了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胡锦涛关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概括，揭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必须发挥的特殊作用，指明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和指导原则。为了在21世纪新阶段下，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就必须把人民的内聚力转变成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为此胡锦涛还提出了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紧紧依靠人民办国防，不断增强国防实力。此外胡锦涛还提出建立和谐的军地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形成“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实现生产力与战斗力、国防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以及坚持以人为本，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作为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不竭动力等军事思想。

除此之外，一支军队要想不断取得胜利，还需要具有强大的能够凝聚军心的军魂。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就是人民军队在80年的艰苦奋斗中所培育和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那就是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牺牲英勇善战。这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对此，胡锦涛指出：正是由于高度自觉听党指挥，人民解放军才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服务人民，是人民军队一切奋斗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解放军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宗旨。人民军队必须具有牢不可破的依靠力量。从诞生之日起，人民解放军就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赢得了亿万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全力支持，形成了夺取胜利最深厚、最伟大的力量源泉。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征，是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根本要求。人民军队必须具有克敌制胜的强大能力。在长期实践中，人民解放军大力发扬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

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既敢于胜利又善于胜利，生成和发挥了强大战斗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本色，凝聚着党和人民对军队的重托和期望，是我们总结人民解放军80年建军治军经验的基本结论。

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但是，我们的人民军队仍然需要把听党指挥、为人民服务、英勇善战作为我们的军魂，仍然要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建军治军思想，仍然要坚持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这一性质不动摇。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巩固的国防，始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宁的可靠保障。”纵观世界，天下并不太平，“台独”分裂势力日益猖獗，国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相互勾结，利用人权、民主、宗教、民族和领土等问题，采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手段，竭力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妄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加紧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渗透活动，并大肆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等谬论，企图挑拨和分裂军队同党的关系，使我们的人民军队摆脱党的领导，不讲政治，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迷失正确的方向，以达到彻底改变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对此，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总结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党和人民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

当然，现代战争将会更复杂，更需要科学技术。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了这个根本原则就能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刻苦钻研，就能有克敌制胜的方法。我们坚信，有80年历史的人民军队，一定会更加成熟，更加伟大，更加有战斗力。



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第六十八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分为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法律责任、附则等八章，共57条。在反垄断法总则第一条中明确写出了起草这部法律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对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在总则第二条中也有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这部法律中还规定了垄断行为所包括的内容：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虽然反垄断法于2008年才开始正式实施，但是有关反垄断的实质性立法工作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90年，这个阶段以规制行政性垄断为立法中心。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垄断问题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但是当时的垄断现象还不是西方国家那种经济性垄断，而是所谓的行政性垄断。为此，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其中第6条明确要求“开展竞争必须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封锁市场，不得禁止外地商品在本地区、本部门销售。”尽管发布了这个规定，但是由于政企不分、市场经济下地方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很多公司本身兼有一定行政管理只能等原因，“棉花大战”、“蚕丝大战”等事件屡屡发生。从1984年到1990年的六年间，国务院又先后出台了三个相关规定来进一步治理与防范这些行政性垄断行为。这三个规定分别是：1984年12月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8年10月的《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以及1990年11月的《关于打通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这些规定在实施之初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立法层次不高以及缺乏有效的执法手段等，整体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阶段，1991年~2007年，这一阶段反垄断法进入了全方位立法时期。从1991年开始，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立法在此时也进入了高产期。然而这一时期我国并没有出台一部独立的反垄断法，仅仅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部分垄断行为。尽管如此，1994年还是正式启动了有关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由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原国家经贸委联合开始了反垄断法的起草工作。随着反垄断法立法工作的启动，社会各界对之的关注越来越密切，并且对立法工作进行深入思考，由此引发了有关反垄断法具体设计问题的争论和研究。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规模经济与反垄断法、行政性垄断规制的法律依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随着这些争论的深入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逐步受到关注并得到了解决。1994年，反垄断法的立法工作被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8年，再次被列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4年，国务院将该法列入立法计划；2005年2月，反垄断法又一次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立法计划；2005年12月，商务部称反垄断法修改审查已获得较大进展；2006年6月，反垄断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2007年8月30日，十届人大表决通过了反垄断法。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

对于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社会各界所关心的各类问题，这部法律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对于规模经济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这一问题。反垄断法的目标虽然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但是其本身并不反对企业做大做强。一、反垄断法不反对更不禁止企业合法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只是



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阻碍技术进步，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二、关于对经营者的控制和审查，反垄断法强调既要防止经营者过度集中，形成垄断；又要有利于国内企业通过依法兼并做大做强，发展规模经济，提高产业集中度。三、反垄断法在禁止垄断协议的同时，对中小经营者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力所达成的协议则不予禁止。四、反垄断法通过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有利于企业对全国乃至全球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有利于我国企业做大做强。反垄断法主要反对的这种滥用垄断地位，来挤压其他竞争者，使消费者不受益的行为。反垄断法反对这种滥用行为，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如果利用自己的优势，为竞争对手设置障碍，打压竞争对手，操纵市场产品及价格，这种行为就必然要面对反垄断的指控。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要充分认识到良性竞争和不断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只有这样，生产效率才会提高再提高，市场才会生气蓬勃，更好更多的产品才会不断涌现。

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方面，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五大职能：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并发布评估报告；制定、发布反垄断指南；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为正确适用反垄断法，审理好与反垄断法相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好审判职责，切实审理好各类反垄断案件。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要切实审理好涉及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民事案件以及其他各类反垄断民事案件。

反垄断法是一部规范国家经济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反垄断法的实施，对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将对我国经济生活和各个经济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将打破原有的行政垄断，多形成一些良性的竞争，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尽管就目前我国的法律体制、市场状况和执法机制而言，反垄断法尚不能完全发挥“经济宪法”的作用，但该法作为市场竞争法律制度的核心，无疑会对我国培育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和经济

的发展。

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另外一部重要的法律，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第七十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该法律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共分九章六十九条，涵盖了政府责任、工作制度、政策支持、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讲，就是“四个一”，即“确立一个地位，树立一个旗帜，完善一种机制，形成一套体系。”在就业促进法表决通过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于2007年3月25日全文公布了就业促进法草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此后历经三次审议，反复修改，最后就业促进法终于出台了。可以说这部法律承载了太多人的就业希望，收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部就业促进法的出台究竟能给百姓带来什么呢？

就业促进法的总则中明确提出了制定该法的目的，即“为了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同时总则第二条也提出了我国的就业工作方针“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多渠道扩大就业。”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工作方针那？首先，“劳动者自主择业”就是要充分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发挥就业潜能和提高职业技能，依靠自身努力，自谋职业职业和自主创业，尽快实现就业。其次是“市场调节就业”，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职业供求信息，引导劳动者合理流动和就业，通过用人单位自主用人和劳动者自主择业，实现供求双方相互选择；通过市场工资价位信息，调节劳动力之间的供求。第三是“政府促进就业”，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就业中的重要职责，通过发展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就业机会；通过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维护公平就业；通过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创造就业条件；通过提供就业援助，帮助困难群体就业。该法律还对政府在促进就业工作中所承担的职责做了规定，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一、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度。二、制定实施有利于就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三、推进公平就业。四、加强就业服务和管理。五、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六、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七、开着就业和失业调查统计工作。八、发挥社会各方面促进就业的作用。



为了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就业促进法将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积极的就业政策上升为法律规范，并按照促进就业的工作要求，规定了政策支持的法律内容，这些法律内容包括：一、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产业政策，明确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统筹协调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鼓励各类企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国家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在安排政府投资和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应当发挥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带动就业的作用，增加就业岗位。二、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明确规定国家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就业环境，扩大就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就业专业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特定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等的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以及扶持公共就业服务等。审计机关、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就业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三、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扶持失业人员和残疾人就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和人员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具体包括：吸纳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失业人员达到规定要求的企业；失业人员创办的中小企业；安置残疾人员达到规定比例或者集中使用残疾人的企业；从事个体经营的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国家规定给予税收优惠的其他企业、人员。同时，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失业人员和残疾人免除行政事业性收费。四、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政策。明确规定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并对自主创业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小额信贷等扶持。五、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六、实行区域统筹的就业政策。国家支持区域经济发展，鼓励区域协作，统筹协调不同地区就业的均衡增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扩大就业。七、实行群体统筹的就业政策。各级人民政府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业人员就业工作。当前，要统筹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大学生、复转军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工作。八、实行有利于灵活就业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政策。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逐步完善和实施与非全日制用工等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政

策，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九、实行就业援助制度。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对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扶持和帮助。十、实行失业保险促进就业政策。明确规定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基本生活和促进就业的功能，并要求加强对大规模失业的预防、调节和控制。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加强就业服务和就业管理，培育和完善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2007年11月3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出台了《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针对就业促进法的相关内容作了全面的细化，对就业服务与管理、就业援助的相关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

就业促进法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部重要法律，为我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劳动保障法律体系。这部法律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在建设以《宪法》为依据、以《劳动法》为基础、以《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为主干、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配套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方面，又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中韩交流年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域相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韩国历史上的文学泰斗崔致远 12 岁辞别亲人与故国，只身西渡，随商船来到大唐，先在长安、洛阳求学七八年，874 年，崔致远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此后，他先后在溧水、淮南为官，他在中国一共度过了 16 年的时光，于 28 岁回到新罗，并在新罗王朝继续担任要职。崔致远一生文学创作不断，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大学者、诗人，被韩国学术界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历史上中韩两国交往密切，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原本统一的一个国家，被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北部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南部是大韩民国。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曾与朝鲜并肩作战，此后，韩国政府无论是李承晚执政的“第二共和国”，还是朴正熙执政的“第三共和国”，以及后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政府，几乎都施行排斥华侨的政策。到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政府颁布《外国人土地管理法》，规定外国人不能同时拥有两处房产，买地不允许超过 300 坪（约 990 平方米）。此外，华人饭店经营的传统食品炸酱面被要求“永远不许涨价”，华人子女找工作受到限制，进入韩国大企业和政府机关的机会几乎为零。

时间到了 1992 年，这一年对于中韩两国来说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 5 月 13 日~15 日和 6 月 1 日~3 日，中韩两国代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14 号楼举行了两国建交的第一轮谈判和第二轮谈判。这是双方代表隔绝几十年后第一次坐到一起。开始时主要是互相摸底，但韩方从第一次就明确提出，希望韩中两国尽快正式建交。在此情况下，中方提出了建交方案，即如果韩国希望与中国建交，必须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第一轮谈判中，双方围绕此问题出现交锋。每次谈判结束后，韩方人员回到自己房间，楼上一点声音也没有。相隔半个多月，韩方人员带着方案再次来京参加第二轮谈判。在这轮谈判中，双方之间仍存有重要分歧，韩方主要是

想提高与台湾关系的水平，但看到中方不会让步，最终还是同意了中方的意见。这轮谈判双方意见基本取得一致，韩方人员情绪高涨，不仅在晚宴上谈笑风生，而且回到楼上又要了不少茅台酒，歌声持续到半夜。第三轮谈判是在汉城（今首尔）举行的，这是中方提出的，因为中方考虑，再举行一轮谈判估计双方就可以达成协议，而按照国际惯例，谈判应该轮流在双方举行。韩方也像中方一样，把谈判地点安排在汉江畔喜来登华克山庄饭店的一幢别墅内，这里与外界完全隔绝。果然，在这轮谈判中，双方就中韩建交原则达成协议。经过三轮谈判，中韩两国终于在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交后中韩两国各方面关系发展迅速。2003年7月，卢武铉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韩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06年10月13日，卢武铉总统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据韩国政府统计，2006年韩中双边贸易额超过1340亿美元，而1992年这一数字仅仅是63亿美元。目前，大约有两万家韩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据韩国外交通商部统计，截至2005年年底，韩国在中国累计投资达135亿美元。中国的统计数字则为311亿美元。目前每周大约有800个航班将韩国六个主要城市与中国30个城市连接起来，而韩国与美国每周仅有大约200个航班。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过去15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有大约35万亿韩元（合376亿美元）来自韩中双边贸易，“这意味着，如果按韩国经济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计算，那么韩国年经济增长率中有8.7%是中国作出的贡献”。韩中两国关系发展如此迅速，令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一代韩国人感到震惊。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在接受韩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韩国与中国建交令世界震惊，两国关系在各方面取得如此飞速的发展再次令世界震惊。”

从1992年8月24日至今，中韩两国建交已有18年了，在这些年里，中韩友谊之树枝繁叶茂，两国全方位的交流硕果累累。然而，在普通的中国民众眼中，以韩剧、韩国歌手为代表的“韩流”成为人们了解韩国的主要途径，没去过韩国的中国人，往往把韩剧中的场景当作韩国的全貌；没来过中国的韩国人，甚至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影像当作今天的现实。虽然可



以使我们一睹韩国时尚的一面，但是这毕竟只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韩国真正的面貌。因此，为了加深两国的了解，有必要向中韩两国民众展现出两国更加真实的面貌。

应大韩民国总统卢武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11月16日~17日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同卢武铉总统举行会谈，分别会见了国会议长金元基、国务总理李海瓚。在会谈中，两国元首对2003年7月北京会晤以来中韩关系取得的新进展表示满意，并就进一步深化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国际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两国文化、教育、旅游、体育、新闻等领域和友好团体、友好省市等之间的交流，不断巩固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基础。为此，双方商定，将2007年即中韩建交15周年定为中韩交流年。两国政府将认真筹划、组织各种活动，使之成为进一步增进两国民间交流与理解的重要契机。

为了组织好中韩交流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和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主席的组委会，委员包括外交部、文化部、科技部、商务部以及广电总局、体育总局、旅游局、贸促会、对外友协、驻韩国大使等众多部门的主要领导。中韩两国还筹划、组织了各种活动。由中方主办的活动包括：一、组团赴韩参加中韩交流年开幕式；二、举行中韩建交15周年纪念活动；三、在北京举行中韩交流年闭幕式；四、在华举办韩国大学中文系师生语言培训；五、在韩举办中国文物展；六、在韩举办中国电影展；七、派遣中国僧侣代表团赴韩研修；八、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韩；九、邀请韩国青年代表团访华。由韩方主办的活动包括：一、在首尔举行中韩交流年开幕式；二、举行韩中建交15周年纪念活动；三、组团访华参加中韩交流年闭幕式；四、派遣韩国政府采购使节团访华；五、派遣韩国中国西部开发考察团访华；六、在华举办韩国传统饮食文化展；七、在华举办韩国电影展；八、培训中国的韩国语专业教师及学生；九、韩国海军学校巡洋舰队访华。此外还有中韩双方共同主办的活动，包括：一、中韩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理论研讨会；二、中韩友好组织论坛；三、中韩经贸科技联委会会议；四、中韩双方投资合作委员会联席会议；五、中韩经济部长及中韩产业合作委员会会议；六、中韩金融合作会议；七、中韩农业发展政策研讨会；八、中韩女企业家论坛；九、中韩民间经济协议会；十、中韩创新与合作论坛等三十余项活动。为了更好的宣传中韩交流年，2006年12月14日，中韩交

流年中方友好形象大使任命仪式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中国演员陈坤、孙俪被任命为2007年中韩交流年中方友好形象大使。

在2007年中韩交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对韩国、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4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与韩国总统卢武铉举行会谈，就中韩关系提出了保持高层交往、深化经贸合作等五点建议。在会谈中，温家宝总理就发展中韩经贸关系提出，双方应积极落实好两国政府签署的《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早日正式签署《中韩投资保护协定》，推动中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妥善处理双方在经贸问题上的各自关切，尽早实现双边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韩国领导人和经济界人士表示，愿意加强与中方在环保、节能、通信等领域的合作。卢武铉总统表示，希望两国在高水平合作和公平竞争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利益。

2007年12月10日，由文化部和韩国文化观光部共同主办的“中韩交流年”闭幕式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来访的韩国总理韩德洙共同出席闭幕式，并在闭幕式上致辞。温家宝在致辞中指出，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域相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传统。今年适逢中韩建交15周年，两国政府将今年确定为“中韩交流年”。交流年贯穿全年，活动多达100多项。交流年活动范围广，规模大，内容丰富，在两国社会各界引起了积极反响，同时也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互利合作，推动了双边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温家宝强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传承两国友谊的新生力量。他表示，相信由两国青少年艺术家同台演出的交流年闭幕式能够用艺术展现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并预示着两国合作与交流开启新的篇章，祝贺“中韩交流年”取得圆满成功！韩德洙在致辞中表示，韩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建交15年来，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取得迅猛发展。“韩中交流年”活动的成功举行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双边关系飞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韩方将与中方携手共进，推进韩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共创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美好未来。随后，两国总理和首都1000余名观众共同欣赏了由两国青少年艺术家带来的精彩的闭幕式演出。两国青少年同台演出，真情互动，博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和中国杂技团等参加了演出。

在“中韩交流年”闭幕的第二天，即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韩国总理韩德洙，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胡锦涛说，中韩建交 15 年来，特别是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推进，成果喜人。庆祝中韩建交 15 周年和中韩交流年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和好评。我们对两国关系取得的积极进展感到满意。胡锦涛表示，当前，中韩两国都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进一步发展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也必将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愿与韩方一道，共同努力，保持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开拓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韩德洙首先转达卢武铉总统的亲切问候。他说，韩中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韩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敬佩，期待明年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韩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韩方致力于不断深化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愿与中方共同努力，为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中韩交流年”虽然结束了，但是中韩两国的友谊必将长存，中韩两国的未来也必将更加美好。

中共十七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07年10月9日~1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0人，候补中央委员15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将这两份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胡锦涛就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吴邦国就《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根据中共第十六届第七次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隆重开幕。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出席开幕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一、中共十七大是在中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认真总结中共十六大以来五年的工作，对全面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战略部署。二、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讨论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七大的报告稿。四、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稿。

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胡锦涛所作的报告共分12个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的新要求；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十、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十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十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在报告中回顾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就：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胡锦涛在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后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谈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关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胡锦涛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胡锦涛在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胡锦涛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最后，胡锦涛说，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大会认为，胡锦涛所做的报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报告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我们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报告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和长远相结合，突出了高举旗帜、科学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和加强自身建设四个重点，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重视民生的三大要求，以战略性思维和前瞻性眼光描绘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此外，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的2235名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204名委员、16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7名。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为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而扎实努力。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认真研读党的十七大文件，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章，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大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深刻领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深刻领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深刻领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紧密联系广大党员的思想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把用党的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通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进一步明确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奋斗目标，提出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努力解决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大会召开的时机看，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至关重要。21 世纪头 20 年，既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今后五年是关键中的关键。党的十七大正是在这个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其次，从大会确定的主题看，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这样的主题，就是要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这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开拓奋进十分紧要。最后，从大会担负的使命看，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既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实现了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深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中央领导集体。毫无疑问，党的十七大对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各方面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指导作用。



中国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要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这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但是，我国目前的环境状况如何那？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这主要表现为：一、水土流失严重。建国初期水土流失面积为 116 万平方公里。据 1992 年卫星遥感测算，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 179.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8.7%。二、沙漠化迅速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 149 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 15.5%。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沙漠化土地以年均增长 2 100 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三、草原退化加剧。20 世纪 70 年代，草场面积退化率为 15%，80 年代中期已达 30% 以上，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 10 亿亩，目前仍以每年 2 000 多万亩的退化速度在扩大。四，森林资源锐减。中国许多主要林区，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昔日郁郁葱葱的林海已一去不复返。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五，生物物种加速灭绝。据估计，中国的植物物种中大约 15~20% 处于濒危状态，仅高等植物中濒危植物就高达 4 000~5 000 种。此外还有地下水位下降，湖泊面积缩小，水体污染明显加剧，大气污染严重以及环境污染向农村蔓延等问题。

严峻的环境形势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十五”计划时，各省市 GDP 的指标全都超额完成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没有一项完成，全部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环保的指标一个是 COD，水的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气的指标。2010 年可能是 3 200 万吨，2020 年 3 500 万吨以上。到时候国土面积 50% 都将被酸雨覆盖，80% 的人口将处于严重的空气污染中。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统计，说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几年内将达到我们 GDP 的 13%。可能估计得稍高一些，但确实表明我们必将回头支付巨大的

治理成本，而这些治理成本很可能抵消我们取得的经济成果。第二，是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上访投诉每年以 30% 的速度递增。两会的提案中，环境保护作为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还有就是人体健康问题，总体而言，城市的四亿人口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1 500 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种疾病。再有就是环境公平问题。环境不公平必然促成社会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也反过来会加重环境不公平。第三，是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用环境问题制约中国，都会得到选票，特别会得到左翼的选票。现在邻国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像日本、韩国最关心的是沙尘暴，他们认为沙尘暴 100% 来源于蒙古和中国，落在他们头上的酸雨 50% 来源于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抗议我们在上游修水电站，破坏了他们的生态；俄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认为我们的造纸业毁坏了他们的原始森林；美国认为我们十年内会成为他们西海岸的主要污染源。

造成目前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人口压力。中国现代人口数量异常迅猛增长，既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又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的最大压力。迫于生存，人们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乱采滥伐，破坏植被，众多人口的不合理活动超过了大自然许多支持系统的支付能力、输出能力和承载力。其次，工业压力。中国发动工业化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又面临赶超发达国家的繁重任务，不仅以资本高投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以资源高消费、环境高代价换取经济繁荣，重视近利，失之远谋；重视经济，忽视生态，短期性经济行为为中国生态环境带来了长期性、积累些后果。再次，市场压力。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许多外部经济效应或者外部不经济效应，环境污染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财产，这种公共财产的提供，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且多一些人享受它的好处并不会加大总成本。公共财产或者公共财产受到破坏的特点决定了个人或市场都不会提供控制环境污染的费用和服务，只有政府是公共财产的提供者。来自市场经济的压力愈大，政府对防治环境污染、整治国土资源的责任就愈大。

对于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十分重视生态建设与环境治理。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森林问题极为



重视。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1958年，他又进一步指出：“要看到林业、造林。这是我们将来的根本问题之一。”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建设东北、华北、西北“三北”防护林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启了以重大生态工程推进生态治理的绿色行动。在同一年，中共中央还批准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作出的重要指示。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施行，此后中国已制定了10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这个过程体现出我国环境保护由抓末端治理向抓源头和全过程控制延伸，由抓点源治理向抓流域综合治理拓展，由注重工业企业污染向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发展，由注重行业企业的环境管理向推动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制度、体系转变。1981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从此以后，每到春季，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就会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从未间断。1983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转折点。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奠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政策。我国的环境保护机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2年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立环境保护局，1988年成立了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环境保护局，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国的国家环保行政机构的设置，到此经历了四次跨越。环保机构的变化与升格，体现了中国政府以及社会对环境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化，环保力度逐步得到加强。

在“九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党中央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全面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强化环境监督执法、制裁环境犯罪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国务院积极推进《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作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批准并实施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而在十五期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也成为国家重点专项规划的工作之一，为此制定了《“十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专项规划》，这成为

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证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行动纲领。“十五”期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为做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保障；二、综合国力增强，为全面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三、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开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带来了机遇；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创造了条件；五、以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改善西部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六、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高，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规划中还提出了我国从“十五”到2010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论述为指针，牢固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完善法规和政策为保障，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规划中指出：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重视人口问题，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切实保护环境；通过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依靠集约型增长方式，实行全面节约，降低资源消耗，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生态农业，减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生态和环境的压力；结合西部大开发，加快生态建设步伐，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三、重视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面的作用。政府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大投入，强化监管，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直接投资、贷款贴息、税收优惠、调控价格、政府采购和信息发布等手段，促使企业治理污染，居民合理分担环保义务；鼓励公众参与，加强舆论监督，维护生态平衡，防治环境污染，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四、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极推进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和建设的技术水平；开发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先进实用技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五、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要在全面规划的



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抓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着力解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坚持治理与保护并举、保护优先的方针,从源头抓起,避免出现新的破坏和污染;要尊重自然规律,注意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提高建设和治理效果,保证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益。进入 21 世纪之后,党和国家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更为重视。党的十六大把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200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首次明确下来,提出到 2020 年要使我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除了党和政府对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之外,社会各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参与热情高涨。公众踊跃参与节能减排等环保行动,支持“限塑令”,带环保袋上街购物,夏天把空调温度调高,争当环保志愿者。环保民间组织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2008 年民间环保组织总数已经超过了 3 500 家,从业人数达到 30 万;绿色发展成为很多地区、企业的自觉选择,生态市、森林城市、环境优美的乡镇、环境友好企业等不断涌现。

我们相信,13 亿中国人民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奋力前行,“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能够奏出更为激扬动人的和谐乐章。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目前在我国看病贵、看病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据卫生部统计表明，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这一问题已经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普遍关注。为了解决我国医疗体制所面临的难题，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向媒体表示，国务院已经牵头联合 11 个部门成立了医改部际协调工作小组，正在组织联合调查，加紧拟订改革方案，国家发改委也面向全社会征求医改意见和建议。为了找到我国医疗体制出现问题的根源，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医疗体制的建立及其发展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找到症结所在，好对症下药，标本兼治。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成绩非常突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国卫生工作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毛泽东同志早在 1965 年，就明确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 GDP 3% 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影响以及“政事一体化”的管理，我国在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



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党和政府开始不断摸索新的医疗体制发展途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有关统计显示，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1981年的67.8岁，新生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0‰降低到1981年的37.6‰。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财政基础薄弱，卫生费用紧缺，医疗卫生队伍青黄不接，领导水平，技术水平，工作效率都十分低下。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为了恢复医疗卫生体系作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1978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也为医疗改革提供了动力，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卫生事业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这一时期，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对十年浩劫对卫生系统的严重损害进行调整、建设，同时，也包括培养相关人员业务技术，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等内容。为此，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卫生部门也以此作为契机，根据党的建设路线开始加强对卫生事业的管理。1979年，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提出“卫生工作重点转移到医疗卫生现代化建设上，建设全国三分之一重点县”。同年，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接着又开展了“五定一奖”和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的办法，并展开了试点。传统医院管理的弊端在这一阶段逐步显露出来，随后加强医院管理的政策相继出台。1981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开始扭转卫生机构不善于经营核算的局面。在此基础上，1982年卫生部颁布《全国医院工作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了对医院相关工作要求。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恢复与改革之间的过度时期，1980年以前基本上进行的是恢复性质的建设工作，1980年以后许多弊端显露出来，于是就将工作重点开始向改革转移了，这一时期应该视为医改的孕育期。

第二阶段是1985年~1992年。1985年，我国正式启动了医改，这时的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成为我国

医改启动的标志，一、1985年1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局局长会议，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部署全面开展城市卫生改革工作；二、同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62号文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拉开了。为了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1985年8月卫生部下发《关于开展卫生改革中需要划清的几条政策界限》，作为更好贯彻62号文的补充性规定。1989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1989〕10号文），文件提出五点：第一，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第二，开展有偿业余服务；第三，进一步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第四，卫生预防保健单位开展有偿服务；第五，卫生事业单位实行“以副补主”、“以工助医”。其中特别强调“给予卫生产业企业三年免税政策，积极发展卫生产业”。这个文件进一步提出通过市场化来调动企业及相关人员积极性，从而拓宽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1988年11月，国务院发布卫生部“三定”方案（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这一方案确定了卫生部的基本职能，要求对直属企事业单位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1989年11月，卫生部正式颁发实行医院分级管理的通知和办法。医院按照任务和功能的不同被划分为三级十等，这一办法能更客观地反映医院的实际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医院在政府的控制下展开有序的合作和竞争。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1989年2月14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七五”时期卫生改革提要》和《卫生部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九点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各领域改革的政策。从1990年开始，卫生改革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全国卫生局局长会议在贯彻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同时，总结了卫生改革的经验，提出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要求。同年5月卫生部于成立《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纲要（1991~2000）》起草小组，此纲要先后草拟了12稿，不断地征求意见，讨论修改，这个过程对深化各部门对医改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1991年，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同时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阶段卫生政策的高度总结。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关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政府的主导思想在于“给政策不给



钱”。

第三阶段是1992~2005年。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在卫生医疗领域，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探索仍在进行。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提出的“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卫生部门工作会议中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这项卫生政策刺激了医院创收，弥补收入不足，同时，也影响了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发挥，酿成“看病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后患。针对医院注重效益而忽视公益性的倾向，卫生部门内部也展开了一系列争论。争论集中爆发于1993年5月召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明确表示反对市场化，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从此以后，医改领域内的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争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而且逐步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而被社会各界所讨论。199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为下一步卫生改革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提出了推进卫生改革的总要求，在医疗领域主要有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卫生管理体制、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卫生机构运行机制等。这些指导思想成为这一轮改革的基调和依据。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的比重却在下降，政府投入不足，再加上卫生政策失当，使得看病难问题突显出来。为此，党和政府又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总体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2月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等8部委《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之后陆续出台了13个配套政策，包括是：《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医疗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关于改革药品价格管理的意见》、《关于改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意见》、《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若干规定》、《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及监督管理办法》、《关于病人选择医生促进医

疗机构内部改革的意见》、《关于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若干意见》、《关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2000年12月卫生部印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原则》、《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指导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设置指导标准》。2001年11月卫生部印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基本工作内容（试行）》，同年12月印发《关于2005年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目标的意见》。2006年初，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这一时期，从中央文件的印发到地方政府的尝试，改革的领域和层次在不断提高，操作的方法和手段也日益成熟。

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是这一阶段“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医疗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注入新的理念和活力。2005年1月，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吴仪做出批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随着这一问题的逐渐凸现，卫生部开始尝试制定《关于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虽然党和政府为解决医疗体制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2005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医疗体制并没有帮助到最应得到帮助的群体，特别是农民，所以结论是医改并不成功。这一结论印证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结果。

自此之后，2006年9月，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新一轮的医改正式启动。在此之后，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后来增加到9家机构。5月底，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组织召开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对医改方案进行评审。此后，正式的医改方案一直都在酝酿之中，10月份开始征求专家意见，但是没有公布。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医疗体制的制度框架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新时期对卫生医疗体系构成的全面概括。本阶段主要是从反思争论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同时让医改又上了新的台阶，尤其是2006



年医改协调小组成立以后，各方积极分析准备，医改的具体方案也在一次次协调和调研中得到了细化。

2009 年国务院印发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 ~ 2011 年）》，指出 2009 年 ~ 2011 年重点要抓好五项改革：一、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中指出推进五项重点改革目的在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部分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长期薄弱的状况，扭转公立医疗机构趋利行为，使其真正回归公益性，有效解决当前医药卫生领域的突出问题，为全面实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一定可以摆脱困境，找到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

嫦娥一号

中国自古就有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表达了古人对月亮的憧憬。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搭载着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三号塔架点火发射。中国人终于开始了探月之旅。11月5日11时37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动，顺利完成第一次“太空刹车减速”动作，月球捕获卫星。“嫦娥一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成为中国第一颗月球卫星。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致电祝贺嫦娥一号卫星第一次近月制动取得圆满成功。胡锦涛在贺电中说，欣闻嫦娥一号第一次近月制动取得圆满成功，卫星已进入环月轨道，我谨向参与嫦娥一号研制、指挥、测控和保障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望再接再厉，夺取绕月探测的新胜利。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致电祝贺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成功实现近月制动，进入绕月轨道。贺电说，我谨向参与工程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希望同志们继续按照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的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大力协同、扎实工作，确保绕月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工程的成功，是与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中国探月计划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回忆说：“其实在1992年前后，国内就已有科学家提出了‘嫦娥奔月’的想法。”当时为了迎庆1997年香港回归，有人提出利用运载火箭往月球上发射一个象征中国的铁质标志，永远地将其“烙”在月球上，以此扬国威、鼓志气。这个设想当时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还是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很快便形成文字向中央打了申请报告，并计划在香港回归前完成发射任务。“这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研究价值，而且还费钱。所以当报告打到中央后，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否决了。”两年之后到1994年，真正意义上的探月构想才被提出，此后10年间主要是进行论证工作。回想起这10年



的论证过程，中国探月办公室刘建忠研究员回忆说，包括欧阳自远院士在内的很多专家，除了搞研究，10年中作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四处游说和呼吁。“这项工作很费心，只要逮住机会，他们就会向决策者、科技界和公众阐述月球探测的重要性，灌输中国开展探月的必要性。”刘建忠直言不讳地说，“毕竟10多亿元的科研投资不是个小数目，大家都很谨慎。不过如果没有热心科学家的这些外围努力和攻关，中国启动探月计划可能还会要推迟。”但是就在争论中，科学界的一些行动已在悄然地推动着中国探月计划的前进。20世纪90年代初，航天领域首席科学家闵桂荣院士提出了中国也要搞月球卫星的建议。1997年4月7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的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三位院士以“863”计划的名义发表了《我国月球探测技术发展的建议》。1998年，总装863航天领域办公室组织了杨嘉墀等航天专家对清华大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国防科大、中国科技大学的“月球车”项目申请报告进行评审，通过了由清华大学牵头的“月球探测机器人总体方案设计关键技术分解”的立项研究，揭开了我国月球车研究的序幕。2000年5月，清华大学组织了“月球探测技术研讨会”，反响强烈。2000年10月5日在京召开的首届“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作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航天》专题发言，“我国将在无人实验飞船成功飞行的基础上，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并积极参与国际火星探测活动，使我国的空间探测技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公开表明探月决心。2000年11月22日，我国政府首次公布航天白皮书——《中国的航天》，明确了近期发展目标中包括“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2001年，由欧阳自远院士牵头制定的‘发射绕月卫星’第一期科学目标和有效载荷配置终于通过了国家评审。2001~2002年间，孙家栋院士组织全国各方面力量，对首期目标又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综合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科学目标明确、先进，技术能够实现，没有颠覆性的技术问题。2003年9月，中央最终同意并批准了这个计划。中国的探月计划经过长期准备、10年论证，于2004年1月正式立项，被称作“嫦娥工程”。2004年2月13日，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秘书长兼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孙来燕向世人公布，中国月球探测计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3年内，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将开始绕月飞行；6年内，中国的月球车将在月面上软着陆，展开巡视探测；2020年之前，中国研制的机器人将把月壤样品采回地球。

经过 10 年酝酿才最终被批准的“嫦娥工程”将完成以下四大科学目标：

一、获取月球表面三维立体影像，精细划分月球表面的基本构造和地貌单元，进行月球表面撞击坑形态、大小、分布、密度等的研究，为类地行星表面年龄的划分和早期演化历史研究提供基本数据，并为月面软着陆区选址和月球基地位置优选提供基础资料等。

二、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主要是勘察月球表面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钛、铁等 14 种元素的含量和分布，绘制各元素的全月球分布图，月球岩石、矿物和地质学专题图等，发现各元素在月表的富集区，评估月球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前景等。

三、探测月壤厚度，即利用微波辐射技术，获取月球表面月壤的厚度数据，从而得到月球表面年龄及其分布，并在此基础上，估算核聚变发电燃料氦-3 的含量、资源分布及资源量等。

四、探测地球至月球的空间环境。月球与地球平均距离为 38 万公里，处于地球磁场空间的远磁尾区域，卫星在此区域可探测太阳宇宙线高能粒子和太阳风等离子体，研究太阳风和月球以及地球磁场磁尾与月球的相互作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实现我国的探月计划，就必须制造出来符合要求的卫星。我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被命名为“嫦娥一号”。据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介绍：“嫦娥一号”是我国发射的最远距离的卫星，距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38 万公里，而在这之前，我国发射的最远距离的卫星离地面四万公里。那么这颗承载了许多人梦想的人造卫星有着怎样的神通呢？嫦娥一号”卫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承担研制，以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嫦娥命名。嫦娥一号平台以中国已成熟的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为基础进行研制，并充分继承“中国资源二号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等卫星的现有成熟技术和产品，进行适应性改造。该卫星主要用于获取月球表面三维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关物质元素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厚度、探测地月空间环境等。星体为一个 2 米×1.72 米×2.2 米的长方体，两侧各有一个太阳帆板，最大跨度达 18.1 米，重 2 350 千克，工作寿命一年。它将运行在距月球表面 200 千米的圆形极轨道上。该卫星平台由结构分系统、热控分系统、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推进分系统、数据管理分系统、测控数传分系统、定向天线分系统和有效载荷等 9 个分系统组成。这些



分系统各司其职、协同工作,保证月球探测任务的顺利完成。星上的有效载荷用于完成对月球的科学探测和试验,其他分系统则为有效载荷正常工作提供支持、控制、指令和管理保证服务。根据我国探月卫星工程的四大科学目标,在嫦娥一号上搭载了八种 24 台件科学探测仪器,重 130 千克,即微波探测仪系统、 γ 射线谱仪、X 射线谱仪、激光高度计、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太阳风离子探测器、CCD 立体相机、干涉成像光谱仪。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后,为我们传输回来许多重要的信息。2007 年 11 月 20 日,国家航天局宣布:嫦娥一号卫星工作正常,有效载荷公用设备打开。卫星已处于三体定向姿态,即太阳帆板跟踪太阳以保持供电,定向天线跟踪地球以保持通信,星上安装有效载荷的一面对着月球以利于科学探测。同时开始传回探测数据,经过处理制作完成第一幅月面图像。2007 年 11 月 21 日嫦娥一号卫星在轨测试正常,星地之间数据传输畅通。2007 年 11 月 26 日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这幅月面图像位于月表东经 83° 到东经 57° 。图幅宽约 280 公里,长约 460 公里。2007 年 12 月 2 日和 3 日进行了轨道维持,卫星轨道调整为近月点 193 公里,远月点 194 公里。2007 年 12 月 9 日国家航天局公布部分月球探测数据。同年 12 月 11 日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部分月球背面图像。2008 年 11 月 13 日国防科工局等有关部门正式发布了嫦娥一号卫星所拍摄制作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2009 年 3 月 1 日 16 时 13 分,嫦娥一号卫星在控制下成功撞击月球。自此,嫦娥一号卫星顺利完成了它所肩负的使命。

嫦娥一号卫星探月工程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政治领域来看,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体现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相关的尖端科技,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又一象征,表明了中国在有效地掌握和利用太空巨大资源、实现科研创新、凝聚民心、增强国家竞争力等一系列远大目标的决心与行动。从经济领域来看,将带动信息、材料、能源、微机电等其他新技术的提高,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军事领域来看,表明我国的导弹打卫星和激光摧毁卫星的技术已经日臻成熟。虽然这次嫦娥一号卫星没有携带任何与军事有关的设备,但是中国的运载火箭可以在发射出现故障时实施紧急关机,飞船和卫星可以在外太空实施数次变轨,当卫星发生故障,也可以用弹道导弹或者激光予以摧毁,显示我国如果要在外太空实现军事用途也并非难事。那么从科技领域来看,“嫦娥奔月”将促进中国航天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中国基础科学的全面发展。月球探测

将推进宇宙学、比较行星学、月球科学、地球行星科学、空间物理学、材料科学、环境学等学科的发展，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将带动更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目前中国科学家对月球的了解和认识往往依赖于他国提供的材料，这样就丧失了许多研究月球的机会。从文化领域来看，嫦娥一号的发射成功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探月给人类本身带来了社会发展理念的“颠覆性改变”，人类第一次将思维与身躯同时挣脱地心引力的束缚，进入到地球以外的无限宇宙空间中，实地接触了月球表面，人类之前所摸索出的各种科学理论得到部分验证或反证。总之，绕月探测工程是我国在新世纪组织的一项重大科技工程。这项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向空间科学更高研究领域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启了新的征程，是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2007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全文近1.5万字，分为前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家政权建设、多党合作制度与人民政协、多党合作制度与现代化建设、结束语、附录等部分。

众所周知，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政党制度，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政党制度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国家实行两党制，有的国家实行多党竞争制，也有国家实行一党制。每个国家都根据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选择不同的政党制度。而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之后，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一党执政，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掌握国家核心权力。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非执政党及各界无党派政治力量在政治上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三、体现于整个制度中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这套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是不同的，它是一项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包括哪些政党？这些政党主要由哪些人士组成，目前发展情况如何？《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八个民主党派分别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7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以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为对

象，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民革历任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李沛瑶，现任主席何鲁丽。目前，民革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党员81 000多人。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日，张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民盟历届主席为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楚图南、费孝通、丁石孙，现任主席蒋树声。目前，民盟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盟员181 000多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民建历届领导人和主席为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现任主席成思危。目前，民建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108 000多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以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为主，还有一部分工商界爱国人士，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民进主要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民进历届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现任主席许嘉璐。目前，民进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会员103 000多人。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1930年8月9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10日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3日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主要由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农工党历届领导人和主席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周谷城、卢嘉锡，现任主席蒋正华。目前，农工民主党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有成员99 000多人。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1925年10月，由华侨社团发起，在美国旧金山成立。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致公党主要由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组成。致公党历任主席为陈其尤、黄鼎臣、董寅初，现任主席罗豪才。目前，致公党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有党员28 000多人。



九三学社，1944 年底，一批进步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与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 1945 年 9 月 3 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1946 年 5 月 4 日，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九三学社历任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现任主席韩启德。目前，九三学社在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 105 000 多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主义运动的台湾省人士于 1947 年 11 月 12 日在香港成立。台盟由台湾省人士组成。台盟历届主席为谢雪红、蔡啸、苏子衡、蔡子民、张克辉，现任主席林文漪。1987 年～1992 年，台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实行主席团制，主席团执行主席林盛中（1987～1988 年）、蔡子民（1988～1992 年）。目前，台盟在 13 个省、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 2 100 多人。

除了八个民主党派还有许多无党派人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称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为社会贤达。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后，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目前，把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称为无党派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无党派代表人士主要有郭沫若、马寅初、巴金、缪云台、程思远等。

在中国之所以可以实行这种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野蛮入侵，清王朝腐朽衰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 100 多年，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人民根本没有民主权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争取国家、民族的富强，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命运，奋起抗争，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先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912 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同时他还仿效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政治和多党制。这种制度对于君主专制制度来说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不久之后，它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失败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总结的，中国的社会既然和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能完全效仿欧美。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逐渐掌控了国民党的大权，从 1927 年～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一党专制，独揽国家大权，打击迫害民主进步力量，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终被人民所推翻，事实证明孙

中山先生效仿欧美建立的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以及蒋介石所实行的一党专制，都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到底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更适合中国，这一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肩上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经过实践摸索出了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各个民主民主党派则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他们都具有反帝、爱国和追求民主的政治要求。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奋斗。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又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打内战、搞独裁的政策。这些经历为后来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并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此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建设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商国是。中国共产党也始终重视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首次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原则。对此，周恩来作了清晰的解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我们是6亿人口的国家。要把6亿人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但是由于出现了“左”的政治理念，严重干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5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融洽关系一度受到损害。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积极调整党际关系。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89年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得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有了基本运作规范。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长期存在



和发展载入了国家宪法，使其成为国家意志。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进一步将这一制度分别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之一。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党际和谐”这个新概念，这对于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关系，探索和谐党际关系的建设途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使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各种形式的高层次政治协商活动就有180多次，各民主党派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重大建议180多项，许多意见建议都被采纳。1998年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意见建议共77件，许多建议受到高度重视并被采纳。截至2004年底，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有17.6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有33.7万多人，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32万多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在中国政治运行的各个环节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到今天，已被证明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是适应中国的发展现状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2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注入了更多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内容，从而使中国的政党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具有独特性，也更加具有生命力。

改革开放 30 周年

200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 30 年，1978 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三个伟大转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人民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格局，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 1978 年到 2007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 206 亿美元提高到 21 737 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 10 000 亿美元。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决策，使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从 1978 年到 2007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3 645 亿元增长到 24.95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 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 3 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 13 亿人口吃饭问题。我国



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1978年~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大力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迅速，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

社会事业长足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扎实贯彻，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成功开辟，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顺利

完成，军队武器装备建设成效显著。军队、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固。人民军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强，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特别是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成功实施，使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加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斗争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

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我们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我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显著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从容地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风险。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我们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30年的伟大成就，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现出来。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概括为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

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30年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造福人民，在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作用中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3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得到人民充分信赖和拥护，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大力量、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30年来，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0年来，我们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30年来，我们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30年来，我们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30年来，我们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的大环境下，始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30年来，我们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明确党的历史方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30年来，我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因此，我们要继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的彰显

2008年1月以来，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出现了建国以来罕见的持续大范围低温、雨雪和冰冻的极端天气。严重的气象灾害，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到2月12日，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已造成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107人，失踪8人，紧急转移安置151.2万人，累计救助铁路公路滞留人员192.7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7亿亩，绝收2530亩；倒塌房屋35.4万间。面对冰雪灾害中国全国上下紧急动员，全力抗击灾害。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这场突如其来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地区是50年一遇，一些地区是百年一遇。但是，中国政府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反应是迅速的，应对是及时的，措施是有力的。从2007年12月10日开始，到2008年1月19日，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气象预报，连续五次发出通知预警，要求各地做好暴雪天气的应对准备。1月中旬，针对灾害的发生和发展，各地和各有关部门也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果断决策。在广州火车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广州往武昌的列车，视察了一节车厢，然后从站台进入大厅，在三号候车棚对旅客讲话，并将一包食物送给一位重庆的旅客。温总理说知道大家辛苦，正在修复电网，让大家回家过年，并祝新春快乐。候车的旅客听了温总理的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京珠高速湘潭段，南下广东的车辆排着几十公里的长龙。温家宝总理亲自登上一辆客车慰问被困乘客。同一天温家宝总理还在湖南湘潭市郊外查看电力设施受损情况。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南长沙看望在沙坪变电站除冰抢险中不幸殉职



的周景华、罗长明、罗海文三名电力职工的家属。温家宝总理说：“今天面对你们，我无法用更多的语言来表示安慰，我给你们鞠个躬吧！”此外，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都亲临一线，靠前指挥。军队、武警、公安干警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投入到救灾抗灾工作，国务院也适时成立了由 29 个部门组成的应急指挥中心。为了妥善解决受灾群众的生活问题，财政部和民政部 2008 年年初下拨冬春灾民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 17.5 亿元。2 月 23 日~24 日，民政部召开全国灾区群众生活安排和恢复重建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把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和恢复重建工作作为当前民政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尽快开展倒塌民房的恢复重建工作，灾区各地民政部门要在 2 月底前摸清底数，3 月底前完成方案制定，6 月底前完成重建工作任务。此后，中央财政于 3 月 8 日再次下拨 3.47 亿元，用于灾区群众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除了党和政府采取了及时、果断的救灾措施以外，许多群众在灾害面前也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全国各地普通群众为了支援救灾工作，也都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 2 月 8 日起，13 名河北唐山农民自费来到遭受 50 年来最严重冰雪灾害的湖南郴州，组成一支“义务救灾小分队”，参加电网抢修等抗冰救灾工作。“义务救灾小分队”队长宋志永为参加这次救灾，他取出了近四万元的存款。21 日是元宵节，这 13 位来自唐山的农民兄弟又投身到郴州电网恢复的工作中，帮助运送电缆，在工地上度过佳节。在湖北省黄石市由于受损铁塔位于较高的山顶，山上积雪达 50 厘米，施工环境十分恶劣，黄石供电公司组织的技术人员通过现场实地调研后决定，对两座倾斜铁塔进行更换，市武警支队与抢修人员正全力以赴运送 15 吨的抢修物资上山。湖北省黄石市武警支队 160 多名干部战士与黄石供电公司近千名员工冒雪转运铁塔架。在江苏省宜兴市公安交巡警大队的众多交巡警冒雪到交通要道指挥，为群众排忧解难。

2 月 13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灾后重建工作。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全国广大干部群众、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抗击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和冰冻灾害工作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全国交通运输恢复正常，大部分受损电力线路和变电站得到修复，居民生活用电基本恢复正常，电厂煤炭库存稳步回升，受灾群众生活得到及时安置，灾区市场基本稳定，社会秩序井然。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天气持续时间长、影

响范围广、危害程度深，给电力、交通运输带来很大破坏，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为了尽快恢复重要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尽快安排好受灾群众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努力把这场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会议要求，一、要以电网恢复重建为重点，抓紧修复基础设施。全面展开受损高压网架的修复工作。二、要立即动员，组织好春耕生产。灾区要制定恢复农业和林业生产规划，并迅速组织实施。三、要进一步加强煤电油运保障工作。继续发挥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国有煤矿骨干作用，增加煤炭生产和供应；受灾煤矿恢复供电后要抓紧排水、通风和维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生产。四、要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认真落实救助受灾群众的各项政策措施，组织好缺粮农民的粮油供应，大力开展生产自救，帮助农民度过春荒。

此后民政部于2月24日召开了全国灾区群众生活安排和恢复重建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说，各级民政部门要把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和恢复重建工作作为当前民政工作的首要任务，从六方面着手确保恢复重建按期完成。一、要强化抗灾救灾的组织领导工作。各地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作为“第一责任人”担负起抗灾救灾的领导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全力以赴投入抗灾救灾工作。二、要切实做好受灾群众的应急救助和荒情救助工作。各地要及时摸清困难群众底数，及时调整和制定春荒救助方案，加大地方救灾投入，抓紧下拨中央安排的第二笔和将对重灾区增拨的冬春生活救助资金，统筹做好春荒救助工作。三、要尽快开展倒塌民房的恢复重建工作。灾区各地民政部门对灾民倒损房屋的恢复重建工作要尽早谋划，尽早安排，尽快启动。在抓紧摸清和掌握倒塌损坏房屋底数的基础上，按照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设计、规避灾害、经济实用的原则，抓紧制定恢复重建实施方案。四、要继续做好支援灾区的社会捐助动员工作。各地民政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大力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在前期做了大量动员社会捐助的基础上，以依托民间组织为主，进一步募集救灾资金和物资，动员志愿者参与，支持和帮助受灾地区的救灾工作。五、要切实管好用好救灾款物。应对此次灾害救灾资金数额较大，救灾物资数量较多。各地民政部门要严格遵循“一卡一账两公开四程序”的原则，按照“户报、村评、乡审、县定”四个程序确定救助对象，保证救灾款物发放的公开、公正和公平。六、要认真做好监督检查工作。民政部将对各地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和恢复重建工作情况实行定期通报。各级民



政部门要及时派出工作组，进行检查和督导，县级民政部门要随时跟踪乡村工作情况，确保各项救灾措施落实到人，各项救灾款物落实到人。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受到冰雪侵袭的各地区，在灾后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2008 年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举世瞩目的奥运盛会，也有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04 秒，四川汶川、北川，8 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生离死别，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此次地震重创约 5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包括震中 50 公里范围内的县城和 200 公里范围内的大中城市。陕西、甘肃、宁夏、天津、青海、北京等地有明显震感，其中以川陕甘 3 省震情最为严重。甚至泰国首都曼谷，越南首都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地均有震感。据专家介绍这次地震是由于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导致地震。高原物质向东缓慢流动，在高原东缘沿龙门山构造带向东挤压，遇到四川盆地之下刚性地块的顽强阻挡，造成构造应力能量的长期积累，最终在龙门山北川——映秀地区突然释放而造成的。四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地壳脆——韧性转换带，震源深度为 10 千米~20 千米，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破坏性巨大。

这次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民政部报告，截至 2008 年 7 月 24 日 12 时，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 69 197 人遇难，374 176 人受伤，失踪 18 209 人。抢险救灾人员已累计解救和转移 1 485 697 人。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累计 96 451 人（不包括灾区病员人数），已出院 90 846 人，仍有 2 946 人住院，其中四川转外省市伤员仍住院 1 533 人，共救治伤病员 3 207 947 人次。直接经济损失 8 451 亿元人民币。四川最严重，占到总损失的 91.3%，甘肃占到总损失的 5.8%，陕西占总损失的 2.9%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灾区群众高度关切并亲临第一线。为了及时解救受灾群众，5 月 12 日总参谋部立即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展开抗震救灾工作，总参谋部指示有关抗震救灾部队，紧急灾情和有关情况可直接向设置在北京的指挥部报告，已减少指挥环节。在“救援黄金 72 小时”内许多部队官兵迅速赶往各个灾区。5 月 12 日成都军区迅速派出三架直升机紧急赶赴汶川现场救援。四川省军区派出的 300 名官兵正前往救灾一线。当日 20:02 空军两架伊尔 76 军用运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运送国家地震救援队 175 人飞往灾区。深夜第三军医大学紧急抽调联合应急医疗队于赶赴四川灾区。医疗队于 13 日凌晨到达四川德阳灾区一

线后，迅即开展救灾工作。到5月13日6：30驻灾区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投入16760人，其中军队11760人，武警5000人。当日7：00总指挥温家宝再次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他强调，务必要在今天晚上12时以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的道路，全面开展抗震、抢险、救人工作。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不畏艰险，从各地及时赶到灾区，为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如此巨大的灾害，全国人民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为止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94.68亿元，实际到账款物总计594.08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268.80亿元。国际社会也向中国政府 and 人民表达真诚同情和慰问，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截至2008年7月18日为止，外交部及中国各驻外使领馆、团共收到外国政府、团体和个人等捐资17.11亿元人民币。其中，外国政府、国际和地区组织捐资7.70亿元人民币；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捐资199.25万元人民币；外国民间团体、企业、各界人士以及华侨华人、海外留学生和中资机构等捐资9.39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的六支境外救援队伍，已经抵达灾区开展救援行动。在地震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有用自己的身躯保护孩子的人民教师谭千秋、敬礼娃娃郎铮、还有宋志永、杨国明、杨东、王加祥等13位唐山农民再一次自发组织来到灾情最重的北川县城，成为最早进入北川的志愿者之一。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前肃立默哀三分钟。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希望通过“防灾减灾日”的设立，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推动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普及推广避灾自救技能，普遍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温家宝总理说多难兴邦，面对冰雪灾害以及5·12汶川地震，全国人民没有被压垮，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紧密团结，众志成城，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

2008年2月2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着眼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要深刻认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按照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目标，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向前进，推动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相协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必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改革创新；必须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今后五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意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通盘考虑、总体谋划，在广泛征求意见中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第一，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目标模式。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从而最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

第二，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政府在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要切



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三，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按照公平公正、覆盖广泛、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第四，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形成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结构，在政府和部门间合理配置政府的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坚持全面、统一、精干、效能的原则，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基本解决政府部门分工过细、职责交叉的问题。

第五，健全行政运行机制，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第六，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推行行政问责制。在科学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明确责任范围，使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权责规范、明确，做到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

第七，提高政府效能，完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业绩评价体系，以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指标考核干部政绩。

第八，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加强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研究，增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与连续性。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步骤，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意见》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认真分析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要求，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既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也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既体现了改革的前瞻性、创造性，也注重改革的连续性、系统性，表明了我们党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坚定意志，展现了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科学精神。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必须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不断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治组织结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依法行政、健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政府职能得到很大转变，行政机构和人员得到优化精简。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只有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才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更好地应对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各种挑战，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各方面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迫切，这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必须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和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突出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是以往改革的继续和深化，要继续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既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一些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又充分考虑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潜在风险等因素，循序渐进，稳步实施。按照《意见》提出的原则要求，这次改革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二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三是按照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要求，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实施综合设置，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改革后，除



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 27 个。

这次国务院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 15 个，正部级机构减少 4 个。具体内容包括：

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形成更加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加强能源管理机构。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组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改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不再保留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组建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民用航空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国家邮政局改由交通运输部管理。不再保留交通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国家公务员局，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不再保留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建环境保护部。不再保留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再保留建设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明确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就是对这一精神的初步落实。

第一，这次大部制改革的意思主要不是减人，而是重新整合职能。现在的机构设置，存在着行政职能分割过细、职责交叉比较严重的情况，因此需要减少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职能分割不清，职能不统一，势必造成一些部门遇到权力就争、遇到责任就推的现象。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行动，印章盖了一大片，职责不清，相互扯皮，降低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从这个角度看，大部制势在必行。

第二，大部制改革是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联系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些需要大部门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比如能源问题、环保问题，这些问题带有综合性、复杂性，牵扯到现有的许多部门，如果机构不能有效整合，那么依靠现有的机构体制就很难把这些大

问题解决好。

第三，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人民服务对政府来说，就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而很好地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需要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从这个角度看，也需要整合现有机构，建立大部门体制。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的大部门体制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完全的大部制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深化、逐步推进。改革方案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既取决于方案本身的科学性和操作性，还取决于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和执政理念的转变。

确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国务院机构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我们要从我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坚定信心，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

回首过去，从1949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产生至今，人民政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2008年3月3日至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贾庆林、王刚、廖晖、帕巴拉·格列朗杰、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董建华、张梅颖、张榕明和大会秘书长郑万通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贾庆林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过去五年的工作。他指出，五年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包括：一、巩固团结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政协；二、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咨政建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增进民族团结和宗教和睦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始终是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大工作。我们围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执行组织视察，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四、开展促进祖国统一和海外联谊工作，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五、扩大交流合作，形成人民政协对外交往新格局；六、加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

贾庆林在报告中归纳了过去五年工作的六条主要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民政

协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人民政协的“三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保障；坚持全面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贾庆林对今后五年工作提出六点建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献计出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真做好港澳台侨人士团结联谊工作；进一步扩大对外友好交往。

贾庆林在报告中指出，在政协今后五年的工作中，要高度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新阶层的利益诉求。政协要高度关注民生，组织委员运用提案、视察、专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多种形式，协助党和政府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贡献。

贾庆林说，各级政协委员是各界群众的代表人士，应当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贾庆林在报告中指出，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献计出力。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各个方面，围绕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金融改革与发展、资源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气候变化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等重大课题建言献策，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贾庆林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引导港澳委员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更好地发挥作用，广泛团结香港、澳门各界同胞，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要坚决贯彻中央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着力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积极促进两岸人民的接触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在贾庆林作完报告之后，受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张梅颖向大会报告十届政协的提案工作情况。她说，十届政协以来，常委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提案工作方针，积极



探索提高提案质量、办理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新举措。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提案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提案质量稳步提高，提案办理取得新进展，提案工作活跃有序、富有成效。五年来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共提交提案 23 081 件，经审查立案 21 843 件。这些提案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建议，多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前瞻性，在协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08 年 2 月 20 日，99.13% 的提案已经办复，提案反映的许多问题已经解决、许多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实践证明，政协提案已经成为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在 3 月 5 日会议听取并赞同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赞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赞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报告。此后，各个小组讨论了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会议认为十届全国政协走过了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人民政协的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要更加深入地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

会议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切实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

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在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凝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会议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协商。委员们强调，要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有效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业投入，严格保护耕地，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供给保障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切实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把更多资源投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城乡困难群众，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要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推动文化创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的文化需求；抓住举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等有利时机，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时代风貌。要深刻总结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斗争经验，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切实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要精心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人民政协要把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为履行职能的重点，积极建真言、献良策。

会议指出，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要广泛宣传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深刻领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刻领会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心和决心，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要认真总结人民政协伴随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一道前进的光辉历程，最大限度地激发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投身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推动人民政协事业蓬勃发展。

会议指出，人民政协要继续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必须继承和发扬历



届政协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推进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在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创造新的辉煌。广大政协委员要珍惜崇高荣誉，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富民之策，常为利民之举，努力在人民政协这个大舞台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贾庆林参加了看望和讨论。联组会上，郑建邦、杨健、史茂林、庄威、孙南雄、蔡国斌、曹亚、石四箴、钮小明、高小玫等10位委员，围绕发展两岸关系、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发了言。胡锦涛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锐意进取、扎实工作，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

3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闭幕会。这次大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展现了政协委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人民政协这一组织和民主形式的生机和活力，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2008年3月5日~1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3月5日上午9时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吴邦国主持会议。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35个选举单位,根据选举法等有关法律和规定于2008年1月分别选举产生,共2987名。2008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298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这次大会的主要工作有: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二、审查国务院关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三、审查国务院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四、表决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五、表决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此外还有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内容。

在会议第一天,各位人大代表听取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审议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表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表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共五项议程。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他指出: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积极应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努力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战胜了突如其来的严重非典疫情和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等特大自然灾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这些重大成就包括：经济跨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在2007年达到了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取消了延续了上千年的农业税，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国有企业、金融、财税、外贸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涌现出一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技创新成果；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成功举办了上海特奥会，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and 上海世博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依法行政扎实推进，保障人民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五年来全国新增城镇就业51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7703元增加到2007年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过去的五年，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以及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能够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是与我们党所坚持的路线、方针、政策分不开的。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所坚持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敢于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与时俱进，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第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四，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只有把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整个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第五，执政为民是各级政府的崇高使命，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六，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

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只有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努力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3月15日上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吴邦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兆国、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161人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上经过表决，选举温家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选举郭伯雄、徐才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选举梁光烈、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王胜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曹建明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审议了各项报告、方案和草案。同时，代表们围绕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目标和任务，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向大会提出议案。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有以下特点：一、议案内容广泛，涉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立法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立法议案占多数。经初步分析，属于宪法相关法类、民法商法类、社会法类的议案占全部议案的35.8%；行政法类的议案占全部议案的30%。这些都反映了代表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愿望和要求。二、紧紧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提出议案。提出的法律案，涉及213个立法项目，属于制定新法律的196件，占法律案总数的42.5%；属于修改完善现行法律的265件，占法律案总数的57.5%，其中有17个代表团1315人次分别联名提出42件议案要求修改刑法，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在制定新法律的同时不断修改完善现行法律的要求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愿望。三、议案的准备比较充



分，议案质量比较高。一些代表在出席大会前积极参加学习活动，努力掌握提出议案的法律规定和基本要求；形成议案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对拟订和提出议案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

会议还确立了 2008 年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一、搞好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四、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做好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六、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八、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九、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通过这些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 5 年里将在以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第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加强和改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二，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围绕转变职能，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调整和完善行业管理机构，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针对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明确界定部门分工和权限，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第三，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加强行政权力监督，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强化政府层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作用。自觉接受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严肃法纪政纪，坚决改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第四，加强廉政建设。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特别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制约的问题。从根本上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政府采购、国有资产转让等公共资源管理。加大专项治理力度，重点解决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土地征收征用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3 月 18 日上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闭幕式。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了闭幕式。在闭幕式上代表们表决各项决议草案，这些决议

草案包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决议草案；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光辉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的治理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新形势下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各民族 共同繁荣而不断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56 个民族，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 multi-ethnic 国家，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有 1 亿多，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 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原因，与内地沿海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民族地区面临着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双重任务，面临着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突出矛盾。民族问题成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征。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反之，天下大乱，民心大乱，社会发展停滞，人民遭殃。

纵观中国历史，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1840 年～1949 年的 100 多年间，国内民族矛盾尖锐，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入侵，中华大地战火横飞、硝烟不断，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难以维护，人民生活无法开展，国家建设、民族发展无从谈起，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诸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国人备受欺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巴黎和会，低眉折腰，丧权辱国；“南京大屠杀”，30 万同胞死于非命，惨绝人寰，骇人听闻。而国共合作，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恰恰说明了团结的重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族人民站立起来了，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

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强调，民族团结与进步，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继续坚定不移地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努力发扬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坚持不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在我国，民族政策的基础是民族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被明确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这是中国的宪法原则，根据这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了什么是民族平等，在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包括三层含义：一、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域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平等；三、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经过60余年的不懈努力，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各民族平等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各民族都已拥有许多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一、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各民族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各民族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中国，任何公民既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又一律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公民的合法权益一律受到平等的保护，对违法行为和任何人犯罪都依法予以追究，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三、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管理。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四、平等地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指每个公民



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五、享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会议，都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或语言翻译。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时，都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字。六、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对少数民族服饰、饮食、居住、婚姻、节庆、礼仪、丧葬等风俗习惯，国家给予了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

然而，随着民族主义的泛滥，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民族冲突、部族仇杀层出不穷，社会持续动荡不安，一些民族世代栖身的家园战火横飞，无辜生命被残害，人权被肆意践踏，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生活艰难困顿，严重影响国家和地区的安宁与稳定，干扰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所谓的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分裂破坏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市“7·5”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对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为了更好的处理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在政策方面：

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对于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这一制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职责。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核心。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监督检查，推进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二、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困难和问题关键，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途径。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靠加快发展来巩固和推进，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始终紧紧

抓住加快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通过发展，能够缩小各民族的差距，进一步稳固民族团结的基石和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助。同时，也能够带动和促进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增强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实力。

三、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无论何时，都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加强民族团结，事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要建立健全维护团结稳定的长效机制。

四、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相互交织，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往往相互渗透，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往往相互影响，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往往不可分割。在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造成影响。做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在采取的措施方面，主要包括：1. 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充分尊重和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根据全国发展的整体布局和总体要求，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2. 在民族优惠政策方面，国家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三项转移支付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入，缩小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3. 加大扶贫力度，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规模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现在重点把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还有三千多万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有一半以上在民族地区，所以现在国家也加大了扶贫的力度。

进入 21 世纪之后，头 20 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04 年 10 月 21 日集体学习民族关系史，这次学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必须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努力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牢固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要全面地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用法律法规来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用发展的成就不断充实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物质基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真正做到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胡锦涛指出：要贯彻人才强国战略，把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一件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加大工作力度，注重提高素质、改善结构，努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了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胡锦涛总书记还提出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张。这是对新时期民族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和新概括，既是我党几十年来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经验归纳，也是对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既顺应了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既科学、精辟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深刻内涵，也十分准确地阐明了我党制定民族政策的根本依据和理论基础。它高度集中地概括了21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及根本任务，是做好21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2008 北京奥运

2008 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中国再次以其独特的魅力向世界展示了她的强大。

2000 年 6 月 20 日，北京奥申委秘书长王伟在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正式递交申请报告。报告回答了国际奥委会向申请城市提出的 22 个问题，陈述了关于北京筹办 2008 年奥运会的计划和构想，是北京市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的第一份正式答卷。2000 年 12 月，北京奥申委聘请成龙等为申奥形象大使，竭力宣传北京申奥，并利用各自的国际关系，帮助北京在申办 2008 年奥运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2001 年 1 月 17 日上午，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将申办报告交到国际奥委会总部，两天后，国际奥委会通知北京奥申委，北京的申办报告完全符合要求，可以将剩余的报告寄给 120 多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等人士和 28 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从 1 月 21 日开始，北京奥申委向世界各地寄出 182 套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申办报告。

2001 年 7 月 13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12 次全会中，北京从数个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 2008 年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在申奥成功当晚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数万名首都群众汇聚北京中华世纪坛，“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标语随处可见。国家主席江泽民也第一时间出席庆祝仪式，并发表了“热烈祝贺北京申办奥运成功”，“衷心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等慷慨激昂的讲话，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热情。

2001 年 12 月 13 日，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组委）正式成立，刘淇任主席，袁伟民任执行主席，标志着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2002 年 3 月 28 日，北京市公布了奥运场馆的总体规划，并设置热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2001 年 8 月 27 日，罗格在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第一次访问北京，2002 年 4 月 28 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维尔布鲁根主席一行来到北



京了解奥运会的筹备情况，他们对北京的建设准备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坚信北京会成功举办 2008 年奥运会。

2002 年 7 月 13 日，值北京申奥成功一周年之际，由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共同制定的《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正式公布，提出了“新北京，新奥运”两大主题和“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新北京，新奥运”作为中国申办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口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而“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这 3 个理念则指明了奥运会筹备以及举办工作的整体方向，北京奥运会将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2 年 10 月 25 日，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第 29 届北京奥组委授权，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面向全球征集 2008 年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建筑概念设计方案。由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ARUP 工程顾问公司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联合体共同设计的“鸟巢”方案，凭借着独特的设计创意在众多参赛设计作品中一举夺魁，被定为奥运会主体育场的正式方案。该设计方案主体由一系列钢桁架围绕碗状坐席区编制而成，空间结构新颖，建筑和结构浑然一体，独特、美观，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

2003 年 8 月 3 日晚，在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成功两年多之后，2008 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在北京天坛公园正式对外发布，这个以中国印为载体、极富东方文化特色的会徽，为奥林匹克大家庭增添了更丰富的色彩。会徽由印形部分、“Beijing2008”字样和奥林匹克五环组成。印形图案好似一个北京的“京”字，又像一个舞动的人型，潇洒飘逸、充满张力。新会徽集合了中国传统的印章、书法等艺术形式和运动特征，将中国精神、中国神韵与中国文化巧妙结合，象征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具有美好前景的中国形象。12 月 24 日，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以及主要由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朋友捐资为主建设的国家游泳中心正式破土动工，拉开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体育场馆建设的序幕。

2004 年，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不仅继续在跳水、乒乓球、射击、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着统治地位，而且还在多项弱势项目中取得了突破。刘翔的男子 110 米栏金牌、李婷和孙甜甜的网球女双冠军以及孟关良和杨文军为中国夺得的历史上第一枚皮划艇金牌，都令全体中国人为之振奋，

为之惊喜。在半个多月的比赛中，中国军团一共赢得了 32 枚金牌，不仅创造了中国在历届奥运会上的夺金新纪录，而且首次超越了俄罗斯这支传统强队，在金牌榜上仅落后于实力强大美国代表团，排名次席。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北京市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王岐山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手中接过奥运会会旗时，中国体育人士就已经开始了新的一个奥运备战周期。

2004 年 7 月 13 日晚 20 时 15 分，2008 北京残疾人奥运会会徽“天地人”发布仪式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会徽画面是一个变化了的中国书法行书的“之”字，“之”字有两层含义。在意义上，有历经坎坷后达到目标的含义，和残奥会所倡导的自信、攀登、毅力等品质吻合；在形体上，和 2008 年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紧密相连。会徽采用红、蓝、绿三色，红色代表太阳，蓝色代表蓝天，绿色代表大地，其寓意正好是天地人。三种颜色又和国际残奥会会徽的颜色一致。“之”字的天地人会徽，体现了“心智、身体、精神”和谐统一的残疾人奥林匹克精神。

2004 年 9 月 21 日，在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前，北京奥运会倒计时钟上的计时器正式启动了。计时器液晶显示屏上跳动着的数字，提示离正式举办 2008 年奥运会还有 1 417 天。倒计时钟的正式启动也意味着奥运会正式进入了北京奥运会周期，它将成为中国实现百年奥运梦想的历史见证，同时也将成为鞭策奥运筹办工作的动力。

2005 年 6 月 26 日，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主题口号发布仪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仪式并发布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的主题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奥林匹克的魅力与欢乐，共同追求着人类和平的理想，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我们拥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

2005 年 11 月 11 日晚，在北京奥运会开幕进入倒计时 1 000 天之际，第 29 届奥运会吉祥物在正式公布。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由五个拟人化的娃娃形象组成，统称“福娃”，每个福娃都有一个琅琅上口的名字，分别叫作“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当把五个福娃的名字连在一起时，你就会读出北京对世界的盛情邀请“北京欢迎你”。奥运会吉祥物采用奥林匹克五环的颜色，以鱼、熊猫、火焰、藏羚羊和京燕为原型，寓意大海、森林、圣火、大地和天空和谐共处。而由中国红、琉璃黄、国槐绿、青



花篮、长城灰、玉脂白组成的 2008 年奥运会专用色彩系统；以中国书画艺术设计的文化活动、志愿者等二级标志；以篆书手法造就的奥运会体育图标等形象景观，也渗透着浓浓的中国特色与和谐观。

2005 年 6 月 5 日，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标志发布，志愿者项目正式启动。心心相扣的心形，象征志愿者与运动员、奥林匹克大家庭和所有宾客心连着心，志愿者用心服务、奉献爱心，为奥林匹克运动增添光彩。

2006 年 4 月 16 日，2008 年奥运会开闭幕式创作团队揭晓，曾经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导演过“雅典八分钟”的著名导演张艺谋众望所归，成为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张继钢、陈维亚任副总导演。包括国学大师季羡林和好莱坞著名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内的多位中外名家被聘为文化艺术顾问。

2007 年 3 月 27 日，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 500 天之际，“金玉良缘”——北京奥运会奖牌诞生了。北京奥运会奖牌，在传统金属牌上第一次创造性地使用了中华美玉，增加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将中华民族象征美好、尊敬、相爱、相助的美玉，镶嵌在金银铜制的奖牌里，这一创举从构思到实现的过程，都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金玉良缘”巧夺天工的设计引起了西方及港澳台媒体的浓厚兴趣。

2007 年 3 月 8 日，北京奥组委正式开通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票务网站，这标志着奥运会购票工作的正式启动。4 月 15 日，北京奥组委正式宣布，第 29 届奥运会门票开始面向全球公众预售。尽管北京奥组委事先已经制定了多项措施来缓解购票的压力，但在购票工作正式展开后，人们对于购买北京奥运会的热情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奥组委的想象。

2007 年 4 月 26 日，第 29 届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计划路线及火炬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隆重发布。北京奥运会火炬“祥云”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的纸卷轴，而源于汉代的漆红色在火炬上的运用使北京奥运火炬明显区别于往届奥运会火炬设计，红银对比的色彩产生醒目的视觉效果，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媒体传播。同一天，北京奥运会火炬的全球传递路线也予以公布。在历时 130 天的火炬接力活动中，“祥云”将穿越五大洲，走遍世界五大洲 113 个城市，通过 2 万多名火炬手，把北京奥运会吉祥、祥和的信息传到全世界。

2007 年 8 月 8 日，是第 29 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刻。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庆祝活动上，百名歌手一起演唱《我们准备好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出席庆祝活动并向各国和地区奥委

会发出北京奥运会邀请函，这一天也在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作为奥运场馆的“收官之作”，第29届奥运会的主会场——国家体育场落成，标志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办及协办城市的所有37个比赛场馆已全部准备就绪。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鸟巢”从2003年12月破土动工到完成竣工验收，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2007年，英国《泰晤士报》将“鸟巢”列为世界正在建设的十个最大最重要的建筑工程。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在全世界选出的100个最具影响力的设计，“鸟巢”夺得建筑类最具影响力设计的桂冠。奥运会期间，拥有9.1万个座席的“鸟巢”承担了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田径比赛、足球比赛决赛等任务。在奥运会结束后，“鸟巢”将继续承担举办重大体育比赛、各类常规赛事的任务，并将成为北京市民参与体育活动及享受体育、文化娱乐的重要场所，成为全中国具有标志性的体育娱乐建筑。

2008年8月8日至24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中国首都北京举行。此次奥运举行了28个大项，38个分项的比赛，产生302枚金牌（其中中国获得51枚）。2008年，有六万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北京奥运会。除大部分比赛在北京举行外，帆船比赛在青岛举行，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部分足球预赛在天津、上海、沈阳和秦皇岛举行。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奥运会开幕。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多年传承的灿烂中华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气势恢泓的新篇章。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点燃了奥运圣火，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经过了16天的精彩角逐，来自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顽强拼搏，展示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竞赛风貌，创造了骄人的运动成绩，共打破38项世界纪录、85项奥运会纪录。中国代表队以51枚金牌的成绩，位列金牌榜首位。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表示，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北京成功举办29届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场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魅力的展示，是一个呈现国家形象和民族地位的舞台，是世界对中国的肯定。



新时期的教育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但教育的发展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新形势的更高要求。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提升国民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深远意义。

200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听取教工委情况的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育部关于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的工作方案。

会议上,温家宝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重大意义。首先,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当今世界,知识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才培养与储备成为各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占据制高点的重要手段。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振兴直接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振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

其次,教育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困难,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剧,使我国的外部需求急剧减少,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公平正义,同样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各类人才。

第三,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为群众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满足群众对发展教育的期望,推动教育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更

大的发展，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上学难、上好学”的问题，这是人民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198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1993年，中央下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中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党的十七大对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现在，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结合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有必要制定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制订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规划，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6月21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规划纲要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出发，对未来十二年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坚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三个面向”归根到底就是要赶上时代的要求，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要立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需求，从我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些就要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超前安排。要瞄准世界教育发展变革的前沿，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紧密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按照教育发展的规律办事。要把教育的改革发展放在我们正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中谋划，充分考虑国家现代化总体布局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充分考虑国家未来人口发展和学龄人口的结构变化，使规划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第二，要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国社会事业改革相对滞后。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教育规划要成为一个改革的规划，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勇于创新。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探索。第三，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教育兴国、教育立国、教育强国都是国家意志。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方针，必须在教育规划



中得到充分体现。第四，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充分考虑群众的期盼，把促进教育公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作为规划的重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规划的落脚点。第五，要坚持立足基本国情。既要看到我国经济总体实力在不断壮大，又要正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贫富差距大，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既要看到现代经济和城市人口对教育的较高需求，又要重视农村教育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还必须充分考虑我国人口众多、现阶段农村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流动的特征。

规划纲要对我国教育领域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软肋”。《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 年达到 4%。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年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收入分配都要体现法定增长要求，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同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经费使用监督，强化重大项目建设和经费使用全过程审计，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建立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制度，加强重大项目经费使用考评。加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建立健全学校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使用效益。让每个孩子“上得起学”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还提出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生学习营养状况。

如何遏止“择校热”、“择校难”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一大课题。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为此要采取的相关措施包括：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针对我国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大的现实情况，《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

近年来,学前儿童“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日益突出。投入不足、资源短缺、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长期制约我国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规划纲要还将农村学前教育作为发展重点,要求“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改扩建、新建幼儿园,充分利用中小学布局调整富余的校舍和教师举办幼儿园(班)”;“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是我国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政府推进教育公平面临的巨大挑战。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加快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安置工作。2009年,全国997.1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中,已有4/5在公办学校就读。针对日益突出的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学习问题,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就学困难、学习困难等原因而失学,努力消除辍学现象。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为此,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并且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推荐录取;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签订协议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建立专门程序,破格录取。



“政府管得过宽、学校被管得过死”是我国教育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教育规划纲要》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在多个方面保证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为克服高校行政化倾向,要“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规划纲要还提出改革思路,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教育规划纲要》将通过“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等方式,为中小学生减负。《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在具体操作上,要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完善教师退出机制”。国家制定教师资格标准,提高教师任职学历标准和品行要求。建立教师资格证书定期登记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为了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提出要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落实教师绩效工资。农村地区师资力量匮乏一直是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软肋。根据规划纲要,我国将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必需”,《教育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要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推进职业学校专业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大对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的宣传表彰力度,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围。为了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建设积极性,规划纲要提出了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和学校安全管理，提高预防灾害、应急避险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这是针对我国近年来不断频发的校园安全事故和治安事件提出的重要举措。频频发生的校园安全事件已成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情况，规划纲要提出了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妥善处置各种事端。此外，针对我国许多学校只有门卫、没有安保的情况，也提出了“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

教育承载着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使命崇高、责任重大。实施好《教育规划纲要》，是全党全社会和教育系统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应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教育科学发展，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而不懈奋斗！



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

2008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部署，全党必须坚持不懈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同年9月19日，中央召开了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对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在不断改进中得到加强。但是，在党长期执政和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繁重。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的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重大的问题麻木不仁。对于这些事件及其严重后果应该给予充分的估计，并要牢牢记取其中的惨痛教训。因此，全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紧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为了更好的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目标要求，为全党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提供了基本遵循。

学习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一面旗帜、突出一个主题、围绕一个总要求、明确三个着力点”。高举一面旗帜，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突出一个主题，就是科学发展。围绕一个总要求，就是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明确三个着力点，就是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学习实践活动中，要紧紧围绕这三个着力点下功夫、求突破、见成效，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关于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原则。《意见》明确提出，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这四条主要原则是总结我们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特别是学习实践活动试点工作经验的重要成果，在整个活动中要始终至终地把握好、贯彻好、落实好。

关于学习实践活动的目标。《意见》指出，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具体达到以下目标要求：一、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加深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按科学发展观要求解放思想，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使各



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要不要科学发展、能不能科学发展、怎么样科学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共识，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二、解决突出问题。努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促进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完善科学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三、创新体制机制。领导机关着重建立健全推动科学发展的各项政策规定和体制机制，切实转变职能；基层单位着重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努力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四、促进科学发展。坚持把务求实效作为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推进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其中，提高思想认识是基础，解决突出问题是重点，创新体制机制是关键，促进科学发展是目的。对此我们要全面理解和把握。

关于学习实践活动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根据《意见》精神，这次学习实践活动要解决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一、要解决发展思路不清、发展信心不足、发展方式落后、发展质量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切实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落实发展是第一要义的要求。二、要解决执政为民意识淡薄，不深入了解群众愿望、倾听群众要求，对民生问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疾苦关注不够、对群众合法权益维护不够、对社会和谐稳定重视不够等问题，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进一步落实核心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三、要解决片面发展、盲目发展、只顾眼前发展等问题，切实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进一步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四、要解决全局意识不强，缺乏战略思维，不能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畅通等问题，切实把统筹兼顾作为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更加自觉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进一步落实统筹兼顾的要求。五、要解决党性不强、党风不正、执行党纪不严的问题，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强堡垒，把干部队伍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进一步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对这次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做了重大战略部署，根据十七大的有关部署，在活动正式开展之前，2008年2月~8月，首先在江苏省、中央组织部等23个地方和单位进行学习实践活动的试点。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学习实践活动涉及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政策性强，覆盖面广，要求很高，任务很重这一实际，中央研究决定，全党学习实践活动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自上而下分三批展开，每批时间半年左右，到2010年2月基本完成。其中，第一批，从2008年9月开始，2009年2月基本完成，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协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团体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中管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管理的事业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事业单位。第二批，从2009年3月开始，2009年8月基本完成，包括：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政机关；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人大、政协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人民团体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团机关；中央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企业，市（地、州、盟）直属企业事业单位；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第三批，从2009年9月开始，2010年2月基本完成，包括：乡（镇）、街道；村、社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层单位；中小学校；未参加第二批活动的企业、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

为了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党中央采取许多的有力措



施。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领导责任。抓好学习实践活动，关键在领导，责任在班子。为了加强对学习实践活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学习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明确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是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加强对学习实践活动的领导，做到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工作到位。二、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创新。第一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单位要在坚持学习实践活动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从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等不同层面、东中西部等不同地域出发，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的不同特点，根据党员领导干部和机关党员等不同对象，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要求，创新活动载体，搭建实践平台。三、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营造浓厚氛围。要以中央文件精神 and 这次会议精神为基本依据，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图书、互联网等媒体，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宣传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主要原则，宣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先进典型。四、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同推动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学习实践活动当作推动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把学习实践活动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活动结合起来，同推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结合起来。要把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体现到解决突出问题、促进各项工作上，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来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越来越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通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一步增强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国政府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迅速蔓延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受到冲击，企业倒闭和失业情况加剧，并不断向内地和大众型企业扩散。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中国房地产、钢铁、汽车等一些重要支柱产业开始受到冲击，产销大幅度下滑，经济运行更为困难。

2008年10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形势，研究应对措施。会议决定，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向各省区市、中央各部门和军队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通报国际金融危机和有关工作情况。会议还决定，成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小组。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11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经济形势，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认为，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审时度势、抓紧时机，采取坚决果断措施来加大调控。会议决定实施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防止经济增幅过快下滑作为宏观调控着力点，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带动实施总额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在稳定外需的同时大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会议还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通报中央的决策部署，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同心同德抓好贯彻落实。11月10日，省区市人民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统一思想，共同行动，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迅速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11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阐述了做好2009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原则。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全面分析了经济形势，阐明了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具体部署了2009年经济工作：“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次会议作出的全面而系统的部署，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规划了详尽的蓝图。

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抓住关键，突出以下重点。

首先，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首要任务，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扩散和蔓延的影响，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能否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对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越是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其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收缩。而我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第三，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我们谋求的发展，必须是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越是在加大力度保增长的时候，越要重视提高发展质量，重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努力创

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只有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启动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

第四，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是提振市场信心的最好办法。要合理把握改革力度和节奏，尤其要注重加强对保障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体制机制建设，通过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更要扩大对外开放，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走以质取胜、集约化、多元化的发展路子，全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五，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的成果要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食品药品质量和生产安全，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集中财力，加快办成几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大事、实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早在2008年11月底~12月初，短短10余天的时间里，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四次重要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把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调整形成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2008年11月15日上午，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入地阐明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3项重要主张，指出“为了有效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应该增强信心、加强协调、密切合作”，“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危难关头，更要全世界携手合作、共同应对。胡锦涛主席在峰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国



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指明了加强国际合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正确方向，介绍了中国政府为确保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采取的积极举措，强调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 10 项举措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传达了中国积极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得到多国领导人呼应，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向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出的建议：“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等。

在全球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程中，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以负责任的姿态，作出不懈努力：在经济面临巨大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世界金融市场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组织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显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定态度；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决定提供首批 15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尽最大努力向有关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达 6 500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明确宣布将采取八项新举措推进中国同非洲的合作，包括建立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启动“中非科技伙伴计划”、向非洲国家提供 100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扩大对非产品开放市场。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的一系列讲话，中国同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展示了中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009 年伊始，从 1 月 14 日~2 月 25 日 1 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汽车、钢铁、造船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4 万亿元投资前二批 2 300 亿元的中央投资部分在春节前下达到位；1 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 1.6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随着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我国经济形势开始逐渐好转，到 2009 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当季已达到 8.9%。中国经济的航船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惊涛骇浪，奋力实现了“V”形反转。2010 年 1 月 21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09 年中国 GDP 增速。一年多

来，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并未因金融危机冲击而下降。2009 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10.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 9.2%。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中国不但成功实现“保八”目标，而且增速超过预期，交出了一份令世界瞩目的答卷。

从推出一揽子计划到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从拉动经济增长到不断改善民生，从促进改革发展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反应、科学决策、果断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强大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灵活高效的决策执行体系得到进一步展现。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的坚强领导集体。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中国人民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海峡两岸实现大“三通”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间，由于海峡两岸处于对峙状态，两岸人员往来和通邮、通航、通商全部中断。一直到1979年元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倡两岸“双方尽快实现通邮通航”，“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的实现海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被简称为“大三通”，它反映了两岸人民的迫切要求。开辟两岸直达邮路、直达电路，可以满足民众需求，节省经转费用，提高各类邮电服务质量；两岸直接航行，可以为两岸民众提供安全、便捷、经济的交通运输条件，可以进一步扩大人员往来与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大陆方面为实现两岸通邮、通航、通商进行了不懈努力。据统计，从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以来，已有数千万人次的台胞到过中国大陆，大陆人士赴台累计也超过100万人次。现在，在大陆有六万多家台商投资企业，去年两岸贸易额超过1200亿美元。

虽然两岸的交流日益密切，同时中国政府也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干扰和影响两岸的经济合作，但是台湾当局则以所谓“对等”、“安全”和“尊严”为借口，拒不开放直接“三通”，并以此作为政治筹码，要我们在“对等政治实体”和“国际生存空间”等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人为地制造“三通”障碍。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对台八项主张，其中提到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2000年12月13日，台湾当局在两岸未能事先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批准《试办金门马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并决定于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试办金门马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凡设籍金马地区满六个月以上居民，可申请赴对岸观光、旅游与从事商务活动。而大陆地区人民得经由金马地区亲友或旅行社，申请赴金马地区进行旅游、商务、探亲或探病奔丧；每年将允许一定数量的大陆同胞到金

门和马祖访问，最长逗留时间不超过七天；明确规范开放大陆地区物品准许输入金、马两地的项目，并予免关税优惠，但现阶段仍禁止大陆货物经金、马两地转运往台湾地区，违者将依海关缉私条例惩处，这个办法被称为“小三通”。2001年1月1日，新年伊始，单方面实施“小三通”的台湾当局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一出“硬闯厦门”的闹剧，结果以“海安号”首航失败而草草收场。但2001年1月2日来自金门、马祖的民众访问团、进香团则分别直航厦门、福州成功，完成了两岸分隔50多年来的首次客轮直接通航。但是，台湾当局的这一计划纯属政治手腕，虚张声势，其真实目的是摆脱在大陆政策上的困境，换取时间，回避“一个中国”原则。所谓的“小三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其没有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改善两岸关系。对大陆而言，根本不存在“小三通”的问题，事实上，金、马与福建已进行了多年的小额贸易，双方早就已经通了。如今台湾当局将之“除罪化”，对台湾来说仅具宣传上的意义，只能满足金、马少数民众的需求，对于台湾内部广大民众和工商界直接“三通”的需求，根本无法满足。台湾新党“议员”冯沪祥也说，“小三通”计划只是“单向三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三通。”台湾当局对于两岸直接“三通”一拖再拖，拒不开放的做法，已经给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工商界带来许多不便，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社会成本。因为，每年到大陆的台胞超过400万人次，由于不能直航，他们到大陆不仅费时费钱，还备受劳顿之苦，而两岸贸易货物经第三地转运，每年给双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十亿美元。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同胞赴大陆旅游、投资和进行各项交流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两岸民众要求两岸直接通商、通航、通邮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不断扩大，经贸依存度不断提升，“三通”议题凝聚了两岸主流民意，经过不断累积的实践经验和充分准备，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成为时代最强音。200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并发表会谈新闻公报。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双方提出，促进两岸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建立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放海空直航，加强投资与贸易的往来与保障，并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

2008年台湾地区选举领导人，中国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在选举过程中提出了切合实际的两岸直接通航的政策，因此，多数大陆台商回



台支持马英九，上海台商协会会长李茂盛表示，台商最关心的就是两岸早日直航，并且希望尽早开辟虹桥机场飞台北松山机场航线，让台商台北吃早餐、中午上海开会，晚上回台睡觉。同年3月22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举行投票。中国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获胜，得票765.87万张，得票率58.45%。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马英九立即表示原定要送给台湾的大熊猫已经又大又壮，欢迎他们的到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于22日晚发表谈话表示，“台独”分裂势力搞“台独”是不得人心的，期盼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努力。李维一说：我们注意到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结果。陈水扁当局推动的所谓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遭到失败，再次说明“台独”分裂势力搞“台独”是不得人心的。世界各国也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期盼两岸展开对话，美国总统布什说：“我相信，这次选举提供两岸一个新的机会来进行接触和往来，以和平化解双边歧见。”他表示，美国并将依循一贯的中国政策。日本外相高村正彦22日晚间发表声明重申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并指出，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立场已表述于日中共同声明。欧洲联盟22日晚发布声明，对台湾举行的“大选”结果表示欢迎。由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政府代表欧盟发布的声明说：“希望（台湾地区新领导人）提供台湾海峡两岸一个令人愉快的机会，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有所进展，并有利于各自的人民。”声明中也重申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及坚定支持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声明中并提醒，在需要独立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欧盟不支持台湾的正式会籍。对于两岸直航的问题，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岸直航越快实现越好。杨毅还表示，我们希望尽快实现两岸包机的常态化、周末化和货运包机的便捷化，尽快实现两岸直航，我们将为此作出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11月4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首次访问台湾，并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北签署四项协议，内容涉及两岸空运、海运、邮政与两岸食品安全。双方同意开通台湾海峡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开放多个货运包机航点和常态化客运包机航点。双方同意两岸资本并在两岸登记的船舶，经许可得从事两岸间客货直接运输，开放包括数十个港口。双方同意开办两岸直接平常和挂号函件、小包、包裹、快捷邮件、邮政汇兑等业务，共设13封发局，同意通过空运或海运直航方式将邮件总包运送至对方邮件处理中心。

12月15日，东方航空公司MU2075航班在上午8时许由上海浦东机场

起飞，划破长空驶向台北桃园机场。这标志着“截弯取直”的台湾海峡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正式开通启用。几分钟后，台湾首架两岸直航航班——复兴航空332号航班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前往上海。8时47分，这两架划时代的客机，在两岸新航路交接点以西空域相遇，创下两岸空运交流史上的永恒瞬间。几乎同时，中国民航上海区域管制中心管制运行部主任钱海生通过直通热线电话，刚刚结束了与台北区域管制中心值班主任季亮的对话，这意味着上海飞行情报区与台北飞行情报区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直接交接，两岸同胞期待已久的直接、双向、全面空中通航终于变为现实。当天，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天津、广州，到台北桃园、松山，16个平日包机航班往返于两岸8个航点，上座率达到九成以上，上海、广州及杭州等航线均告客满。12月15日上午10时15分，台湾长荣海运“立敏轮”缓缓驶离位于宝岛之南的高雄港，乘风破浪前往大陆北方大港天津。这趟航程不仅穿越台湾海峡，也跨越两岸近60年来不能直接海上通航的历史。15分钟后，台湾万海航运“明春轮”、阳明海运“宇明轮”、台湾航业“桃园轮”和福建华荣航运“康平轮”等四艘船舶，也纷纷驶离台湾北部大港基隆港，航向大陆。30分钟后，砂石船“大邦轮”也从宝岛中部的台中港启程直航广州黄埔港。当天，海峡这头的天津、上海、太仓、福州、厦门、泉州各港，汽笛声也同样此起彼伏。“新烟台轮”、“大洋洲轮”、“新非洲轮”、“远河轮”、“天福轮”、“盛达2号”货轮等10多艘船舶，陆续驶出码头开往海峡彼岸由此正式展开的两岸海运直航，以首航当日两岸13家公司20艘船舶劈波斩浪的潇洒身姿，绘制出一幅动人心魄的“两岸海景图”。81岁的郑坚老人15日上午将第一封从大陆直邮到台湾的民众家书郑重投入信筒，天津市民崔美英有幸成为这个城市第一位向台湾直邮包裹的人。

两岸同胞期盼了数十年之久的“三通”梦终于实现了，这将翻开两岸关系发展的时代新篇。“三通”犹如“三箭齐发”，已经或必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积极效应。两岸正式实现“大三通”之后，马英九表示，两岸“三通”启动象征两岸和解，希望两岸能共谋和平繁荣。国台办主任王毅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不可阻挡。王毅表示，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凡是符合两岸同胞利益、符合两岸关系发展需要、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事情，不管面临多少困难，遇到多少阻力，花费多少时间，终究都会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不可阻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愈发光明。大陆多位台湾问题专家



均表示，两岸直接“三通”的基本实现，是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的重大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指出，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两岸“三通”。经过30年的努力，直接“三通”终于将基本实现，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直接“三通”的基本实现将为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合作节约相当可观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海空直航启动后，两岸之间形成了“一日生活圈”，这将大大便利于两岸同胞的往来和两岸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教授指出，两岸直接“三通”有助于减少生产要素成本支出，有利于提升两岸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遭遇金融风暴、面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直接‘三通’的基本实现有助于两岸经济平稳发展。在此基础上，两岸会产生更多的相互需求，在具体合作方面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为珠三角地区持续发展做出进一步的指导。《纲要》的正式公布意味着珠三角的改革发展事业纳入了国家整体战略的范畴，广东将迎来改革发展的新纪元。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 and 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珠江三角洲地区锐意改革，率先开放，开拓进取，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的发展既面临严峻挑战，也孕育着重大机遇。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出发，为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发挥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先行示范作用，特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本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是，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规划期至2020年。

《纲要》赋予了珠三角五大战略定位：首先，是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赋予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更大的自主权，支持率先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途径、新举措，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全国科学发展提供示范。

其次，为深化改革先行区。继续承担全国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



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

第三，是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创新国际区域合作机制，全面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第四是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建设自主创新新高地，打造若干规模和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和品牌，发展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与港澳地区错位发展的航运、物流、贸易、会展、旅游和创新中心。

最后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居全国经济区前列，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形成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资源互补、产业关联、梯度发展的多层次产业圈，建设成为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和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龙头，成为带动全国发展更为强大的引擎。

《纲要》五大战略定位既有时代高度和世界眼光，又体现珠三角和广东特点，比较好地把握了珠三角地区发展的世界坐标、全国方位和阶段特征。《纲要》从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出发，科学谋划珠三角未来发展蓝图，进一步发挥对全国辐射带动作用 and 先行示范作用。“五个率先”重任落在珠三角的肩上：率先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率先建立创新型区域；率先构建和谐社会；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五大战略定位是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论证后确定下来的。既是中央对珠三角的期望，也符合珠三角发展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30年，珠三角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下一个30年，珠三角能否书写另一个更辉煌的传奇呢？关键在于珠三角人能否进一步强化排头兵意识、转型意识、改革意识和一体化意识，《纲要》的颁布，将这种排头兵意识推到了全新高度。在这份近三万字的纲领性文件里，“率先”、“先行先试”等字眼出现了近40次，明确授予珠三角的全国性试点有九个，示范区、试验区高达12个。最令人瞩目的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字眼出现在《纲要》里，惠州、佛山、中山被确定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四个市戴上“新特区”的帽子，珠三角由此获得巨大的探索和

发展的空间。

珠三角要再创新辉煌，就必须强化转型意识，走出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闯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纲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珠三角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并指明三个努力方向：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技术和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过份依赖外需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转为内外需并重、全面融合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从经济发展单兵突进、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跛脚式发展，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政治建设齐头并进的全面协调发展模式。

珠三角要再创新辉煌，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改革意识，建成深化改革的先行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的阶段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30年，更多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更多的是在“破”中“立”；如今，我们推进的则是系统性改革，更多的要在“立”中“破”。《纲要》明确提出：珠三角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基于这种指导思想，《纲要》对珠三角提出了近百项改革任务。改革进入深水区，珠三角人既要有“破”旧体制的大刀阔斧，更要有“立”新机制的精雕细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作科学的系统设计，确保全面改革的顺利、平稳推进。

珠三角要再创新辉煌，就必须强化一体化的意识。从珠三角自身来看，强化一体化意识，首先要着力打破区域内的行政体制障碍，全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其次则必须站在全国、全球的高度谋划珠三角的新发展，推进粤港澳更紧密地合作，增强辐射力，更好地带动环珠三角、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并以此为依托，加强与东盟等国际经济区域的合作，积极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新格局。

《纲要》的正式颁布，使深圳期待已久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地位终于得以明确，成为继浦东、滨海之后的第三个综合性的配套改革试点。从2008年初以来，深圳官方提出的“社会主义示范市”、“行政体制改革”、“社会工作体制改革”等种种概念，加上前几年已经在践行的“循环经济”、“国家创新城市”、“总部经济”等举措，实际正是一条综合改革的道路。

在《纲要》中，佛山、中山、惠州被定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在“城乡统筹”这个重大课题上，广东再次被寄予厚望。随着试点的



确立，三市城乡统筹的步伐必然加快，从中得益最大的自然是当地农村居民。在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基础上建立的产业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农民的收入；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普及，将使农民生活更有保障，其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城乡一体化方面，中山、佛山、惠州三市已经做出了一些探索，为今后的试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佛山市 2004 年就出台了“统筹城乡发展五十条”以及九个配套文件，以“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探索解决“三农”问题；2004 年 7 月 1 日，佛山宣布全市户籍人口户口性质统一为“居民户口”，近 200 万的农民变成了居民。中山市 200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 22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0 900 元，相对差距远低于全省水平，城镇化率达 84.2% 以上；以“专业镇”为主要形式，中山市通过工业化链条延伸加强城乡经济融合，探索出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新经验。惠州市以解决“一保五难”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逐步使农民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城乡低保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逐步缓解农民“看病难、交通难、教育难、饮水难、住房难”等问题。

《纲要》的公布给珠海市更明确了社会管理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改革突破方向。珠海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先机，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先期遇到了社会深度变革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压力，呈现经济关系多样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新特点，对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势在必行。珠海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珠海市委作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新特区、争当科学发展示范市”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思路、工作目标和举措。力争经过 10 年的努力，基本建成经济发达、生态良好、社会公平，既有魅力又有实力的城市，成为科学发展的示范市。

“先行先试”在珠三角的遍地开花，必将为区域内各城市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根据《纲要》，未来十几年，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的加快建设，也将打造出以广州为中心的一小时城市圈。也将打造出以广州为中心的一小时城市圈。以密集的轨道交通系统为基础，珠三角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同城生活。那个时候，在广州上班、在佛山居住，在香港上班、在深圳居住、在佛山上班、在中山居住或许会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

2012 年和 2020 年的珠三角各是什么样子？《纲要》分别给出了两个阶

段的奋斗目标：2012年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2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纲要》还分别设定了20多个指标进行了定量描述。到2012年，珠三角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到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环境质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能耗水平和环境质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意味着珠三角处处能见到青山、绿地、碧水、蓝天，意味着珠江水可以天天游泳，意味着晚上仰望天空就可以见到满天繁星，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图景，《纲要》为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提出了具体的方法：首先，调整产业结构。服务业是典型的低耗能、低污染产业，2007年，珠三角服务业比重为46.6%，而2020年的规划目标是60%，13.4个百分点的提升，预计可以为能耗下降、污染控制腾出巨大的空间。其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垃圾发电、余热利发电、工业用水重复使用、城镇再生水反复利用，《纲要》提及了大量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让我们看到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曙光。第三，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引导工业企业进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加大力度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站……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我们看到了铁腕治污的决心和力度。第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强自然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加强珠江流域水源涵养林建设和保护，推进城市景观林、城区公共绿地、环城绿带建设。

2009年4月10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决定》，全面落实了《纲要》提出的规划部署、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为进一步提振信心、激发斗志，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一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动全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立足新起点、形成新优势、再上新水平做出了重要部署。

《规划纲要》明确把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赋予“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从全局出发，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发展从根本上指明了前进方向。贯彻实施《规划纲要》，对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外交方针指导下的外交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不断调整着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七十年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寻求同中国接近。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 年 2 月，他在会见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

近的看法。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我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20 世纪头 20 年内，中国将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将继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继续推进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公众外交，积极发展与各国经济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与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 and 了解；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续，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为生存而努力到为发展而奋斗的发展历程。中国外交的舞台曾经很狭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如今的中国外交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起舞，以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舞



台。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正是外交工作需要贡献力量时的时候，和平、发展及合作是中国外交追求的三大目标。和平是中国崛起和世界进步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中国需要和平，世界也需要和平；发展则是解决中国以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只有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才有可能去应对那些困扰各国乃至人类的难题；合作更是不可缺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他国之外寻求发展和谋求现代化。

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9年2月10日~17日对沙特阿拉伯、马里、塞内加尔、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五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就是新时期外交政策影响下的一次成功范例，被称为“友好合作之旅”，成为2009年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外交行动之一。

胡锦涛对亚非五国的访问达到了巩固友谊，深化合作，同迎挑战，共谋发展的目的，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友好合作之旅。胡锦涛主席此访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深刻演变、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并对发展中国家日渐造成负面影响、今年正值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收官之年的新形势下，中国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在短短七天时间里，胡锦涛主席访问了亚非五国，共出席了50多场活动。访问期间，往访国政府和人民给予胡锦涛主席最高礼遇和热情友好接待。胡锦涛主席同往访国政要举行会谈、会见，共商合作之计，共谋发展之策，并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亲切互动，共叙友谊之情。

这次访问巩固和深化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深了中国人民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友谊，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就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达成新共识。

胡锦涛主席此次访问亚非五国，正值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扩大和蔓延，中国、沙特、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期间，全面阐述了中方提出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和主张，强调国际社会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中方愿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协调行动。胡锦涛表示支持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呼吁国际社会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针对中国是否会减少对非援助的担心，胡锦涛主席郑重承诺，尽管中国自身也面临困难，但是中方将认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各项援非举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增加对非援助、减免非洲国家债

务，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加强中非务实合作。胡锦涛主席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中非越要相互支持、通力合作、共克时艰。往访国领导人对胡锦涛主席的上述主张表示高度赞赏和热烈欢迎，认为这将有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增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

第二，推动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

往访五国均对中国十分友好，双方进一步深化关系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就进一步推动双方友好合作，认真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援非举措，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了广泛共识。

胡锦涛主席还同往访五国领导人就中东、非洲形势及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胡锦涛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与往访五国在国际上加强合作与配合，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携手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胡锦涛主席此次五国之行包括四个非洲国家。胡锦涛主席在坦桑尼亚的演讲中着重阐述了新形势下发展中非关系的六条主张，强调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中国人民都珍视同非洲的传统友谊，始终视非洲人民为完全可信赖和可依靠的全天候朋友，愿同非洲人民永做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努力，扎实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胡锦涛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得到非洲各国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往访四国领导人表示，非中关系堪称友好合作的典范，非洲愿与中国加强友好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第三，促进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

胡锦涛主席此次往访五国均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这次访问，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此次访问期间，中方与五国共签署了20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经贸、投资、能源、质检、卫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进一步拓展了双方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访问非洲四国期间，胡锦涛主席表示，中方将继续落实好已经确定的合作项目，愿本着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原则，加强同非方在农业、纺织、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继续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胡锦涛主席亲临现场视察了中国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续行动承担的一些援助、援建项目。这些项目关系到改善非洲民生，有助于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增强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胡锦涛主席出席了马里巴马科第三大桥开工仪式、中国——马里疟疾防治中心揭牌仪式和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竣工



仪式，并参观了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胡锦涛主席还就加强对非合作提出了新举措，包括分别向四国提供更多人才培训和奖学金名额等。在沙特阿拉伯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参观了沙特利雅得水泥公司生产线项目和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科技城。

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同非洲四国发展全面友好关系，并给予无私的援助。此次胡锦涛主席专程访问这些国家，就如何加强双边经贸往来、深化务实合作达成许多共识。这充分说明，中非合作是全方位、多领域、着眼长远的，建立在平等互利、互惠共赢基础上，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第四，为增进人民友好往来创造新亮点。

胡锦涛主席此访亮点不断，生动印证了中沙、中非友谊深入人心、深得民心。往访五国民众对胡锦涛主席到访充满热情期待，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胡锦涛主席深入到各国民众之中，在机场、会场、体育场、工地、医院、课堂等多种场合同往访国各界人士亲切交流，出现许多感人场面。尽管行程十分紧张，胡锦涛主席抽出时间在每一个国家均与媒体会面，向往访国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美好祝福，播撒友谊的种子。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胡锦涛主席同阿卜杜拉国王共同会见了中国少年儿童赴沙特交流团成员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从进入市区的解放碑一直到下榻的饭店，数万群众自发涌上街头，挥舞着中马两国国旗，高呼“谢谢你中国”、“中马友谊万岁”，尽情表达他们对胡锦涛主席的欢迎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数万民众在胡锦涛主席车队两侧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胡锦涛主席。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我援建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的竣工仪式上，上百名少年儿童专门为胡锦涛主席表演了中国老师教授的武术和杂技，并用汉语深情演唱了《南泥湾》等中国歌曲，6 000多名观众在现场热情欢呼，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真心谢意。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正在当地中国文化中心学习的学生向胡锦涛主席展示了他们学习汉语、武术和中国舞蹈的成果，胡锦涛主席与他们亲切交谈，现场洋溢着热烈的气氛，生动反映了中毛文化交流深入人心。

胡锦涛主席十分关心中国援非人员，在马里，胡锦涛主席看望了我援马医疗队队员，关切询问了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努力促进马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两国人民友谊。在坦桑尼亚，胡锦涛主席专程凭吊了中国援坦专家公墓并敬献花圈，深切缅怀为中非友好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

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亲切会见驻往访国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代

表、华侨华人代表，发表重要讲话，介绍国内发展形势及访问成果，勉励他们为促进中国同往访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胡锦涛主席此次亚非五国之行对于进一步推动中沙、中非友好关系发展，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是我国新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加强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外交政策的生动体现。



中共领导全民抗击 H1N1 流感

2009 年 3 月，一种新型病毒——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在墨西哥暴发，疫情随即在全球迅速扩散。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9 年 11 月 29 日通报，全球 207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实验室确诊的甲型 H1N1 流感病例 62 万余例，死亡病例 7 826 例，实际数字还远超过报告数字。继“非典”之后，又一场抗击全球性传染病的战斗打响了。

甲型 H1N1 流感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病原体是一种新型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在人群中传播。与以往或目前的季节性流感病毒不同，该病毒毒株包含有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三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人群对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普遍易感，并可以人传染人，人感染甲流后的早期症状与普通流感相似，包括发热、咳嗽、喉痛、身体疼痛、头痛、发冷和疲劳等，有些还会出现腹泻或呕吐、肌肉痛或疲倦、眼睛发红等。2009 年开始，甲型 H1N1 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

甲型 H1N1 流感的群间传播主要是以感染者的咳嗽和喷嚏为媒介，在人群密集的环境中更容易发生感染，微量病毒可留存在桌面、电话机或其他平面上，再通过手指与眼、鼻、口的接触来传播。如果接触带有甲型 H1N1 流感病毒的物品，而后再触碰自己的鼻子和口腔，也会受到感染。感染者有可能在出现症状前感染其他人，感染后一般在一周、或一周多后发病。小孩的传染性会久一些。

2009 年 3 月 18 日开始，墨西哥陆续发现人类感染、死亡病例。从 4 月 27 日起，国际卫生组织将 H1N1 流感病毒从 3 级升到 4 级警报，2 日后又升级至 5 级警报。世界卫生组织（WHO）初始将此型流感称为“人感染猪流感”，后将其更名为“甲型 H1N1 流感”。6 月 11 日，WHO 宣布将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为 6 级，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阶段。

在 4 月 25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美国和墨西哥甲型 H1N1 流感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从保护人民群众健康

和生命安全、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立足于我国人口多、密度大、流动性强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相对有限的特点，确定了“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的原则，迅速成立了多部门参与的应对甲型 H1N1 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统一部署，依法、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一系列防控措施。

4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门就做好防范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其他国家发生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的报告，研究部署我国加强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

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把防控甲型 H1N1 流感作为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处置，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出行安全，维护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4月30日，卫生部发出公告，将甲型 H1N1 流感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同时，将甲型 H1N1 流感纳入《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卫生部成立了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一系列通知和技术规范，对各地加强防控和应急、医疗救治准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导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开展病例诊疗和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各地确定甲型 H1N1 流感病例定点医院，并做好人员、药品、设备、设施的准备。

5月1日下午，中国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系统甲型 H1N1 流感（原称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视频会议，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甲型 H1N1 流感防范工作的明确要求，进一步部署加强卫生系统甲型 H1N1 流感的预防控制和应急准备工作。卫生部部长陈竺出席会议并对防控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要求各级卫生部门和广大医疗卫生人员要发扬抗击非典和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精神，打好防控甲型 H1N1 流感的阻击战和歼灭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二、加强监测报告，做好调查处理；三、有效准备，有序应急；四、强化培训，做好储备；五、做好应急值



守，确保措施落实；六、开展健康宣教，加强风险沟通。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5月11日上午确诊了中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5月10日下午，四川省卫生厅报告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现一例发热病例，根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初步诊断为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11日早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对该疑似患者咽拭子标本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迅速组织，形成多部门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并在联防联控工作框架下成立了3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综合、口岸、医疗、畜牧兽医、保障、宣传、对外合作和科技等八个工作组以及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专家委员会，形成“8+1”的联防联控格局，从而保证科学应对甲型H1N1流感。

5月29日，我国内地首次出现二代病例。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连夜召开专家会商会，部署防控工作。陈竺表示，防止疫情扩散的重点是加强监测，及早发现本土传播病例，摸清其感染途径，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降低其传播速率。在强化疫情监测方面，国家迅速做出反应。将原来的流感监测网络由197家哨点医院扩大到556家，网络实验室由63家扩大到411家，每周检测标本1万余份，及时提供我国流感样患者比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占流感病例的比例和病毒变异情况。多方面开展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监测措施，为科学研判疫情现状与疫情发展趋势及时提供了依据。

2009年6月以来，我国成功研发、生产出甲型H1N1流感疫苗，并实现了在重点人群中的大规模接种，为有效遏制甲型H1N1流感疫情，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作出巨大贡献。6月初，我国就建立了由发改委、卫生部、工信部、药监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和10家流感疫苗生产企业组成的甲流疫苗研发与联动生产协调机制。6月8日后，我国各家流感疫苗生产企业陆续从WHO获得可直接用于甲流疫苗生产用的毒种，按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工艺经过研制、生产出临床试验用疫苗。7月22日开始，在7个省份实施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甲流疫苗临床试验，13000余人接受了临床试验，卫生部部长陈竺作为受试者亲自接受疫苗临床试验，为全国的志愿者作出了表率。

试验结果表明，接种一剂次15 μ g甲型H1N1流感裂解疫苗即可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保护率超过85%。9月初，甲流疫苗正式投入生产，我国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疫苗研发和注册使用的国家。我国首家获得注册的企业从研制、试生产、临床试验、现场检查、注册检验到最后的审评审批，整个疫苗研制周期仅用了短短 87 天。

9 月下旬，北京、山东等地以及军队和武警部队启动了首批疫苗的接种工作，我国成为全球最早开始甲流疫苗大规模人群接种工作的国家。截至 12 月 3 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完成接种 3 000 万人，部分地区和特定人群接种后已显现出十分明显的保护效果，有效遏制了疫情的传播。

2009 年 12 月 20 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甲型 H1N1 流感已在全球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卫生部 2010 年 1 月 2 日通报指出，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全国 31 个省份累计报告甲型 H1N1 流感确诊病例 12 万余例，已治愈 11 万例，死亡 648 例。截至 12 月 31 日 24 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累计完成甲型 H1N1 流感疫苗批签发 464 批次 8 380.3 万人份。全国 31 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签收疫苗 7 215 万人份；累计完成接种 4 991 万人。2010 年 4 月中旬以来，每周报告甲流感确诊病例数不超过 30 例，并连续 12 周无死亡病例。

2010 年 8 月 10 日 12 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布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后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大流行应对准备计划，“流感大流行后期”指的是大多数国家的甲型 H1N1 流感活动水平已恢复到季节性流感水平，但并不意味着甲流感病毒完全消失，局部地区仍有发生甲流感暴发疫情的可能。8 月 11 日下午，卫生部召集应对甲型 H1N1 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专家委员会和各工作组联络员会议，共同研究下一步防控措施，与会专家和部门一致认为，流感大流行后期要继续加强流感监测、做好疫情防控和病例救治、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卫生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总结前期甲型 H1N1 流感防控经验，不断完善相关预案和防控工作方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这场抗击甲型 H1N1 流感的战役中，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各条战线广大专业人员忘我奋战，通过采取加强疫情形势分析研判，不断调整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强化口岸检验检疫，认真实施疫情监测，积极推进疫苗研制与接种工作，全力救治患者，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及时、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信息，加强新闻宣传和健康教育，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广泛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等一系列措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效减轻了疫情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危



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重症和死亡病例的发生，最大程度地减缓了疫情扩散和对社会经济及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

自从疫情发生后，我国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赢得了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国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采取以周报为主的形式，向社会公布本区域内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指标包括流感样患者比例、甲型 H1N1 流感病例占流感病例的比例、确诊病例数、确诊住院病例数、死亡病例数，并分析本区域内的疫情趋势，提出相关建议。同时，卫生部门加大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和防控知识的宣传力度，使更多的公众及时了解我国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了解我国防控工作策略和防控措施。

在征求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各组和其他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卫生部配合、会同有关部门修改完善了《学校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方案》、《机关企事业单位甲型 H1N1 流感防控指南（试行）》和《乡镇（街道）甲型 H1N1 流感防控指南（试行）》，并积极做好相关防控工作方案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以指导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卫生部不断总结疫情防控工作实践，《国家流感大流行防控应急预案》正在编制完善中。

我国政府为防控甲型 H1N1 流感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延缓了疫情在内地的输入、扩散和流行速度。通过综合防控措施，减轻了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社会生产和公众生活秩序正常、社会稳定，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在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防控措施积极有力，她丝毫不怀疑中国政府有能力抵御这次疫情，并赞赏中国国家领导人为控制疫情所作出的努力。

党中央带领人民沉着冷静、积极 高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从2009年9月中旬开始，中国西南五省出现持续高温少雨的天气，导致这些地区旱情不断加重。其中云南、广西的部分地区的旱情已达特大干旱等级，贵州部分地区旱情百年一遇。由于此次干旱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受灾程度重，已对西南部分地区群众生活、农业生产、塘库蓄水、森林防火等造成极大影响，截至2010年3月18日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达9736万亩，有2054万人、1260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旱灾最重的是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五个省区市，受旱耕地面积8368万亩，占到全国受旱面积的86%。

对这次旱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多次下拨抗旱救灾资金，派出工作组指导抗旱。同时各地党政机关也积极采取措施，抗旱救灾工作部署早、力度大，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拨资金、物资、人员，组织干部群众积极抗旱，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要求军队帮助各地抗旱救灾。胡锦涛强调，当地驻军一定要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密切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投身抗旱救灾斗争，为打赢这场硬仗做出更大贡献。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进行抗旱救灾，201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三下西南，到第一线指导抗旱救灾工作。2月12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九。温家宝上午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后，立即乘飞机赶往广西。12日~13日，温家宝来到河池市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旱救灾工作。温总理在了解当地的灾情之后指出：当前旱区农村工作要以抗旱为中心；首先要保人畜饮水，同时要搞好春耕备耕；党员干部要到第一线，带领和组织群众抗旱，统筹调度水资源；要保证节日期间群众用水，让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他强调，从长远看，根本解决水的问



题，要统筹规划水库、塘坝、水柜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要给予支持，做到来水时能存得住，干旱时能用得上，切实把这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好。3月19日~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云南省曲靖市，深入旱灾最严重的地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在曲靖温家宝指出，目前全国旱情还在发展，北方地区和东部地区又出现低温寡照和雨雪冻害，农业生产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重视农业，切实做好当前的抗旱救灾工作，抓好春耕生产，千方百计保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4月3日~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又赶赴贵州旱灾最严重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先后到兴义市、兴仁县、安龙县，深入村寨，走访农户，慰问各族群众，到田间地头察看灾情，与干部群众共商抗旱救灾大计。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说，党和政府时刻惦念着你们，全国人民牵挂着你们。当前，要千方百计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开辟新的水源，保障春耕用水。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乡亲们说，总理来了，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面对这次严重的旱灾，中央有关部门也都紧急行动起来，急旱区之所急、想旱区之所想，周密部署，科学指挥，精确测报，精心调度。一道道紧急通知相继发出，一项项应急预案迅速启动，一批批救灾款物运往灾区，打响了一场保饮水、保民生、保春耕的抗旱保卫战。为支持西南地区抗旱，国土资源部派出由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带队的4个工作组，分别赴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旱情严重地区指导开展抗旱打井找水工作，并于2010年3月25日在云南召开国土资源系统紧急行动协调会，研究分析各省区旱情及发展趋势，部署下一步找水行动，以进一步组织系统力量支援旱区开展抗旱工作。自2009年秋季以来，国家防总、水利部针对西南旱情先后发出四个紧急通知，分阶段对抗旱工作作出部署。先后派出33个工作组到偏远山区、田间地头，组织指导西南五省区市新建抗旱水源井1.8万眼、抗旱应急调水工程4307处、“五小”水利工程七万处，铺设输水管线两万多公里。在这场抗旱救灾的战斗中，水利部门成为“精算师”，精打细算，科学调度，“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充分利用水资源，确保水资源调配科学合理，优先保障人畜饮水。水利部部长陈雷介绍，截至2010年3月31日，西南旱区累计投入抗旱资金41.1亿元，保障了1939万因旱饮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其中利用水库供水解决了344万人的困难，通过实施应急调水解决了210万人的困难，通过打井开采地下水解决了94

万人的困难，通过拉水送水解决了 506 万人的困难，通过人背畜驮等措施解决了 785 万人的困难。准确的天气预报是及时组织旱情墒情评估，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的重要基础。中国气象局于 2010 年 2 月 27 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Ⅲ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国家气候中心每天与旱区气象局滚动会商短期、中期、延伸期天气预报和干旱发展趋势，先后派出 28 个工作组赴旱区检查指导抗旱减灾气象服务和人工增雨作业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指挥下，随着强有力的政府机器高速运转，一个个充满民生情怀的举措、一次次果敢有力的行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抗旱救灾的强大合力，使得这场抗旱救灾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正在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西南旱灾之际，又一场灾难降临在了中华民族的肩上。2010 年 4 月 14 日晨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 7.1 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介绍，截止 14 日下午 14 时，青海玉树县 7.1 级地震已经发生 18 次余震，未来震区余震活动频繁。截至 19 日 8 时，中国地震局台网共记录到玉树地震余震总数为 1 206 次，其中 3.0 级以上余震 12 次。截止 4 月 25 日下午 17 时玉树地震造成 2 220 人遇难，失踪 70 人。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为做好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任总指挥。回良玉一行于 4 月 14 日晚 8 时左右进入地震震中结古镇，并立即进行灾民慰问活动，了解灾情，组织抗震救灾工作。4 月 15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飞抵青海玉树地震灾区，考察灾情，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抗震救灾第一位的工作是救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尽百分努力，坚持下去，决不放弃。4 月 1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乘飞机前往玉树地震灾区，看望慰问灾区干部群众，实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在玉树州孤儿学校的板房教室里，胡锦涛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并领着孩子们大声朗读。在受灾严重的扎西科村，胡锦涛走到正在清理废墟的部队官兵和公安民警中间，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慰问。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10 年 4 月 20 日国务院决定，2010 年 4 月 21 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青海玉树县地震发生后，各部门立即采取行动投入救援工作中。4月14日8点30分，青海省气象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王莘召集相关处室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地震进行救援及开展气象服务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省气象局随即派出了以副局长张国胜为首的赴地震灾区救援组，并准备了帐篷、发动机、应急移动气象台、移动通讯设备及药品、食品等物资，开展气象部门救援工作。同日13时23分中国地震局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签署决定，将地震应急响应级别升级为Ⅰ级，并立即进入Ⅰ级地震响应状态。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迅速组建医疗救治专家组和医疗队，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到达救灾现场的医务人员立即开展医疗点检伤分类、伤情处理、手术治疗、转运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各项医疗救治工作。同时对当地的医疗救援工作进行必要的指导。从4月15日下午6点开始，陕西省交通运输厅按照交通部的要求，对途经陕西省高速公路前往青海玉树灾区抗震救灾的车辆一律免收通行费，并开辟“绿色生命通道”，确保救灾车辆顺利通行。4月16日，公安部发布生命大搜救总攻令，号召全体参战民警，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周永康同志的重要指示，按照孟建柱同志的要求，立即发起生命大搜救，全力救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以实际行动回报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

面对大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玉树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回良玉4月21日上午主持召开总指挥部第八次全体会议。回良玉强调，要抓紧开展灾害损失评估，全面启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各项工作，确保抗震救灾始终科学依法统一、有力有序有效地进行。在此之前，4月20日青海省政府也召开了玉树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了玉树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青海省省长、青海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骆惠宁在会议上提出，要确保用三年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再用两年时间，把玉树州首府建成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三江源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青藏高原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地区。骆惠宁说，做好灾后重建工作，直接关系到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青海藏区的跨越发展。他还表示，推进灾后重建将把握以下重要原则：一、以人为本，政策措施支持的范围要覆盖受灾全部地区，重点支持城乡居民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等重建；二、科学规划，着眼长远发展，体现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做到适度超前、高标准规

划、分阶段实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玉树一定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2010 年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在接连发生西南大旱、玉树大地震之后，这一年入夏以来，我国许多地方又遭受了洪灾水患。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人为本、科学决策，上下一心、团结协作，勇于拼搏、敢于胜利，出现了一幕幕抗洪救灾的动人场景，夺取了一场场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的尊重与珍惜，展现了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本情怀。面对防汛抗洪的严峻形势，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各地党委和政府指挥抗洪救灾中，首先关注的也是群众安全转移了没有，强调最多的是生命第一、生命至上。江西省委、省政府在每次洪灾来临或水库堤坝出险时，都是在第一时间组织受威胁地区群众安全转移，提出宁可 10 次提前转移没有发生灾害，也不能因麻痹大意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湖南省委、省政府定下了“确保生命安全，确保防洪安全，确保供水安全”的防汛抗灾总目标。陕西省委、省政府要求在抗洪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至上”的原则。在重大灾情面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立即组织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和医疗卫生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灾区，全力抢救受伤人员。6 月 21 日，江西省抚州市唱凯堤决口后，各路援军紧急驰援灾区，创造了 48 小时解救和转移 10 万余被困群众、无一人伤亡的抢险奇迹。在抗洪救灾的不同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带着深厚的感情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切实加强疫病预防，千方百计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药品和帐篷、防寒衣等救灾物资，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处、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就医。所有这些，都充分凸显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今年的抗洪救灾再一次彰显了中国人民大团结、大协作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是九八抗洪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全国人民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随着近年来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角色。

2009年9月21日至25日，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以及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就一系列重大全球性问题发出中国声音。

第六十四届联大于9月23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一般性辩论，有1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会议，各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联合国作用和国际与地区问题阐述看法。胡锦涛主席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全球问题的看法，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互利共赢、实现和谐共处提出中方主张。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深入人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同时，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携手并进，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理念，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懈努力。

第一，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和国际争端，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不断深化国际安全合作。

第二，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发展和平等参与，就没有世界共同繁荣，就无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应该把促进共同发展作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联合国应该加大对发展问题的投入，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努力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国际金融机构应该把新增资源首先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脱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着力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应该采取负责任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举措，坚定反对保护主义，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减免关税，兑现官方发展援助和减债承诺。发展中国家应该立足自主发展，探索有利于实现发展、消除贫困的发展模式。

第三，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挑战、确保和睦安宁的必由之路。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应该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主渠道地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推动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应该加大农业投入，发展先进技术，抑制市场投机，增加粮食援助，加强农业和粮食合作。加强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互利合作，加紧研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构建先进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体系，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

第四，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兼容并蓄，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我们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使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历来把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尽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为进一步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将采取以下举措。一、继续加强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认真落实有关增资融资计划，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有关国家抵御金融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继续落实中国在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举措，促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三、继续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定的各项援非举措，增加对非援助，减免非洲国家债务，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提供人力和技术支持，加大人力资源培训。四、继续参与和推动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维护地区金融和经济形势稳定，促进地区金融合作和贸易发展。

9月24日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共同缔造普遍安全的世界》的讲话，结合新的国际安全形势，介绍中方关于通过互利共赢实现普遍安全的理念，并对国际社会关心的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核安全等提出中方主张。

第一，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积极推进核裁军进程。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规定的义务，并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该继续率先大幅度实质性削减其核武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应该早日生效。应该尽快就“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条件成熟时，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应该加入多边核裁军谈判进程。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国际社会应该适时制订一项切实可行的分阶段的长远规划，包括缔结《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

第二，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切实减少核武器威胁。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就此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同时，核武器国家之间应该谈判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第三，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防止核武器扩散。所有国家应该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切实维护和加强条约权威性和有效性。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职能。所有国家应该严格履行防扩散义务，不搞双重标准，加强和改进防扩散出口管制。

第四，充分尊重各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发达国家应该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和平目的开发利用核能。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加大投入，推动核电、核安全、核技术应用等方面技术合作和援助。

第五，大力加强核安全，切实减少核风险。各国应该严格遵守核安全领域各项国际法律文书，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其核设施和核材料安全，有效防止核材料流失。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核恐怖主义。

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

略，始终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将继续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将继续为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作出努力。中国愿继续为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9月25日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峰会并发表了题为《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的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同时要坚定不移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进程中实现世界经济全面持续平衡发展。

第一，坚定不移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国集团这一平台，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保持政策导向总体一致性、时效性、前瞻性。各国应该保持经济刺激方案力度，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举措，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上多下功夫。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公正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继续承诺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在锁定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成功。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国际新兴产业合作尤其是节能减排、环保、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内在动力。

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20国集团领导人在前两次金融峰会上达成了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政治共识，这是我们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现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有所好转，但我们推进改革的决心不能减弱、目标不能降低。我们应该落实伦敦峰会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着力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推动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应该完善国际金融机构现行决策程序和机制，推动各方更加广泛有效参与。我们应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尽快制订普遍接受的金融监管标准，高质量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第三，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当前，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效实现发展，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才会坚实，世界经济增长才能持久。我们应该完善促



进平衡发展的国际机制，支持联合国在解决发展问题方面更好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推动世界银行增加发展资源、增强减贫和发展职能，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快速有效的金融救援机制，优先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融资支持。我们应该加大形式多样的发展投入，2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推动筹集的大量资金应该优先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合作对促进平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降低人为技术转让壁垒，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缩小发展差距创造条件，尤其要加强绿色技术领域合作，确保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绿色技术。

中国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坚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基本立足点，积极调整内外需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在经济发展中努力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推出一系列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增长、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并取得初步成效。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发展合作。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仍然积极参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中国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落实各项对外援助承诺和举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胡锦涛主席此次参与的系列峰会所涉及到的几大问题，如核安全与核不扩散、经济和金融危机等，既是当今世界各国关心的大事，也是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几个重大国际问题。中方积极参与上述几大峰会，表明中国已成为解决当今世界重大国际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更表明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高度重视中国国际地位和重要作用。

中国领导人积极参与 国际环境保护行动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两代人面临的最严峻、深远的挑战之一。科学家预测，随着温室效应不断加剧，到20世纪末全球升温范围将在1.1~6.4度之间。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从最新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速度来看，地球气候已经开始朝着6~7℃严酷升温发展，大大超出2℃的地球生态警戒线，几乎宣告了生态系统的死刑，世界处在毁灭性的气候混乱状态边缘。过去1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使得人类拥有影响气候、人为加速地球升温的破坏力。要阻止最可怕的暖化灾难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唯一的途径是全人类携手采取最坚决的行动。

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峰会。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外交行动。当前，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构成严峻挑战。这次峰会所讨论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关乎国际未来的重大问题，也是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在应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看法、主张和举措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胡锦涛主席赴美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意义重大。

峰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全面阐述中国“气候观”。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既受自然因素影响，也受人类活动影响，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同各国发展阶段、生活方式、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归根到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该也只能在发展过程中推进，应该也只能靠共同发展来解决。胡锦涛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



展，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不断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胡锦涛在会上呼吁，当前我们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该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坚持这一原则，对确保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在正确轨道上前行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积极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发达国家应该完成《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任务，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下，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第二，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也符合发达国家长远利益。我们应该树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观念，努力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实现各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共赢。

第三，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发展中国家应该统筹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同时，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实际能力的义务。从长期看，没有各国共同发展，特别是没有发展中国家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就没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第四，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发达国家应该担起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支持。这是对人类未来的共同投资。气候友好技术应该更好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应该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互动机制，让发展中国家用得上气候友好技术。

在新形势下，中国将展示什么样的“气候观”，受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胡锦涛此次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就气候变化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中国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胡锦涛表示，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

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1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决定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主张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统筹考虑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积极推进经济 and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实施鼓励节能、提高能效等政策措施，不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投入，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森林碳汇，提高适应能力，取得了积极成效。

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与行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着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特别是在目前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中国政府本着对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全面考虑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能源消费总量、节能降耗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的基础上,制定了这样的行动目标。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关键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实现上述行动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要立足于推动科学发展,立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和气候友好技术,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工作,在2007年就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已经比2005年降低了13%。经过努力,有希望实现单位GDP能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这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亿吨以上,在世界各国中减排量都是非常大的。中国还在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经过4年努力,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5%,提高到目前的近9%。通过大力植树造林,中国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8.2%达到了20%。

尽管如此,要实现2005年至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至45%的目标,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面临着既要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还要面临着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速的挑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现在提出的单位GDP碳强度总体来说还是相对减排的指标,这是从国情出发作出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可能还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可能还会有所增加。我们要在经济质量上下工夫，相对减排主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重复发达国家过去那种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既要保持我们的发展，保证有合理的增长和排放量，又要降低温室气体增长的速度。

2009年12月7日起，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将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会议将在现代化的 Bella 中心举行，为期两周。联合国气候会议一年召开一次，其前身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地球峰会的目的是协调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国际行动。

12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会议。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温家宝说，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13%，相当于少排放8亿吨二氧化碳。中国是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温家宝强调，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但是，我们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

2010年3月9日，中国致信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表示批准《哥本哈根协议》，成为最新一个批准该协议的重要经济体。根据哥本哈根协议，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个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希望能在2050年之前把全球升温控制在两度以内。中国将同有关国家、组织共同努力，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按照“巴厘路线图”，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各国一起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中国政府实现减排目标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将尽最大可能采取政策措施和切实行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全球气候不断作出贡献。



六十年沧桑、六十年辉煌、 六十年感动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喜日子。这一天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庄严雄伟，城楼红墙正中悬挂着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的巨幅彩色画像。巍巍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纪念碑两侧超宽电子屏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格外醒目。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新中国60华诞。广场上彩旗招展，8万名青少年手持花束，组成各种绚丽图案，使整个广场成了花的世界、欢乐的海洋。上午9时58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10时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宣布庆祝大会开始。60响礼炮响彻云霄，200名国旗护卫队官兵护卫着五星红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至广场北端的旗杆基座。由150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场齐声高唱，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响，胡锦涛主席乘国产红旗牌检阅车，穿过天安门城楼，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检阅了44个精神抖擞、装备精良的地面方队。检阅部队后，胡锦涛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说，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个喜庆而又庄严的时刻，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自豪，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

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同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涟漪，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六十年却是一部伟大的崛起发展的历史。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天安门的讲话中指出：60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新中国60年的发展进步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回首六十年前的10月1日，当祖国南部的硝烟还在弥漫之际，在天安门前已响起28声礼炮，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从此站起来！”虽然当时人们依然穿着破旧的衣裳，肚子里依然空空如也。但是他们却拥有全世界最自信的眼光，历史证明了这一切，中国人确实觉醒了，在朝鲜战场上，无数的先烈用自己的血肉证明中国人确实是站起来了，他们在钢铁与火焰组成的暴雨中为中国的在世界的历史上抹掉了中国的屈辱！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使我们这个拥有全球第二多人口、人均耕地只有1.4亩的国家，却养活了全球的1/4的人口。美国历史学家说：新中国成立后只挨过一次饿简直就是奇迹。除此之外，我们还创造了两弹一星、红旗渠等许多的奇迹。在建国初的3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奠定了今天的工业基础，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富强打下了坚固的基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开始与国际接轨，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让世界人民称赞。中国的发展与壮大是与世共睹的，从亚运会到奥运会。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再到全球经济危机。从香港回归到澳门回归到台湾的三通等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的生活改善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当初自行车到现在的机动车，从低矮的平房到现在的高楼大厦，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到现在的鸟巢。经济的腾飞带动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

在讲话中，胡锦涛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对于港、澳、台问题，胡锦涛说，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而奋斗。在外交政策方面，胡锦涛说，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于中国的未来，胡锦涛强调，历史启示我们，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掌握了自己命运、团结起来的人民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历史伟业。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最后，胡锦涛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继续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主席胡锦涛讲话之后，10时37分，阅兵分列式开始。由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组成的方队，护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走在最前面。随后，由军区、军兵种、武警部队和总部直属部队以及北京市民兵预备役部队官兵组成的13个徒步方队、30个装备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11时22分，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旨的群众游行开始。游行分“奋斗创业”“改革开放”“世纪跨越”“科学发展”“辉煌成就”“锦绣中华”“美好未来”七个部分，由36个方阵、60辆彩车和6节行进式文艺表演组成。参加游行的10万各界群众以各种方式，尽情抒发着对伟大祖国的由衷赞美和美好祝福。最后，全部由青少年组成的以“美好未来”为主题的游行方阵走来了。在“未来号”航船造型彩车引领下，少年儿童踩着欢快的节拍，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象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12时25分，历时2小时25分的庆祝大会圆满结束。

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只是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众多活动中的一部分。在9月19日“辉煌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60 周年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隆重开幕。60 周年成就展是首都重要国庆庆祝活动之一，也是开放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致开幕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持开幕式。在开幕词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辉煌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成就展”，是献给建国 60 周年的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辉煌六十年成就展”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的发展史，再现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展示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本次展览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确定的庆祝活动基本原则，综合运用多种展览方式，直观、形象、生动地展示 60 年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国人民创立的丰功伟绩，在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民族振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辉煌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成就展”系统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系统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展望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成就展在展览布局上分为序展、综合展、专题展和展望四个部分。序展分为导言和伟大的历程两个单元；综合展分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个单元；专题展分为农业、工业、基础设施、科教、文化、人口健康社保、对外开放、资源环境、少数民族、国防、一国两制和外交十二个单元。通过展览，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展示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豪迈气概，充分展示当代中国的崭新风貌。这次展览于 10 月 20 日结束，在为期一个月的展出期间，有 70 多万人参观了展览。

为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在 9 月 30 日，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招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6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



业，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盛和欣欣向荣而倍感自豪！6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总结起来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功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和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10月1日夜，首都各界群众八万余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各界群众欢度国庆之夜。

10月6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圆满结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筹办国庆系列活动的有关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演职人员、受阅部队官兵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参加会见。胡锦涛说，为了把国庆系列活动办好，各有关方面精心谋划、周密组织，统筹协调、团结合作，不怕疲劳、连续奋战，为确保国庆系列活动圆满成功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锦涛强调，这次国庆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倍加珍惜、大力发扬。尤其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在活动中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和伟大民族精神，进一步引导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10 年来取得显著成效

西部大开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一项政策，目的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我国之所以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因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十分关注西部的开发建设，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讲道：“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 70% 在沿海，只有 30% 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顾全两个大局”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即到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全国就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并多次就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问题发表重要讲话。1999 年 6 月 17 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

1999 年 11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会议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



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随后，在12月份举行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指出：“要像当年搞特区那样，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副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 and 战略任务，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西部地区特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内蒙古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成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的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可按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奠定基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二、加速发展阶段，从2010年到2030年，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开发的冲刺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跃进；三、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从2031年到2050年，在一部分率先发展地区增强实力，融入国内国际现代化经济体系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加快边远山区、落后农牧区开发，

普遍提高西部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全面缩小差距。2000年，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新开工了“十大工程”，即宁西铁路、渝怀铁路、西部公路建设、西部机场建设、重庆轻轨、涩北——西宁——兰州输气管线、青海30万吨钾肥工程、西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西部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等。与此同时，还开工建设了一批配套项目。同年6月29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全线正式开工。这条铁路长达1118公里，预计2007年完工。青藏铁路将纵贯青海、西藏两省区而成为沟通西藏、青海与内地联系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通道，同时也成为西部腹地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201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了十年，那么这十年间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胡锦涛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世纪之交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十年，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对国家贡献最突出的1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发展，使西部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且为全国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西部大开发工作是卓有成效的。2010年7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介绍了西部大开发实施情况及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任务、政策措施等情况。杜鹰介绍说，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部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应该说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改滞后的局面，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9%，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十年间都翻了一番以上。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像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这些标志性的工程相继建成。铁路、公路通车里程分别是十年前的1.5倍和2.8倍，电力的装机是十年前的五倍。三、生态建设规模空前，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西部地区退耕还林的面积是2.4亿亩，退牧还草的面积是6.8亿亩，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10.32%，提高到现在的17.05%，提高了6.7个百分点。四、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展。这十年间中央在西部地区先后组织了50多项专向性的社会事业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上千亿元，西部地区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大大提高。五、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别是十年前的2.7倍和2.3倍，十年前西部地区有5700万贫



困人口，现在下降到了2 370万，减少近60%。同时西部地区的东、中、西不同地区之间互动合作的关系向广度和深度进展，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格局初步的形成。广大干部群众开拓创新的意识不断的增强，西部人民的精神风貌昂扬向上。西部大开发的十年，使西部各个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陕西省省长袁纯清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来，陕西全省生产总值从1 592亿元增加到6 851亿元，十年间，增长了3.3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8 246元，为1999年的4.1倍。财政收入增长了5.4倍，达到1 104亿元。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说，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形成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并重，以生态保护为主的发展路径。内蒙古既是国家北疆的生态屏障，又是一个资源富集区，目前，已经探明的煤炭储量达到7 000多亿吨，探明的天然气整装气田储量达1.4万亿立方米，同时稀土资源也相当丰富。他介绍，十年来，内蒙古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370多亿元，全区草原面积建设总规模达到了7 458万亩，林业生态建设面积达到1.3亿亩，2.4亿亩风沙危害面积和1.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10年当中，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1万亿元。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巴特尔说。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飏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08年，全区生产总值为1999年的3.6倍，年均增长11.5%；财政收入为1999年的4.2倍，年均增长17.3%。马飏表示，广西将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历史机遇来加快发展，推进全方位的开放。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要建成，届时将有7 000多个产品实行零关税。自贸区拥有19亿人口，经济规模有六万亿美元，按人口将是世界第一大自贸区。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说，凭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重庆已经搭建了产业发展的平台。发展产业将是重庆西部大开发新阶段的重要使命。童小平说，西部大开发的十年，是重庆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十年。重庆市的GDP总量从1 500亿元增加到现在的5 100亿元，年均增长11.7%，比西部开发以前翻了一倍半。据童小平介绍，重庆市工业总产值比西部开发前增长了5.5倍，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3倍，已经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在两三年之后，我们将形成5 000亿元的信息产业，进一步优化这座老工业城市的结构。”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这也只是完成了西部大开发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即奠定基础阶段的任务，接下来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2010年4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会议强调，今后十年是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必须以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坚定不移地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二、要坚持把加强“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三、要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地位。四、要构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五、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六、要进一步加大西部重点区域开发力度。七、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及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5日~6日在北京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出席会议。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今后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胡锦涛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世纪之交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生动而具体的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指出，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此次会议是为西部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总体发展格局进行了新的谋划，更加突出了西部的战略地位，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布局西部地区的发展，新一轮西部发展的大幕已经拉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缩写 CAFTA，是中国与东盟 10 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2010 年 1 月 1 日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 13%，成为一个涵盖 11 个国家、19 亿人口、GDP 达六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与欧盟（European Union）、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并称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包括中国 and 原东盟 6 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以及 4 个新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主席由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担任。中方理事单位由中国有代表性商会和知名企业组成。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的东盟合作方是东盟工商会。东盟工商会由东盟十国最具代表性的商会组成：文莱国家工商会、柬埔寨总商会、印尼工商会、老挝全国工商会、马来西亚国家工商会、缅甸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新加坡工商联合会、泰国工业联合会、越南工商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以下目标：一、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企业对话与合作；二、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三、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 年～2010 年）：启动并大幅下调关税阶段。自 2002 年 11 月双方签署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始，至 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对东盟 93% 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第二阶段（2011 年～2015 年）：全面建成自贸区阶段，即东盟越、老、柬、缅四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亦实现零关税，与此同时，双方实现更广泛深入的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第三阶段（2016 年之后）：自贸区巩固完善阶段。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准备过程。1997 年 12 月，中国和东盟

领导人在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了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针。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和十个东盟成员国宣布了将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1995年~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15%。200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性的78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2.9%。2004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下调农产品的关税，到2006年，约600项农产品的关税降为零。2004年底，双边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文莱、印尼和菲律宾时提出，到201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中国和东盟的7000种产品在大幅降低关税、免配额以及其他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更加顺畅地进入对方市场，这有利于东盟国家的产品扩大对中国市场出口，也有助于中国企业以更低成本从东盟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商务部陈德铭部长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和东盟各国愿同舟共济，携手抗击金融危机，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为东亚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投资协议》包括27个条款。该协议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为双方投资者创造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境，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此次《投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如期在2010年全面建成。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对东盟和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分别达到 0.9%（约合 54 亿美元）和 0.3%（约合 22 亿美元），将为中国和东盟商界创造无穷商机和广阔前景。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首先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当今世界经济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全球化，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风起云涌，发展很快。WTO 的成员基本上都与其他有关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中国和东盟成员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高，全球经济的变动会对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中的负面影响和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应运而生。

其次，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密切发展的需要。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建自贸区的良好基础。一、山水相连，息息相关，相互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相似的历史遭遇；二、资源禀赋各具优势，产业结构各有特点，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三、在国际社会事务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对经济发展有稳定和增长的共同愿望；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改善和发展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友好关系，相互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断有新的发展，尤其是自 1991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来，相互间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及时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积极发展和密切相互间的经贸合作，建立自贸区。

第三，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促使。1997 年，东南亚遭受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受危机打击的东盟各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中国政府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帮助东盟国家最终克服了金融危机。中国在危机中表现出的负责任邻国的风范赢得东盟各国的普遍好评，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改善和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东盟更加明确了地区需要加快经济一体化，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来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和冲击，中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因而选择和中国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必然而积极的选择。

尽管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充满风雨，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建立充满信心。今后几年内，自贸区以及双边经贸关系将出现以下发展前景：

第一，双方的贸易将有更大的增长，贸易结构进一步合理化。随着入世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加快，特别是我国的制造业将会有快速发

展，将带动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占很大比重，而这一产业多为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加工，这将导致相关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的增多。从成本结构来看，在食品、农矿产品、能源和电子产品等方面，东盟与我国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因而从东盟进口石油、天然气、棕榈油、天然橡胶、热带木材等资源性初级产品以及电子电器等机电产品的零部件及半成品将会进一步增多。据分析，按照我国年均10%的进口增长测算，从东盟的进口在2005年预计将达到355亿美元，比2000年的133亿增加近1.7倍，年均增加40多亿美元。如果按照90年代以来从东盟进口增长21%的速度计算，进口数量还将大大超过上述数字。由此可见，我国入世将为东盟产品的出口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有利的机遇。与此同时，我国对东盟的出口也将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这种增长一方面来自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另一方面来自对东盟具有潜在优势的产品。与东盟产品相比，我国纺织品、服装、鞋、食品、谷物、建筑材料等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些产品的进口占东盟从我国总进口的21%，今后几年我国将仍然保持这些产品的出口优势。此外，我国的机械电子设备、精密仪器、钟表手表、车辆、金属产品和化工产品具有潜在优势，1993~1999年东盟大量增加了上述产品的进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东盟同类产品的总进口增长率，因此，在东盟市场上这些产品的份额将会继续增加。伴随着双边贸易的增长，贸易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互出口增多，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将会有明显增大。

第二，双方的相互直接投资将逐步扩大。尽管目前东盟和中国都不是对方投资的主要市场，特别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更少，但随着双方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投资壁垒的逐渐消除，相互投资将会增多。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海外投资是重要的措施，投资的重点区域今后首先将是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周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盟新成员国。随着我国电信、金融、保险和服务业的开放，一些较发达的东盟成员国也将扩大对我国的投资。

第三，经济合作领域将日益拓宽。随着双方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的正式启动和实施，双方的经济合作将进入一个全面深化发展的新阶段，服务贸易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合作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另外，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将会全面展开，特别是随着“清迈协议”的实施和“电子东盟”的启动，我国与东盟在金融、保险与电信领域的合作将更大规模地展开。基础



设施的合作步伐也将加快，同时将带动相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农业、环境保护、能源、知识产权及企业之间，特别是中小企业等方面的合作也将启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合作。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团结合作，也有利于东盟在国际事务上提高地位、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促进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区域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为区域内各国人民谋求福利。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增长也有积极作用。

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全面、深入、快速发展友好关系。维护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从建立国际新秩序来看，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从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来看，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有助于东盟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从双方经济发展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使双方获得“贸易创造”效益、投资增长效益、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对推动双方的经济发展。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历史性的一步。它充分反映了双方领导人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和东盟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新的里程碑。

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10年1月2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派出代表就《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北京开始工作协商。大陆方面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带队，台湾方面由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高孔廉带队，成员包括两岸相关经济主管部门的人员。在这次协商中海峡两岸就《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名称、基本结构、建立协商工作机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英文为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台湾方面的繁体版本称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原称为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协定或称两岸综合经济合作协定（英文简称CECA，即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那么这一协议为什么被称为框架协议呢？“架构协议”是指签署正式协议之前所拟订的纲要，仅先定架构及目标，具体内容日后再协商，因为要协商签署正式协议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为了考量实际需要，故先签署纲要式的“架构协议”，并针对攸关生存关键之产业，可先进行互免关税或优惠市场开放条件之协商，协商完成者先执行。海峡两岸一致认为，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海峡两岸展开进一步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海峡两岸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激烈竞争的挑战，有利于建立具有海峡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有利于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福祉。海峡两岸同意，《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基本内容涵盖海峡两岸之间的主要经济活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原产地规则、早期收获计划、贸易救济、争端解决、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在这次协商中，海峡两岸同意，应本着先易后难、求同化异、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和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尽快推动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程。

其实早在这次协商之前，海峡两岸就已表达出了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愿望。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其中就提出两党将共同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其后，两岸各界有识之士不断探讨和呼吁，两岸应以签署协议的方式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2008年海峡两岸关系实现历史转折后，台湾方面提出希望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台湾方面推动和大陆签署 ECFA 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要推动海峡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目前虽然两岸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是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仍有许多限制。二、要避免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体系中被“边缘化”。区域经济整合是全球的重要趋势，目前全世界有将近 247 个自由贸易协定，签约成员彼此互免关税，如果不能和主要贸易对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台湾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在重要市场失去竞争力。而中国大陆是目前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地区，与中国大陆签署协议并有助台湾与其他国家洽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避免台湾被边缘化。三、要促进台湾经贸投资“国际化”。帮助台湾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并吸引跨国企业利用台湾作为进入东亚的经贸投资平台。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就此议题明确提出：两岸可以签定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2010 年农历春节到来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福建看望台商时说：“现在两岸正在商谈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是一件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双赢的好事。在商谈过程中，我们会充分考虑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农民兄弟的利益，把这件好事办好。”2010 年 2 月 27 日，温家宝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表示，大陆将充分照顾台湾中小企业和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大陆可以做到让利。2010 年 3 月 9 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今年两会商谈工作有两大规划：以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商谈为重点，加快两岸经济关系迈向正常化、制度化、自由化的步伐；适时在两会商谈中增加文化、教育、卫生、新闻等议题，不断为两岸协商注入新的内涵。3 月 14 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再次表示，要让利给台湾。这种让利，比如通过减免关税，通过早期收获实现。另外，也要做出让台湾农民放心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兄弟”。3 月 30 日，国台办主任王毅接受台湾媒体《旺报》专访表示，签署 ECFA 是台湾方面先提出来的。并声明几点基本信息：一、ECFA 的性质是一个经济合作协议，协议中不会有政

治内容，也不会有政治语言。二、指大陆方面选择对台湾降税的产品时，将尽可能选取能惠及台湾中小企业和广大基层民众的相关产品。三、指大陆方面提出希望台湾方面降税的要求时，将尽量不影响台湾的弱势产业。四、大陆不会要求台湾方面进一步扩大大陆农产品入岛。五是大陆无意对台湾实施劳务出口。

大陆方面对台湾方面提出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希望，进行了积极而真诚的回应。而台湾则更加需要与大陆签署这一协议，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登辉对两岸经贸关系开始采取限制性政策，开始推动“南向政策”，希望把产业转向东南亚，陈水扁上台后二次推行南向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让台湾形成分散市场。近10年来，台湾岛内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对台湾经济伤害是非常大的。民进党上台以后，由于台湾和大陆关系的恶化，很多跨国公司从台湾撤离，同时大陆的资金也不准进入台湾，旅游等领域也不开放，从政策上完全扼杀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活力，所以台湾经济走上了衰落之路。而在此期间，韩国经济突飞猛进，台湾远远被甩在后面了，成为“四小龙”的最末。马英九上台以后对台湾经济的症结看得很清楚，决心要扭转局面，改善两岸关系，回过头来带动台湾经济的发展。2010年2月9日，马英九表示，两岸经济协议（ECFA）内容包括减免关税、投资保障与保障智慧财产权三大部分，目的是“帮助人民做生意，提升台湾竞争力”；首度松动今年上半年签订的立场，强调“现在协商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表”。3月9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表示，两岸经济协议（ECFA）4、5月完成谈判工作，6月签署协议是很好的时机。2010年3月14日晚间，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针对媒体报导谭慎格指“两岸经济协议”会使台湾经济边缘化的言论，发表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苏俊宾的三点响应。2010年3月14日，马英九出席“两岸经济协议座谈会”时说，不签“两岸经济协议”的后果就是“生意难做、竞争不过”。2010年4月10日，马英九到高雄向南部中小企业说明两岸经济协议，他强调签ECFA会“一帮二不三要”，就是要帮人民做生意，提升台湾竞争力；不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进口、不开放大陆劳工来台；要关税减免、投资保障和保护智慧财产权。2010年4月25日，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ECFA进行电视辩论。马英九表示，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对台湾有利。签署ECFA，等于打通台湾经济的任督二脉。

海峡两岸高层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的



进程。2010年3月31日第二次两会专家工作商谈在桃园县大溪举行。这次双方业务层级的商谈，属事务性、技术性协商。协商双方将就早期收获计划、协议文本主要内容及未来协商工作安排等深入交换意见。海协会方面由海协会理事、专家等经济主管部门人员组成。商务部台港澳司司长唐炜在致辞中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商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经济优势互补，互利双赢，这将有利于两岸展开进一步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有利于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有利于相互开放市场。台湾方面协商代表、经济主管相关部门负责人黄志鹏在致辞中说，今年1月26日在北京进行的第一次协商，为两岸协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希望双方能够加速相关工作，以互惠互利为前提，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达成共同努力的目标。此后不久，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又在北京再次举行工作协商，逐渐敲定《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文本构成、早期收获计划等重要内容。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领导人第五会谈在重庆举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会谈中就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后续商谈议题等交换意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分别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上签字，然后互换文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从此开启新篇章。2010年8月17日晚间台湾立法机构二读表决通过《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9月11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完成换文程序，同意《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于2010年9月12日实施。

对于协议正式生效，海峡两岸都予以积极肯定。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于2010年6月30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对台湾而言，是历史性的里程碑，走出这一步是正确的。马英九表示，大陆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已经从“世界工厂”快速转变为“世界市场”，除非台湾要自外于全球经贸体系，否则绝对无法忽略。台湾现在同大陆签署ECFA，就是要帮助台湾民众做生意，为提高台湾产品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力赢得先机。签署ECFA能让两岸已经非常热络的经贸活动制度化，两岸间的进出口都将大幅增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姚坚 11 日就此发表谈话。他指出，非常高兴看到协议双方顺利完成了各自相关准备程序，协议即将正式生效。商务部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将积极落实好协议内容，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早期收获的实施。姚坚表示，相信协议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罗智强表示，ECFA 等协议的生效不但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将进一步巩固两岸和平繁荣的现状。罗智强说，ECFA 是让台湾经济不再陷入空转的重要里程碑。同时，象征两岸经贸走向互惠合作的一大步，可以在制度化的架构下，为台湾创造更多商机且增加更多就业机会。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为了推动两岸经济进一步深化合作、遵守世界贸易的有关规则而做出的一项具有两岸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两岸经济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客观需求和需要。

这一协议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地方政府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精神；只规范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事项，如同海峡两岸已签署的其他 14 份协议，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签署的协议。ECFA 其实和 FTA（自由贸易协定）的原则基本是一致的。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区只是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关税同盟，接下来形成共同市场，然后是经济联盟。ECFA 的签订，标志着两岸迈向了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两岸经济融合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在未来两岸经济一体化可以形成类似欧盟的两岸经济共同体，台湾将再度融入到中华民族经济体系当中。ECFA 的签署，也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逐步推进户籍改革

户口或许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烙在每个人身上的最深刻的印记。随着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的一些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无疑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适应国家实施大开发战略，促进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确保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那？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人口迁徙管束较为粗放，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很容易，三天内到有关部门登记暂住户口，居住时期超三个月，就可申报常住户口。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农村生产的初步恢复，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的从农村流向城市，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不但加剧了粮食供求矛盾，也使城镇在住房、交通、就医、教育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与就业压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1953年，国家开始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中国城乡户口的坚冰也从此设立起来。到了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中提出“随母落户”原则；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证明以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部法律的公布使户口登记有了全国统一完整的法律依据，在当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墙，使城乡之间泾渭分明，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又被附加了很多带有利益性的东西，比如，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可能在城市企事业单位招工的时候报名就业；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有可能在城市分配到住房以及获得社会保障等各种机会。而城市又没有给农村进城就业人员任何承诺，最后他们只能是城市的“暂住者”。

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城乡居民间的这道坚冰才首次出现了

裂缝。这一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继而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吃议价粮，办理《自理口粮户口簿》和《加价粮油供应证》。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6年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国新增办理自理口粮户1 633 828户，总计达到了4 542 988人。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维护农民根本权益的角度出发对户籍制度进行调整。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做到来人登记，走人注销；暂住时间拟超过三个月的十六周岁以上人，须申领《暂住证》。对外来开店等暂住时间较长的人，采取雇用单位和常住户口所在地主管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同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草案）》。“一人一证”制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与暂住人口制度成为中国户籍制度基本定型的重要标志。1989年10月，国务院针对一些地方自行放宽“农转非”标准的做法，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要求各地审批“农转非”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下达的“农转非”计划指标内。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达《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分工意见报告的通知》，规定由中央出台“农转非”政策。这一时期户口管理的特点是大量压缩了“农转非”数量，城乡壁垒日益加厚。1992年8月公安部代拟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试图解决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过多与进城计划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通知规定，对在城镇有稳定住所和职业，并要求在城镇定居的农村人口，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允许他们以蓝印户口的形式在城镇入户，统计为“非农业人口”，享受与城镇常住户口同等的待遇。同年10月开始，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先后以省政府名义下发通知，着手试行。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少地区自行出台征收城镇增容费等措施，使本来为了满足农民进城落户要求的“农转非”成为合法、合理、公开进行的户口买卖。据统计，截至1993年，全国累计出售各种城镇户口300多万个，收入达250亿元。与此同时，上海、深圳、厦门等一些沿海城市将蓝印户口政策作为吸引资金、搞活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只要投资或者购房都可办理蓝印户口。1994年，取消户口按商品粮为标准划分为农业



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包括指导性意见：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该城市落户；；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然而，在一系列政策松动之后，持非农业户口的农村人仍然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诸多不公的待遇。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上学问题，许多城市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根本不接收农村孩子，少量接收的学校则需要大量的“赞助费”，因此不少常年在城市的农民工只能选择“民工小学”，但是这些小学设施简陋、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甚至经常因为手续不全而被查封；还有就是就医难的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单位报销，一旦得了大病，以其现有的收入很难保证支付全部费用；而最让农村人愤怒的是，他们为城市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却得不到城市的认可和包容，即使自己勉强被容纳，其父母妻儿也难逃别样对待。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引发了不满的情绪，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正如人口学专家研究表明：合理的人口流动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为实现公民的择业、居住以及迁徙自由，国家不断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人口的正常、合理流动。2002年公安部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进入小城镇和县级市的市区的农民，只要他有稳定的居住地，有稳定的就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举家迁入或者个人迁入。2006年10月，公安部门进一步努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本次户籍制度

深化改革的重点是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线，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的限制。2007年3月4日，公安部表示，该部治安管理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民政部等13个部门进行了户籍管理工作综合调研，形成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然而公安部的这些努力最终无果而终。对于户籍制度改革这一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十分关注，2008年10月9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始举行。此次会议把制度建设和创新作为农村改革的首要目标，紧紧围绕当前农村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对农村制度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

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在国家层面的各项政策调整，许多地方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比如上海，就规定郊区新生儿可以上城市户口，而2003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在各类来沪人员中推行居住证制度。来沪人员根据不同条件申请引进人才、务工经商和投靠就读等三类《上海市居住证》。同年，南京市政府批转南京市公安局关于《南京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各种户口性质，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浙江等地则规定购房即可转户口的政策，并且取消了指标限制。此外广东省的佛山、深圳、中山等地将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居民统一转为非农业户口，实行城市化管理，为下一步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奠定了基础。截至2006年底，已有河北、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取消了二元户口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河北和四川省步伐较快，已经基本取消二元户口划分，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陕西省计划从2005年起用五年时间逐步实现户口一元化管理；而北京市作为有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考虑到城市的承载能力和特殊的政治因素，在户籍改革方面较为稳妥，改革方案和措施还在积极酝酿阶段。

为了彻底打破户籍束缚，剥离捆绑于户籍之上的相关户籍特权，实现城



乡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维系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和网友交流时，透露出高层推进户籍改革的决心。他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症结所在就是户籍。政府今后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将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为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层面，逐步给予城市外来人口公正的待遇和保障，同时推进城市人口向农村地区流动发展，真正让理论上的城乡一体化成为现实。另一方面需要提升独立于户籍存在的人口福利，即公共福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维护社会公平的二次分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一定能够协调好民政、教育、卫生等各部门的配套改革，有步骤、分阶段地通过户籍制度及配套政策的协同改革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

2010年5月1日~10月31日期间，上海市举行了第41届世界博览会。此次世博会也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总投资达450亿人民币，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记录。

世界博览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它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最初以美术品和传统工艺品的展示为主，后来逐渐变为荟萃科学技术与产业技术的展览会，成为培育产业人才和一般市民的启蒙教育不可多得的场所。世界展览会的会场不单是展示技术和商品，而且伴以异彩纷呈的表演，富有魅力的壮观景色，设置成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充满节日气氛的空间，成为一般市民娱乐和消费的理想场所。

世界博览会是综合反映当代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及成就的大型展示活动。它以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被誉为经济、科技、文化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因此是世界各大国争相承办的大型国际活动。中国自1982年至今已参加了十次世博会，并于世博会的管理机构——国际展览局开展多项合作，在1993年5月成为其正式成员国。

1999年5月31日上海市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作出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2000年3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成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成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并确定了以国务委员吴仪为主任委员的申办委员会成员名单。5月15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情况介绍会。吴仪国务委员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全力支持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2001年4月25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新鲜出炉。5月2日，中国驻法国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中国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申请书。11月30日国际展览局举行第130次成员国代表大会。时任上海市市



长徐匡迪作了申办陈述。2002年1月30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递交了中国政府申办2010年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报告,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致国际展览局领导人的支持信。2002年12月3日国际展览局举行第132次大会,对2010年世博会主办国进行投票表决。在第四轮投票中,中国上海获得54票,成功赢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

上海世博会是全国人民的盛会极大推动了上海所在的环渤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进而辐射和激励全国。有经济学家测算举办上海世博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会达到每年0.6%。两大盛会场馆的建设和投资,将大大促进举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后续影响会持续10~15年。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和地区经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而21世纪的头20年,正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当此之时,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的上海承办世博会,机遇就在眼前,内涵殊为深远,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

主题是世博会的核心和灵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提出首先具有独创性,在世博会历史上,从未有其他举办国家将“城市”作为主题。同时,兼具时代性,城市的产生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Better City, Better Life”表达了全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作为世界博览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具有普遍性。任何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可以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通过不同的视角、围绕不同的城市组成要素,展示城市文明成果、探讨包括城市环境、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科技等方面的问题、交流城市发展经验。因此,这样的主题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可展示性。

“和谐城市”是上海世博会主题的精髓。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以“和谐城市”的理念来回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和谐”的理念蕴藏在中国古老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推崇人际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礼记》在描绘“大同社会”时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中国的先秦诸子也都在各自的著述中设想了和谐的社会。同时“和谐”也见诸西方先贤的理想。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系统地提出了和

谐说，和谐包含着对立和统一。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提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到的和谐更美好”的主张。而在《理想国》和《法律篇》里，柏拉图也开始寻求“整个社会将获得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获得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的美好状态。数百年来，人们对“和谐城市”模式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再到“田园都市”，一系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无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平衡与和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各国城市政府为提出的发展战略大多围绕如何重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达到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和谐。由此可见，对“和谐生活”和“和谐城市”的追求和实践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并且正越来越彰显在人们为明天城市所描绘的蓝图之中。建立“和谐城市”，是从根本上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和谐，在形式上体现为多文化的和谐共存、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和谐城市”的理念将为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提出更新的挑战，并将之引入更高的境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徽在2004年11月29日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徽揭晓仪式”上公布，会徽图案以汉字“世”为书法创意原形，并与数字“2010”巧妙组合，相得益彰，表达了中国人民举办一届属于世界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博览盛会的强烈愿望。会徽图案从形象上看犹如一个三人合臂相拥，状似美满幸福、相携同乐的家庭，也可抽象为“你、我、他”的广义人类，对美好和谐的生活追求，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突显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人为本的积极追求。会徽以绿色为主色调，富有生命活力，增添了向上、升腾、明快的动感和意蕴，抒发了中国人民面向未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激情。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吉祥物，于2007年12月18日20时揭晓。吉祥物由巫永坚设计，命名为“海宝”，即取“四海之宝”意，主体为蓝色“人”字造型。上海世博会吉祥物的设计，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演绎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选用了汉字的“人”作为创意点。而吉祥物的蓝色则表现了地球、梦想、海洋、未来、科技等元素，符合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吉祥物整体形象结构简洁、信息单纯、便于记忆、宜于传播。虽然只有一个，但通过动作演绎、服装变化，可以千变



万化，形态各异，展现多种风采。“上善若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吉祥物的主形态是水，他的颜色是海一样的蓝色，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拥抱世界的崭新姿态。海宝体现了“人”对城市多元文化融合的理想；体现了“人”对经济繁荣、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设的赞颂；体现了“人”对城市科技创新、对发展的无限可能的期盼；也体现了“人”对城市社区重塑的心愿；他还体现着“人”心中城市与乡村共同繁荣的愿景。海宝是对五彩缤纷生活的向往，对五光十色的生命的祝福，也是中国上海对来自五湖四海朋友的热情邀约。以汉字的“人”作为核心创意，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又呼应了上海世博会会徽的设计理念。在国际大型活动吉祥物设计中率先使用文字作为吉祥物设计的创意，是一次创新。“人”字创意造型依靠上海世博会的传播平台，必将成为中国上海世博会的吉祥符号和文化标志。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场，位于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区域，并沿着上海城区黄浦江两岸进行布局。世博园区规划用地范围为5.28平方公里，包括浦东部分为3.93平方公里，浦西部分为1.35平方公里。围栏区范围约为3.22平方公里。上海世博会历时184天，共有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参展，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已有11项纪录入选世界记录协会世界之最。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表现出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气质。展馆的展示以“寻觅”为主线，带领参观者行走在“东方足迹”、“寻觅之旅”、“低碳行动”三个展区，在“寻觅”中发现并感悟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展馆从当代切入，回顾中国3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凸显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和成就，回溯、探寻中国城市的底蕴和传统。随后，一条绵延的“智慧之旅”引导参观者走向未来，感悟立足于中华价值观和发展观的未来城市发展之路。

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在2010年4月30日20点在世博文化中心举行。作为全世界人民的世博会，灿烂的烟花与绚丽的水景在黄浦江上交相辉映，盛况空前。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将是中华风情和世界潮流的融合。开幕式由《中国欢迎你》、《欢聚在世博》、《世界同欢庆》三个篇章组成，运用绚丽灯光、奇妙装置、流动喷泉、灿烂焰火以及多媒体等综合元素，构成“五洲同欢庆、四海期欢腾”的盛大庆典。

网上世博会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10年5月

1日正式上线，是世博会的导引、补充与延伸；是服务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集推介、导引、展示、教育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性的网上平台。世界博览会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一直是以实体场馆的方式进行展览展示。上海世博会将推出“网上世博会”项目，通过互联网新媒体与多种技术结合，把世博会最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推进世博会，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

上海成功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为上海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和市民综合素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世博会将带来的主要经济效应有：推动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对GDP的贡献效应、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后续经济效应等。另外，世博会还将给上海带来其他效应，如：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提高上海的知名度和区域辐射效应等。改革开放的中国举世瞩目。20多年来，中国经济腾飞，政局稳定，文化繁荣，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和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令世界刮目相看。世博会在中国举行，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申办的信心。“中国如有一份幸运，世界将添一片异彩。”中国有信心办好这样一个大型世界博览会，给世界一个惊喜，有信心展示中国，沟通世界，并对人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